

魯迅傳

雪色付

王士禛著

光緒二十三年

魯迅傳

著者 王士禛
出版者 新知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東北華東·中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LUSIN ZHUAN

一九四九年一月
哈爾濱東北二版
五千冊

D. H. 0001—5,000

魯迅傳序

魯迅傳在中國印行的有一種日人小田獄夫寫的譯本。而直至現在，魯迅逝世了十一週年的時候，纔看到這一本是中國人寫的，即此一點，也可以說彌補了多年的缺憾。

日譯本魯迅傳未出版前，確曾有先睹之榮，也曾傳予幾本魯迅著作以爲查檢一些引證魯迅作品的文字。但不知怎的，在「文藝春秋」介紹時編後記裏竟硬被說是「許廣平校訂」的了。與之交涉：這不能算「校訂」，因爲我並沒有拿日文與譯本對校過，並且要求下一回予以更正。待到次一期的「文藝春秋」到手，翻譯編後記一看，那更妙了，大意是說：魯迅傳許廣平並沒有從日文對校，不過是她校訂的。這是什麼話？自己不懂得日文，而却不怕汗顏冒充什麼大名流來掛一個校訂的空銜因爲榮麼？那時是日本人統治的世界，我沒有可以發表更正之詞的地方，一直容忍着。直至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的時候，也仍然照樣登廣告說是我「校訂」的。但是我又犯不着爲這一點點小事來特別寫聲明，感謝這一本魯迅傳要我說幾句話，因而順便連想起來，作從我自己手裏洗掉被偷冒校訂之名的良心上數年來的不自在。

日譯本早先曾由柯靈先生向我提起，是否可以替它出版？我的答覆是：那本書，原著者有若干主

觀之見，拿來放到魯迅身上，這是不大好的。第一點，他看到中國文藝工作者，好一點的都往西去了，沒有肯替他們做漢奸，因此頗有微詞，尋根究底，似乎尋到魯迅身上，被推崇爲他的關係，因而說發生之後，中國文人把魯迅當作文化戰神云。這太抹煞各文藝工作者自己崇高的認識，我不大同意。其次是：大多數日人強調認爲魯迅的攻擊時弊，是對某一個負責者的斥責，是反對他。藉此作掩飾，辯護，以爲某人也被寬其所對，無怪日本要爲其伐罪，深入中國了。這是非常惡毒的寫法，在那時。魯迅的攻擊對象，有時固然我一個人物以代表某一集團，如陳源之與現代評論派。但是對於普遍的惡劣情形，以至無須拿具體事物即可以了然於中國政治的昏亂，則不是一二人而是一大群連某人在內的集體作。不過其固有程度深淺之不同罷了。廣泛些說，也可以與階級、思想、制度有關的。因此我以爲小田氏的寫法，是隨着戰爭環境，一如其他日人的通例，統統在戰爭時期，爲日黷武主義者借詞解脫。在抗戰時代，我們替他出版，是不大好的。待到譯者把譯文給我看的時候，曾經把這一點頗爲重要之處說明了，似乎譯本出版，多少刪掉了一些。

勝利之後，有機會看到這本真正自國人寫的魯迅傳。他把中國歷史發生的重要事件和魯迅生平經過，從頭正確地，客觀地找出它的所以然。惟其如此，纔能了解魯迅行文，處世的真意。這正是我多年心裏所願看到的，而希望竟在眼前實現，這一歡欣鼓舞，是不能言語形容的。

魯迅活着的時代，正是中國人民從睡夢到覺醒，從死的古文到活的白話文，從被征服到掙鎖枷鎖，從帝國主義的統治高揚到人民起來自主……。凡這些，魯迅生息期間，吸收其滋養，在這國土裏發芽

整苗，即是一棵稻草吧，當然有秕稻從旁擠軋，那是毫不足為奇的。然而人們還是要稻草存在，因為是人類所需要的。魯迅著作的存在，一如稻草，因為是人類所需要，所以值得研究。而這魯迅傳是提供我們研究這作家所代表的時代，為人類所需要的一部分歷史過程，而作者王士菁先生却把握到這些，凡我們所願意知道的，都盡力告訴給我們了。

本書的小疵不是沒有。據我看：有些地方略嫌引證過多，如魯迅原著，幾乎大家都容易看到，無需連篇引證的。至於別人攻擊的文字，引證出來，可以豐富讀者的另一觀感，未始不可作研究的資料，但倘使對魯迅批判得不甚確當，甚或含有若干主觀，意氣存在，反而無意中有使研究主題淆混之嫌了。

我學植甚淺，或未能盡窺作者全意。大致說來，個人認為這本書總算值得一看，的確為中國人自己寫出來的，到現在為止，比較客觀的一本魯迅傳。

景

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次

序(景東).....

第一章 幼年時代

一歲至十三歲.....

第二章 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

十三歲至十八歲.....

第三章 走出了『狹的籠』

十八歲至二十二歲.....

第四章 在日本

二十二歲至二十九歲.....

第五章 回到故鄉

二十九歲至三十一歲.....

第六章 沉默

三十一歲至三十八歲.....

第七章 吶喊與彷徨

七

三

三

三

七

一

一

二十八歲至四十六歲..... 八五

第八章 廈門—廣州—上海

四十六歲至四十七歲..... 三五

第九章 被圍攻

四十七歲至五十歲..... 三六

第十章 真理·光明·力量

五十歲至五十六歲..... 四〇

後記（建人）..... 四三

第一章 幼年時代：一歲至十三歲

——一八八八——一八九三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巒陸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澈，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註一）

在這樣的一個自然環境裏，襯托着這秀麗的山光水色，並且使得這山水增加光彩的，更有許多前聖先賢的偉蹟和義女俠士的遺烈。後來的人們對此往往徘徊流連不能去，熱慕着，傾戀着，由此，更油然而生怎樣地去繼承，去發揮前人的豐功偉業，爲人類底歷史再添寫些比前人更輝煌而顯耀的新頁。

和中國別個地方一樣，也許更要精彩些，豐富些，在魯迅底故鄉也被保留下來許多史實和傳說：「舜上虞人。去處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註二）在中國傳說中最古的人物中間的一個，親自躬耕，用自己的勞力換取衣食的聖人，便生在這裏。又：「舜橋，舜避丹朱於此。百官從之，故亦名百官橋。」（註三）對於自己的勞動領袖，老百姓們是擁護的。

「會稽山在縣東南，其上，石狀似覆釜，禹夢元夷倉水使者，卻倚覆釜之上是也。」（註四）又：「郡

有禹穴，案「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又有禹井」(註五)相傳禹是治平洪水，爲中華民族開闢草萊的第一個大聖人。又：「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壇，人工所作，故謂之千人壇。」(註六)這便是民衆對於民族英雄的酬勞。然而，他們對於暴君却又有另一種待遇：「始皇崩，邑人刻木爲像祀之，配食夏禹。後漢太守王朗，棄其像江中。」(註七)專制暴君的淫威雖能震懾人民於一時，可是這股憤怒的火燄到底總有發作的一天。」

「嚴光一名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六年，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論故舊累日，拜爲諫議大夫。莫留宿，遵以足荷上，共夜，客星犯天子座甚急。明且，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與故人嚴子陵俱臥耳。」又：「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註八)後來，他一個人到富春江，披起羊裘釣魚去了。不爲統治者幫忙或幫閒，這是

(註一) 見「魯迅全集」第八卷第九九頁，「會稽郡故書雜集」：孔靈符撰「會稽記」引「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會稽郡記」。

(註二) 見同書第一〇六頁，引「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舊記」。

(註三) 見同書第一一五頁，夏侯曾先撰「會稽地志」引「寰宇記」九十六。

(註四) 見同書第九九頁，引「御覽」四十一。

(註五) 見同書同頁，引「御覽」五十四。

(註六) 見同書第一〇六頁，引「嘉泰」會稽志「十八云」史記正義引「舊記」。

(註七) 見同書第一〇四頁，引「嘉泰」會稽志「六」輿地紀勝「十」。

(註八) 見同書第二四頁，虞預撰「會稽典錄」卷上。並參看同書第一三頁，謝承撰「會稽先賢傳」：「嚴遵」。

「嚴遵」。

何等骨氣！

「董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甚肥。說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辱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烏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註一）士可殺不可辱，這種反抗精神是越人的特色。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迎伍君神，浙澗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註二）小兒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默默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實踐自己的懷抱，較之閉口忠孝，閉口節義的王公大人，爲何如呢？這才是民族的光輝，山水的精靈，後來者的榜樣。

二

隨着時序的遷移，歷史走向牠應該走的方向和道路。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帶給了中華民族苦痛和災難。從此，中國人民大眾便踏入艱苦的鬪爭裏。

在魯迅出生前四十年，中國爆發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以這一戰爭作爲起點，中國人民逐漸地被迫着走入被搾取被剝削的殖民地化的陷阱裏。這之前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一種比較落後的封建主義的形態，統治在人民頭上的是滿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吏，滿清皇

帝是最大的地主，官吏們是他的幫手。人民則是他們的奴隸。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前後這一時期起，整個的中國歷史進程起了一種本質上的變化。英國軍艦後面帶來的不僅是鴉片和其他的商品，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我們古老的國度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希奇古怪的「資本主義」，牠促使着整個的中國封建社會解體，強迫着中國農村走向崩潰的道路，把牠的勢力儘量地伸展到每一個封閉着的角落去，牠想要使得封建主義隸屬於牠。

起初，滿清帝國對於這外來的力量，還拚死拚命地抵抗幾下，結果是不上三個回合，於是就碰得焦頭爛額，再也沒有勇氣去嘗試了。於是就服服貼貼地跪倒在洋大人的脚下搖尾乞憐，恭而敬之地獻上降書降表，並且把人民大眾的利益當作他們的稱臣納貢的禮物；牠把統治的寶座讓給外來的主子，而牠自己却退居於奴隸總管的地位，藉此而揩油以自肥。事實上，在外來的資本主義戰勝了土著的封建主義之後的滿清政府，牠祇不過是國際財神爺們在中國代爲收稅的最大的唯一的機關而已。牠除了壓迫和榨取勞苦大眾之外，牠是什麼本領都沒有的，然而，牠却擺出一個空架子，揚着一面空招牌，繼續着，矛盾着，發展着。

舊的日子不會再回來了。新的時代和新的人正邁向着中國人民。

(註一) 見「全集」第三二頁。

(註二) 見同書第六五——六六頁，「會稽典錄」卷下。並請參看同書第一一四頁，夏侯曾先撰「會稽地志」。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按中國的舊曆是清光緒七年辛巳八月初三日），魯迅在浙江省會稽縣（後與山陰合稱紹興縣）周家誕生了，名樟壽，字豫山，因為豫山讀音和「雨傘」相似，不好聽，不久便改為豫才。「魯迅」是他後來在一九一八年發表小說，登載在當時的「新青年」雜誌上的筆名。這周姓人家，原籍湖南道州人，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四世，（註一）最初搬到紹興來的祖先似乎是農民，（註二）定居紹興之後，子孫漸漸興旺，分爲若干房，住在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房住在紹興城東的覆盆橋附近的，就叫做覆盆房，此外還有清道房和竹園房等。覆盆房起初只有一家，後來人口多了起來，又分作三房：致房、中房、和房。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在城內東昌坊口的一所房子裏，叫做新台門；魯迅就出生於「新台門」這一支裏。

紹興周家起初是沒有錢的，後來才慢慢的富有起來。但不久就窮了下去。及至魯迅出生時，他家又有四五十畝水田和少許店面房子，但是，生活還不成問題。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官，家裏有曾祖母、祖母、祖父的妾、姑婆、父、母、庶出的叔，及姑母二人；稍後又有第三人（四弟早死），妹一人（亦早死）。父伯宜公「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註三）因為魯迅在周家是長男，他的父親怕他沒有出息，養不大；所以不到一歲便領他到附近的長慶寺裏，拜了一個和尚爲師，取個法名叫做「長庚」。（註四）這和尚給他一件百家衣——「衲衣」，這「衲

衣」在理論上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而他的卻用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逢喜慶大事不許拿出來穿。此外，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位師父是個瘦長的個子，瘦長的臉，高顴骨，細眼睛，留着兩縷下垂的小鬍子，是一個與別的和尙不同，在封建社會中頗爲出色的人物，大家稱他爲「龍師父」。

家裏照顧魯迅的是一位生得黃胖而矮的女人，魯迅的祖母叫她「阿長」，家裏的人則通稱爲「長媽媽」。(註五)她是個粗鹵而淳樸的鄉下女人，沒有什麼知識，但是她卻知道一些莫名其妙的禮俗和禁忌。夏天夜裏，她躺在床上伸開兩手兩脚，擺成一個「大」字，把魯迅擠到蓆子的一角，沒有翻身的餘地，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

平時，她的規矩多得很：她不許魯迅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算是頑皮了，要告訴他的母親去。

(註一) 見王治秋先生著「民元前的魯迅先生」第二頁。

(註二) 請參看魯迅先生作「魯迅的家世」。

(註三) 見「魯迅全集」第七卷第四四七頁，「自傳」。

(註四) 請參看「全集」第六卷第五七二——五八一頁，「我的第一個師父」。

(註五) 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三五二——三五九頁，「阿長與山海經」。

一年中最高興的日子，自然要算除夕了，辭歲之後，魯迅從長輩那裏得到的壓歲錢，用紅紙包着，放在枕邊，只要過一夜，便可隨意使用。他睡在床上，看着紅紙包，想到明天真來的小鼓、刀鎗、泥人、糖菩薩，……他真高興極了。長媽媽走進來，又在魯迅的床頭放了一個福橘。

「哥兒，你牢牢記住！」她極其鄭重地說，「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記得麼？你要記着，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不許說別的話！說過之後，還得吃一點福橘。」

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魯迅眼前搖了兩搖，又說道：

「那麼，一年到頭，順順流流，……」

夢裏也記着元旦，魯迅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長媽媽卻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將他按住，像有所要求的搖着魯迅的肩頭，魯迅忽然想起了——

「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於是十分歡喜，笑了起來，同時將一點冰冷的東西，往魯迅嘴裏一塞，他大喫一驚之後，也就忽然記起福橘。元旦開始的磨難過去了，然後，他才以下床玩耍。

此外，她又教給魯迅一些道理，例如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生了孩子，死了人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喫下去；晒襪子用的竹竿底下，

是萬不可續過去的……。

她講起故事來，也是希奇古怪的。她說：先前「長毛」（她所講的「長毛」不單是指太平天國的軍隊，而且連後來的一切盜匪都在內）時候，魯迅的一家人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看門的和一個煮飯的老媽子看家。「長毛」進門來，老媽子嚇慌了，叫他們「大王」，並且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喫了罷！」說着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那正是看門的人底頭。煮飯的老媽子從此被嚇破了膽；後來一提起這事，就立刻面如土色。長媽媽說時她自己也輕輕拍着胸脯說：「阿呀，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像你一樣的小孩子，」她又對魯迅說：「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魯迅以爲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看門的，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漂亮。

「那裏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我們也要被擄去的。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襪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礮就放不出來；再放，就要炸了！」

出於意料之外，她還有這麼偉大的神力，對於她，魯迅更起了特別的敬意。這敬意一直被保持到了魯迅發現了她踩死他的那隻心愛的隱鼠，才逐漸地淡薄下去。

魯迅在小時候，是非常喜愛老鼠的，尤其是小形的，不很怕人的隱鼠。（註二）祖母她們雖然常恨鼠

子嘴們做了新櫃，偷喫了東西，但魯迅卻以為這算不了什麼大罪。他的床前貼着兩張花紙，一張是『八戒招贅』，兩紙長嘴大耳，很不雅觀；另一張是『老鼠成親』，卻很可愛，自新郎、新婦以至賓客，賓客就是這鎮壓着一架不是尖腮細腿，煞像讀書人的模樣，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袴。那時，魯迅想道：『這次『水滸金山』式的，恐怕只有這些他所喜歡的隱鼠了，他非常神往於這件事。』舊曆正月他，他逃來逃去，逃到蟹殼裡，即等待着隱鼠們的儀仗從床下出來。然而，他只看見幾個空着身子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辜正在發着喜事的样子，可是他還要等，一直要等到熬不住了，這才快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喫完，燈落了。

出，翻轉，使裏面向外，只要不破壞去的，有時跑到人的面前來，緣腿而上，一直爬到膝上。若果把牠稱他『蟹和尚』，這就是躲在裏面整潔清潔；放在書桌上，則從容遊行，看見視台便喫這上面餅好子的。對於這一個民間傳說，魯迅非常一天，魯迅懷着有所失似的，忽然有半天沒有看見隱鼠，長媽媽應有的大快人心的懲罰。

四

迅非常生氣。

七歲，(許二)魯迅進了家塾，開蒙時，夏夜，魯迅睡在一株大桂樹底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厲，無論做什麼事都不馬虎。給他聽，或是叫他猜謎語。

在魯迅的幼年時代，那時的一般，一天夜裏，在桂樹上忽然發出了沙沙的聲音，在他們的頭上的

是萬不可鑽過去的……。

她講起故事來，也是希奇古怪的軍隊，而匪連後來的一切盜匪都在內煮飯的老媽子看家。「長毛」進門來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喫了

閃閃的眼睛也在暗中隨聲而下，他們在大喫一驚之後，祖母把話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方法，喫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只有做過牠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把貓殺掉，自己便是最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是自己也輕輕拍着胸脯說：「阿呀，駭」像你一樣的小孩子，」她又對

踏然，桂葉瑟瑟作響，微風吹動，想來草蓆定已微涼，他便進屋

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魯迅「山」的故事。(註二)

亮。

蛇，」祖母說，「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

「那裏的話！」她嚴肅地說有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牛我們脫下襪子，一排一排地，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面，白蛇娘娘自於意料之外，她還有這金山」。

「後來，也氣死他的邪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鉢盂埋在地下，上面造起了

(註一) 請參看「全集」第三四一——三五二頁，「狗、貓、鼠」。

(註二) 請參看同書第三卷第一五七——一五九頁，「論雷峯塔的倒塌」。

一座塔來鎮壓她，這塔就是豎在西湖的雷峯塔。」

那時，魯迅聽了這個故事，心中很不舒服，他深怪法海和尚多事，爲白蛇娘娘抱着不平，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這鎮壓着一個美麗的靈魂的雷峯塔快些倒掉。

據說：這次『水滸金山』，人民被淹死很多，玉皇大帝也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於是想要拿辦他，他逃來逃去，逃到蟹殼裏避難，不敢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喫完，就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下切，取出，翻轉，使裏面向外，只要不破，便有個維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有身子，是坐着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這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對於這一個民間傳說，魯迅非常滿意。因爲，這是對於做了損人而不利己的缺德事情的法海和尚應有的大快人心的懲罰。

四

七歲，(許)魯迅進了家塾，開蒙讀書。最初，跟着叔祖玉田先生誦讀『鑑略』。父親管教得很嚴厲，無論做什麼事都不馬虎。

在魯迅的幼年時代，那時的一般家庭的教育主張，粗粗地可以分爲兩大派別，方法上：一派是主

張放縱，另一派却主張嚴厲；目的上：一派是在於養成遇事敷衍，或既會吹牛又能拍馬的人物，另一派却要訓練出剛強正直，堅定的有骨氣的性格。魯迅的家庭教育系統是屬於後面的一派。（註二）

有一次，魯迅想到東關去看五猖會，因為背書的事，父親卻留攔他一下。（註三）

因為東關離魯迅家很遠，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所以清早大家就起來了，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意的大船，已經泊在船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陸續搬下去了，魯迅笑着跳着，催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嚴肅，他知道不好了，回頭一看，他的父親站在他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的父親慢慢地說。這所謂「書」，是指他開蒙所讀的「鑑略」。

他忐忑着，拿了書來，和父親對坐在堂屋中央，父親教他一句一句地讀下去。他十分害怕，一句一句地讀下去。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父親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房裏去了。

這時，像有一盆冰水澆在魯迅的頭上，他有什麼法子可想呢？只好讀下去，讀着，讀着，強記

（註一）許壽裳先生著「魯迅先生年譜」中，說是六歲，恐誤。此處所說的「七歲」，請參看「全集」第

二卷第三七〇頁。

（註二）請參看克士先生作「略講關於魯迅的事」。

（註三）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八——三七三頁，「五猖會」。

着，——而且要背出來。

粵自盤古，

生於太荒。

首出御世，

肇開混茫。……

一直要讀下去。

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家中由忙亂轉成靜肅，朝陽照着西牆，天氣晴朗得很。母親、工人、長嫗都無法營救，他們只好默默地靜候着魯迅讀下去，讀下去，直到讀熟背上來。他在百靜中，他頭裏似乎要伸出許多鐵鉗，將什麼『生於太荒』之流夾住；他又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着抖，彷彿深秋的蟋蟀，在夜中嗚叫似的。

家裏的人還在等候着，太陽也升得更高了。

他忽然似乎已經有把握，便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下去，夢一般的背完了。

『不錯。去罷。』父親點着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將他高高地抱起，彷彿在祝賀他的成功，快步走在前頭。

他的父親對於他的讀書，雖然督促得很嚴，但在其他的各方面，卻是非常和善的，從來沒有打罵過小孩子。他的父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是嚴厲而公正的：有時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事告訴他，他往往會這樣問道：

「你先去欺侮別人的嗎？」

若是小孩子說：「沒有。」他又這樣說：

「那麼他們爲什麼不來欺侮我呢？」

他深恐自己的孩子先去欺侮別人，這種無端地去侵害別人的行爲是不應該的。但另一方面他認爲一個人如無端地被別人欺侮，而不用強硬的态度去抵抗，甘心容忍別人加諸自己的侵害也是不應該的。

五

這時，另一件使魯迅發生興趣的事，是社戲。(註一)這社戲是在他的外婆家——鄉下開演的。

魯迅的外婆家住在安橋村，那是一個離海不遠極偏僻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職業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

按照那時鄉間的規矩，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若還未輪到當家，在夏天便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魯迅的祖母雖然還健康，而他的母親卻已分擔一部分家務了，所以夏天就不能有多日的歸省，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他便跟着母親到外婆家裏。不讀書了，整天和小朋友玩着鬧着。

和他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們，因爲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裏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來伴着他

(註一) 請參看「全集」第一卷第四四九——四六二頁，「社戲」。

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客。他們年紀大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卻都比魯迅長，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是本家。可是他們這羣小孩子却是很好的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也不算犯上。他們每天的事情大都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鈎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不到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客人喫。其次是一同去放牛，黃牛、水牛都很欺生，魯迅不敢走近牠們身邊，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小朋友們都不大佩服這個讀書人了，大家都來笑話他。

除去釣蝦放牛之外，在這裏最大的樂事是看社戲。這同是在離安橋村四五里的趙莊演。趙莊和安橋村之間是水路，來往交通靠着船隻。安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不能留下來使用，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給別人定下了。這可把魯迅急壞了，幾乎急得要哭。到了下午，他的朋友都去了，戲也開場了，他似乎還聽到鑼鼓的聲音，又似乎看到他們在戲台下買豆漿喝。這一天，他不釣蝦，東西也少喫了。母親很爲難，但也沒有法子想，外祖母也着急，說這太怠慢了客人，難怪魯迅生氣。喫過晚飯之後，看過戲的人也聚攔來，高高興興的來講戲，只有魯迅不開口，大家也都嘆息，表示同情。

忽然間，他們當中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

「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

十幾個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攏攔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他一同去，這使魯迅很高興。可是

外祖母却怕他們都是孩子，不可靠，路上出岔子；母親以爲若呼白天做工的大人們一同去熬夜，這是不合理的。於是大家都猶豫起來。雙喜又大聲說：

「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外祖母和母親都相信，不再回駁，都微笑了。他們立刻一闕的出了門。

這時，魯迅的很沉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

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安橋內泊着一隻白蓬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去，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魯迅坐在船裏，較大的聚在船尾。待到母親出來吩咐要小心時候，船頭已經點開，在橋石上一磕，退後一點，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橈，兩人一枝。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嘖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向趙莊前進了。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吹來；月色朦朧在這水氣里。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他卻還以爲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燈火，料想中那也許是戲台，也許是漁火。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漁火；前面的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而是一叢松林，過了那叢林，船便轉進了又港，於是趙莊就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空地上的一座戲台，模糊在這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

船不停地向前進着，不多時，在戲台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台的河邊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近台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的看罷。」阿發說。

船慢了，不久就到了，果然不得近台，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台的神棚還要遠。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台上有一個黑色的長鬍子的人，背上插着四張旗子，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正在打架，雙喜說：

「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還親自數過的。然而，這時那鐵頭老生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在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且來，咿咿呀呀的唱着。鄉下人爲了明天工作，熬不得夜，都紛紛散去了，台下站的只有疏疏朗朗的幾十個木村的和鄰村的閒漢；後來，魯迅他們也熬不住了，打起呵欠來，拔了篙，回轉船頭，架起橈回來了。

這時，月亮還沒有落，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如緊搖船，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躡，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起采來。

離安橋村還有一里模樣，船行卻慢了，搖船的都說很疲乏，因爲太用力，而且許久沒有喫東西。於是，桂生說：

「這時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

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里，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

「阿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六一家的，我們偷那一邊的呢？」雙喜先跳了下去，在岸上說。

他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

「慢點，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

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爲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他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地搖着船，幾個到後艙去生火，年幼的和魯迅剝豆。不久豆熟了，便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圍起來用手撮着喫。喫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里，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會知道，要罵的，然而大家議論之後，歸結是不怕。他如果罵，他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

「都回來了！那裏會錯。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雙喜在船頭忽然大聲的說。

這時，船已經到了安橋，魯迅的母親已經站在橋脚上等着了。他們都紛紛的跳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立刻也就高興了，笑着邀大家去喫炒米。

他們都說已經喫了點心，又渴睡，不如早睡好，於是，他們便各自回去了。

還有一種大戲，中有『跳女吊』。(註二)在沒有開場之前，戲台的兩旁早已掛滿了紙帽，這是給神道和鬼魂戴的。凡是內行的人，緩緩的喫過晚飯，喝過茶，閒閒而去，只要看掛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麼鬼神已經出現了。

但這戲的開場却比較早些，『起殤』——專召橫死者的鬼魂的儀式——在太陽落盡的時候舉行。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台下，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面鱗紋，手執鋼叉，還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魯迅這個時候，就會經充當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台去，說明志願，他們就給他臉上塗了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二周。奔回台時，將鋼叉一擲，釘在台板上。他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台，可以回家，但倘被父母知道，往往不免挨一頓竹籐，一以罰其帶着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魯迅卻沒有被覺察過，所以也就不會被打過。

這一種儀式舉行之後，戲文便接着開場，徐徐進行，人事之中，夾以出鬼：火燒鬼，淹死鬼，科場鬼，虎傷鬼，……孩子們也可以自由去扮，但這種沒出息鬼，願意去扮的並不多，看客也不將牠當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時分，情形的鬆緊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涼的喇叭，中央的橫樑上，原有一團布，也在這時放下，長約戲台長度五分之二。看客們都屏着氣，台上就闖出一個不穿衣褲，只有一條犢鼻褲，而帶幾筆粉墨的男人，這叫做『男吊』。他一登台，徑奔懸布，像蜘蛛死守着蛛絲，

又如結綯，在這上面鑽，掛。他用希弔着各處：腰、脅、胯下、腿彎、後項窩……一共有七七四十九處，最後才是脖子，但並不真套進去，兩手扳着布，將頸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這之後，就是一跳女弔。也先有悲涼的喇叭，不一會兒，門幕一掀，女弔出場了。人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髮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了一個全台，——內行的說：這是走了一個「心」字。——然後，她將披着的頭髮向後一抖，人們這才看清她的臉孔：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楊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這之後的下文，大概是說：做童養媳時備受虐待，終於弄到投繯自盡。唱完，就聽到遠處的哭聲，也是一個女人，在啣冤悲泣，準備自殺。她萬分驚喜，要去「討替代」了，卻不料突然跳出一男弔來，主張應該他去討，他們由爭論而至動武，女弔當然不敵，幸而王靈官——台上的另一個神——在這危急之際出現了，一鞭把男弔打退，放女弔獨自去活動。

這引起了孩子們無限的同情和稱快。

十二歲，教魯迅書的教師換了另一個人。他跟着位早就聞名的，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戴着眼鏡，本城中極方正，質樸，而又博學的壽鏡吾先生讀書。走出自家的大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先生的家，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匾，題着：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註一）

三味書屋後面有個小園子，在那裏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或是在地上或桂花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可是學生們到園子裏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是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當學生們的聲音低下去了，靜下去了，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巨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喘」。

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學生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魯迅這時是趁空子學畫畫兒：用「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兒也就多起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魯迅因為沒有錢用，便把這些賣給一個有錢的同學了。

在家裏，也是一樣，沒有事的時候，魯迅總是愛畫畫兒。有一次他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也許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吧？）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魯迅很不高興，扯去另畫，祖母覺得不好意思。（註二）

此外，魯迅又搜集了許多其他畫譜。（註三）過年分得的壓歲錢，也都用在這方面。自己買的有石印的「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攷」「點石齋叢畫」和「詩畫舫」。在家可以冠冕堂皇看的「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傳」，這上面都是畫着雷公雷母站在雲中，牛頭馬面布滿地下的，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有一位長輩給他的一本薄薄的下圖上說的「二十四孝圖」，魯迅對於其中的「老萊娛

（註一）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三八四——三九〇頁，「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註二）請參看知堂作「關於魯迅」。

（註三）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三五二——三六七頁，「阿長與山海經」，「二十四孝圖」。

親」和「郭巨埋兒」這兩件事情發生反感，討厭他們故意地做作，做出虛偽的樣子給別人看。那時，他最心愛的是阿長買給他的「繪圖山海經」了。

一天，魯迅的一位遠房叔祖，告訴他說：有一部繪圖的「山海經」，這書上畫着的有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被他放在那裏了。這位叔祖，是個很懶散的人，魯迅不好意思逼他去找尋，只是把這事放在心裏，天天掛念着。當他玩耍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不會想到，可是一坐下了，就記起這繪圖的「山海經」了。因為他對於這件事太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有一次她告假回家了，四五天之後，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魯迅，並且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畫的「三暉經」，我給你買來了！」

魯迅高興極了，他似乎是遇着一個霹靂，全身都震慄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一看，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使魯迅對她發生了新的敬意，害死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這時，魯迅另一個樂園，是他家後面的一個很大的園子——百草園。在這裏，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肥皂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枝上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按住

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形的果實，何首烏有腫腫的根。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好得多。

冬天來了，百草園比較無味；可是，雪一下，就兩樣了。這時，他的從鄉下來的一位小朋友，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紅帽，頸上套着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就在這個時候，他來教給魯迅在雪地上捉鳥的方法。

「我們沙地上，下了雪，」閻土講起他那裏的捉鳥方法，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

什麼都有：稻雞、角鴉、鶉鴉、藍背……」（註一）

要是說到夏天，閻土又能夠談到夏天的許多新鮮的故事：

「夏天你到我們這裏來。我們這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魯迅問他道。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裏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牠不咬人麼？」魯迅那時並不知這所謂獒的是什麼東西，只是無端地覺得牠狀如小狗而且兇猛，心中似乎有點害怕。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查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你腋下竄走了。牠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們沙地裏，潮泛要來的時候，」閩士又說道：「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前面有青蛙似的兩隻脚。」

對於這些希奇古怪的東西，魯迅是非常神往的。

「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裏，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
（註二）他漸漸地切斷了過去的牽連，他走入了和他的出身截然不同的新的隊伍裏面去，他看到了比較廣大寬闊的世界。

（註一）見何凝先生作「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第二章 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十三歲至十八歲

——一八九三——一八九八

七

「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註一）

魯迅自己曾述說過這一時期生活的梗概。

這裏所說的家中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是指他的祖父介孚公下獄這件事。

一八九三年的二月，（註二）魯迅的曾祖母戴太君死了，五月，祖父介孚公從北京丁憂回來，到家不久，秋天就因事坐牢了。

魯迅的祖父是以喜歡「罵人」出名，當時人都恨他。他的罵人，並非是對着被罵的人當面拍案大罵，而是毫不留情地不論在什麼場合，指責或批評別人的是非曲直，這很容易遭受別人的猜忌。據說有一年江蘇鄉試，主考官是介孚公的同年，蘇州的紳士某君，有一子一姪，都要在這一年的鄉試，他便

拜託周老先生去向主考官關說，周老先生似乎答應了。據說還有一封他的親筆信件，落在當時蘇州知府王可莊手裏，於是這就成爲罪名，因而被捕入獄，解送北京，長期被監禁起來了。(註三)

周老先生在獄中的時候，在紹興的家裏被波及到的是出賣田地和房屋。每一年的秋天，就有消息傳來，說是今年秋審，老太爺恐遭不測了。趕快匯些銀錢去，北京可以託人幫幫忙；於是紹興家裏就趕緊出賣一部分田地和房屋，把錢匯到北京去。這樣的每年一次，周家便漸漸支持不住了。主持這事的是魯迅的母親，魯迅和他的弟弟們因爲怕連累到受着殺戮和逮捕，被安插在城外的外婆家裏。

遭了這場事變之後，魯迅的家庭經濟完全崩潰了，他的父親心裏非常不快，於是就時常喝酒，時常發脾氣，有時太氣得厲害了，在喫飯時候甚至於把筷子丟掉，把碗摔碎。不久，他就病倒了。(註四)

給魯迅的父親診病的是一位本城的一名醫士，隔日一回，每次診金一元四角（那時是一筆數目頗大的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這位先生不但用藥有些稀奇古怪，就是藥引也很難覓得。每換一次新

(註一) 見「全集」第七卷第四四七——四四八頁，「俄文譯本阿Q正傳及著者自敘傳略」。

(註二) 按魯曆爲「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二月裏。

(註三) 此說係根據孫伏園先生的「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中所云。關於這件事，歐陽凡海先生在其大著「魯迅的書」中係採取無名先生的魯迅的家世一文中的說法，請參看。

又鄭學稼在其所著「魯迅正傳」第四——五頁中所云，恐怕是故意造出來的謠言。

(註四) 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三九一——三九八頁，「父親的病」。

方，就要大忙一場，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起碼是蘆根，到河邊去掘得的，經霜三年的甘蔗，至少要搜求兩三天，凡是可以用搜求得到的，總是想盡方法把牠購來。這樣，差不多有兩年，他的父親的水腫病不但沒有見效，反而漸漸地厲害起來，不能起床了。

有一天，這位醫生又來診了，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些……」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魯迅却仍然恭敬地送他上轎。回來，看他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話，也頗頹喪，大意是說他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了；這醫生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來代替，和自己完全脫離關係。但另外又有什麼法子呢？城內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个陳蓮河了。第二天就只得去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他用藥和先前那位「名醫」是大不相同的，前回的「名醫」的藥方一個人還可以採辦，這一回卻非一個人力所能及了，因為他開的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怪的藥引。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從來沒有用過，他所用的藥引，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有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引的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魯迅却並不爲難，走進百草園，要十對也容易辦到，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

人，問賣藥草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都只是搖頭，臨末才記起了那遠處的叔叔，愛種一點花木的
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像小珊瑚珠似的，普通都稱他
『老弗大』。

藥引尋到了，然而還要製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
的；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牠，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只有一家出售，離開
醫生的家還有五里。可是，買來了，喫了，還是沒有用。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又想起了妙法，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
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就可以買一盒……』

魯迅的父親想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
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魯迅的父親想了一會，搖搖頭。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什麼『冤愆』來，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依然打不
破水腫，他的父親終於輪在床上喘氣了。還去請一回陳蓮河，這回是特請，診資格外貴。他仍舊泰然
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卻從病
人的嘴角上回了出來。從此陳蓮河不再來了。

他的父親喘氣頗長久，連魯迅聽到都感覺喫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有時，魯迅竟會這樣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

一天早晨，魯迅的父親的病十分嚴重了，住在一門裏的鄰居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他們家裏人不應該空等着。於是家裏的人們就忙着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魯迅大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了。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的父親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痛苦。

「叫呀！快叫呀！」衍太太又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曬。……不……。」他的父親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才恢

復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魯迅還叫着，一直到父親咽了氣。

後來，在回憶裏，魯迅會說及這件事道：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樣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八

父親去世以後，祖父才從牢裏被釋放出來，回家之後，什麼事都不能管了。

在這幾年之中，幾乎是每天，魯迅經常出入於當舖和藥店裏；從比他高一倍的當舖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中接了錢，再到和他一樣高的櫃台上給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這樣，魯迅一直奔走到他的父親死了的時候。（註一）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現實給魯迅以最初的考驗。

自從父親去世以後，家裏非常冷清，魯迅也很少和別的孩子玩耍，有時卻走到衍太太家裏，去和衍太太或她的丈夫閒談。（註二）這時，魯迅的家裏更是感覺到窮乏了，在孩子的心裏總覺得有很多東西要買，看的和要的，然而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裏了，衍太太便說道：

「母親的錢，你拿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麼？」

「母親沒有錢。」魯迅說。

（註一）請參看「全集」第一卷第二六九——二七六頁，「吶喊自序」。

（註二）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三九九——四〇〇頁，「瑣記」。

『可以拿首飾去變賣呀！』她說。

『沒有首飾。』

『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魯迅當時聽了覺得很異樣，從此就不到她那裏去了。但有時他似乎真想要打開大櫥，細細地找一找看。

這之後，不到一個月，有一種流言發生了，說魯迅偷了家裏的東西出去變賣。這使魯迅覺得實在難過，像是掉在冷水裏面。彷彿真是犯了什麼罪似的，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這怎麼辦呢？他這時打算出走了。

他打算離開這討厭的故鄉，這裏的人們的嘴臉他早經看熟了，連心肝似乎也有些了然。他要去尋別樣的人們了，——去尋求爲他們所詬病的人們去，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

『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魯迅說。
這時，他便打算去到那裏爲全城所笑罵的一個開辦不久的學校去，這學校叫做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一些洋文和算學。這時，這學校已經成爲棄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上的文章，做一篇八股文來嘲諷牠，這名文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開頭是：「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鵠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

魯迅對於這個學校，也不甚滿意，因爲這裏面的功課，除去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之外，別的

就沒有了。功課較爲別緻的，是當時的杭州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去不起。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這時，他只有往南京去了。

母親沒有辦法，只忙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他自便；然而她哭了。因爲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爲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她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

然而，魯迅却顧不了這一些，他毅然地走出了「封建宗法社會」的門檻，到南京去進江南水師學堂去。

這時他十八歲，改名壽樟爲樹人。

第三章 走出了『狹的籠』：十八歲至二十二歲

——一八九八——一九〇二——

九

當着魯迅正奔走於當舖和藥店，或是環繞着父親病榻的時候，中國的社會又大大的變更了一次面目。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使得中國人民的災難，加深而且加重了。滿清政府從此一蹶不振，牠對於外來的資本主義的侵略，連半點反抗力量都沒有，在牠統治下的人民被奉送給洋大人做半殖民地的牛馬的命運，從此也就更加確定了。

這之前，西方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已經開始侵略中國，並且以武力戰勝了中國（繼鴉片戰爭之後曾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等），但是，那時牠們在基本上所採取的政策，還是比較和平的，牠們的目的是在通商，是在輸入商品。可是，這次中日戰爭，在本質上就大不相同了，這時，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連日本也在內——都已經發展到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牠們的向外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帶有武力侵略的性質了。恰好，在這次中日戰爭裏，一個小小的日本把偌大的滿清帝國紙老虎完全戳穿了，牠的腐敗、昏庸、軟弱無能這一些弱點，都被暴露出來

了，這給予各資本主義的國家以可乘的機會。於是中國就成爲衆矢之的，牠們都一齊湧得來，奪取港灣，劃定勢力範圍，建築鐵路，開採礦山，興辦工廠，設立銀行，……無所不用其極。

這時，在經濟上，刺激起了近代工業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放棄了他們的以前的僅僅製造船隻、鎗礮和軍火的軍用工業的成見，他們知道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於中國經濟侵略的嚴重性，懂得了創辦近代工業的重要性，於是他們自己也來開礦山，敷鐵道，開工廠，而以振興實業爲要務了。

在政治上，反映着這一個經濟的變革的是，一部分官僚資產階級的士大夫主張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運動。一八九五年康有爲和他的弟子梁啓超在北京糾合當時應試的舉子一千多人，簽名上書給光緒皇帝，請求實行他們的主張。此外，他們又在北京，上海各地設立強學會，保國會這一類組織，「時務報」是他們當時鼓吹維新運動的機關報。同時，和他們主張相反的，孫中山先生則創立興中會，傳播革命思想，主張把滿清政府根本推翻，反對康梁等的保皇的改良主義。

在文化思想上，配合着這一經濟和政治的進展，一味頑固保守的舊派漸趨沒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馬馬虎虎的不澈底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折衷主義，和朦朧的不十分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底啓蒙的革命思想。

就在這個時候，魯迅來到了南京。

魯迅來到南京，是在一八九八年四月間。旅費只有母親給他的八塊錢，上下輪船總是僱用獨輪車子，一邊擱行李，一邊留着自己坐。(註二)到了南京之後，錢就差不多用光了，於是他就穿着夾襖過冬，在南京，冬天是非常冷的，沒有法子，就開始喫辣椒取暖，以至成了習慣，進而變爲嗜好，因之損害到胃的健康。(註三)

魯迅到了南京之後不久，就考進了江南水師學堂。這學校是頗爲別緻的，一進儀鳳門，便可以看見這學校裏的約有二十丈高的桅桿，和不知有多少高的烟通。在這學校裏，功課頗爲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頸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頸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魯迅初進去，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裏是一桌一檯一床，床板只有兩塊。而頭二班生就不同了，二桌二檯或三檯一床，床板多至三塊，他們不但上講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着，便是空着手，也一定要將肘臂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學生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們之前。

這學校裏，可愛的是桅桿，烏鴉喜鵲，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而且並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去，也不過如一條小魚似的落在網裏；

況且自從張網以來，也還沒有人跌下去過。這學校裏，原先還有一個池子，給學生們游泳的，在這裏而會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在魯迅進校之前，這池子就早被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開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橫寫着四個大字：「敬惜字紙」，辦學的人心腸好，每年七月十五日，總請一羣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饑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迴資囉，普彌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在這樣的環境裏，魯迅總覺得不大合適，第二年他就離開了，在一八九九年的二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

在礦路學堂裏，情形稍微改變了一些。這回不是「It is a cut」了，而是德文。Der Mann, Die Web, Das Kind 漢文仍舊是「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即現在的地質學），金石學（礦物學）……都是非常新鮮的。到這裏的第二年，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學生道：

「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註一）請參看許壽裳先生作「魯迅的生活」。

（註二）請參看某先生作「魯迅的日常生活」。

看新式的風氣便流行起來了，這時，魯迅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做「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知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壁外語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

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天造草昧……」

魯迅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魯迅於是就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這一些，把魯迅底思想領入了另一個新天地。

此外，在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讀報處，「時務報」固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封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藍得可愛。

可是，不久這環境就改變了。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

一位本家的長輩嚴肅地對魯迅說而且遞過了一張報紙來。他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參康有爲變法的奏章。

魯迅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空閒，仍舊照常吃大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有時，他還出外騎馬，偶爾經過旗人居住的地方，他不甘心受旗人的輕侮，往往揚鞭驅馬以示威，以發不憤。由馬上摔落下，跌得皮破血流，但是，他卻毫不在乎，說：「落馬一次，就增加了一次進步。」和魯

同班的同學，大約有二十幾個人，以魯迅的年數最小，但他繪圖却最快而且最好。

同學們若是因爲課堂上趕不及畫，下課請他代爲補畫，是常有的事。每逢考試，他從不溫習功課，但他總是完卷最早，成績揭曉時，名次也總是很高，什九是他第一，難得有一回是第二。每次考試，他都得到獎金：國文每週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每次他都要得到三等銀質獎章。依學校章程，凡四個三等章准許換一個二等的，又幾個二等的換一個頭等的，又幾個頭等的換一個金的。全班中得過這金質獎章的惟有魯迅一個人，他得到了之後，就拿去變賣了，買書籍來看，或是買點心，請大家大嚼一通。（註一）

但不久，他們的不安的時期又來了，在魯迅進入了這學校的第二年，聽說這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是無怪的，這學校的設立，原是因爲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却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裏也不甚了然起來，終於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帳。既然開礦無利，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他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爲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裏積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裏而鬼一般的工作着。

一八九四年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勢力的侵入更甚，中國近代工業在這刺激與影響之下，也慢慢地抬起頭來。這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利的，牠們不能夠讓着中國近代工業，一帆風順地發展下去，牠們總是要設法來阻撓牠的發展。同時，因為牠們已經走入最後的帝國主義的階段，用武力去爭奪殖民地，已成爲牠們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所以在這個時候，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就盡力地設法來窺死中國的剛剛興起的近代工業，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準備進行瓜分中國領土的陰謀。

這時，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是非常的軟弱無能，而滿清政府卻更加腐敗昏庸，在這樣巨大的外來壓力之下，剛剛興起的工業立刻就趨於破產，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了。伴着這脆弱的工業而起的維新運動，以及反映着這個運動的新思潮要遭受着壓迫，這也似乎是必然的結果了。在外力協助之下，國內頑固派的抬頭，對於新興勢力的阻撓和摧殘，這更是無可足怪的事了。

外來的和傳統的，進取的和保守的，革新的和反動的，這一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交織成一片充滿了矛盾的迷離的巨網，放在中國人民的面前了，這需要英勇而果斷的抉擇。

一九〇二年的二月，魯迅在礦路學堂畢業了，迎面便來了這一個大問題。

畢業，自然是大家盼望的事，但一到畢業，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桿，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

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了。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是一無所有，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所餘的只還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這時，恰巧滿清政府要派選學生到外國去留學，魯迅就趁着這個機會，到日本去了。

第四章 在日本：二十二歲至二十九歲

——一九〇二——一九〇九——

一一一

一九〇二年的三月，魯迅和另外的四個人被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他們之中有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贖下的只有四個人。

那時，據說日本是同中國同樣的，去之前應該好好準備一下，於是他們就去請教一位比他們早一年畢業的，曾經游歷過日本的同學。這位前輩先生，鄭重地說道：

「日本的襪子是萬不能穿的，要多帶些中國襪子。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遵命了，魯迅到了上海都把錢換成日本的銀元，並且，還帶了十雙中國襪。後來，及至到了日本，要穿制服和皮鞋了，中國襪完全沒有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於是，又只好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流言使他最初吃了小虧。

魯迅到了日本，最初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文。在這裏他認識了許壽裳先生。

這時，中國的留學日本的學生在東京的很多。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遠遠看去好似緋紅的輕雲，在這花下時常出現成羣結隊的中國留學生的速成班，他們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子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平的，除下帽子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註一）

在東京，還有一個中國留學生會館，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可買，有時，魯迅也去轉一轉；若在上，這裏面有幾間洋房倒可以坐坐，到傍晚，有一間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起來，滿屋都是烟塵，問問知道內中情形的人，說是留學生們在學跳舞。

也有不學跳舞的，他們大抵是在住的地方關起門來燉牛肉喫。

魯迅在課餘卻喜歡看看哲學和文藝這一類書籍。（註二）和許壽裳先生在一起，常常談到這樣的三個相聯的問題：

一 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

（註一）請看「全集」第二卷第四〇九頁——四一七頁，「藤野先生」。

（註二）請看許壽裳先生作「懷亡友魯迅」。

二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 它的病根何在？

公共集會他也時常參加。有一次，在某一個會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調講演排滿的青年，他講得激昂慷慨，魯迅也聽得肅然起敬，到後來聽他說到『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註二）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裏罵吳稚暉』，聽者哄堂大笑，魯迅也很失望，認爲他是在打諢。

第二年，魯迅還在弘文學院補習日文。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間，排滿的浪潮繼續高漲。當時的鼓吹革命思想的書報刊物很多，著名的有「萬帝魂」，「蕩虛叢書」，「攘夷中國民族志」，「漢聲」，「太平天國史」，……等，此外各省學生個別出刊的有「湖北學生界」，「江蘇」，「新湖南」，「浙江潮」這些雜誌。魯迅曾在「浙江潮」上發表過「斯巴達之魂」和「說鉅」，（註三）

「斯巴達之魂」是記載紀元前四八〇年波斯王澤耳士進攻希臘時，斯巴達王黎河尼佗率領市民三百人和數千軍隊，扼守溫泉門戰死不屈的故事；「說鉅」是敘述法國居禮夫人發現鐳的經過的科學論文。篇幅較長的，是他翻譯的美國培侖作科學小說「月界旅行」，和英國威南作科學小說「地底旅行」。他想借小說力量灌輸科學智識給一般讀者。在「月界旅行」的「辨言」中，他寫道：

『蓋臆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譎玄，亦能浸淫際筋，不生厭倦。……故掇取輿理，去莊而諧，俾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

偉，有如此者！我邦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誌怪者，架棟汗牛，而獨於科學小說，乃如鱗角。智識荒蕪，此實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羣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註二)

科學(那時是自然科學)和社會改造的事業，那時在魯迅底思維裏最初被連接起來了。

一九〇四年的暑假之前，魯迅仍然在弘文學院學習日文。七月，接到他的祖父死的消息。

秋天，九月離開東京，往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這個學校對於魯迅頗爲優待，不但不收學費，學校裏的職員還爲他的食宿操心。他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初冬已經頗冷了，但蚊子却還多，他使用被子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停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也就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有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囚人的飯食，魯迅在那裏不相宜，幾次三番地對魯迅說，叫他搬到別處去。因爲盛情難却，魯迅也就搬到別處去，離開監獄很遠了，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在這學校裏，魯迅看到了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了許多新鮮的講義。在這許多先生們之中，他認識了一位叫做藤野先生的。

藤野先生是一個黑而且瘦的人，八字鬚，戴着眼鏡，穿衣服很不講究，據說有時竟忘記帶領結；

(註一) 指的是慈禧太后。

(註二) 見「全集」第七卷第三七四——三九二頁。

(註三) 見「全集」第十一卷第一〇——一一頁。

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起先他是教魯迅骨學的，上講堂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又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接着，他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罷，他使一個助手來叫魯迅了，魯迅到了研究室，見他在人骨和許多單獨骨頭中間坐着。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魯迅回答說。

「拿來我看！」

魯迅便交出所抄的講義，他收下了，過兩三天便還給魯迅，並且吩咐，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

魯迅拿回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又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他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被藤野先生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了。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有一回，藤野先生將魯迅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他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和講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有法改換牠。現在我替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十四

一九〇五年的夏天，魯迅由仙台回到東京來過暑假。在這次旅行的半路上，曾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許壽裳先生曾講過，他說：

「有一次，從仙台回東京，爲的要去瞻仰明末大仔朱舜水的遺蹟，忽然中途在水戶下車了。朱舜水反抗滿清，百折不撓，「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以致終老異域，魯迅一向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亟亟乎去過弔。下車在夜裏，當然要投旅店，他進去時，店主看作他是日本學生，便領到一間極平常的房間。原例要寫履歷，他寫道：「周樹人……支那。」——那時，日本人稱中國人曰清國人，我們卻不願自稱清國人，又不便稱中國，因爲日本也稱山陽爲中國，所以寫作支那。」——那知道這麼一來，店主和主婦都大起忙頭了。以爲有限不識泰山，太簡慢了貴客，趕緊來謝罪，請他醒到大房間去。他心裏並不願更換，只因爲店主的盛意殷勤，不好意思堅却，也就同着去。那是一間陳設很講究的房子，

貴的寢具都是用綢新製的。他把這一夜的經過情形，曾經詳細對我說過：

「我睡之後，暗想明天付賬，囊中的錢不夠了，預備一早打電報給你，請你電匯一點款子，以救眉急。」如此決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剛要睡熟，忽聽見外面有聲，報告鄰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錢不花，還被店主派人領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聲明，只要普通房間。夜已深了，趕快就寢，萬不料朦朧中，外面又嚷着「火事，火事，」了。」

「啊呀，你好像是『火老鴉』了！倒不是燒了眉毛。」我笑着說。

「可不是嗎。我馬上爬起來，出去一望，知道距離尚遠，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他也笑着說。『（註一）

經過這夜的紛擾，最後，他終於瞻仰了朱舜水的遺蹟才回來。

在東京過了一個暑假，秋初，魯迅又回到學校去，這時，學校裏的成績已經發表了。同學一百多人，他在中間，沒有落第。

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上解剖實習課大約有一星期的樣子，他又來叫魯迅去了，很高興地用着抑揚的聲調對魯迅說道：

「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有使魯迅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可是知道得不詳細，所以他有時要

問怎麼裝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

「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魯迅既然這樣受到先生的重視，因此也就遭到一班無知的同學的歧視。侮蔑無端地飛來了。

有一天，魯迅的同級的學生會幹事到他的寓裏來了，聲稱要借他的筆記看。魯迅就檢出來交給他們，這位幹事先生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可是他們走後不久，郵差就送來一封很厚的信，拆開來看，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但新近託爾斯泰曾經引用過，所以也就新鮮了。當時，正是日俄戰爭，托爾斯泰會寫了一封信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開頭便是這一句。

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的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魯迅預先知道，所以才能有那樣的成績。信末尾是匿名。

魯迅這時才想到前幾天的那件事：因為要開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通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他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個「漏」字是在譏刺他了，就是說他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魯迅就把這事告訴藤野先生；有幾個和魯迅相熟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

華禮，並且要求他們把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最後，這流言終於消滅了，幹事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魯迅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本領了；對於身為弱國國民的魯迅，這刺激是非常深刻的。

然而，他忍受着。

不久，在這學校裏的第二年，另一件事發生了。

醫學專門學校在魯迅入學第二學年的時候，添教細菌學；這一個課程，細菌的形狀全是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但還沒有到下課時間，便映幾片時事的片子；這時是日俄戰爭剛剛結束，所映的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不巧，在這些影片裏，卻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這時，在講堂裏還有他一個也是中國人。

『萬歲！』除了魯迅之外，所有的人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完一片都有的，但這時，在魯迅聽來，這一聲卻特別刺耳。這引起了魯迅深刻的追詢：他看到這影片上，一個綁在中間的是中國人，許多站在左右的也是中國人，一樣是強壯的體格，卻都顯出麻木的神情，他們來圍觀自己同胞替異國人做偵探，又被別一個異國人抓住砍頭的盛舉，而他們竟無動於衷，這真是怪事！（註二）

從那一回以後，魯迅深深地感覺到了學醫並非一件最緊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

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他認爲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他那時以爲要首推文藝，於是他就想到提倡文藝運動。

這一年的春假，魯迅從仙台回到東京，他又和許壽裳先生碰在一起了。

「我退學了。」魯迅對他說。

「爲什麼？」許先生聽了出驚地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爲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道，「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馱子，壞馱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他們相對苦笑了，「馱子」，「壞馱子」這一類問題，是他們平時最關心的，常常提到的而要想法解決的問題。

最後，到了第二學年的終結，魯迅終於去尋藤野先生去，告訴他說他自己不願學醫了，並且想離開仙台。藤野先生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是沒有說出來。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他並沒有想學生物學的意思，因爲看到藤野先生有些悽然，便說了這一句安慰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沒有什麼大幫助。」藤野先生嘆息說。

魯迅將走的前幾天，藤野先生把他叫到家裏去，交給他一張照相，後面寫着「惜別」兩個字。後來，在魯迅中年的時候還時常追念起這位良師，曾寫道：

「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藤野先生底這一個照相，一直都掛在魯迅的北京寓居的東牆上，在書桌的對面。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魯迅又曾經這樣的寫道。

一五

迎着魯迅底熱烈的新希望的，是一個冰冷而沉重的打擊。

因爲，在那個時候，「支配留學生的是一種淺薄的性急的實用主義，……所以大家所學的都是替

察、陸軍、農、工、商、法政、醫學、教育這一類的功課，文學是在被輕蔑之列，因此，迎上他底新希望的是一張冷面。不理解他的人都問他文學有什麼用？說學文學只有餓死。有的同鄉甚至於傳消息到他鄉裏說他已經和日本女人結婚，帶着兒子在神田散步了。這種流言使他家裏非常驚訝，便接二連三來催他歸國，有時一日甚至於有兩封信來催，魯迅竟憤怒麻煩得神經衰弱起來。但結果他在這一年的陰曆六月歸國了，……他到家就由親戚和家族逼迫他和山陰朱女士結了婚。

「家人以爲他現在是一個新人物，當心他不拜祖宗，或者反對舊式婚儀，然而他卻並沒有，家屬要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了。只是結婚一禮拜之後，他馬上就再離開故鄉，到東京去了。」（註一）

在新與舊的矛盾和衝突的中間，舊的喫人的封建社會藉着婚姻形式給魯迅以殘酷的打擊；然而，這並沒有吞下了魯迅，他默默地忍耐着，反抗着！

回到了東京之後，魯迅正式地開始了，他的光輝的然而却是艱巨的文學的事業和生涯。

「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魯迅自己敘述這一件事的經過，寫道：「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爲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

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自此以後，魯迅感到未嘗經驗過的無聊。

然而，這並不會絲毫地妨礙着戰鬥者的戰鬥。

自己的雜誌雖然沒有辦成功，魯迅就借着別人的陣地發揮他的戰鬥的力量。「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篇，（註）陸續在「河南」雜誌上發表了。向着那時的暮氣沉沉的社會，魯迅站出來公開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統治着那時的社會上面的思想主潮是改良主義者們的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這一些洋務運動的首領，在喫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霧頭之後，雖然反省了一番，然而他們只覺得鎗礮不如別人，輪船機器不如別人，這樣繼續下去，中國就要被列強們的鎗礮輪船機器所征服了。他們的唯一的急起直追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富國強兵，派員攜帶幼童出洋學習機械，在國內開辦軍事工業的工廠；而自己祖宗傳下來的百年大法則是不能更動的。比他們稍加改進的是康有爲，梁啓超們的變法維新，他們知道單是鎗礮輪船機器是不足以救亡圖存的，由祖宗傳下來的法也是靠不住的，非變一變不可了，於是他們提出了君主立憲。

不論是富國強兵或者是君主立憲，這都不是根本的辦法。他們這班提倡者唯一企圖，是在挽救這垂死的滿清王朝和封建制度，而他們自己則在這腐朽地存在着的機構之下保存自己的地位。所以他們都盡心竭力地想找出一條適合於自己利益的道路。

魯迅曾給予他們以嚴厲的批判，他寫道：

「有新國林起於西，以其殊異之方術來向，一施吹拂，塊然蹈僥，人心始自危，而輕才小慧之徒，於是競言武事。後有學於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鈎爪鋸牙，爲國家首事。」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怎樣一回事呢，魯迅又寫道：

「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爲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殺如猶太遺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於身受；縱大禍垂及矣，而倖免者非無人，其人又適爲己，則能得溫飽又如故也。……中較善者，或誠痛乎外侮迭來，不可終日，自既荒陋，則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緒餘，思鳩大羣以抗禦，而又飛揚其性，善能攘攘，見異己者輿，必藉衆以陵寡，託言衆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數者，乃無過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願見諸實事，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搆，當列其班，况復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羣之令譽，捷徑在目，斯不憚竭蹶以求之耳。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爲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與國究何與焉。」

假公濟私的人們，藉着福國利民的美名，做着禍國殃民的壞事，這樣，蒙蔽了羣衆，也蒙蔽了自

（註一）收入「全集」第一卷第一三——一〇二頁，除了這四篇之外，刊載在當時的「河南」雜誌上的尚

有「破惡聲論」，「全集」未收入，現在看不到。

己。魯迅卻予以澈底地揭露而提出自己的主張道：

『誠若爲今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掃物質而張靈明，任箇人而排衆數。人既發揚尊屬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奚事抱枝拾葉，徒金鐵國會立憲之云乎？』

同樣地，在文學上的觀點，魯迅也申述着這一個主張。他認爲要改造這一個暮氣沉沉的社會，第一步是在人底個性的解放，而解放個性的最有效的武器，莫如心聲，『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斷昭明，不同凡響』。像這樣的心聲，『至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

『摩羅』是印度字，意思是魔鬼，歐洲人叫做撒旦。這是人們拿來稱呼拜倫的，現在，魯迅把歐洲所有的著名詩人，從拜倫起到裴象飛止，『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甚愉悅者』，在『摩羅詩力說』裏把他們都介紹給正傾聽着這樣心聲的中國讀者。可是，在那個時候，他沒有得到反應：贊成他的或是反對他的。

一六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劃是譯書。

德文是魯迅在南京的時候就學過的，到日本之後，他在弘文學院補習日文，後來，在醫學專門學校讀書時又學德文，此外，他又曾在東京的翻譯學協會的學校聽講，這時，他的日文和德文的學力

譯書是可以的。除了學習日文德文以外，他又曾經和着許壽裳、陳子英、陶望潮、汪公權幾位朋友共同學習俄文。教師孔特夫人是一個因為革命逃到日本的俄國人。不久，陳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習，陶望潮也將往長崎跟俄國人學造炸藥也走了，只有四人暫時支撐，後來因為財力不繼，也就散了。（註一）

這時，又因為景慕章太炎先生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以及他的許多光輝的革命史蹟，魯迅就和許壽裳、錢家治、朱希祖、錢德潛（後改爲名玄同）、朱宗萊、龔寶銓……等八個人，每星期日到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並且加入了光復會做會員。（註二）

魯迅的介紹國外作品，偏重在俄國、東歐、北歐以及其他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這一個系統。

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了，他便忙着去尋找，其中如有一篇是關於俄國文學的介紹或翻譯，一定要買得來，把這篇拆下來保存，至於波蘭的他也很愛好，那時他只能買到「你往何處去」和「火與劍」。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去購買弱小民族的作品，像捷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芬蘭、匈

（註一）請參看知堂作「關於魯迅之二」。

（註二）在知堂「關於魯迅之二」中有云：「他也沒有入「光復會」。但許壽裳先生，魯迅年譜」中則

云：「一九〇八年，二十八歲。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爲「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又據胡風先生「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註八」中有云：「周先生加入過×××沒有？」「沒有，我加入的是光復會，不過這件事沒有人知道，他們曉得了要更不高興的。」則先生加入光復會是沒有疑問的了。

牙利、希臘；以及丹麥、挪威、瑞典、荷蘭……這些國家，他特別感到興趣。

在這些國度裏，許多作家之中，魯迅所喜歡的俄國有安得列夫、伽爾洵、契訶夫、科羅連珂、高爾基；尤其喜歡的是果戈理，他的「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巡按」和「死魂靈」給魯迅以很大的影響。波蘭的作家有顯克微支。捷克的有納廬陀、扶爾赫列支奇。芬蘭的有不佛林多。匈牙利的女作家飛，魯迅最爲推崇，他的德譯詩集一卷和小說「絞手之繩」，魯迅把他從舊書攤上買來，非常重視。

至於當時的日本文學，魯迅並不特別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這些人的文章，差不多只看看他們的批評文字或譯文，夏目漱石的小說「我是貓」、「虞美人草」，他還愛讀。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候也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乎不感到什麼興趣。

一九〇九年，「域外小說集」終於出版了。這書是他和周作人合譯的，其中安得列夫的「謾」「獸」，和伽爾洵的「四日」係出自魯迅手筆。對於這件事，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在這書的序裏他寫道：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彙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固，必將掣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稽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瀾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邇

暮之感矣。」(註一)

這並沒有半點誇張，真正的談得上介紹西洋小說入中國的「域外小說集」，可以說是第一部最可寶貴的書。牠不但使得這以後的中國翻譯界無遲暮之感，牠並且給這以後的中國翻譯界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同時，牠也可以說是爲魯迅自己的文學活動劃出了一個鮮明的正確的路線。

曹靖華先生論及這事，他說：

「魯迅先生所以注重到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尤其是俄國的作品，就因爲這些作品是爲人生的，是叫喊和反抗的，是被壓迫者的辛酸、掙扎、呻吟、窮困的反映。這種「爲人生」的思想，不但是他的文藝介紹工作的基因，而且是他全部文藝活動的出發點。」(註二)

這是一個非常正確而恰當的解釋。因爲，在那一個時候的中國人的和俄國人的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命運有許多地方是相似的，他們的叫喊和反抗，他們的辛酸、掙扎、呻吟、窮困，並不是簡簡單單地單是他們自己的生活底反映，在這裏也照出了那時候的中國人民大眾的影子，被壓迫者在壓迫下尋求自由和解放，這是一個普遍而共同的要求。文學捨掉了反映着這一個重要的「爲人生」的意義，牠是不能夠從現實裏找到牠的確切的依據的。

事實落在理想的後面，魯迅雖然指出了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當時的社會並沒有了解到這一

(註一) 見「全集」第十一卷第一八五頁

(註二) 見「魯迅先生與翻譯」。

點。對着他迎上來的又是一個冷面，這嚴肅而又艱鉅的開創工作，在社會上像石沉大海一樣，雖然激起了一點小小的微波，但卻沒有得到任何巨大的反映。

日後，魯迅追憶當時的狼狽情形，他曾寫道：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移轉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王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就在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

們的書和紙版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註二）

（註一） 見「全集」第十一卷第一八八——一八九頁。

第五章 回到故鄉——二十九歲至三十一歲

——一九〇九——一九一一——

一七

一九〇九年七月，魯迅由日本回來。這時，他的家境大不如前了，他自己非得謀點事做就要受餓，同時，還有另外的幾個人需要他供給生活上的費用。

魯迅剛回國，立刻就觸到了霧頭，他和封建社會的鬭爭在「辮子問題」上展開了。（註二）

這時，身爲滿清主子底奴隸的臣民，沒有辮子是不行的；可是魯迅底辮子老早就在日本剪掉了，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是給了理髮匠。（註三）所以他一到上海，首先就要裝假辮子；那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這家的大名，那時的留學生是都知道的。做的十分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細看，是不會出岔子的，但是，如果有人仔細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在人堆裏要提防被人擠掉或擠歪了。這樣裝了有一個月光景，魯迅想道，如果在路上掉下來或是被人拉下來，那豈不是比原來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於是，他就索性把假辮子去掉了。

當他裝上了假辮子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並沒有說什麼，然而別人卻都走來研究，待到知道這辮

子是假的，大家就冷笑一聲，並且把他擬爲殺頭的罪名；還有他的一位本家預備去告官，但是，後來又因爲他考慮到革命黨的造反或許會成功，這才中止了。及至魯迅把假辮子去了，並且穿上洋服在街上行走，於是人們的嘲罵就更多了，小則說是他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爲那時捉住奸夫，才把辮子剪掉；大則說是「裏通外國」，一路走着，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後面大罵道：「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這樣的環境裏，魯迅是非常爲難的；然而，他決沒有半點妥協的意思。

一八

秋天，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開學了，這學校的校長沈鈞儒先生聘魯迅做生理學兼化學的教員，此外又擔任生物學科方面的翻譯。

「翻譯的職務是勞苦而且難以表現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語言傳達他人的意思以外，並無任何可以顯出才能的地方。」他的那時候的同事之一夏丏尊先生敘述他的服務情況道，「周先生在這學校裏，卻很受學生尊敬，他所譯的講義，就很被人稱贊。那時白話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風氣尙盛，周先生對於古文的造詣，在當時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說集」裏已經顯出，以那樣的精美的文字來譯動物植物的

(註一) 請參看「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五——三二八頁，「頭髮的故事」。

(註二) 請參看「全集」第六卷第一九〇——一九四頁，「病後雜談之餘」。

講義，在現在看來似乎是浪費，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視文章的時代，是很受歡迎的。」（註一）

接着他又講出一段那時的魯迅的軼事道：

「周先生教生理衛生，曾有一次，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加講生殖系統。這事在今日學校裏似乎也成問題，何況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時代，全校師生們都爲驚訝，他卻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對學生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在他講的時候，不許笑，他曾向我們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爲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被壞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見，據說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爲沒有聽到，紛紛向他來討油印講義看，他指着剩餘的油印講義對他們說：「恐怕你們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單，而且還故意用着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乎」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字學素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這是當時一段珍聞。」

在魯迅做化學試驗的時候，也曾有一段珍聞，他的那時候的學生之一，孫福照先生講給我們聽道：

「他在教室試驗輕氣燃燒，因爲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裂。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炸了；等手里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現前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

都避在後面了。」（註二）

課外，魯迅自己研究植物學，常到西湖去採集植物，壓製標本；他以為在中國要研究科學，設備和環境實在太簡陋了，只有植物材料，可以隨時隨地採集，比較還算方便。（註三）

有時，同事們聚在一起了，魯迅也時常談到學醫時代的故事，有一次提到了解剖屍體的事，他說：

「以前曾經解剖過不少的屍體，有老年的，壯年的，男的，女的都有。最初也會感到不安，後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了；不過對於年青的婦人和小孩子的屍體，當開始去破壞的時候，常會感到一種不忍下手的心情，尤其是小孩子的屍體，更覺得不好下手，非鼓起勇氣，拿不起解剖刀來。」

在平時，魯迅是很嚴肅的，不大輕易露出笑容，他要笑必定是在很詼諧的時候。對於官吏他特別憎惡，他常常摹擬官場的習氣和態度，引得別人發笑，但他自己卻不笑。

每夜他都要看書，是他的同事們中間最能熬夜的一個。他所看的書以文藝作品居多，他睡得很遲，強盜牌香烟，條頭糕，這兩樣東西是他每夜必備的糧食。照顧他的校工叫陳福，陳福對於他的任務，最重要的是在每晚搖就寢鈴之前替他買好這兩件東西，若是在星期六的夜間，那就要預備得更充足些。

（註一）見「魯迅翁雜憶」。

（註二）見「我所見於示衆者註」。

（註三）請參看周建人先生作「魯迅先生對於科學」。

魯迅的衣服是不很講究的。一件廉價的羽紗——那時叫洋官紗——長衫，從端午節之前穿起，一直要穿到重陽。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見他穿着羽紗長衫。

後來，一九二六年的秋天，魯迅從北京到廈門去教書，路過上海，上海的朋友們請他喫飯，他穿的還是這件羽紗長衫。這時，他的老同事夏丏尊先生也在場，看到了，止不住發出驚訝的問道：

「還是洋官紗嗎？」

「呃，還是洋官紗。」魯迅帶笑回答說。

魯迅在這學校裏不久，校長沈鈞備先生「因為被選爲浙江諮議局副議長而辭去校長。繼之者是夏震武，以道學先生自命，喜歡擺架子，就職的第一天，便和教員們起了衝突，於是全體教員哄堂大笑而散，魯迅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同事有許壽裳兼教務長，朱希祖，張宗祥，錢家治，章索，張邦華，馮漢叔，胡潛濟，楊乃康……等，統統撤出了校舍，表示決絕，使得夏震武只好辭職。事後，他們戲呼夏震武曰「夏木瓜」，回校後，有「木瓜會」的紀念」。(註一)

一九

一九一〇年的夏天，魯迅在暑假期中離開杭州回到紹興，在秋季開學的時候，就在紹興府中學堂做了教務長，並且兼任博物、生理學教員，那時，他剛剛三十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辦事認真，學生們都畏懼他。(註二)

那時的他的學生之一胡愈之先生回想到這段中學時代的生活，會寫道：

「那年紹興府中學堂的學監是周豫才先生，就是後來用魯迅的筆名寫文章的那位作家。他在我們這一級，每週只授生理衛生一小時，但在學校裏以嚴厲出名，學生沒有一個不怕他。……那年（一九一一年——菁註）上半年，革命雖未發動，排滿空氣已到處瀰漫，紹興又是革命策源地。在不久以前被清廷捕殺的革命黨徐錫麟、秋瑾都是紹興人。那時紹興府中學堂的校長陳先生和學監周豫才先生，都是日本留學生，學生們都知道他們兩人是和同盟會及徐錫麟有過關係，雖然逢着聖誕日，他們都戴上假辮子，率領學生向萬歲牌跪拜，但學生們都明白他們是革命黨，是不得已而爲此，因此對他們起了敬意。」（註三）

在紹興府中學堂裏，學生是很複雜的，教員也很複雜。紹興府共轄八縣，各縣籍的學生都有，各縣籍的教職員也都有；紹興府的首縣是山陰會稽，魯迅便是會稽人，因爲同屬首縣，山陰會稽不分甚界限，兩首縣籍的人統稱山會人，但是這兩縣和其他六縣卻常分界限，在府學堂裏，同一縣籍的教職員和學生的關係往往比較密切些，魯迅在最初並不了解這一點。他任學監，有獎懲學生的權力，而且時常碰到懲罰學生的事情。他的獎懲是按照一定的客觀的標準的，但是後來他竟發覺了，凡開除某縣

（註一） 轉引自王著民「元前的魯迅先生」第一一九頁，許壽裳先生所述。

（註二） 請參看景宋先生作「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註三） 見「在紹興中學堂」。

學生的時候，必有某縣教職員擠滿了他的屋子，替被開除的學生向他求情。從此，這之後同山會籍的學生犯了校規，他也就要考慮一番了，他不但不能矯枉過直，偏偏嚴懲他們，而且鑒於各縣教職員對於同鄉學生的迴護，他自己已是山會籍人，山會籍的教職員又特別少，所以凡能從寬發落的他就從寬發落了。

(註二)在魯迅底嚴厲中間還包含着厚重和寬大。

假如，他萬一因為厚重寬大而上了當，別人對他太不厚重的時候，他的對付方法是：他自己有力，量就還擊，沒有力量就暫時退卻。

那時的他的另一個學生孫伏園先生講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紹興府學堂的教職員們常常發起，星期日乘畫舫到禹廟蘭亭去遊玩，魯迅先生也就隨喜他們。畫舫的規模很宏大，有三艙，四艙，五艙的分別：每艙有明瓦，上有名人書畫的遮陽。艙內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廚房，魚蝦菜蔬沿途可以買到。人在畫舫之內，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時時變換而已。在這種逸豫優渥的環境中，人們最易聯想到不正當的娛樂。畫舫裏面本備有各種博具，只要乘客一開口，就可以拿出來玩耍。這羣教職員當中，只有魯迅先生沒有辮子。消息傳到城裏，說舫中還有一個和尚，社會間即刻想到府學堂的教職員們借遊山水爲名而在畫舫中賭博。魯迅先生上當之餘，只有退卻。從此他不再隨喜他們乘畫舫遊山水了。」(註二)

所謂「和尚」云者，根本的原因是在魯迅既然缺少了辮子，而他又肯作僞，保留一條假辮子，以敷衍敷衍這一個封建社會中的要面子的人們的面子；所以這社會上的人士便向他加以攻擊了。這

時，許多其他的留日回國學生，爲適應國內的環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辮子，有些人覺得這樣還不夠，隔兩三天還要到理髮館爲假辮子理頭髮，擦油，使人看不出辮子的真假。而魯迅卻不理會這一套，他既不肯戴假辮子，而且頭髮也不常理，平時總是亂蓬蓬的一團，這對於頑固派的守舊份子是大不敬的。這時紹興知府是滿州人，對於他非常注意，每到學校里來，總是喜歡注視魯迅的短頭髮，並且要和他特別地多說話。同事們對他的態度也頗冷淡，避之惟恐不遠，這真叫他像整天坐在冰窖子裏面，又如同站在刑場旁邊。真是難受。

有一次，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子的風潮，有許多學生想要把辮子剪掉，而魯迅卻連忙極力阻止他們不要剪去辮子。於是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了：

「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

魯迅卻不加思索地答覆說：

「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

學生們頗不滿意這一個回答，於是，又有許多的人說他「言行不一致」了。魯迅沒有辦法可以解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只有再忍耐了一些時候，便離開了紹興府中學堂。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他

（註一）請參看孫伏園先生作「往事」。

（註二）見同上。

想到一個書店裏去做編譯員，又被拒絕了，於是就在紹興和同縣的孫德清先生辦報，由他主編。（註一）但不久情形卻又改變了。

二〇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推翻滿清帝國的革命在武昌爆發了，紹興也跟着光復，魯迅於是就出任紹興師範學校的校長，他的朋友范愛農先生做學監。

「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卻戴一頂陸軍帽。」孫伏園先生追憶當時情形，寫道：「這陸軍帽的來歷，以後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註二）

當紹興光復的時候，人心很浮動，魯迅會召集了府中學堂全校學生，整隊出發，在街上遊行了一通來鎮靜人心；結果，大家認為革命軍已經來到，吳官僚們便一哄而散，造成唾手而得紹興的佳話。他們這一批整隊出發的學生所採用的名義是很有趣的，他們把這個隊伍叫做「武裝演說隊」。出發之前，魯迅會有一段簡短的訓話，學生之中有一位當隊長的問他道：

「萬一有人攔阻便怎樣？」

「你手上的指揮刀作什麼用的？」魯迅馬上就正顏厲色地答覆了他。(註三)

那時學校用的指揮刀都不會開口，用來雖不能殺人，但是用作鞭子來打人那卻是够厲害的。結果這次遊行沒有遇到抵抗，滿街貼上了「溥儀逃，奔動被逮」的大新聞，紹興軍政府也就在這一天成立了，都督王金發到紹興還是這之後約有五天左右的事。

紹興的外貌雖然改觀了，可是骨子裏還是依舊。都督王金發是「綠林大學」出身的豪傑，初進紹興城的時候，還算顧全大局，採納輿論，可是一些無聊的紳士們，卻用祖傳的老法子羣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為了，於是漸漸變成老官僚的樣子，動手搜刮地皮了。組織軍政府的還是一些舊鄉紳，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什麼鐵店掌櫃是軍械司長，……在衙門裏面任職的人物也都是些閒漢和飯桶，他們來的時候是穿着布衣的，但是不上十天就都換上了皮袍子，雖然天氣還並不太冷。(註四)

王都督發給他們校款只有兩百塊錢。

(註一) 轉引自林辰先生《魯迅歸國年代及初回國時的生活》裏的周建人先生在上海文化界紀念魯迅六十誕辰大會上的演辭中所云。

(註二) 見「哭魯迅先生」

(註三) 請參看孫伏園先生作「惜別」。

(註四) 請參看「全集」第二卷第四一八——四二八頁，「范愛農」。

「情形是一天天不行了，王金發他們。」一個曾經聽過魯迅的講義的少年，有一天來找魯迅，並且很慷慨地對他說道：「我們要辦一種報紙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爲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會推卻的。」

魯迅果然答應了。兩天之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五天之後就看見了報紙，發起人真是他們三個。在這報紙上開頭就罵軍政府和那裏面的人員；此後便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魯迅家裏，說是都督因爲魯迅他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於是他就要派人用手鎗來把他們打死。

聽到了這個消息，別人倒不打緊，第一個着急的是魯迅的母親，她連忙囑咐魯迅不要出去，可是魯迅還是照常在外面行走，因爲他知道王金發是不會派人來打死他們的，他雖然是強盜出身，而殺人卻還沒有這末容易，況且魯迅拿的是校款，這事他是知道的。

果然沒有派人來殺，魯迅又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兩百塊錢；但是他彷彿有些生氣了，給了錢卻同時吩咐說：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范愛農先生得到了另一種消息，這卻使魯迅很爲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而是指另一筆送給報館的款子。當着辦報的少年們在報紙上開始罵王金發的時候，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五百塊錢到報館裏來，於是這班少年們便開了一會講，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

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魯迅聽到了這話，便立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大家都說是真的，魯迅就略說了幾句不該收王金發的錢的話，一個名爲會計員的便不高興了，質問他說：

「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魯迅不再向下說了，再說這位會計員也許就會當面斥責他太愛惜這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爲社會犧牲，明天，也許在報紙就登出來他怎樣怕死的發抖的記載了。

事情很湊巧，許壽裳先生來信催魯迅到南京去，范愛農先生也很贊成，但頗淒涼地說道：

「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魯迅懂得他這無聲的話，便決計到南京去了。他於是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是照准，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他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兩個銅元；繼任他做校長的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第六章 沉默：三十二歲至三十八歲

——一九二二——一九二八——

二

一九〇〇的義和團的，比這更早些的是一八五〇年的太平天國的，革命的農民戰爭，雖然被國內的封建勢力和國際的帝國主義的勢力壓了下去，但是，這並不能把牠看作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停止，相反地，這一個運動卻更加深了。廣大的農民羣衆從搶劫、屠殺、欺騙之中，獲得了寶貴的經驗，他們知道了那妥協的反動的滿清政府和王公大臣是不能夠領導這一個廣大的革命運動的，這班人不能夠在半殖民地地上把農民解放出來；於是農民階級與另一個階級——新興的資產階級聯合了起來。

因爲受到了外來的資本主義的強烈的刺激，國內的土著的和國外的華僑資本也逐漸地發達起來，代表着這一個新興的資本底勢力的新興資產階級在這時也慢慢地抬起頭來，來爭取一個發展的機會。這兩股力量匯合在一起，於是就形成了一個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帶着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〇〇年鄧士良在惠州，唐才常在武漢發動了兩次暴動和起義。一九〇四年有黃興在長沙暴動，這引起了更多的人覺悟，一九〇六年的瀏陽暴動，曾引起了萍鄉礦工的響應。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

州起義，連作爲滿清政府的爪牙的士兵都捲入革命的漩渦了。最後，一九二一年的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終於把滿清政府推翻了，這便是有聲有色的辛亥革命。

這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表面上雖然可以說是成功了，但是，這一個革命是不澈底的，許多投機份子乘着機會，一躍而爲新貴，拖泥帶水地混進了革命陣營，攀折革命的花木，採摘革命的果實；所以這塊招牌不等到塗飾的新漆脫落，而舊相就要顯現出來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的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可是，在五月裏就遷到北京去，臨時政府的從南京遷到北京，這不僅是表示着南方的革命力量對於北方封建勢力的暫時讓步，而是被威脅和欺騙着妥協投降了。代表着北方封建勢力的袁世凱在當初南北講條件的時候，他對於這次革命是並沒有誠意的，這次革命的力量既然投到他的懷抱裏，而他又有日本以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們撐着後腰，各地的封建軍閥們和地主們的擁護，於是他就更放心大膽地在五色共和的旗子下面，進一步向革命力量大舉進攻了。當着中華民國剛剛成立不久，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爲着緩和衝突起見，把這大總統的地位讓給他的時候，他就利用着這一個機會，把大權集中到自己的手裏，暗地下佈置自己的爪牙，準備消滅當時的一切進步的力量。一九一三年的三月，他僱人在上海把國民黨的領袖宋教仁刺死了，四月裏他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鎊，用着來購買軍械，訓練軍隊，收買爪牙，把陣容佈置妥當了，六月裏下令免去國民黨三都督：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的職權，於是第二次革命戰爭又爆發了。因爲當時革命勢力很薄弱，起事不久，就被袁世凱壓了下去，從此他

更是橫行無忌，爲所欲爲，用賤價來招收流氓，冒充公民，假借民意，包圍議會，強迫議員選舉他做正式大總統。前前後後共選了三次，他這才勉強強地爬上了大總統的寶座，可是他並不滿足，他又要求再進一步租借皇帝的滋味，於是他就僱用一班御用學者來替他創作他應該做皇帝的理由，並且又組織了一個籌安會，預先大吹大擂鬧熱一番。

這一個熱鬧，帝國主義者們是樂於看看的，而且這也正是他們可趁的機會，可惜的是這時西方的帝國主義者們正忙於自相屠殺，這個便宜於是落到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家去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看準了袁世凱昏頭昏腦地睡在新華宮裏的龍床上，蒙在大被子裏面正做着甜蜜的糊塗的皇帝夢，於是就趁機提出了駭人聽聞的二十一條件來，而袁世凱卻居然也就偷偷摸摸地在一九一五年的一月裏承認了，把整個的中國人民大眾的利益，低價出售給日本帝國主義者。這引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不滿，在這年年底，首先在雲南發動了一個反袁反帝制的戰爭，不久，貴州、廣西、廣東、四川、湖南……各地也都響應，袁世凱看風頭不順，立刻收回想做皇帝的成命，企圖退而保全大總統的地位，可是，那已經是悔之晚矣了。這之後，沒有多少日子，他便悔恨而死。

這一場風波算是暫時告一結束，然而這一批封建勢力卻沒有根本地被剷除。袁世凱這一個大頭子雖然倒下去了，他的下面的許多小頭子卻又慢慢地想爭着向上爬，由袁世凱一手造成的北洋軍閥這一個集團，四分五裂地散開來了，並且他們也都學會了扛着「民國」的招牌，披着「共和」的外衣，却各自埋頭專心致志地幹他們的禍國殃民的勾當。這局面一直維持了有十幾年，造成了軍閥們的殺人盈

野罪惡滔天的內戰。

魯迅從家鄉到南京，到南京不久又遷往北京，這之後大約有十五年的光景，和中國大多數的人民一樣，整個地生活在腐敗的霉爛的然而又充滿着火藥氣味的空氣裏。

三三

魯迅應許壽裳先生的函約，從紹興來到南京，那時是一九一二年的一月。許先生在教育部供職，那時的教育部部長是蔡元培先生，魯迅在教育部裏做了部員。對於這新誕生的中華民國和當時的局面，他覺得很是光明的很有希望的。可是，不久便覺得不對了。

在辦公的餘暇，魯迅時常抄寫沈下賢的集子。(註一)有時，他和許壽裳先生以及其他的舊時的同學或朋友，去訪以前的駐防旗營的殘址，這時已經成爲一片瓦礫場了，偶爾廢着幾間破屋，門窗全缺，情形十分淒涼，這使他記起從前在礦路學堂讀書的時候，騎馬經過這裏，因爲不甘心受旗人欺侮，揚鞭窮追，以致墜馬的往事，覺得很是有趣。五月，魯迅隨着臨時政府和教育部一齊到北京去，住在紹興會館裏面的籐花館內，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又被任命爲僉事。公務的餘暇，還是抄書。

(註一) 請參看許壽裳先生作「魯迅的生活」。歐陽凡海先生在「魯迅的書」裏面，提到魯迅在這時候，曾鈔「地學淺說」，恐怕不確，這似乎是先生在南京求學時代的事情。

這之前，在魯迅歸國以後不久，在事事都無可爲的環境裏面，他就已經開始抄書了，在這幾年之中抄成的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璠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晏子春秋」，「蜂衙小記」和「記海錯」，此外，又從「說郛」裏抄出有好多種。這時，在北京他又覺得無事可做了，於是又開始抄書，魯迅把他的興趣放在蒐輯唐以前的小說逸文和唐以前的越中史地這兩方面。此外，是校勘「稽康集」。再後一時候，他又開始研究佛經和金石拓本。

關於唐以前的越中史地的文獻，他輯成了「會稽郡故書雜集」，（註）其中包括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先賢像讚」，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會先「會稽地志」等八種，一九一五年以周作人的名義印行。實際上這書的一切編排考訂，序文小引，以至於釐清三四次之多，都是魯迅自己親手寫成的。他在這書的序言上，寫出編輯這書的目的和價值道：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

此外，還有一部謝承的「後漢書」，因爲謝承是由陰人，也是會稽的先賢，所以特別注意輯錄，可惜編全集時抄稿不在近旁，不能和「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同刊出。

關於唐以前的小說逸文，輯成有「古小說鈎沈」，(註二)從「青史子」到旌「異記」共三十六種，漢魏六朝以來的散佚作品，都被收羅在這裏了。全書可分四個部份：第一部是見於「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書，第二部是見於「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的書，第三部是見於「新唐書」「藝文志」小說書中第三類著錄的書，第四部是雖不見於史籍，而漢唐人卻已引用的書。後來，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篇到第七篇就是以此為根據，因為篇幅太多，自己沒有排印的資本，雖然輯錄成功，但那時卻並沒有印出來。

對於魯迅的輯佚工作，鄭振鐸先生有恰當的評價，他說：

「魯迅先生的輯佚工作，和他的創作及翻譯是「三絕」。清代的輯佚工作做得很不壞。這是所謂「漢學」的基本工作之一；需要周密细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闊的披覽。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人人能做的死工夫；其實，粗心大意的人永遠不會做；淺薄而少讀書的人永遠做不好。其工作的辛苦艱難，實不下創作與翻譯。魯迅先生在「輯佚」這一方面的成功，也便是他博覽和細心校輯的結果。在這裏，他所費去的時間並不在少數。我們看他自己「糟」鈔的幾個輯本，都可看出他在校輯時是不啻三易稿而後寫定的。

「他曾經告訴過我，當他在教育部辦事的時候（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五），每天幾乎無公可辦。許

(註一) 收入「全集」第十卷第七——一七頁。

(註二) 收入「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三——六七五頁。

多同事們都在看報，下棋，談閒天。他的時間都耗費在翻譯和古書的校勘上，同事們反以他的這種努力爲可怪！這一大段的比較有「暇」的時間，便是他的許多古書輯佚的工作的時間。

「原來「輯佚」的工作，往往是「文藝復興」的先驅。王充以後的漢晉思想的蓬勃時代，未始不是劉向父子整理、搜輯古籍的結果。歐洲的文藝復興便大得力於聖本多派的僧侶們的抱殘守闕，清代的許多漢學家們的整理和輯佚的工作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也是幫助不淺的。這工作不僅僅是像古人所謂「生白骨，澤枯骨」而已，而是有更重要的意義的。」（註一）

魯迅研究佛經，只是把牠們當作人類思想史的材料看，當作一種哲學思想來研究。他所相信的是科學，——尤其是進化論的思想，所以他雖然也刻「百喻經」，但是卻不沾染一點迷信的色彩。他認爲佛教的精神已經死亡了，那是屬於過去的東西，永遠不會復活的。

他研究金石拓本，也有自己的獨到的眼光。一般人研究碑石，向來都是注意文字的，對於石刻上的圖案，是很少留意的；而魯迅卻在這個地方花了許多工夫。此外，他對於中國古代石刻畫像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所保存的，除去原拓的碑帖畫像之外，又編好了一本「六朝造象目錄」，和一本尚未完成的「六朝墓志目錄」，還有一些手寫的畫像以及碑帖上的字跡。（註二）

三三三

魯迅初到北京，是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的藤花館，在這裏住了不久，便移到會館裏

而的另一所叫做古槐書屋的房子裏，在這裏還是照常繼續他的鈔寫蒐集和研究的工作。

在古槐書屋的院子裏，相傳往昔曾在這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現在這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房子卻還沒有人住；這時魯迅便住在這裏面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日子也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夏天，蚊子多了，他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鷺又每每冰冷的落到頭上。他的青年時候的激昂慷慨的意思沒有了，這寂寞一天天的長大起來，像毒蛇一樣，纏繞着他的靈魂。他雖然也時常感到無端的悲哀，可是他冷靜地看看四週，但他卻並不憤懣，因為單是憤懣是沒有用的；經驗催促着他，使他自己靜靜地反省。他知道自己了，他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而只是生活在苦難的中國人民大衆中的一個。

可是，這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對於他是太痛苦了。於是他就用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沉到平凡的生活中。

沉默呵，沉默呵，難耐的沉默呀！

一個人若是不在這沉默中爆發，那就只有在這沉默中滅亡了。

（註一） 見鄭振鐸先生作「魯迅先生的輯佚工作」。

（註二） 請參看長宋先生作「關於漢唐石刻畫像」。

幸運得很，時代沒有忘記了魯迅，殷勤而又關切地向他召喚着。

有一天，魯迅正坐在會館內的屋子裏，他的老朋友錢玄同走來了，將手提的大皮夾向桌上一放，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他翻開魯迅的古碑鈔本，發了一句研究的質問。

「沒有什麼用。」魯迅回答說。

「那麼，你鈔牠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

魯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那時正辦「新青年」雜誌，但是沒有人幫助，他們正在竭力地尋求友軍。於是，他說道：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這時魯迅雖然有自己的想法，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一時的寂寞是掩不住他對於未來的光明的憧憬的；最後，他終於答應了錢玄同先生，拿起了自己的鬪爭的武器來了。他在當時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註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這一股深藏在冷靜寂寞的地球殼內的熔岩，現在找到一個出口噴發出來了。「這熔岩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於無聲處動驚雷」，猛烈地掃蕩着一切墮落、虛偽、反動、猥褻的東西，衝向了那包圍着中國人民大眾的封建社會的堡壘，衝向了帝國主義者們的長堤，衝向了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者們交織成的天羅地網。

這是一個偉大的開始！

第七章 吶喊與彷徨：三十八歲至四十六歲

——一九一八——一九二六——

二五

魯迅底「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的四月發表了，把這當作魯迅的創作生活的真正的開始，是很恰當的，同時，若把這一件事作為真正的現代中國新文學底開端，似乎也並不是過分誇張的評價。

有了魯迅，中國才有現代的新文學；有了「狂人日記」，現代中國的新文學才最初地顯示了牠底存在的實績。

在「狂人日記」里，魯迅天才地指示出中國新文學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反封建的任務。離開了這一個反封建的任務。中國的新文學是無法表現與充實牠的內容的，不論牠披着什麼花樣的時髦的外衣。

在那一個時候，主要的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雜誌是「新青年」，而牠在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發刊的時候，全部還都是封建氣味十足的文言文，但經過一個醞釀時期，到一九一七年，發表了胡適博士的「文學改良芻議」，於是，在這雜誌上有了新的所謂白話文。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可是除了

帶着舊的詩詞味兒很重的，像是中年婦女剛放了以前裹着的小脚似的白話詩之外，其他的創作是没有的。在這裏第一個發表短篇小說的是魯迅，魯迅底第一篇小說便是「狂人日記」。

因為那時的「新青年」雜誌底編者不喜歡在雜誌上有像別號似的署名，所以魯迅就不用他的以前的筆名：令飛，迅行……等，而用了母親底姓「魯」，取了迅行這筆名上的「迅」字，合起來就叫做「魯迅」了。

在這篇小說裏，魯迅藉着患有「迫害狂」之類的病的狂人底思想、言語、動作，把封建社會中的家族制度和禮教，赤裸裸地都揭穿了，他不給假仁假義的偽善者留下一點點面子。

晚上，狂人沒有睡着，於是他就開始思索了，魯迅就用着這狂人的口吻，對於中國的歷史傳統加以批評道：——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接着，他便分析這一個封建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什麼表面上說得好聽的「仁義道德」，而是鮮血淋淋的「喫人」的關係。在這一個封建社會裏，一面是喫人的人，一面便是被喫的人。不論是在趙貴翁那兒也好，古久先生那兒也好，何醫生那兒也好，或是狼子村也好，甚至於在街上和路上都好，這一個「喫人」的關係，在封建社會裏卻到處都是存在着的。喫人的人們可以從歷史上找

出堂皇的理由，作爲他們應該喫人的理論根據，「易子而食」，「食肉寢皮」，是古已有之的辦法，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這部醫書上也分明地寫着人肉可以煎喫的妙文。於是喫人便不能算作一種罪惡，而是一件平平常常的，甚至於應該的事了。

這一種「喫人」的關係，不但是普遍地在社會上存在着，同樣地，就是在家庭裏的兄弟、姊妹、父母子女之間也還是存在着的。狂人的妹妹就會被狂人的哥哥喫掉，說不定狂人自己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喫到妹妹的肉；生在封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除掉了被喫者之外，似乎是總免不了沾染上或多或少的喫人的罪惡的。

然而，這一班喫人的人，又不敢明目張膽地去喫，不敢直接下手，總是鬼鬼祟祟地想法子來遮掩他們的醜態；因爲直接下手，怕有禍累，於是大家連絡起來，布滿了羅網，逼着被喫者自殺，這樣，他們既沒有殺人的罪名，又達到了目的，償了心願。在他們這羣喫人的人們之間，他們也不是平安無事的，他們彼此互相戒備着，自己想去喫人，卻又怕被別人喫掉，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而他們卻至死也不肯去掉了這喫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

這是一幅何等可悲而又可憐的封建社會的圖畫！這圖畫在中國已經存在着有好幾千年了，魯迅第一次給他勾出一個具體的輪廓，並且塗上了幾筆鮮明的色彩。

把握封建社會裏的主題，創造封建社會中的典型，描寫這一些典型的性格，和渲染這一個社會環境的樸實生動的景色，以及解說這一個社會本質的淳樸簡潔的語言，……這一些構成了以後的魯迅底

小說的主要內容。但是，魯迅對於這幅表面上是美麗的，而本質上是醜惡的圖畫，卻絲毫不加愛惜，畫出了隨即便把牠撕毀了，他一點也不惋惜這一個舊社會的滅亡！

「狂人日記」是魯迅的對於封建社會的說明書，宣戰書，同時也就是判決書；這是他的這之後的反封建的創作的全部綱領。

二六

接着「狂人日記」之後，在一九一九年的三月，魯迅發表了第二個短篇小說「孔乙己」，（註二）描一個破落的舊知識分子孔乙己的遭遇。他是唯一的站在魯鎮上咸亨酒店的櫃台外面喝酒的穿長衫的顧客，年紀是相當的大了，滿臉繃紋，鬍子已經花白；他原來也讀過書，可是幸運不佳，一輩子連半個秀才都沒有撈到，又不會營生，於是就愈過愈窮了，弄到幾乎討飯。微倖的是他還能寫一筆好字，可以替人家鈔書，換一碗飯喫。可惜他又有一樣好喫懶做壞脾氣，在人家鈔書，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了。這樣幾次，就沒有人叫他鈔書了，他沒有辦法，便免不了偶爾做些偷竊的事。有一次，他偷到了舉人家裏去，被抓住了，先寫服辯，然後捆打，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才放掉。此後，他只好用手來代替腳，兩腿盤起，下面墊一個蒲團，用草繩掛在肩上，到處行走。

有一天，他爬到咸亨酒店來喝酒了，人們還不肯放鬆對於他的奚落和嘲笑。

（註二） 見「全集」第一卷第二九二——二九七頁。

「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掌櫃笑着對他說。

「不要取笑！」

「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

「跌斷，跌……」他的眼色很淒厲，想懇求掌櫃，不要再提。這時，有幾個閒漢便圍上來了，看過便一哄而散。

在別人的談笑聲中，他喝完了酒，坐着用手慢慢走去了。

後來，他便沒有了；沒有人看見，沒有人聽說，大約是死了。

在封建社會裏，孔乙己是一個典型。在一九一九年之前的那一個時代，——更確定地說在一九二二年之前，似乎更妥當些——放在中國的舊知識分子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爬上去，像丁舉人之流的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作威作福；一條是跌下來，被人們當作取笑的資料。爬上去的就變成喫人的人，跌下來的便變成被喫的了。孔乙己在他活着的時候，他似乎是除了供給別人愚弄和嘲笑之外，便別無其他生活的目的；然而，就是這樣，還是不能夠生活下去，最後，終於被社會吞食了。

四月，寫成了第三篇小說「藥」。(註一)

藥的內容是這樣的：開茶鋪的華老栓華大媽的兒子小栓得了肺癆病，爲着要醫好這病，在一個秋天的夜裏老栓從家裏帶着僅有的積蓄下來的銀元，揣着饅頭走到屠殺犯人的刑場去。他想：把這饅頭在犯人的血裏浸一下，拿回來給小栓喫，那麼病就會好了。這犯人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革命者夏瑜，是

因為他的叔父夏三爺的告密而遭屠殺的，老栓把他所有的錢換了一個血饅頭，得意洋洋地回來了，立刻就把這饅頭燒給小栓喫。這時，天已經亮了，時候已經不早，茶鋪子裏充滿了顧客，對於這件事各人發表各人的意見：——

「喫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一個突然闖進來的滿臉橫肉的人，身上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銀釧，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細在腰間，剛走進門，就這樣曬道：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拏來，趁熱的喫下。……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喫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由這個人引起了話題，接着便是紛紛的議論。

「原來你家的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完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一個留花白鬍子的人一面說着，一面走到那位亂曬的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看見許多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

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敢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啊呀，那還了得。」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現出很氣憤的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辯說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

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够他受用了。」駝背五少爺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花白鬍子說。

「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康大叔顯出看不上他的樣子，冷笑着說。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那個人也和着說。

「瘋了。」駝背也說着。

最後，用革命者的血做成的藥，並沒有醫好小栓的病，小栓終於也死了。

愚昧、無知、殘暴、冷酷，……這是在封建社會裏必然地存在着陰暗的一面，因為整個的這一

個社會制度就是天天在製造這一些愚昧、無知、殘暴和冷酷的事件，天天在導演着人與人之間的莫名其妙的不可了解的悲劇。把革命者看成瘋子——就是「狂人」，這是無足奇怪的事。在他們還沒有能够了解「瘋子」的時候，他們是不知「瘋子」是爲他們的利益而犧牲的；他們反而要把「瘋子」喫掉，這一種可悲的誤會是難免的。

統治階級不但在政治和經濟上佔據着統治的地位，統治者的思想在思維領域裏也是佔據着統治的地位的。針對着這一個在數千年專制制度之下養成的、落後的蒙昧的自甘做奴隸的奴性，予以清醒的揭露，沉重的鞭策，嚴厲的批判，是當時的迫切的需要。從這一個被揭穿了了的顯明的例證裏，人們不難推想出一個必然的結論來，那便是：人們不能不澈底地消滅封建勢力的統治，那是不能夠達到完全的人性解放的；要達到完全的人性的解放的目標，先來擴清、掃蕩到這個目的地的路上的障礙物，這又是必要的非做不可的首要工作了。

在文學上擔當起這樣複雜而艱鉅的工作的，是魯迅底批判的清醒的現實主義。

二七

浪漫主義是人們離開了現實的，熱情的帶着感傷的幻想，而現實主義則是人們日常的實際生活中的戰鬥和生活方向。作爲「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的作者魯迅，在他年青時代的生活裏，是曾經也有過浪漫蒂克的空想的美夢的，可是卻都在冷冰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現實上碰碎

了。這一些他的年青時候曾經做過的許多夢，雖然被碰碎了，但他自己並不覺得可惜。現實告訴了他，對於一切事情用不着激昂慷慨，相反地，卻是較的深澀的戰鬥。從過去的各個階段的生活裏，魯迅吸取了這非常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他的現實主義的根源。

可是，他對於他的過去的曾經做過的許多夢，卻又不能完全忘卻，他的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這不能夠完全忘卻的一部分，便成爲他的創作的來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魯迅是可能走上浪漫主義的作家的路上去的，然而他沒有；限制着他向着這一傾向發展的是：客觀的中國的社會環境和主觀的他的戰鬥的氣質，被壓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塊大石頭底下的中國人民，不是戰鬥便是滅亡，幻想是不存在的。

代替了魯迅的可能發展成爲充滿了熱情的勇猛的吶喊。冷靜、沉重、嚴峻，是這

在這三篇作品裏面，魯迅刻劃出

過了這一羣人物，給予了產生這羣人悚的程度；沒有光，沒有熱，只有一「狂人日記」似的，魯迅在他自己的「狂人日記」裏分明也留着安得列夫式的陰冷。在「孔乙己」這一種極端的冷靜、沉重、嚴峻的作風

這壓縮了這奔放的熱情之後的發出來的低沉而冷。華老栓、康大叔這一羣人們的浮腫，逆他的筆觸的冷靜幾乎冷到死靜的令人震地向讀者們的心頭襲來。像果戈理的「狂人」這冷酷和陰暗的社會絕叫起來；「藥」的收魯迅把他自己的感情壓抑到無可再壓縮的地步向消極的悲觀的路上去，憎惡黑暗而自己反

在黑暗中沉默了。然而魯迅的作品卻沒有這大而讀者的內心的抵抗力也愈強，我們似乎裏一刻也不息地奔流着。這就是魯迅的理、安得列夫的地方。他比果戈理更着魯迅，他比果戈理安得列夫向前

當着魯迅剛開始動手寫小說的時候

來講，他卻又處在一個生氣勃勃的小資來講，他卻又處在一個生氣勃勃的小資使命，那便是：他自己的和階級的出路，是來和建勢力作決死的頑強的鬭爭中，殺出一條生路來，消極是不行的。所以他自願將自己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別的伙伴們，他「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這樣，便形成了魯迅底現實主義批判的清醒的作風。

二八

魯迅底批判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另一個表現，並且表現得更鮮明更具體的是在魯迅的雜文裏面。

「雜文」這一種文體，是魯迅獨創的文體。這文體在「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裏是查不到的，「這並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而是既鋒利又切實的匕首或投槍。

果，恰和這個相反，外界的黑暗勢力的壓力愈聽到那作者的激蕩的熱血也在我們自己的血管和果戈理、安得列夫相似，但又不同於果戈理「藥」的收尾又添上了一個花環。時代推動

雖然是非常陰暗的，可是就他自己的本身

據，而這根據一定都是對的。

魯迅卻揭穿了他們這一個糊塗的念頭。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

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

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

「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

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比較國粹主義者們稍微聰明一點，然而在本質上卻還是極端反動的，是頭腦裏面滿裝着二重思想

的先生們。他們看到了單憑「國粹」是不能夠挽救舊制度和他們自身以及階級滅亡的，勢必在「國粹」

，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

，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

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所以如此情形，新派搖說，舊派也歎氣。

，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

之外加上一點新玩意兒，這樣才可以苟延殘喘。可是外來的洋人勢力又似乎太大了，抵抗既沒有力量，接受又不甘心，於是他們就徘徊在這兩可之間，最後，便扭扭捏捏地走上了妥協的二重思想的道路。

對於這，魯迅也曾有嚴厲的批判，他說：

「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云』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那兩樣舊東西以外（按即是中國人歷來的對外國人的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蔣註），別想了。

「他們的稱呼雖然斷了，我們的

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

人物，脫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

體，西學爲用」，這幾年謂之「中學爲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

了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

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

前輩先生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

「子曰詩云」呢？」（註一）

「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拔去
終究尋不出位置的。」（註二）魯迅又說道。

國粹主義和二重思想夾雜不清地糾纏
怪現象一個一個都出來了。科學扶乩
遍的現象。

魯迅是非常激烈地反對這一些

「我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

在發明了六百另六，肉體上的病，既

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

「病」的旗號來反對喫藥，中國的昏亂病，便會有愈的一天。」（註三）

這時，魯迅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青年和兒童——尤其是兒童身上，他認為在這古老的腐朽的封建社會裏，只有孩子們才是這一片荒涼的廢墟上唯一的新生的幼芽。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的收尾，他曾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這時，在雜文裏更加強地發揮着這一個意見。他反對那妨礙

（註一） 見「全集」第二卷第五六——五七頁。

（註二） 見「全集」第二卷第六六頁。

（註三） 見「全集」第二卷第三三頁。

這新機的生長的，虛偽的罪惡的喫人的舊禮教，他重複地大聲疾呼道：

「我們能够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鴉鴉便鴉鴉般叫。我們不必學那才從私窩子裏跨出脚，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

「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帳勾消的時候。

「舊帳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註二）

依據進化論的觀點，目前的烏煙瘴氣，一糶糊塗的現象和事實，都不能够使他灰心氣餒的，因為他十分確信將來總是比現在好，小孩子總是比老年人好的。現在的窮凶極惡的年紀的人們，必然地要趨於滅亡的，而新起的善良的幼小者一定會走出來代替了他們。生物進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走向壯的路；舊的應該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那便是死的路。老的讓開道，催促着，獎勵着，讓小的走過去。這樣，後來的人們一步一步超越過自己的祖先，產生了一代一代的新人，新的社會。他不能夠確定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就在前面了，目前的暫時的黑暗是無足悲的。

二九

除了小說和雜文之外，這時，魯迅又曾

「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

「人與時」這幾首新詩。（註三）

對於詩魯迅是很有研究的，在一九〇七年
對於詩的見解和愛好。在一九〇七年的前後
張，學力和天才是不難在這些篇幅裏看到的。
的光輝，沒有固定的呆板的韻脚，音節的
良的影響，比較起當時的帶着舊詩的
的創舉。可是時代決定了魯迅的文學
這一個文學形式上長足進展，他的文
詩的外形的詩——這一方向來，魯迅寫

過：

「只因爲那時詩境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
(註一)

然而，事實卻並不如此。新詩這一種文學形式雖然沒有在以後的魯迅作品裏面出現，但是「詩」
的成分卻滲透了所有的魯迅作品。尤其是在他的雜文裏面，這一點表現得很明顯，他的全部的雜文

(註一) 見「全集」第二卷第四一—四二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七卷第三九三—三九四頁。

(註三) 見「全集」第七卷第三七一頁。



過一篇洋洋萬言的天文「摩羅詩力說」，發表他
寫了一些舊詩發抒自己的情感和懷抱。他的主
這幾首新詩裏，仍然還可以見到他的天才的閃爍
完全擺脫了舊詩的傳統的限制，和歐化的消化不
謂白話詩，實在是中國新詩領域中的別開生面
他的社會環境和他的戰鬥氣質沒有能够使他在
新詩——這裏所說的自然是狹義的普通的具有
後，他就沒有再寫新詩了。他曾經很謙虛地說

差不多都是一詩一和政論」的結晶。時代使得魯迅成爲另一種類型的戰鬥的詩人。

三〇

從一八九四年起，中國才有了近代工業底開端。同時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走上了帝國主義的階段，牠們在經濟上自由競爭轉向了獨佔形態，牠們對於殖民地上的民族資產階級必然地要採取壓制政策，不讓牠自由發展。帝國主義的經濟特色之一是以金融資本的輸出代替商品輸出的，在一八九四年之後，許多外國銀行便在中國設立了，各國都希望金融上來統治中國。

由於這大量的資金的輸入，中國的民族工業稍稍受了一些刺激，而慢慢地發展起來，這便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經濟基礎。可以說，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的經濟勢力是非常脆弱的；他們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壓迫，此外再加上國際帝國主義者直接地或間接地扶助封建勢力，來阻止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在重壓力之下，辛亥革命終於是流產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爆發了，這對於民族工業是發展的好機會。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這期間，中國的輕工業和一般其他產業都發展起來了，貿易輸出額也逐漸增加起來。這一民族工業的興起，對內牠必定是要排斥封建經濟的，對國際帝國主義經濟的，這一經濟形態反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便成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同時又因爲一九一七年的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成功，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的根本的變化，牠不僅在帝國主義的本國裏動搖了，牠還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和前方，動搖了牠們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上的統治。被海裏，望見了自己的解放的曙光，這給予了人民以莫大的刺激和鼓勵。這之後不久，在中國便爆發了一個繼承着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歐戰結束了，中國雖然也會參戰過，並且也是戰勝。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不復存在。息從和會上傳到了中國，大大地引起了山陸宗輿卻不顧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去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簽訂「山東換文」；這時，北京的學生便首先起來反對，五月四日他們聚集了有三千多人，舉行示威大遊行，到總統府請願，要求懲辦曹、陸、章、三個賣國賊，不料反被軍警所阻。這樣一來，他們更是火上加油，便直接地去把曹汝霖的住宅燒掉，把陸宗輿打了一頓，他們有組織的團結起來，到處宣傳，抵制日貨。不久，山東、天津、山西、河南、江蘇、湖北各地學生都起來響應，要求政府對於巴黎和會中的關於山東問題的條款拒絕簽字，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條件，懲辦賣國禍首，要求外交公開及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的權利。

「五四」運動是繼承着辛亥革命的傳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覺悟起來，繼續着去完

發掘，他想從這些資料裏面，找出這古老的社會最根本的病源來，這是一種最厲害的挖根辦法。這樣的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太『進步』的不能夠了解的。

三一

這年八月，魯迅把紹興的家裏房子重新加修繕，和周作人他們都搬進裏面去住了。那時候，故鄉的情形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後來他寫他回到故鄉時的情形，道：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註三）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箇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註一） 據歐陽凡海先生「魯迅的書」第一四四頁所云。

（註二） 見「全集」第一卷第三四四——三五八頁。

（註三） 謹按民元以前不久，尚在家鄉辦學校，到現在（一九一九年）只不過十年；這裏所說「二十餘年」者，恐怕是指一八九八年那一次離別故鄉而言。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有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人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屋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這次，恐怕是魯迅的最後一次回到他的故鄉。這之後，他似乎沒有什麼機會再回來過。魯迅到家之後，除了拜望親戚本家之外，又碰到了幼年時代的伙伴閻士，斜對門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這給

予他極深的印象，好久好久，他都忘記不了這一些尊良的靈魂。

關於他們，後來魯迅寫道：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褲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像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你不認識了麼？我還抱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了。」

「他多年出門，統忘卻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卻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卻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裏，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闕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闕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闕？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闕？什麼都闕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上去。

「這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是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舊帽，身上只有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枝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

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枞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只是說：

「呀！闊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渣，……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回旋，吐不出口外。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二十年前的闊土，只是黃瘦些，頸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闊土說。

「啊，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啊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闊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

打拱，那孩子卻害羞，緊緊的只是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卻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坐了，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曬在那裏的，請老爺……」

「我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是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出烟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對於中國農村社會以及農民的典型，魯迅的其他的任何一個作家都清楚。自從他的士大夫的家庭中落以後，由小康之家走入了困頓，魯迅便混入變遷、阿發這一羣野孩子的隊伍裏，他曾經歷過放牛、釣蝦這些平凡的人民生活，呼吸過真正的新鮮的土地的氣息，他從安橋村的大自然環境中吸取了自己的生活的養料。後來，他雖然從農村和農民中走了出來，並且漸漸地和他們隔離得遠了，走進知識份子的生活圈子裏，可是，在他的作品裏面，能給他的作品增加明麗的不朽的光輝的，大部分仍離不開他的外婆家安橋村這一帶的景物；能給予他在戰鬪中頑強不屈的抵抗的力量，閻土、楊二

嫂、長媽媽這羣固執的淳樸的農民是有極大的關係。

不幸的是中國的農村一天一天走向崩潰的路，生活在這正在崩潰下去的農村裏面的農民底命運，也就一天比一天更悲慘下去。饑荒、苛稅、多子、疾病、兵、匪、官、紳以及外來的帝國主義者的吸血，逼着他們走向失業失地的路上去。在魯迅的小說裏面，在明麗的農村景色底下，在淳樸善良的人物身上，也隱藏着淡淡的無可挽救的悲哀。

在家裏又住了九天，魯迅和他的家屬在歸途中，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稍去。在默默中，他沉思着。在這篇小說的末尾，魯迅曾抒寫出這樣的惆悵的心情，道：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了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色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色的圓月。我想：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三三

魯迅把家屬接到了北京，和母親，周作人以及三弟建人都住在西直門公用庫八道灣的房子裏，家庭的費用，大部分由他供給。

周老太太是非常喜歡看舊小說的，平時閱讀書籍，也由魯迅到處搜羅。（註一）周老太太看書的速度，不算太慢，頂多一個星期，她便說道：

『老大，我沒有書看了。』

於是魯迅就忙着去找，找到了，拿來給了老太太，而她卻又說道：

『老大，這本書，我看過哉。』

魯迅又要另去找。

因為母親愛看舊小說，魯迅就更是特別留心地在這一方面搜集，凡是爲母親買來的書，他自己必定要先看一遍。據魯迅說，僞的是：

「老太太看書，多偏於才子佳人這一類的故事，而她又過於動感情，其結局太悲慘的，她看了還會難過好幾天，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書，她又不高興看。」

所以他就不先看一遍，先選擇一下。可是，老太太看書太多了，而她的記性又好，凡是改頭換面的東西，她一看就看出來，說什麼書與什麼書是相同的。這提醒了魯迅更仔細地去考察許多舊小說來源和改裝。當着魯迅搜集、整理、校勘「小說舊聞鈔」以及「唐宋傳奇集」這一些書的時候，在方法上是頗受這一個影響的。

回到了北京之後不久，家事佈置就緒了。一九二〇年的一月，魯迅就着手翻譯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戲劇「一個青年的夢」。(註二)六月，寫成短篇小說「明天」。(註三)

「明天」這篇小說，是敘述着這樣一個故事，寡婦單四嫂子是一個非常粗笨的女人，自從她丈夫死後，她就專靠着自己的一雙手紡出的棉紗，來養活自己和她的三歲的兒子寶兒。一天，寶兒病了，並且病得很厲害，單四嫂子抱着他坐在牀沿上，在黑沉沉的燈光裏，看着孩子的緋紅裏帶有一點青色的臉。夜已經很深了。和她隔壁的兩個無賴漢：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在嗚嗚地哼着小曲子。這時，單四嫂子心裏計算着：神籤也求過了，心願也許過了，單方也喫過了，要是沒有見效，這怎樣好？

(註一) 荊有麟著「魯迅回憶斷片」一書中，關於魯迅先生生活中的瑣事，有一些可以參看。

(註二) 收入「全集」第十二卷第七——二八五頁。

(註三) 見「全集」第一卷第三一一——三二〇頁。

——那只有去看何小仙了。她又想道：寶兒也許是日輕夜重罷，到了明天，太陽一出，熱也會退，氣喘也會平的，這實在是病人常有的事。於是她就等着，等着，等待着明天。天亮了，寶兒的病卻沒有減輕，反而愈加沈重起來，他的鼻翼已經一放一收的扇動了。單四嫂子知道不妙，於是只有去看何小仙，她從木櫃裏掏出僅有的每天節省下來的十三個小銀元和一百八十個銅錢，向衣袋裏一裝，鎖上門，抱着寶兒便直奔何家去了。

天氣還早，何家已經坐着四個病人了。她摸出四角銀元，買了號籤，第五個便輪到寶兒。何小仙伸開兩個指頭按着脈，那指甲是有四寸多長，單四嫂子暗暗喫驚，她心裏想道：寶兒該有活命了。但是，她還是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問，便局局促促的說：——

「先生，——我家的寶兒什麼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麼？他……」

「先去喫兩帖。」

「他喘不過氣來，鼻翅子都扇着呢。」

「這是火尅金……」

何小仙說了半句話，便閉上眼睛；單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問。在何小仙對面坐着的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已開好一張藥方，指着紙角上的幾個字說道：——

「這第一味保嬰活命丸，須是賣家濟世老店才有！」

單四嫂子接過藥方，就徑向濟世老店走去。店夥也翹了長長的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包藥。她抱着寶兒等着；寶兒忽然攥起小手來，用力拔她的散亂着的一縷頭髮，單四嫂子怕得發怔。

這時，太陽早出了。單四嫂子抱着孩子，帶着藥包，越走越得越重；孩子又不住的掙扎，路也覺得越長。沒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館的門檻上，休息了一會，衣服漸漸的冰着肌膚，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寶兒卻彷彿睡着了。她再起來慢慢地走，仍然支撐不住，耳朵邊忽然聽得人說：——

「單四嫂子我替你抱轎！」似乎是藍皮阿五的聲音。

她抬頭看時。正是藍皮阿五，睡眼朦朧的跟着她走。

單四嫂子在這時候，雖然很希望降下一員天將，助她一臂之力，卻不願是阿五。但阿五無論如何，總是偏要幫忙，所以推讓了一會，終於得了許可。他便伸開臂膀，從單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單四嫂子便覺乳房發了一條熱，剎時間直熱到臉上和耳根。

他們兩人離開了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說些話，單四嫂子卻大半沒有答。走了不多時候，阿五又將孩子還給她；說是昨天與朋友約定的喫飯時候到了；單四嫂子便接了孩子。幸而不遠便是家，早看見對門的王九媽在衙邊坐着，遠遠地說話：——

「單四嫂子，孩子怎了？」——看過先生了麼？」

「看看了。」——王九媽，你有年紀，見的多，不如請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樣……」

「唔……」

「怎樣……？」

「唔……」王九媽端詳了一番，把頭點了兩點，搖了兩搖。

寶兒喫下了藥，午後，不久便死了。

王九媽發命令燒了一串紙錢，又對單四嫂子的兩條板燒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她借了兩塊洋錢，給幫忙的人備飯。她又把單四嫂子的一副銀耳環和一支鍍金的銀簪，交給村裏的咸亨酒店的掌櫃，託他作一個保，半現半賒的買一具棺木，僱兩名脚夫，把寶兒埋了。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結束了。在封建社會裏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寡婦孤兒所期待的就是這樣的「明天」。

和「藥」相類似，魯迅在「明天」裏面畫出封建社會中悲慘的人們的生活又一面，更加強地剖明了封建社會喫人的真相和本質，像這類的事件，在中國社會裏是非常普遍的，幾乎到處都存在着，也幾乎天天在發生着；大部分的中國人民的命運，是不會比這故事中的角色的命運較為幸福的，而更悲慘的恐怕就多得很多了。像這樣的反映着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的生活的，幾乎到處存在着和幾乎天天發生着的主题，空想的浪漫主義的作家，對於牠是不屑一顧的，他們的偉大而空洞的理想飛翔在雲端裏，不願意把他們的高雅的筆尖觸到這污濁醜惡的地上來，觸到真正的人民的生活的疾苦和戰鬥上來，他們認為這是卑俗的，他們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而逃開現實了，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的魯迅，和這

相反，他不但避開這一些污濁和醜惡的現實，並且面對着牠們，把這一些主題寫進自己的作品裏面去，發掘得更深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這不惟不會得到一個消極的效果，而牠卻揭破了這一社會的罪惡的真面目，鼓舞起人們去改造這一個社會的決心和力量。從「孔乙己」起，通過了「藥」、「明天」，魯迅底批判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在中國新文學的領域裏，堅實地建立起了一個優秀的傳統。

七月，作短篇小說「一件小事」。(註一)寫他自己在三年前(民國六年)的冬天的早晨的小事情。北風刮得正猛，魯迅因爲生計關係，不得不就趕路。一路幾乎遇不見人，好容易才僱定了一輛人力車，拉他到S門去。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淨，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夫也跑得更快，剛挨近S門，忽而車把上帶着一個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髮，衣服都很破爛。她從馬路邊上突然向車前橫過過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她的破棉背心沒有上釘，微風吹着，向外展開，所以終於兜着車把。幸而車夫早有點停步，否則她定要栽一個大斛斗，跌到頭破血出了。

她伏在地上；車夫便也立住脚。魯迅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車夫多事，要惹出是非，就誤了路。

「沒有什麼的，走你的罷。」魯迅對車夫說。

(註一) 見「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一——三二四頁。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並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着她臂膀站好，問她說：

「小怎麼啦？」

「我摔壞了。」

魯迅想道：我親眼看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惡。車夫多事，也正
是自討舌喫，現在你自己想法子去。

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着他的臂膀，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魯迅有些詫異了，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後，外面也不見人。這車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走向那個大門。這時，魯迅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那車夫的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要仰臉才能看見。這車夫對於他，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掙出他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他坐着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裏走出一個巡警，才下了車。

「你自己僱車罷，他不能拉你了。」巡警走近他說。

「請你給他……」魯迅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裏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了巡警。

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他走着，一面想着，幾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是什麼意思？獎他麼？自己還能夠獎勵車夫麼？自己也不能夠回答。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魯迅還想到這事件，他在這篇小說的收尾，寫道：「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這一種偉大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在別人是罕見的。人們往往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或過失，卻想盡了千方百計來文過飾非，把自己應該承認的過錯，都推諉給別人，而自己則逍遙於九霄雲外，下看塵寰，洋洋自得，這是人們的不可救藥的劣根性，而魯迅卻拋棄了他。

他具有着別人所沒有的虛心和勇氣。他不僅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過失，他而且還有改正自己過失的決心。這「一件小事」促使他慚愧、反省；在他的深切的反省之後，他便揭起了自己的劣根性，走向着更高的新階段。

同時，這也可以說是魯迅對他自己的階級的嚴正批判。因為，和魯迅生在同一階級的人們，大家都是非常要面子的。在他們的自命不凡的所謂高貴、尊嚴、顯赫……底下掩蓋着的，盡是些荒淫和無恥、虛偽和自私、殘酷和卑劣，沒有一點點的好東西，可以拿出來，向着大家誇耀的。可是，他們卻偏偏又要裝模作樣，擺出趾高氣昂，自以爲了不起的架子，拿出和平中正，斯斯文文的派頭來，魯迅不管他們這一些，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這一些卑劣的根性揭穿了。

沒有這一個面對真理的勇氣，不願意在真理的面前低下頭來，卻傲然地昂着頭從真理旁邊走過

去，這樣，永遠不會接近真正的人民底歷史的；沒有這一個誠摯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向前發展的，走進廣大的工農的隊伍裏面去。雖然，這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過程，是一個曲折，痛苦而又艱巨的過程，可是，要進步，這又是不可避免的必經的過程。

在這一艱苦過程中，首要的是：坦白，誠懇，勇氣，和決心。

三三三

一九二〇年的秋季，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馬幼漁先生邀請周作人到北大去教「中國小說史」這一門課程，周作人貿然答應下來了，後來他自己覺得不合適，於是便和魯迅商量，說還是魯迅去教這門課程比較好些。魯迅答應嘗試看。對於這一門學問，在這之前，魯迅已經比任何人都下了更多的工夫了。

從這一個時候起，魯迅從自己的房間走出來，步入了青年學生們的羣衆當中。當他最初在廣大的青年面前出現的時候，便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那時還是北大的學生之一的王魯彥先生，在後來，追憶當時的盛況，曾有詳細的描寫道：

「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仰着冷靜蒼白的面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着四五個人，連門邊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教室裏主宰着極大的喧鬧。但當魯迅先生一進門，立刻安靜得只剩了呼吸的聲音。他站在他講桌邊，用着銳利的目光望

了一下聽衆，就開始了「中國小說史」那一課題。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短的舊長袍，不常修理的粗長的頭髮下露出方正的前額和長厚的耳朵，兩條粗濃方長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稜骨上，眼窩是下陷的，眼角微朝下垂着，並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給兩邊深刻的皺紋映襯着，這才顯出了一點高大的模樣，濃密的上唇上的短鬚掩着他的闊的上唇，——這種種看不出來有什麼奇特，既不威嚴也似乎不慈和。說起話來，聲音是平緩的，既不抑揚頓挫，也無慷慨激昂的音調，他那拿着粉筆和講義的兩手從來沒有表情的姿勢幫助他的語言，他的臉上也老是那樣的冷靜，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敘述着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着極平常的語句，既不讚譽，也不貶毀。」

「然而，教室裏卻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衆的眼前赤裸裸地顯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彷彿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教室裏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裏混雜着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的蒼白的冷靜的面孔上浮動着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但是教室裏又忽然異常靜默了，可以聽見脈搏的擊動聲。魯迅先生的蒼白的臉上始終不會露出過一絲絲的微笑。」（註一）

同樣，後來魯迅在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教書，也受到學生們的歡迎。那時還是他的學生的景宋女士，回憶到那時的情景，寫出了他的另一個形像，道：

「當魯迅先生來上課的瞬間，人們震於他的聲名，每個學生都懷着研究這新先生的一種好奇心。在鐘聲還沒有收住餘音，同學照往常積習還沒就案坐定之際，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髮，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着，真當得「怒髮衝冠」的一個「衝」字。一向以爲這句話有點誇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的許多補釘，則炫着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鵲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掩蓋不住了。一句話說完：一團的黑。那補釘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耀人眼。小姐們嘩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也許人們這麼想。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刹那，人們不知爲什麼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逃課，也沒有一個在聽講之外拿出什麼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着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着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氣回轉過來了。一致愛護的魯迅先生，在學生中找不出一句惡評。」（註二）

在授課的餘暇，十月裏，作短篇小說「頭髮的故事」。（註三）借着頭髮故事的變遷，魯迅寫出從辛亥革命的前後起到那一個時候（一九二〇年）止的軍閥官僚當權的政治變遷的一個側面。

在這篇文章裏，魯迅寫出了革命與人民是無關的，那是軍閥和官僚們包辦的事。雙十節算是國慶紀念日了，可是人民對於這並不感到興趣。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人來，擡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晚，收了旗關門；有幾家若是忘了，那塊爛布一直要掛到第二天早晨。這是人民對於寡頭的官僚政治絕好的天才的諷刺。

正經事情沒有人來過問，而大家所爭執的，衝突、矛盾最厲害的最尖銳化的事情，卻是『辮子問題』。不論那一個官兒當權，人民的生活照例是不管的，而對於辮子的有無，卻必須首先過問。在『首善之區』的北京城內，在民國已經成立了有九個年頭的時候，居然有這樣的一樁怪事：有個已經考進了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因為剪了頭髮，沒有辮子，不能梳成盤龍髻，S髻，於是便不能入校了。這一個奇聞，和魯迅自己以前因為沒有辮子，而吃了許多苦頭的往事，是可以互相比美的。如今思昔，魯迅的心中是非常憤怒的，由於這一個感觸，他便寫出這篇『頭髮的故事』來。同時，又由於『辮子問題』的聯想，在同年內，魯迅又寫出了另一個短篇小說『風波』。(註四)

「風波」裏面所描寫的是一九一七年的張勳復辟時候的故事。在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借着參加歐

(註一) 見「活在人類的心裏」。

(註二) 見「魯迅和青年們」。

(註三) 見「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五——三三二頁。

(註四) 見「全集」第一卷第三三二——三四三頁。

戰的名義，想來擴張自己的勢力，這引起了當時的總統黎元洪和衆議院的反對。對於這件事段祺瑞頗不服氣，於是就在暗地裏唆使各省督軍入京，組織流氓式的所謂公民團二三千人包圍總統和國會。黎元洪見勢不妙，於是召長江巡閱使張勳入京調停。張勳到了北京，強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又和保皇黨首領康有爲商量，七月一日入清宮擁廢帝溥儀復辟，恢復滿清舊制，大封功臣，他自己封爲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這個復辟運動剛發生，不久就被撲滅了。可是，這一個惡影響卻傳播得很遠，在「風波」裏面所描寫的，便是這場復辟運動在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村裏所引起的風波。

開頭的場面是這樣的：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牠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才喘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而河的農家的煙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這是晚飯的時候了。

接着這一個場面，便是生活在這農村裏面的，保守的，頑固的，愚昧的，落後的農民們的糾纏，和反動的封建勢力在農村社會裏的抬頭。

農民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他的女兒六斤溜到了他的身邊，也坐下來，叫他一聲爸爸，七斤沒有應。

「一代不如一代！」七斤的祖母九斤老太正生着氣。

七斤慢慢地抬起頭來，歎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說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七斤又歎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麼？」七斤嫂問道。

「皇帝要辮子。」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在直覺上覺得這事不妙了，她一轉眼又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捧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喫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麼？」

皇帝坐龍庭的消息傳遍了全村，村子裏的反動的封建勢力於是也就躊躇欲試了。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趙七爺，這三十里方圓之內唯一的帶着遺老臭味的，曾經讀過「三國演義」的學問家，自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不是道士，卻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她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又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這天的晚飯時候，趙七爺走進村子來了，坐着吃飯的人看見他來，都站起身，拏筷子點着自己的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裏用飯！」

他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一徑走到七斤的桌旁。

七斤們也連忙招呼，他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麼？」趙七爺說。

「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說，「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裏，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的女人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過了半天，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

「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有些什麼人。」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她用筷子指着七

斤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進城就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裏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喫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他的兩週歲的遺腹子，連忙解勸說：

「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耳朵早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

「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是一個人，我會說出這樣昏誕糊塗的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掙了空碗，伸出手去曬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她的雙丫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卻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繞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

歸他，」他兩手同時舉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牙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又看見趙七爺這兇相，她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她走去，衆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人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就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於是就回想起以前七斤常常對人談論城裏新聞的時候，他不該含着長烟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現在他既然犯了皇法，這倒也暢快。他們還想發些議論，但卻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於是他們也就慢慢散掉，回家關門睡覺。

十多天過去了。一天，七斤從城裏回來，他的女人見他非常高興，就問他說：「你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我想，不坐了罷。」

不久，沒有辮子的七斤在村子裏又恢復了原來的地位，七斤嫂和村人們又給他相當的尊敬了。

投機的反動份子也不聲不響了，農村社會和生活在這社會裏的人們又回到寧靜的，不輕易改變的，停滯的狀態裏。革命也罷，復辟也罷，對於他們這些事是無關緊要的，除了留心自己的和別人的辮子。

軍閥官僚們的愚民政策的統治方式，在這裏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三四

在魯迅走進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之前不久，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直皖戰爭爆發了。

自從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方的封建勢力妥協以後，北洋軍閥的勢力便一天比一天膨脹起來，國際帝國主義者們在他們的幕後精心傑構地在導演一幕又一幕互相殘殺的悲劇。這反映着牠們在中國的利益衝

突越來越發尖銳化。

袁世凱死了之後，北洋軍閥即分爲直皖兩大系統。直系的首領是馮國璋，馮國璋死後曹錕、吳佩孚成了他的後繼者；皖系則以段祺瑞爲首領。在他們後面站着的主人是英國和日本這兩個帝國主義者。

當着徐世昌繼承了馮國璋做大總統的時候，北京政府的實權操在皖系軍閥的手裏，段祺瑞便假借參加歐戰的名義，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借到大批款項，編練自己私人的軍隊，抵制直系軍閥的勢力，同時，安福系的官僚政客又把持住了政府要職，處處給予直系的軍閥、政客、官僚以難看。這時，吳佩孚大爲不平，遂由湖南撤防北上，（這時他是正在抵制南方的革命勢力的）到了鄭州，聯合曹錕、張作霖通電攻擊安福系政客把持政權，禍國殃民。段祺瑞不服，於是雙方就打起來了，結果，皖系大敗，禍首們都逃到日本領事館裏去避難，英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佔了上風。這時的北京歸入了直系和奉系的軍閥統治之下。在這樣的一個烏烟瘴氣的局裏，山羊式的叭兒狗式的文人們都出來了，搖尾隨頭，放賴撒嬌，乞憐於將軍們的槍桿和指揮刀之前，希望這些兇頭惡腦的武人們，在得意洋洋的勝利之後，趁戰勝的餘威，再來牠一個誅戮異己，廓清邪說的壯舉，把不順眼睛的硬着骨頭的人們殺光，從此，天下便可以太平無事了。

然而，這只是個美麗的空想。暴力絕對地是不會征服一切的。事實卻恰恰和這一班英雄豪傑們的願望相反，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在暗地下還是靜靜地向前流去，雖然，這時也已經有了逆流和洄漩。

由於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陸續地在新文學園地裏出現，革命的新文學才算顯示了自己的實績。因為當時的青年人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他們的心，因此便得到了廣大的傳播。接着這幾個短篇小說之後，魯迅又發表了「明天」、「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風波」四篇作品，這更加給予了文藝青年們以無限的鼓勵。同時，又因為魯迅進了北大教書以後，正式地經常參加實際的文藝活動，在生活上和青年們有更多的接觸，在理論上給青年們以更具體更確切的指導，甚至於在作品上也時常給青年們以詳明精細的改正，這把新文學運動的潮流推廣得更遠了。在當時，除了北京之外，新文學在各個地方各個城市，風起雲湧地生長起來。就在這一個大規模展開的文學運動裏面，在中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兩個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便同時誕生了。

這之前，領導着「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的刊物是「新青年」雜誌，這雜誌是當時新的文化運動的理論論爭的中心，各種問題各種意見都在這上面發表。和「新青年」雜誌相呼應的刊物是「新潮」，這雜誌上面出現了好幾個文學作家；此外還有「少年中國」、「星期評論」、「建設」……這一些雜誌，以及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都是鼓吹新思想的。稍後，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地走向了這一個新的方向。國外的各種思潮，藉着這一些刊物的介紹，於是也逐漸地滲透進中國人民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頭腦裏，並且默默地將掀起壯闊的波瀾。再向後來，「新青年」雜誌移到廣州去，牠

的內容偏向了政治方面；其他的刊物也起了分化，有的改變目標，有的停止出版，然而，由於這些刊物所傳播的新文學的種子，在中國的貧瘠的土地上，卻發芽滋長起來了。作爲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學第一個光輝而燦爛的碩果的，是文學研究會。

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是沈雁冰、鄭振鐸、孫伏園、葉紹鈞、耿濟之，……諸位先生們。會員約有一二百人，幾乎包括了「五四」以來的所有的新文學的作家和譯者。在組織上，並不十分嚴密。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改組之後的「小說月報」（由沈雁冰先生主編），作爲他們的總機關報。此外，其他的分散在各地的屬於文學研究會的日報副刊、旬刊、週刊，則由各地的文學研究會分會主持，在目標上，大體是一致的，反對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在文學裏表現，是他們的共同的基本的態度。他們認爲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玩意兒，這一種士大夫的想法，是已經過去了。爲着「一方面想打破這種對於文學的謬誤與輕視的因襲的見解，一方面想介紹世界的文學，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以謀與人們全體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註）他們便和商務印書館合作，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介紹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的書籍，使文學的基本知識，能够普及於中國的文學界，乃至一般人民的腦中。介紹近代的世界文學名著，尤其是俄國、東歐、北歐以及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作品，作爲自己的創作的借鏡。創作方面，他們主張爲人生爲社會的藝術觀，標榜寫實主義，着重暴露社會的黑暗的一面。

因爲文學研究會迅速地發展，在各地文學研究會分會主編的刊物上，都註明着某地文學研究會分

會字樣，也頗引起了當時的一部分人的不滿。當時的另一個文學團體創造社，主張完全和文學研究會相反，他們不注重翻譯介紹而要自己創造，不贊成爲人生爲社會的寫實主義文學，而揭起了爲藝術而藝術的唯美派的大旗，崇拜浪漫主義的自我表現。

這是非常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現象，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文學思潮卻同時在中國新文學的領域裏出現了。這是在別一個國度裏不會發生的現象，而在中國的社會裏卻很自然的發生了。其原因在這裏：因爲「中國的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雖然沒有「完全得了勝利」，但五四前後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確是以在歐戰期間得以發展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爲基礎；於文學的領域內，在對封建古文的鬭爭勝利以後，因爲受了歐洲資產者社會近二三百年文藝思潮的影響，於是在短促的時間內，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文學同時呈現」了。（註二）

「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所以同時存在的另一原因，則由於當時現實生活情況的造成：「五四運動的狂潮過去以後，一般社會又陷於苦悶之中。外交上雖沒有十分的失敗，而軍閥的內鬨，官僚誤國之情狀，卻依然存在」。（鄭振鐸）而對這黑暗的現實加以暴露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會，與熱情的反抗的間帶着感傷主義的調子的浪漫主義的創造社，（「感傷主義是與浪漫主義離不開的」。——柯根「世界文學史綱」）就同時活動起來了。現實的背景是一樣，不過所反映的方式不同而已：文學研究

（註一） 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隱」第七三頁。

（註二） 見李何林先生「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七七頁。

會偏於暴露黑暗，創造社則於反抗中憧憬着光明。其爲不滿意於現狀，而暗示或要求改革則又是一樣的。」（註一）

總括起來，可以這樣的說：這兩個表面雖然各不相同的，而本質上卻是互相接近的文藝思潮，在同一時代以不同的形式，反映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上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不滿和反抗；這不但不是爲奇的現象，反而卻是錯綜複雜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的，並且是應有的產物了。牠們把進步的反帝反封建的優秀作風，帶進了新文學的領域，豐富了新文學的內容；在文學的領域裏，牠們繼續着去完成從辛亥革命以來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運動，同時，牠們卻又開闢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新興的普洛文學運動的先河。

作爲這兩大文藝思潮的啓蒙者，是魯迅；在將來，作爲這兩大文藝思潮的衝突與矛盾之後的統帥，也將在他的作品裏面反映出來。

新文化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向上高漲，這對於國內的封建勢力，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們是一種莫大的威脅；所以，也就在這一時候，牠們也展開了對於新文化力量猛烈的進攻。

首先，爲着反對新文化新文學而出現的有「學衡雜誌」，這雜誌的主要人物是胡先驌、梅光迪、吳宓這幾位頑固先生們，他們以「不偏不激」的態度，來張皇舊文學而排斥新文學。在他們的雜誌的「弁言」裏，就有這樣的妙文：

「雜誌適例。弁以宣言。綜其旨要。不逾二轍。自釋則奢飾。斥人則詆訶。句必盈尺。字或累

高。同人淺劣。謝未能也。出版之始。謹矢四義。

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

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

三、詮釋之作必趨雅晉以崇文。

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

揭發真理不趨衆好。自勉勉人。期於是而已。莊生有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聵盲哉。夫知亦有之。同人不敏。求知不敢懈。第視斯志之出。不聵盲吾國人。則幸矣。」（標點符號，悉依原文。——善註）

在這似通非通莫名其妙「宣言」裏，牠的字句雖然令人莫測高深，可是，牠們的對於新文化的攻擊的態度，是不難一目了然的。「句必盈尺，字或累萬」的當然不是指他們自己的，復古的「簡練」的文言文，而是說那些「的噁嗎呀」的白話文了。

其次，是章士釗的「老虎報」——「甲寅雜誌」也復刊了。牠比「學衡雜誌」來得更惡劣些，牠攻擊新文化比「學衡雜誌」更刻毒。章士釗倚仗着站在他背後的主人：軍閥政客的武力，對於新興力量加以卑劣的污蔑和摧殘。

和牠們氣味相投而且互相呼應的有「民心週刊」、「經世報」、「亞洲學術雜誌」、「史地學報」、

（註一） 見同上，第七八頁。

「文哲學報」、「湘君」、「長青」、「紅」、「快活」、「禮拜六」、「紅玫瑰」、「紫羅蘭」、……
這一些腐朽，墮落，肉麻的刊物。

配合着國內的反動勢力的抬頭，國際帝國主義者們也加緊了牠們的對於新文化陣營的威脅和利誘，迫使着新文化的陣營起了很大的分化作用。最聰明的是「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如陳源即西營教授者流，搖身一變，裝出和平中正的嘴臉，跟在國內國外的主子後面，說說「閒話」獻獻殷勤，混一碗飯喫了事。比較時髦的歐化紳士如徐志摩先生，他說：「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而規規矩矩地投到帝國主義者的懷裏，心安理得的去做他的歐化詩去了。最穩當的是胡適之博士們的「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的辦法，他們心平氣和的走進研究室去「整理國故」，用他們的「科學」方法去「打鬼」，結果是被鬼迷住了心竅，向死鬼，僵尸鬼，爛骨頭，妥協投降了。此外，還有一批落荒而走的人物，據說他們是飄飄蕩蕩的到外國留學去。

最後，剩下來的只有「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真的猛士」了。魯迅便是其中最堅定的一個。這之後，他要作更曲折複雜的，多方面的戰鬥。當着以往的隊伍拆散之後，他在這多方面戰鬥當中，魯迅又重新召集了另一批文藝戰線上的新軍，那便是：後來的未名社和莽原社。

反對復古的反動派「學衡雜誌」的淺薄無知。魯迅從他們的根底上把他們的祕密揭穿了。他們雖然打着張皇舊學的旗幟，而他們對於舊學卻是無知的，他們反對白話文，提倡文言文，可是他們自己卻連文言文的句子還沒有做通，弄得笑話百出。而魯迅卻是從舊壘中來的，看得分明，知道他們的底細，對於舊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反戈一擊，正中要害，致他們的死命了。

在「估學衡」裏，（註二）魯迅給了他們最恰當不過的價錢，他寫道：

「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爲「衡」，而本身的稱星尙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着較準，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接着，魯迅就真的估一估，順便舉出了這雜誌上面所刊載的文章上面的許多不通的地方：如「學衡」的「弁言」的開頭第一句「雜誌適例，弁以宣言」，就弄錯了。魯迅指出說：「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適例」的宣言，并爲一談，太汗漫了。」

又，在「學衡」上刊載的「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有云：「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映，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也。」魯迅寫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 *Practical*，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棺呢？」

（註一）見「全集」第二卷第九八——九〇頁。

又，在「國學據譚」中有云：『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摺紳先生難言之。』魯迅寫道：『入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爲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摺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摺紳也難言之呢？推度情理，當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摺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五家言黃帝」而並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

又，在「記白鹿洞中談虎」中有云：『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談噉之類也。』魯迅寫道：『姑不論其「能」「健」「談」「稱」，牀上安牀，「抉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談噉」，也可謂太遠於於事情。倘使但「資談噉」，則先前的聞而變色者，簡直是獸子了。記又云：「俚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又，漁丈人行的起首有云：『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魯迅寫道：『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是犯了複，而且，「之下」二字沒有着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够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爲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脚韻」。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採集植物遊記」，這連題目都不通了。魯迅寫道：『採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

古人作記，務與游不並舉，地與游總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游，採醜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採集時候，也兼游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裏，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的說起喫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採集植物游食眠記」。

「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魯迅最後指出道：「總之，諸公培植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爲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我所憾者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堂堂的大學教授的，自命爲國粹家們的，蒙在假古董的偽裝之下的真面目，於是完全暴露出來了。真是丟盡了人。

由這兒更進一步，魯迅指出了他們的，以及他們之外的一夥國學家所依據的所謂「國學」，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牠有那些內容呢？

他寫道：

「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藉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是不商於「士類」的，現在也趁着新

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爲名，想揆進遺老，遺少的「士林」裏去。他們所刻的書都無異國曆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卻是古董性質，至少每本兩三元，絲連、錦帙、古色古香，學生們是買不起的。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麼「菁華」，什麼「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卻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了。然而錯字疊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那時的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各地，在反動的復古的聲浪中，一齊吵吵鬧鬧得天昏地黑的所謂「國學！國學！」者，也不過如此而已，真是可憐得很。

正當着這些國粹主義者們曬得最厲害的時候，新文學運動也漸漸地跌入低潮，很多的聰明人準備卷旗息鼓了，魯迅卻工作得更勤快。

一九二一年四月，他從 S. Bog wund A. Billard 德譯的「革命的故事」(Revolution—geschichte) 中，譯出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長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註) 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生長在帝俄時代的，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寫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工人綏惠略夫，游離在實際的社會生活鬭爭的外面，終身和社會反抗，但卻並沒有認識這社會裏的真正敵

人，究竟是誰。最後，他在莫名其妙的憤怒憎恨和嫌惡裏，用鎗毀滅了別人也毀滅了自己。

十二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劇「一個青年的夢」。(註三)也是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這是作者在第一次歐戰期間所寫的反對戰爭的作品，在這書的自序裏，作者很慷慨地說明他自己的願望，希望在這世界上生出平和的理性的自然的新秩序，殺人的血腥的事能够避免多少總還是避免多少的好。這並不是他膽怯，他說：他實在因爲願做平和的人民。

反對戰爭（尤其是國內的軍閥戰爭）反對舊社會制度，這是那時候一般中國青年人的夢想，同時，這也正是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最熱烈的期望。然而，那個時候，新興的哲學思想和社會科學的理論，還沒有大量的輸入國內，新興的階級剛剛在歷史舞台上出現，還沒有能够成爲領導的力量，一般的青年人在憧憬着光明，反抗着黑暗，大多數是免不了多少總帶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的。「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魯迅把這兩本書譯出來，作爲中國青年們的，以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借鏡。

三六

接着「明天」、「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風波」之後，在中國新文學的領域裏又顯示出

(註一) 收入「全集」第十一卷第五五——五九五頁。

(註二) 收入「全集」第十二卷第七——二八五頁。

大的實績，魯迅在一九二二年寫出了更輝煌的兩個短篇小說：「故鄉」和「阿Q正傳」。(詳)

「明天」的作風是「藥」的繼續，雖然「因爲那時的主將不主張消極的，」魯迅自己也「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別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他「不恤用了曲筆」，和「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了一個花環」這手法相似，「在「明天」裏也不絀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可是在全篇裏，也和藥的收尾一樣，安得列夫式的陰冷，卻到處充滿着。沒有光明，沒有希望，這便是寡婦孤兒們在封建社會的愚昧、無知、迷信、層層包圍之中，所熱烈期待着的「明天」，這把人窒息得幾乎絕叫起來，牠不給人們以一絲溫暖的慰藉。看起來這似乎太消極了太殘忍了一些，然而，這卻正是批判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手法。

然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的社會，畢竟和十九世紀末的俄國社會大不相同，這一種安得列夫式的陰冷的作風，在中國找不到牠的現實的土壤。在這上面生根發芽滋長，所以在現實主義者的魯迅的作品裏牠就不能形成一個主導的在本質上的影響，這影響在魯迅的作品只存在着很短的時間，很快地魯迅就揚棄了牠。這樣的一個風格上的轉變，在「一件小事」和「頭髮的故事」這兩篇作品裏分明地顯現出來。

和存在於以前的作品中的冷靜、沉重、嚴峻的風格不同，在這兩個短篇裏，魯迅顯示出來了他的作風的另一個特色，那便是：記事的明快、生動，然而在抒情方面卻又帶着一點憂鬱的風格。在這兩個短篇裏，結構是很簡單的，故事非常單純，沒有什麼穿插。人物的描寫，尤其簡單，幾乎沒有什麼

刻劃，而完全是作者藉着作品中的人物，主觀的直抒胸臆。在某一些地方和契訶夫的某些作品是非常相似的。若按着公式主義者的批評家們的標準分析起來，這似乎只是只能稱爲「Sketch」，而不能算是場面、人物、典型、性格，……各樣貨色俱全的『小說』的。其實，這也正是小說的一個形態，是魯迅的想要擺脫外來的影響，走向着傳統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最初的形態。在這兩篇作品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魯迅的主要的表現手法，多半是從中國小說的優秀傳統中學習得來的，外來的影響——例如契訶夫的影響，退居到不是主導的而是次要的地位。這是一個新的趨勢，這趨勢經過了「風波」和「故鄉」，在「阿Q正傳」裏便大大的發揮出來牠的顯著的特點了。

「風波」和「故鄉」的作風在表面上和「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可是在骨子裏面，牠們卻是很親密的緊緊地連繫着。若是不經過在「一件小事」和「頭髮的故事」這兩篇作品的明快、生動的開朗的作風，而一下子由「樂」和「明天」跳到「風波」和「故鄉」，從冷靜、沉重、嚴峻的作風跳到明麗、輕快的作風，這是不可想像的奇蹟，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實。在「風波」和「故鄉」裏，雖然有了自然風景的襯托，給作品增加了不少明麗輕快，栩栩如生的畫面，可是在這兩篇作品的基本情調上，透過這一些生動的畫面，卻深藏着作者的淡淡的，然而卻又是深廣的哀愁。這和「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中的憂鬱的情調是完全相通的，尤其是在「故鄉」裏表現得格外明顯。

一九一九年的十二月，魯迅最後一次回到他的故鄉。他的頭腦裏想像着的兒時的捉鳥、看瓜、打獠，……這一些生活的痕迹，和安橋村一帶的明媚的景色，完全在冷酷的現實裏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些沒有活氣的躺在蒼黃的天底下的荒村，荒蕪的豎在瓦楞上的臨風戰慄着的枯草的斷莖；和生活在這個環境裏的，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活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的『豆腐西施』楊二嫂；伸出又粗又笨而且裂開，像是松樹皮似的變手的閩土。這完全不像是二十年前的景象了。魯迅把這一個景象在腦子裏保存了有一年多的時間，現在，在題名爲『故鄉』的這篇小說裏，寫出了這樣一個正走向着崩潰路上去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縮影。

自從資本主義侵入了中國農村以後，牠的佔有極大優勢的生產方式，一下子就把農村征服了，隸屬在牠的下面，任牠榨取和掠奪。大規模製造出來的商品，源源不絕的像洪水一樣衝破了封建社會的防堤，牠們又好像那無孔不入的水銀立刻鑽進了每一個農村的手工業的生產組織裏，並且破壞了這一些生產組織，征服了這一些生產組織，代替了這一些生產組織；把農村手工業生產出來的生產品，逐漸地排斥開去，而補充以『價廉物美』的洋貨。這樣，成千成萬的依靠着手工業生產方式生活的農民，也就逐漸地走向失業和失地的途徑了。在『故鄉』裏魯迅所描寫的人物正是遭遇着這樣的悲慘的命運，在『阿Q正傳』裏魯迅刻劃出來的，囑囑大名，中外皆知的阿Q，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住在未莊土穀祠裏的帶有流氓無產階級性的阿Q，他大概是從破產的農村裏的貧農中分化出來的。他脫離了自己的土地，喪失了獨立生活的資格，他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時期略長一些，他或住在臨時的主人家裏，但工作一完就要走路了。所以和他同住未莊的人們，只有在忙碌時候，才記起了阿Q，一空閒，就把他忘記了。

阿Q雖然赤貧如洗，但卻很妄自尊大，深染上一些中國社會上的士大夫的習氣，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睛裏，就是那最受人們尊敬的趙太爺、錢太爺，他也不去表示格外崇奉。他想：將來他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除了妄自尊大。阿Q的另一個壞脾氣是文過飾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的頭上便生了一些最惱人的無可奈何的瘡疤，這使他頗為頭痛。因此他就忌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喫虧的時候多，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

他很要面子而且膽怯，精神勝利法是他用來對敵人安慰自己的唯一的最好的辦法。

未莊的人們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就格外喜歡開他的玩笑，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喫驚的說：

『噲，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裏！」他們並不怕。

阿Q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

「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而非平常的癩頭瘡了。

閒人們還不完，只擦他，於是終而至於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響頭，他們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他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這是他的精神勝利法。

有一年的春天，阿Q醉醺醺的在街上走，看見王鬚在牆根的日光下，赤膊捉蝨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於是他就和王鬚並排坐下，也脫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為新洗呢還是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鬚，卻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裏畢畢剝剝的響。阿Q以為這很丟面子，他極力想找出一兩個大的來，可是找不到，好容易找到一個中等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裏，狠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鬚響。

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毛蟲！」

「癩皮狗。你罵誰？」王鬚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誰認就罵誰！」阿Q站起來，兩手又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鬚也站起來，披上衣服。

阿Q以爲他要逃走了，搶上去就是一拳，這拳還未達到王鬚身上，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踉踉跄跄的便跌過去，王鬚抓住了他的辮子，照例揪到牆上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着頭說。

王鬚不理會，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一推，阿Q跌出六尺多遠，他這才滿足的走了，阿Q無可適從的站着。

遠遠的一個人走來了，這是阿Q最厭惡的錢太爺的大兒子『假洋鬼子』。

『秃兒。騙……』阿Q向來就看不起剪了辮子而又裝上假辮子的人物，以前是在肚子裏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爲正氣忿，要報仇，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那秃兒拿着一枝黃漆的手杖——就是阿Q所說的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剎那，知道大約要挨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實打在自己的頭上。

『我說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個小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又挨了幾下。

被打之後，他走開了，似乎了結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

對面走來了靜修菴裏的小尼姑。阿Q在平時看見她，是一定要唾罵的，而在這屈辱之後，他更加惱怒起來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爲見了你！」阿Q想道。於是他迎上去，大聲吐出一口唾沫：「咳，開！」

小尼姑全不睬，低頭只是走。阿Q走近她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她新剃的頭皮，默笑着，說：「禿兒！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面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旁邊酒店裏的人們大笑起來。阿Q見了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了：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阿Q扭住了她的面頰。

酒店裏的人們更加大笑了。阿Q更得意，再用力一擰，才放手。

在這個偉大的勝利裏面，他把王鬚忘卻了，也忘卻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之後更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阿Q飄飄然的飄進了土穀祠，這晚他可不容易合眼了。

「女人，女人！……」他想着，「……和尚動得，……女人，女人！……女人！」

這一個念頭，可害了阿Q。有一天，他在趙太爺家裏舂米，舂了一天，喫過晚飯，便在廚房裏吸旱煙。吳媽，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洗完了碗碟，也在長凳上坐下了，和阿Q談閒天：

「太太兩天沒有喫飯哩，因爲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着。

「我們的少奶奶八月裏要生孩子了……」

「女人，女人！……」阿Q想着，放下煙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在嘮叨。

「我和你睷覺，我和你睷覺！」阿Q忽然搶上前去，對她跪下了。

一剎那中很寂然。

「阿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曬，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了牆壁跪着發楞，後來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了。他慌慌張張的把煙管向褲腰帶一插，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重的一下，他急忙轉身想逃，趙太爺的兒子秀才便拿一枝大竹槓站在他面前了。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一聲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點痛。他便衝出了廚房門，他的背上又着了一下。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這之後，吳媽便鬧着尋死，晚間，地保走進土穀祠來找阿Q算帳：

「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調戲起來，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覺睡，你的媽媽的！……」

阿Q沒有話說。最後，因爲在晚上，應該送地保加倍的酒錢四百文，而阿Q沒有現錢，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並且訂定了五個條件：

一、明天用紅燭——要一斤重的——一對，香一封，到趙府上去賠罪。

二、趙府上請道士祓除縊鬼，費用由阿Q負擔。

三、阿Q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

四、吳媽此後倘有不測，惟阿Q是問。

五、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

阿Q自然是都答應了，可惜沒有錢，幸而已經是春天，棉被可以不用，便質了二千大錢，履行條約。阿Q赤膊磕頭贖罪之後，居然還剩幾文，他也不再贖氈帽，統統用了喝了酒了。阿Q贖罪的禮物，趙家並不立刻燒香點燭，卻留給太太拜佛的時候用，那留在趙府上的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襁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做了吳媽的鞋底。

從此，阿Q在未莊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他失業了，人們家裏有事都找那又瘦又乏的窮小子小D去做。

阿Q沒有辦法，只得外面去謀生。

阿Q離開了未莊約末有半年，在這年的中秋節剛過了的時候，在未莊人們又看見阿Q了。

阿Q這次回來，和先前大不相同了，有一天，天色快黑，他睡眼朦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走近

木櫃台，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向櫃台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腰間掛着一個大搭連，沈錮錮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線。堂倌、掌櫃、酒客、路人，大家都顯出疑而且敬的神情來，掌櫃先之以點頭，繼之以談話：

「噯，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去了！」

這一件新聞立刻傳遍了未莊，阿Q得到了人們的畏敬。

「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麼？」阿Q對着大家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

他搖搖頭，將唾沫飛到正對面的趙太爺家裏的用人趙司長的臉上，聽的人都肅然起敬。阿Q向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那伸長脖子聽得出神的王縣的後項窩直劈下去道：「嚓！」

從此阿Q的大名傳遍了未莊。趙太爺之流的人物心裏有些慌張了，一天，把阿Q請到家裏來，試探試探他的底細。

「太爺！」阿Q來了，似笑非笑的叫了一聲，在簷下站住了。

「阿Q，聽說你在外面發了財了。」趙太爺踱開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說：「那很好，那很好的。這個，……聽說你有些舊東西，……可以都拿來看一看，……這也並不是別的，因為我倒

要……」

「我對第七嫂說過了。那完了。」

「完了？」趙太爺不覺失聲的說，「那裏會完得這樣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來不多。他們買了些。……」

「總該還有一點罷。」

「現在，只剩了一張門幕了。」

「就拿門幕來看罷。」趙太太慌忙說。

「那麼明天拿來就是，」趙太爺卻不甚熱心了，「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儘先送來

給我們看，……」

「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秀才說道。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趙太太說。

阿Q毫不在意的出去了，趙太爺很失望，氣憤而且擔心，秀才也不平，說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許他住在未莊。

未莊的一班閒人們也來尋根究底的探聽阿Q的底細。阿Q並不諱飾，傲然的說出他的經歷來，等到大家都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偷兒，也就不把他掛在心上了。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夜裏，城裏學人老爺的船泊在趙府的船埠頭，這帶給了未莊很大的不安，謠言

於是傳遍了全村，說：革命黨就在這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着崇正（崇禎）皇帝的孝。

阿Q的耳朵裏，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爲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這樣害怕，於是他也就未免神往了。何況未莊的一羣烏男女慌張的神情，使得阿Q更爲快意。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加以阿Q近來用度頗窘，更爲不平，而午間又喫了兩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飄飄然起來。不知怎樣一來，忽然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的人卻都是他的俘虜了。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的人們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裏喝了雪水，他更加高興，一面走一面喊道：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悔不該，呀呀呀……

得得，鏘鏘，得，得鏘令鏘！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府上的兩位本家和兩個閒漢，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老Q。」趙太爺怯怯的迎上去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為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

唱，「得，鏘，鏘令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才站住，歪着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說，「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惴惴的說，似乎想探聽革命黨的口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着便走了。

阿Q飄飄然的回到土穀祠，酒已經醒透了。這晚上，管祠的老頭子也意外的和氣，請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兩個餅子，喫完之後，又要了一枝四兩重的燭和一個燭台，點起了燭，獨自躺在自己的屋裏。他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新鮮和高興，燭火像元夜裏的似的閃閃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着板刀、鋼鞭、炸彈、洋礮、三尖兩刃刀、鈎鐮鎗，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烏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主顧本來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簪式牀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裏，——可惜腳太大。」

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已經發出鼾聲，四兩燭只點去了一小半，紅燄燄的光照着他的張開的嘴。

第二天他起得很遲，走到街上看看，樣樣都照舊，他仍然感覺肚子餓，他想着，但又想不起什麼

來；忽然，他想起了一個主意來：走向靜修菴去革命去。

阿Q慢慢的走着，有意無意的走到了靜修菴。他恐怕狗會咬他，像在春天有一次他到這菴裏偷蘿蔔那樣，他連忙捏好了磚頭，大步上前，用力敲門。

「你又來什麼事？」菴門開了一條縫，一個老尼姑大喫一驚的說。

「革命了……你知道？……」阿Q說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

「什麼？……」阿Q詫異了。

「你不知道，他們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加詫異了。

「那秀才和假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錯愕，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便飛速的關了門，阿Q再推也推不動了。

原來，在這天的上午，阿Q還沒有來到靜修菴革命，趙秀才和假洋鬼子就已經來到這裏革過命了。

趙秀才消息靈通，一知道革命黨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錢洋鬼子，他們談得投機，立刻成爲同志，就相約去革命。他們想了又想：才想出靜修菴裏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於是他們就立刻同到菴裏去革命。老尼姑出來阻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把她當作滿清政府的代表，在她的頭上給了她不少的棍子。老尼姑沒法抵抗，只好由他們任意的革去；他

們走了，這才定神來檢查一下，龍牌已經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匾。這事，阿Q後來才知道，他頗懊悔自己睡着了，又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但他又退一步想道：

「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經投降了革命黨了麼？」

過了一些時候，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可是並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人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人夾在裏面搗亂，第二天就動手剪辮子。於是未莊也就因之起了很大的改革，趙秀才，趙白眼，趙司晨……大家都把辮子盤在頭頂上了。阿Q也下了決心，用一支竹篦把辮子也盤在頭頂上。

那幾天，能到城裏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寫了一封信，託他帶進城，給自己介紹介紹，好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了，向趙秀才討了四塊大洋，秀才從此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上的人們都大爲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目空一切，阿Q也不在他的眼下。

阿Q正在不平，又時時刻刻感到冷落，一聽得這銀桃子傳說，他立刻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上辮子，也不行的，第一要着是去和革命黨人結識。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人只有兩個，城裏的一個早已「」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去趕緊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路子了。他於是就到錢府上去拜望假洋鬼子，但假洋鬼子卻沒有理

他，把他趕了出來。於是他發起愁來了，感覺到未曾經驗過的無聊，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途，全都一筆勾消了。

這之後不久，趙府上遭了一次搶，未莊的人們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後，阿Q在半夜裏忽然被抓進縣城裏去了。那時恰恰是昏夜，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乘昏暗圍住了土穀祠，正對門架好了機關鎗。阿Q這時不衝出來，許多時沒有動靜，把總焦急起來了，懸了二十千賞錢，才有兩個團丁冒險翻牆進去，裏應外合，把阿Q抓出；直到抓到祠外的機關鎗旁邊，他才有些清醒，帶進城，已經是第二天的正午，被關進一間破牢裏。

下午，他又被抓出柵欄門外，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案旁又站着十幾個穿長衫的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像這老頭子的，也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着他；他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下去了。

「站着說！不要跪！」站在阿Q旁邊的穿長衫的人物都吆喝說。

阿Q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爲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喫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審判他的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

阿Q的臉，沈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糊裏糊塗的想了一通，這才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准我！」

「糊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裏？」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

「他們沒有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來這事便憤憤。

「走到那裏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阿Q又被抓進柵欄門裏去了。

阿Q第二次被抓出柵欄門，是第二天的上午。大堂上的情形都照舊，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

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你有什麼話說麼？」老頭子仍然和氣的問道。

阿Q一想，沒有話，他便回答說，「沒有。」

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裏。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

「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罷！」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着筆卻只是抖。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量來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他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阿Q正在慚愧，那人卻不計較，把紙筆拿走了。阿Q第二次又被抓進柵欄裏。

不久，阿Q第三次又被抓出柵欄門來，照例的跪下了。

老頭子還是很和氣的問道，「你有什麼話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許多長衫和短衫的人物，忽然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生氣，因為這很像是帶孝，而帶孝是晦氣的。然而同時他的兩手被反縛起來了，一直被抓出衙門外去。

阿Q被抬上了一輛沒有篷的車，幾個短衣人物和他同坐在一起。這車立刻走動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礮的兵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阿Q忽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被殺頭麼？他一想，兩眼發黑，耳朵裏噓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着急，有時卻也泰然；他覺得似乎人生在世，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被殺頭的。

他還認得路，於是有些詫異了：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他不知道這是在游街示衆。但他忽然又省悟了，這是繞路到法場去，去「噉」的一聲殺頭。他於是惘然了，他沒精打彩的向左右看着，在螻蟻似的人羣中，無意的發現了吳媽。阿Q忽然很羞慚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鬪」裏的「恨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他將要把手一揚，才覺得兩手已經被綁着，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裏，發出像豺狼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車子不住的向前走動。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現出了四年之前的一個景象：他曾在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喫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現在他又看見了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裏咬他的靈魂了。

「救命，……」

阿Q沒有說。他兩眼一黑，耳朵裏嗡的一聲，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

這便是鬧動全中國的甚至於全世界的阿Q底一生。

阿Q的影像在魯迅心目中確乎已經有好幾年了，但他一向沒有寫出阿Q的意思。這時，孫伏園先生正在「晨報」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出「開心話」這一欄來，每週一次。於是他就來請魯迅寫一點東西。（註一）

經這一提，魯迅忽然想起來了，當天晚上就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合「開心話」這題目，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第一章登出之後，以後每七天必須做一篇。那時，魯迅雖然並不忙，可是生活頗不安定，夜間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很難靜坐一會，想一下。而孫伏園先生是一位非常善於催稿的人，每星期必到魯迅這裏來一次，每次一有機會，于他就對魯迅說道：

「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

魯迅只得寫下去，於是又一章。他漸漸認真寫起來了，孫伏園先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把「阿Q正傳」移在「新文藝」欄裏。這樣大約繼續有兩個多月；魯迅實在很想把這故事結束了，而孫伏園先生似乎不贊成，假如一結束，他也許要抗議，所以魯迅就把「大團圓」藏在心裏，而實際上卻把阿Q漸漸送向死路去了。後來，孫伏園先生因事到別處去了一趟，代替他的是另一位編輯先生，對於阿Q素無愛憎，魯迅把「大團圓」送去，他就照登出來。等到孫伏園先生回來，阿Q已經被鎗斃有一個多月，再也無法復活了。

當著「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上出現的時候，這引起了當時的神經衰弱的人們的恐懼和不

安。在那時的「現代評論」上瀟灑的「閒話」裏，有這樣的記載：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這篇文章明明白白的收在魯迅的第一個小說集「吶喊」裏面了，也還有人來問魯迅說：

「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

這事使得魯迅非常為難。其實他並沒有在罵誰和誰。

自從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濤衝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防堤，中國的廣大的手工業者羣和農民走上失業失地的途徑以後，由中國的破落的農村裏分化出一個像阿Q這樣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典型，原是極平常極普通的現象，這是用不着大驚小怪的。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的統治階級長期壓迫之下的農民，沾染上各種腐敗墮落的思想意識，而這一些思想意識有意無意的在行動中表現出來，這也是自然而然的

事。魯迅並不是在有意描寫那一個特定的人物，他卻要刻畫出一個『這樣沈默的國民的』共同的『靈魂』來，阿Q便是這樣的向下坡路上走去的人們一個綜合的典型。

阿Q的誕生和成長正是中國人民大眾走向下坡，處處倒霉的時代，過去的光榮和祖宗的勳業留在他的腦子裏留下了一個自大的幻影——『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哩？你算是什麼東西！』而目前的艱苦的現實，卻使他茫然無所措手足了。舊的路走不通，新的路沒法走，這造成了阿Q底悲劇的命運。

因為他們——農民們，兩隻腳陷在封建社會的泥土裏，已經有好幾千年了，實際生活上的和傳統觀念上的，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重擔緊緊地壓在他們的頭上，落後的逐漸解體的生產方式，散漫的零亂的生活方式分散了他們的力量，使得他們沒有機會，沒有可能，去追求一個偉大的叛逆的理想。而這時，他們的朋友和領導者，新興的另一個階級還沒有登上政治舞台，領導着他們走向正確的歷史方向；在這樣的一個階段當中，必然地他們要遭遇到彷徨、苦悶、被欺騙、被出賣，甚至於被殺戮的命運。阿Q便是這樣的一個犧牲者。

關於阿Q的家世，魯迅沒有十分精確的把牠考證出來，其實這也無須乎十分精確地去考證，他的祖先是農民——不論是富農、中農、或貧農——大概是不會錯的，及至到了他這一代，他卻變成一個農村無產者了：沒有固定的職業，平時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時間長些，他便住在臨時的主人家裏，工作一完，便無家可歸，回到未莊的土穀祠。

未莊的社會是一個死氣沉沉的散漫的毫無組織的農村封建社會，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彼此是漠不關心的。未莊的統治者趙太爺、錢太爺、秀才、假洋鬼子以及這些統治者的幫閒趙白眼、趙司晨這一流人物，對於阿Q的關係，只是爲着自己的利益，怎樣去想法剝削阿Q，或是替主人幫忙來剝削阿Q，此外，是什麼事情都不管的。

阿Q這一個落後的農村無產者，滿頭滿腦裝滿了封建的祖傳下來的遺毒的糊塗蟲，沉沒在麻木不仁的生活裏，當他觸犯了在封建社會中有無上尊嚴的，統治階級要拚死拚命維護的舊禮教的時候，他便被全未莊所有的人們唾棄了，最後，他失業了，在未莊無法生活下去。他只好離開未莊。

從農村走進城市，這是一般的農村無產者的共同道路，阿Q自然也不能是個例外。可惜的是他沾染舊習氣太深，他是富於保守性的農民中最保守的一個，生活雖然逼着他不得不離開鄉村而走入城市，但他卻又過不慣城市的生活，不能在城市裏生根，他只好在城裏做了小偷。小偷中的小脚色。他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也不會進洞，只站在洞門外接東西；有一夜，他剛接到一個包，正手再進去，不一會，只聽得裏面大嚷起來，他便趕緊跑掉，連夜爬出城，逃回了未莊，從此不敢再做小偷。

阿Q從城市又回到農村，一瞬間的『中興』並不能挽救他的沒落，他把偷得來的東西帶到未莊來，依靠着這些東西換錢來維持生活。這事鬧動了整個的未莊，怯弱的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以及他們的幫閒們，立刻改變了對於阿Q的態度，由先前的鄙視一變爲畏而敬之，不久，便又敬而遠之，但他們卻始終沒有忘記對於阿Q的榨取和剝奪。他們想出種種辦法，用低價來收買阿Q偷來的東西；當着阿

Q把這些東西賣光了，變成了飯喫完了，於是，又發生了生計問題。他沒有膽量再回到城市裏去，留在這裏，只好等待着滅亡了。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的夜裏，革命的消息傳到了未莊，不到第二天的中午，全村的人心就浮動起來。帶有極頑固的保守性的阿Q，對於革命他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但當時的現實生活卻逼着他。他於是也就不免神往了。阿Q對於革命雖然神往，但他所採取的卻是等待的機會主義，他不明瞭這所謂革命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躺在土穀祠裏一面做夢一面等着，等着別人來叫他：『阿Q，同去同去！』可是，事實和夢想恰恰相反，他等待了好久，卻沒有人來招呼他。當他正在土穀祠鼾睡的時候，革命的利益卻被別人掠奪去了。

Q這一次革命原是開玩笑的事情，雖然在表面上算是推翻了滿清政府的統治，可是骨子裏卻仍然是「一切依舊」。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學人也做了什麼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在未莊上除去有幾個人的辮子被剪掉了，或是自動的盤起來之外，別的便沒有什麼大變動。這一班革命英雄們當道了，天下大事也就可想而知，作爲他們的爪牙的趙太爺、錢太爺這些紳士們的統治地位是不會被推翻的。若是他們的統治勢力不被推翻，阿Q那裏會有出路呢。所以他們是可以隨隨便便的革命革到靜修菴，把觀音菩薩面前的宣德鑪革到他們自己的荷包裏，而阿Q卻偏是不准革命的。因爲他們害怕阿Q革命革到他們的頭上來。所以，當着革命大功似乎告成了，天下似乎太平無事了，他們竊取了革命的果實，坐上統治的寶座的時候，阿Q於是在莫明其妙的罪名之下被鎮斃

了。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流產，革命力量向封建勢力妥協投降之後的，農民階級的共同悲慘的命運。

阿Q雖然被鎗斃了，可是他的形像、動作，甚至於聲音卻藉着魯迅的筆而保存下來了，一直到現在還活躍在中國人的心目裏；尤其是離開都市較遠的地方，差不多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阿Q似的，被生活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愁苦的，愚笨的，然而卻又是忠實而樸素的，令人哭笑不得的面孔。從栩栩如生的阿Q這一個典型裏，魯迅簡單而扼要的抓住了令人戰慄的農民的靈魂，但卻並不以農民的意識形態這一個範疇爲限（自然，阿Q的意識形態主要的是存在於落後的農民中間），阿Q的意識形態普遍地存在着所有的中國人意識裏。散漫的小手工業的生產者，或是依據着這一生產方式而生活的各個階層，那是不用說了；就是那些所謂讀書明禮的士大夫，飛黃騰達的達官貴人們，……他們或多或少總是帶有一點阿Q相的。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被鎗斃掉。

以前，錢杏邨先生曾有一個極不正確的估計，他說：「阿Q時代」已經「死去」了，這是非常錯誤的。因爲他沒有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他的判斷是出自浪漫帶克的空想。

「老年人的記性真長久，」當他論到「阿Q正傳」的時代意義，多少帶有一點意氣用事時，寫道：「科學時代的事件，辛亥革命時代的事件，他都能津津不倦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敘述出來，來裝點「現代」文壇的局面，這真是難得！他的創作在時代意義上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他不過如天寶宮女，在追述着當年皇朝的盛事而已；站在時代的觀點上，我們是不需要這種東西的。」（註一）

（註一） 見「死去了的阿Q時代」。轉引自李何林先生編「魯迅論」第七五——七六頁。

「他的創作時代背景，時代地位，」錢杏邨先生更確切地武斷道：「把他和李伯元、劉鐵雲並論倒是很相宜的，他的創作時代決不是五四運動以後的，確確實實的祇能代表「新民叢報」時代的思潮，確確實實的祇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義和團暴動時代的思潮，真能代表五四時代的創作實在不多。」這真是笑話，他實在沒有仔細地好好地去讀「阿Q正傳」，或是讀了而沒有讀得懂。他把未莊以及未莊上的人們撇開，而單獨的把阿Q扯了出來，使阿Q孤立了，使他和中國的落後的封建社會絕了緣，這樣，祇從阿Q本身來觀察阿Q，在他身上所剩的只是一些滑稽可笑的成分，而且僅僅是一些滑稽可笑的成分了。這樣，從一個城市人的眼光看來，阿Q早就應該死去了，阿Q時代也應該隨阿Q的被鎗斃而滅亡了，而現在（一九二一年），魯迅寫出了這一個典型，無疑地是用着古色古香的點綴品，來裝璜「現代」文壇了，這作者也就應該被列入清末的義和團時代，和那時的作家們李伯元、劉鐵雲相提並論了。這是中了機械論的毒素，死板板的公式和教條在他的頭腦裏作怪。「阿Q時代」其實並沒有「死去」，雖然「阿Q時代」一天天走向崩潰的路上去。阿Q的子孫真正的在中國絕跡，阿Q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成爲過去的陳跡，那恐怕是要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完全解體的時候，恐怕是要在資本主義轉向更高級的經濟結構在中國完全勝利了的時候。

魯迅並沒有落在時代的後頭，和現實的生活脫了節；相反地，他卻從極其平凡的現實裏，創造出一個極其普遍的典型，並且描繪下來一幅由舊向新轉變時期的社會底面貌。

這不但是中國新文學領域的最偉大的新收穫，爲中國新文學奠定了一塊最穩固的新基礎，樹立了

第一座光榮的紀念碑；同時，在國際文學的領域裏，也跨出了輝煌的值得讚頌的第一步。

在「阿Q正傳」發表之後不久，牠就被譯成好幾個國家的文字，傳播向全世界的讀者們了。由於「阿Q正傳」，中國的新文學才和國際的進步的文學有了最初的連繫。

三八

正當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時候，北方的軍閥們也在醞釀着又一次的互相殘殺的對內戰爭。自從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戰爭中皖系失敗，直系勝利以後，統治着北方天下的只有直系軍閥們了，奉系居於次要的地位，這反映着大英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在中國佔了上風，日本帝國主義者又扶植起來另一批走狗，這便是奉興的。所以，在作爲牠的走狗皖系軍閥失敗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又扶植起來另一批走狗，這便是奉系軍閥的慢慢的抬頭，他們在一九二一年的十月擁護親日派的首領梁士詒組織內閣，以挾制直系的政客們。這當然引起了直系的軍閥和政客們的不滿了。

梁士詒剛剛上台，就對他的主人——日本帝國主義者，表示特殊的好感，想趁着那時的華盛頓會議上正在交涉的山東問題的機會，向日本大批借款，用來贖回膠濟鐵路，並且同日本訂立共管這路的條約。同時，又因爲財政上的困難，發行了九千六百萬元的公債券，這兩件事便成了直系軍閥所要攻擊的目標了，於是，在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吳佩孚通電全國，說梁士詒勾結黨羽，賣國求榮；張作霖也不甘示弱，三月，通電擁兵入關，以武力擁護內閣，四月便打起來了。結果是直勝奉敗，張作霖退出

山海關外，宣布獨立，與北京政府脫離關係。這時，在北京城內高視闊步的只有直系的軍閥和官僚，以及在他們脚下的爪牙們了。在昏天黑地裏，人家只知道怎樣去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正經事是沒有人來過問的。

這時，魯迅目睹和身受到這樣的苦痛，他接着「阿Q正傳」之後，寫出了另一個短篇小說「端午節」。(註)

在這篇小說裏，魯迅創造出來一個在他的以前的作品中沒有出現過的，新的知識份子的典型，——一個相信着「差不多說」的小公務員方玄綽。

在先前，方玄綽也許是個激昂慷慨的青年，但經過了社會上的許多折磨之後，現在，他覺得事事都「差不多」了。他自從發見了這一個妥當的辦法以後，雖然也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時卻也得到許多新安慰。譬如看見老輩壓迫青年，在先前他是要憤憤的，但現在卻轉念道，將來這少年有了兒孫時，大約也要擺這架子的罷，便再沒有什麼不平了。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在先也要憤憤的，但現在也就轉念道，倘使這車夫當了兵，這兵拉了車，大約也會這麼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有時，他也疑心他這樣想法，是因爲自己沒有和惡社會奮鬥的勇氣，瞞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來的一條逃路，很近於「無是非之心」，不如改正了好。可是，這「差不多說」卻總是在他的頭腦裏盤據着，並且生長起來。有一次，他把他的「差不多說」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最初公布了，由關於歷史上的問題扯到官僚與學生的關係，他大發議論說：

「現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而學生罵得尤厲害。然而官僚並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而是平民變成的。現在由學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麼兩樣呢？「易地則皆然」，思想、言論、舉動都沒有什麼大區別……就是學生團體新辦的許多事業，不是也難免出弊病，大半煙消火滅了麼？差不多的。中國將來之可慮就在此……」

學生們聽了，大半都不以為然，心裏想道，這大概是他替自己的辯解，因為方玄綽是一方教書一面兼做官僚的。

其實，這猜想是錯誤的。這不過是他的一種新不平，雖說不平，但也是他的一種安分的空論。

他是一個非常安分守己的人。總長怨他有神經病，只要他的位置不至於動搖，他決不開口；教員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他有別的官俸支持，他也決不開口。不但不開口，當教員聯合索薪的時候，他還暗地裏以為欠斟酌，太囉嗦；直到聽到同僚的過分奚落教員們，他這才略有些小感慨，後來又一轉念，這或者因為自己正缺錢，而別的官並不兼做教員的緣故罷，於是他也就釋然了。

他雖然也缺錢，但從沒有加入教員的索薪的團體，大家議決罷課，於是大家都不去上課。而政府卻宣布道「上了課才給錢」，他這才略恨他們的類乎用果子耍猴子；一個大教育家說：「教員一手挾書包一手要錢不高尚」，他聽了很不平。於是，有一天，方玄綽對他的太太正式的發牢騷了。

「喂，怎麼只有兩盤？」晚餐時候，他看着菜蔬說。

「可是上月領來的一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還是好容易才除來的呢。」她站在桌旁，臉對着他說。

「你看，還說教書的要薪水是卑鄙哩。這種東西似乎連人要喫飯，飯要米做，米要錢買這一點粗淺的事情都不知道……」

「對啦。沒有錢怎麼買米；沒有米怎麼煮……」

……

待到淒風苦雨的一天，教員們因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華門前爛泥裏被軍隊打得頭破血出之後，居然也得了一點薪水。方玄綽不費一舉手之勞的領了錢，酌還些舊債，卻還缺一大筆款，這因為官俸也頗有些拖欠了。這時，就是一班廉吏清官們也漸以為欠薪之不可不索了，而做官兼做教員的方玄綽，自然是對學界更表同情，所以，在大家主張繼續罷課的時候，他雖然仍未到場，但事後卻也心悅誠服的確守了公共的決議。然而政府竟又付錢了，學校也就開課。但在這前幾天，卻有學生總會上一個呈文給政府，說：「教員倘若不上課，便不要付欠薪」。這雖然無效，而方玄綽卻忽而記起前回政府所說的「上了課才給錢」的話來，「差不多」——學生與官僚是「差不多」的影子在他眼前一幌，而且並不消滅，於是他就講堂上對學生公佈了這一個學說了。

這之後不久，「差不多」的事實又發生了。政府當初只不理那些招人頭痛的教員，後來竟不理到無關痛癢的官吏，薪俸欠而又欠，終於逼得先前鄙薄教員要錢的好官，也很有幾個變成索薪大會裏的

驕將了。惟有幾種日報上卻發表了一些鄙薄譏笑小官的文字。方玄綽也毫不爲奇，毫不介意，因爲他根據了他的「差不多說」，知道這是新聞記者還未缺少潤筆的緣故，萬一政府或是關人停了津貼，他們多半也要開大會的。

方玄綽既然同情教員的索薪，自然也贊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仍然安坐在衙門裏，照例的並不一同去討。大家左索右索，總算一節一節的挨過去，但比起先前來，方玄綽卻拮据萬分了。在舊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到家，方太太就把一疊帳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這是以往沒有發生過的事。

「一共總得一百八十塊錢才够開消……發了麼？」她並不向方玄綽看着說。

「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錢的支票是領來的了，可是索薪大會的代表不發放，先說是沒有同去的人都不發，後來又說是要到他們跟前去看。他們今天單捏着支票，就變了閻王臉了，我實在怕看見，……我錢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方太太見了這少見的義憤，倒有些愕然了，也就沈靜下來。

「我想，還不如去親領罷，這算什麼呢。」她看着他的臉說。

「我不去！這是官俸，不是賞錢，照例由會計科送來的。」

「可是不送來又怎麼好呢……哦，昨夜忘記說了，孩子們說那學費，學校裏已經催過好幾次了，說是倘若再不繳……」

「胡說！做老子的辦事教書都不給錢，兒子去念幾句書倒要錢？」

她覺得他已經不很顧忌道理，似乎就要把自己當作校長來出氣，犯不上，便不再說話了。兩個人默默的喫了午飯。方玄綽想了一會，又懊惱的出去了。

照舊例，近年是每逢節根或年關的前一天，他一定須在夜裏的十二點鐘才回家，一面走，一面掏着懷中，一面大聲的叫道：「喂，領來了！」於是遞給她一疊簇新的中交票，臉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而初四這一天卻破了例，方玄綽不到七點鐘便回家來。方太太很驚疑，以爲他真的辭了職了，但暗暗地察看他的臉上，卻也並不見有什麼格外倒運的神情。

「怎麼了？……這樣早？……」她看定了他說。

「發不及了，領不出了，銀行已經關門，得等初八。」

「親領？……」她惴惴的問。

「親領這一層，倒也已經取消了，聽說仍舊由會計科分送。可是銀行今天已經關了門，休息三天，得等到初八的上午。」方玄綽坐下來，眼睛看着地面，喝一口茶，才又慢慢的開口說，「幸而衙正門裏也沒有什麼問題了，大約到初八就準有錢，……向不相干的親戚朋友去借錢，實在是一件煩雜事。我午後硬着頭皮去尋金永生，談了一會，他先恭維我不去索薪，不肯親領，非常之清高，一個人應該這樣做；待到知道我要問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裏塞了一大把鹽似的，凡有臉上可以打皺的地方都打起皺來，說房租怎樣的收不起，買賣怎樣的賠本，在同事面前親身領款，也不算什麼的，即刻把我支使出來了。」

「這樣緊急的節根，誰還肯借出錢去呢。」方太太卻只淡淡的說，並沒有什麼感慨。

方支綽低下頭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着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向他借十塊錢，他自己明明是有錢的，卻不借給這位同鄉，把他空手送走了，這客人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這實在和他今天所遭遇的情況是「差不多」的。

在百無聊賴的當中，方支綽叫僕人賒了一瓶蓮花白來，喝過了，點上一支煙，從桌上抓起一本「嘗試集」，向牀上一躺就要看。

「那麼，明天怎麼對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牀面前，看着他的臉說。

「店家？……教他們初八的下午來。」

「我可不能這麼說。他們不相信，不答應的。」

「有什麼不相信。他們可以問去，全衙門裏什麼人也沒有領到，都得初八！」說着他便翻開了「嘗試集」。

方太太見他強橫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就暫時不開口。

「我想，這模樣是鬧不下去的，將來總得想點法子，做點什麼別的事……」她終於尋到了別的路，說。

「什麼法子呢？我「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別的做什麼？」

「你不是給上海的書鋪子做過文章麼？」

「上海的書鋪子？買稿要一個一個的算字，空格不算數。你看我做在那裏的白話詩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錢一本罷。收版權稅又半年六月沒消息，「遠水救不得近火」，誰耐煩。」

「那麼，給這裏的報館裏……」

「給報館裏？便在這裏的很大的報館裏，我靠着一個學生在那裏做編輯的人情面，一千字也就是這幾個錢，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養活你們麼？況且我肚子裏也沒有這許多文章。」

「那麼，過了節怎麼辦呢？」

「過了節麼？——仍舊做官……明天店家來要錢，你只要說初八的下午。」

他又要看「嘗試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機會，連忙吞吞吐吐的說：

「我想，過了節，到了初八，我們……倒不如去賣一張彩票……」

「胡說！會說出這樣無教育的……」

這時候，方玄緯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惘惘的走過舊香村，看見店門口豎着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圓」，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但似乎因為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他臉色一變，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惱着她的無教育，便趕緊退開，沒有說完話。方玄緯也沒有說完話，將腰一伸，唧唧鳴鳴的就念「嘗

試集。」

這便是那時的軍閥官僚政治下的，新知識份子生活的縮影，和他們的共同的暗淡的前途和悲慘的命運。

當着「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們挾着國內的反動的封建勢力，捲土重來的時候，在中國便造成了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這些分散着的大大小小的集團之間，存在着許許多多他們自己的以及帝國主義者們的錯綜複雜互相矛盾的關係。這推動着軍閥們的循環不已的內戰。在這一些循環不已的內戰的情況之下，無論誰勝誰敗都一樣，最吃虧的便是沒有鎗桿的勞苦大眾，當兵作炮灰的是他們，納糧納稅充軍費的也是他們；其次便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了，在他們中間，能够爬得上去，作爲軍閥官僚們的幫忙、幫閒或幫兇的究竟是少數「天之驕子」，而大多數是要遭遇到可悲的命運的。他們的希望和前途在那裏呢？這時，新興的階級才剛剛抬頭，還沒有走上鬭爭的政治舞台，還沒有團結爲一個集體的力量；並且，又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往往把自己束縛在自己階級的小天地裏，看不到未來的光明和希望，所以，在生活的擔子重壓之下，他們消極了，油滑了，頹喪了。在可怕的灰色的氣氛裏，他們覺得事事無可爲，而採取了一切都無所謂的生活態度，這使方玄綽創立了他的，不敢正視人生，而從生活的戰鬥中逃走的一條出路：「差不多說」，這使方玄綽變成一個怯於對外而勇於對內的，只會向老婆發脾氣的英雄了。

「五四」以後的新知識份子的無可奈何的淡淡的哀愁，以及他們分明感覺得到的，無可挽救的必然要沒落的煩惱和惆悵，在魯迅的作品裏最初地流露出來，魯迅給予他們以極深刻的清醒的批判。

接着「端午節」之後，魯迅寫出另一個短篇小說「白光」，（註二）刻畫出一個「五四」以前的舊知識份子的典型，——陳士成。

陳士成的遭遇和孔乙己很相似，他也是在封建的科舉制度之下，一生沒有撈到半個秀才的人物，他一共應試過十六次，但每次卻都失敗了。當他最後一次——第十六次失敗的時候，他的所有的勇氣都消失了，他平日安排的前程，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剎時倒塌下來，只剩一堆碎片，他看過縣考的榜，不自覺的旋轉了覺得渙散的身軀，惘惘的走向歸家的路。

「這回又完了！」在迷惘中他自己糊裏糊塗的說道。

這時，別家早已吃過晚飯，連碗筷也洗過了，而陳士成還不去做飯，他在房外的院子裏徘徊着。四週很寂靜，月亮注下寒光來，但這寂靜忽又無端的紛擾起來，他耳邊似乎確鑿聽到急促的低聲說：

「左彎右彎……」

他聳然了，傾耳聽時，那聲音又提高的複述道：

「右彎！」

他記得了。那還是他十幾歲時他的祖母說給他的故事。她說：她會聽得她的祖母說，陳氏的祖宗是鉅富，這屋子便是祖墓，祖宗埋着無數的銀子，留給有福氣的子孫，然而至今還沒有出現。至於處所，那是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

「左彎右彎，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斗。」

對於這謎語，陳士成在平時也常常暗地裏加以揣測，可惜大約剛以為可通卻又立刻覺得不合了，但今天陳士成卻想大膽地去嘗試一下，他看見白光像一柄白團扇似的，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裏了，「也終於在這裏！」

他說着，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裏去，但跨進裏面的時候，便不見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蒼蒼的一間舊房，和幾個破書桌都沒在昏暗裏。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卻分明的又起來了，這回更廣大，比燄黃火更白淨，比朝霧更靈微，而且便在靠東牆的一張書桌下。

陳士成獅子似的奔到門後邊，伸手去摸鋤頭，撞着一條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張惶的點了燈，看鋤頭還是倚着。他移開桌子，用鋤頭一氣掘起四塊大方磚，蹲下去一看，是黃澄澄的細沙，揀了袖爬開細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來。他極小心的，幽靜的，一鋤一鋤往下掘，然而夜是太寂靜了，尖銳觸土的聲音，總是鈍重的不肯闖人的發響。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並不見有壘口，陳士成正心焦，一聲脆響，震得手腕發痛，鋤尖碰到什麼堅硬的東西了；他急忙拋下鋤頭，摸索着看時，一塊大方磚在下面。他心抖得很厲害，聚精會神的按起那方磚來，下面也滿是先前一樣的黑土，爬鬆了許多土，下面似乎還無窮。但忽又觸着堅硬的小東西了，圓的，大約是一個鋪銅錢；此外也還有幾片破碎的磁片。

陳士成心裏彷彿覺得空虛了。渾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這時，心在空中又一抖動，又觸着一種

古怪的小東西了，這似乎約略有些像馬掌形，但觸手很鬆脆。他又聚精會神的撿起那東西來，謹慎的撮着，就燈光下仔細的看時，那東西斑斑剝剝的像是爛骨頭，上面還帶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齒，陳士成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裏索索的動彈起來，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終於聽得他開口道：

「這回又完了！」

陳士成嚇得一放手，下巴骨輕飄飄的回到坑底裏，他於是逃到院子裏了。他偷看房裏面，燈火如此輝煌，下巴骨如此嘲笑，非常駭怕，便不敢再向那邊看了。他躲在遠處的簷下的陰影裏，覺得較為平安，但在這平安中，忽而耳邊又聽得竊竊的低聲說：

「這裏沒有……到山裏去……」

陳士成似乎記得白天在街上也會聽得有人說這種話，他不待聽完，已經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由西高峯這方面隱去，他遠想那離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峯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魃魃的挺立着，周圍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

這白光遠遠的就在眼前了。

「是的，到山裏去！」

他決定了，便慘然直奔出去。

「開城門來……」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游絲似的在西關門前的黎明中，戰戰兢兢的叫喊着。

第二天的中午，有人在離西門十五里的萬流湖裏看見一個浮屍，鄉下人打撈上來一看，那是男屍，五十多歲，「身中面白無鬚」。有人說這就是陳士成。

在這兩篇小說裏，魯迅的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又有了些微的變更，——由外形的刻畫漸趨向於內心的描寫。從「孔乙己」開始，經過了「藥」、「明天」、「風波」、「故鄉」這一系列的作品，在表現的技巧上，多半是側重在外形的刻劃的，這一些短篇裏人物的心理變化，魯迅很少，或者說幾乎沒有去詳細描寫，他只是用極簡單而準確的筆觸，刻劃出一個人或是一群人以及他們的社會關係來，而每一個人的內心的描寫則是往往被省略掉，這傾向發展到「阿○正傳」算是到了一個頂點，他的冷靜、沉重、嚴峻、明快的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作風，算是完全建立起來了。在外形的刻劃這一方面達到了可驚的高度。這之後，便是他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另一發展，他比較詳細地從事於一個人物的心理描寫去表現這個人物的性格來，「端午節」裏的相信「差不多說」的方玄稟是如此，「白光」裏的歲考落第的陳士成也是如此的。這一種細緻：曲折、而又蘊蓄的作風，牠使得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作風以及作品的內容，更加豐富起來了。

這兩種傾向的向更高高度發展，以及發展到某一高度之後的有機的綜合，在魯迅自稱的「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的如「肥皂」、「離婚」等短篇小說裏，被表現出來。

這之後，不久，接着「端午節」和「白光」，在盲詩人愛羅先珂的影響之下，魯迅寫出了在形式

上頗近於散文的三個短篇：「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註二)。

三九

愛羅先珂到中國來大約是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這之前，他是在印度、緬甸、日本各地漫遊的。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世界主義者，詩人，音樂家，而同時又是童話的作者。一九二一年他到了日本，但不久就被驅逐出境。惡毒的日本的軍警當局猜疑他是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和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連絡人，認爲他從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那裏拿了許多錢，在日本做着宣傳事業，於是就下令把他放逐了。這命令下了之後，警察爲要催迫愛羅先珂到淀橋署去，便到他的寓所中村屋（一個麵包店的名稱）裏來了，店主人相馬說：「他是盲人，又是夜裏，請等到明天的早上罷。」警察允許了，單是守在門外邊，沒有實行怎樣的強制。可是，一過十一點，攘攘的成堆的跑來了三四十個穿制服的和便衣的巡警。一齊叱咤道：「內務大臣閣下的命令，沒有不就在這一天接受的道理的。一個盲人，倒囑強！」一面破壞大門，破壞格扇，擁上愛羅先珂住着的樓上的一間房裏去。圍住了因爲過於恐怖而哭喊的愛羅先珂，踐踏，踢，毆打之後，捉着手腳，拖下樓梯，又推倒在木料上，打倒在地面上，毫不聽他不住的說「放手罷放手罷」反覆的悲鳴，據說還在新宿街道上鋪着的礫石上，沙沙的一直拖到警察署。

拖到了警察署，被檢查之後，除了相馬以及別的兩人而外，無論什麼人都絕對不准去見他。他的

朋友若是送點東西去，官警們卻以『不至於餓死的東西是眼着的，不要多事罷，』這一種極其橫暴的話，推回來了，相馬請人去說，『因爲須收拾行李，暫時也好，可以給他回去一趟麼？』而他們卻叱咤道：『若是行李，便在衙門裏也能收拾，』便將敵車拉到中村屋，運了他的所有的行李到警署去，愛羅先珂蹲在不乾淨的昏暗的收押房的一角裏，一面說着『這拿俄國去，』或是說『這替我送給日本的誰，』或者是『這不要了，替我拋掉罷，』一面他摸索着，一樣一樣的挑選開來，極其無聊的獨自怡然的作那最後的收拾。這時，他想起和自己的各個東西聯絡着的種種的記憶，想到從此不得不永遠別離日本的親密的朋友，從他的緊閉的眼臉的深奧裏，浮出了傷心的淚水來。然而那一些疑心極深的日本官憲不但不睬這酸楚的情形，倒想從旁偷看他是否當真的看不見或是看得見。並且，據說有一些疑心到了絕頂的人們，竟發酷到還想要挖開他的眼睛來。最後，還算是他幸運，他帶着日本官憲們賞賜給他的滿身的腫成紫色的靴痕，熬着深入骨髓的痛楚，被放逐出了日本的境界。(註二)

離開了日本，不久，愛羅先珂便到了上海，後來又到北京，住在周作人的家裏。魯迅這時才和他相識，並且譯出了他的創作「狹的籠」、「魚的悲哀」、「池邊」……這一些童話，(註三)稍後，在一

(註一) 見「全集」第一卷第四三七——四六二頁。

(註二) 請參看收入「全集」第十二卷第五〇六、五二五頁，「愛羅先珂童話集」的附錄，江口漁作「憶愛羅先珂華希理君」。

(註三) 這些童話都收入在「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九一——五〇五頁。「愛羅先珂童話集」裏面。

在這一些作品裏，作者懷抱着一顆赤子似的單純而坦白的心，想寫出他理想中的，然而却不是現實的世界；美的未來的烏托邦，自由鄉，近於童話的世界。這和他所住着的，正生活在這裏的現實環境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想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可是他所得到的卻是不得所愛的悲哀了，這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然而，這一些童心的美的夢，卻又並不是徒然的，而是有牠的真實性存在着的，作者十分肯定地叫道：「不要失望罷，因為春天是，決不是會滅亡的東西，」這確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這確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在苦難中能够看到的一線光輝，這確是在這冷酷的世界上生活在夢幻中的理想主義者所可能尋到的一點溫暖。就靠着這一點近乎虛無的希望，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才能在現實的世界裏生活下去。然而，這樣的生活方式和態度是脆弱的，作者在這些作品裏雖然懷着無限的溫暖的愛，但卻又在這些作品上披上了一層廣漠的無可奈何的悲哀，這卻又是一個理想主義不能解決的爲了愛而發生的悲劇。

作爲現實主義者的魯迅，雖然是不可否認的在他的「兔和貓」「鴨的喜劇」，以及「社戲」裏確乎是受了愛羅先珂的一些影響，但這一些影響卻僅僅是表面的。在「兔和貓」，「鴨的喜劇」這兩篇裏，魯迅的對於弱小的生物的同情，對於造物者「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的責備，這和愛羅先珂的「魚的悲哀」「愛字的瘡」「小雞的悲劇」……等作品裏對於人類的愛，尤其是對於被損害與被侮辱者的愛，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具有着同樣的深廣，但同時卻也存在着顯著的區別。

愛羅先珂式的愛是離開了人間的，浮蕩在太空裏，結果是：他的理想是無所不愛，而在實際上雖是一無所愛的，於是他就不免就要悲哀起來了，但也僅僅止於悲哀而已。而魯迅卻和這相反，他有愛也有憎，他愛得越深，他憎恨得越切，在他愛和恨是有一個明朗的界限的。因為，在這時代裏，人們所夢想着的黃金世界還沒有到來，人們爲着這一個崇高的理想還要付出重大的代價的時候，愛和鬪爭是分不開的。這樣，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就顯得無力了。所以，當着愛羅先珂到處曬着『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的時候，魯迅卻仍固執着不離開這沙漠去尋找別處的綠洲，『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而毫不表示畏縮。所以，在愛羅先珂看到了弱小者被損毀了之後，他便發出深切的憐憫和悲哀，而魯迅却以爲『造物太胡鬧了，我不能不反抗他了，雖然也許是對他的忙……』他看到那殘忍的食害了鬼兒的黑貓，在矮牆上得意的高視，他『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裏的一瓶青酸鉀。』這便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絕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在魯迅的「兔和貓」和「鴨的喜劇」裏雖然有某一地方是無可否認的存在着的，在「端午節」和「白光」裏也存在着淡淡的無可奈何的悲哀的陰影，但在「社戲」裏卻完全掃除了。這便是現實主義的作風對於理想主義的勝利。

一九二三年的九月，魯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出版了，包括了從「狂人日記」到「社戲」十四短篇。（註二）這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件重大的事情，這引起了各方面，尤其是文藝界的注意，許多批評家們都把目光投向着這本書上來，每個人都說出他們自己的獨特的意見。

成仿吾先生說：

「近半年來的文壇，可謂消沉到極處了。我忍着聲音等待震破這沉默的音響到來，終於聽到了一聲宏亮的吶喊。在我未曾直接耳聞這一聲宏亮的吶喊之先，我先聽到了一陣嘈雜的吶喊的呼聲，這種呼聲對於提醒人們遲鈍的注意力是必要的，然對於我這種吞聲等着的人，卻有點覺得嘈雜而可厭。」

「然而我終於聽到一聲宏亮的吶喊了，這便是魯迅的「吶喊」一部小說集。」（註二）

雖然，他接着分析「吶喊」的內容和技巧的意見是不正確的，但他卻首先說出了「吶喊」這書的時代意義。茅盾先生說：

「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裏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丹麥的大批評家布蘭兌斯會說：「有天才的人，應該也有勇氣。他必須敢於自信他的靈感，他必須自信，凡在他腦膜上閃過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而然來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認的權

利。」這位大批評家這幾句話，我們在「吶喊」中得了具體的證明。除了欣賞驚嘆而外，我們對於魯迅的作品，還有什麼可說呢？」（註二）

這可以說是給成仿吾先生的評論最好的訂正和補充。

此外，更有張定璜先生的詳細而生動的記述。他寫道：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荒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烟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魯迅先生的醫究竟學到了怎樣的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

（註一）在初版時還包括了一篇歷史小說「不周山」，後來刪去，把這個短篇改名爲「補天」，收入「故事新編」裏。

（註二）見「吶喊」的評論」。轉引自臺灣農先生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第七一——七二頁。

（註三）見「讀『吶喊』」。轉引自同書第六一頁。

別想去恐嚇他，矇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微細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

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紮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而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有在過這樣沉默的旁觀者麼？「水滸」若教你笑，「紅樓夢」若教你哭，「儒林外史」之流若教你打呵欠，我說「吶喊」便叫你哭笑不得，身子不能動彈。平常愛讀美滿的團圓，或驚奇的冒險，或英雄的偉蹟的誰也不會願意讀「吶喊」。那裏面有的祇是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房子裏在街上遇見的人，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吶喊」裏面沒有像電影裏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奮的光景，因為你的日常生活裏面就沒有那樣光景。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那裏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在這個習見的世界裏，在這些熟識的人們裏，要找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是很難的，我來我去不過是孔乙己偷東西給人家打斷了腿，單四嫂子死了兒子，七斤後悔自己的辮子沒有一類的話罷了，至多也不過是阿Q的鎗斃罷了。然而魯迅先生告訴

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裏，我們都感覺到牠。我們無法拒絕牠。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魯迅先生的「吶喊」將來在中國文學史上會給牠怎樣一個位置，我們無從知道，也毋須知道。時光自然會把這個告訴比我們後來的人。目下我們喜歡知道而且能夠知道的大概有兩件事。

「第一，魯迅先生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有良心的；那就是說，忠於他的表現的，忠於他自己的藝術家。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決不忘記他對於他自己的誠實。他看見什麼，他描寫什麼。他把他自己的世界展開給我們，不粉飾，也不遮蓋。那是他最熟識的世界，也是我們最生疎的世界，我們天天過活，自以為耳目聰明，其實多半是聾子兼瞎子，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且不說別的，我們先就不認識我們自己，待到達見少數的人們，能夠認識自己，能夠辨認自己所住的世界，並且能夠把那世界再現出來的人們，我們才對於從來不關心的事物從新感到小孩子的驚奇，我們才明白許多不值一計較的小東西都包含着可怕的複雜的意味，我們才想到人生、命運、死、以及一切的悲哀。魯迅先生便是這些少數人們裏面的一個，他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蘊着中國的土氣，他可以說是眼前我們唯一的鄉土藝術家，他畢竟是中國的兒子，畢竟忘不掉中國，我們若怪他的嫌惡咒罵不好，我們得首先怪我們自己不好，因為他想誇耀想讚美而不得，他才想

到了這個打掃廁所的辦法。讓我們別厭煩他的囉嗦，但感謝他的勤勉罷。至於他的諷刺呢，我以為諷刺家和理想家原來是一個東西的表裏兩面。我們不必管諷刺的難受不難受，或對不對，只問諷刺的好不好，就是說美不美。我不敢說魯迅先生的諷刺全是美的，我敢說他的大都是美的。他知道怎樣去用適當的文字傳遞適當的情思，不冗長，不散漫，不過火，有許多人費盡苦心去講求塗刷顏色的，結果不是給我們一塊畫家的調色板便是一張戲場門前的廣告單。我們覺得他離奇光怪，再有什麼。讀「吶喊」，讀那篇那裏面最可愛的小東西「孔乙己」，我們看不見調色板上的糊塗和廣告單上的醜陋，我們只感到一個乾淨。「吶喊」的作風所以產生了許多摹仿，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單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先生也是新文學的第一個開拓者。事實是，在一切意義上他是文學革命後我們所得到的第一個作家。是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用實力給我們劃了一個新時代。雖然他並沒有高唱文學革命論。

二關於第二件，用得着說的話不很多。魯迅先生給了我們好些東西，自然也要有些東西是魯迅先生沒給，因為不能給我們的。在我個人呢，他給了我的已經足夠我喜歡了。我們的慾望太大，我們的努力太小。我們往往容易忘記自己的微弱，而責備別人為什麼不是李杜再世，為什麼沒有「莎翁」和「但老」的偉大。偉大不是會從天空掉下來或地上長出來的東西。也許五十年或百年以後我們的文學史上會另有一個花期，像唐代的或蓋過唐代的花期罷，不過想說這句話先得作一個預言家，而我又不是一個預言家，我只以為偉大的時代或偉大的作品是只有誠實可以產生出來的，但我們現在的時代，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現在的文壇——假使我們真有一個文壇——什麼都齊備了，偏偏缺少誠實。我

們的華屋建築在沙上，我們在那上面想創造我們的偉大！魯迅先生不是和我們所理想的偉大一般偉大的作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狹窄。然而他有的正是我們所沒有的，我們所缺少的誠實。我們還說他給少了麼？假使我們覺得「吶喊」的作家沒有十分的情熱，沒有瑰奇的想像，沒有多方面的經驗，我們應該想到，雖然如此，他究竟自然，是真切，他究竟沒打算給我們備辦些紙扎的美人或溫室裏烘出來的盆景。別的人怎麼看，怎麼感想，他不過問；他只把他所看的所感想的忠實地寫出來，這便是他使我們忘不掉的地方。」（註一）

在這一大段冗長的敘述裏，雖然有許多地方是嫌得太繁瑣了，並且還有許多不正確的評價以及錯誤的觀點，但在大體上卻也有些地方說明了這時的魯迅和魯迅的作品真實，作爲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忠實於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以極端冷靜的態度，以極端銳利的筆鋒，給予走向崩潰路上去的舊社會以無可逃避的赤裸裸的剝脫，這一點，對於魯迅的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作風是個很好的說明。但這一個說明只說明了事實的一半，而不是事實的全部。『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這說明魯迅的冷靜的觀察的方法和態度是對的，然而魯迅卻不僅僅是一個極端的冷靜的『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的』的旁觀者，而他卻也是我們當中的一個，他也經歷着我們的上一個世代的和目前的，社會生活鬥爭中的痛苦和煩惱，他是一個實際的社會生活鬥爭中的參加者。他的聲音，我們與其

（註三）見「魯迅先生」。轉引自「關於魯迅先生及其著作」第二〇——二十七頁。

說「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的教息，一到不如把他看作戰士在人生的縱橫馳驅的戰鬥中發出來的呼號；他自己所命名的『吶喊』，這是更正確的。」

四一

接着「吶喊」之後，魯迅在一九二四年的二月，寫出了「祝福」和「在酒樓上」（註二兩個短篇小說。在「祝福」裏魯迅所描寫的主要人物是一個被封建社會舊禮教喫下去的女人——祥林嫂。

她是山裏的人，新喪了丈夫的寡婦，最初是衛家山的衛老婆子領來僱給魯鎮上的魯四老爺的家裏做工，不論食物，不惜氣力，做事毫不懈怠，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鴨，徹夜的煮福禮，全是她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她生活得很滿足。有一天，新年才過，她在河邊淘米，被她夫家的人看到了，不久，就被捉住綁在船艙裏裝回去，到家便以八十千錢的代價，賣給深山裏的賀家塢的賀老六。起初，她鬧得很厲害，她被關在轎裏，一路只是毆罵，抬到賀家塢，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當他們一不小心的時候，一鬆手，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直到七手八脚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她還是罵，還是哭，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後來，她到了年底，生了一個男孩子，兒子也胖，母親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有氣力，又會做活，她似乎是交到好運了。但不久，不幸的事情便接二連三的發生。她的男人年紀青青的卻得了傷

寒死了。她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他的孩子又會給狼啣去了，所以，她只好又第二次回到魯四老爺的家裏做女工。這回，她是非常的慘淡了，臉色青黃，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見人便提起她孩子的事。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沒有神采的眼睛來，她說道：「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半年，尋來尋去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接着只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這話，起初還能够引起別人的同情，甚至於惹出老太太們的眼淚，人們因此也減少一些對於她鄙薄的神情。可是，她翻來覆去的說得太久了，白天夜裏逢人便提到這件事，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她的話又變成人們嘲笑她的資料。

這一回，祥林嫂的地位降低了許多了，魯四老爺是讀過聖賢書的人，知道許多古理，他暗暗地告誡家裏人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她敗壞了風俗，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不能讓她沾手

，一切飯菜只要她一沾手，便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喫的。在魯鎮過新年的時候，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魯四老爺家裏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鴨……，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喫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閒着坐看柳媽洗器皿。

「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一看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微雪點點的下着。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望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唔唔。」她含糊的回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把眼睛向祥林嫂的額上一瞥，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目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

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祥林嫂的臉上立刻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曾聽過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覺得非常苦悶，第二天早上起來，兩眼上都圍着一大圈黑。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才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此後，便逢人打聽死後靈魂的有無，笑容是沒有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爲恥辱的記號的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積下了一筆工錢，換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地對女主人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她自己以爲已經贖了這一世的罪名了。冬至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她看到桌子擺好，祭品裝好了，便坦然的去拿酒盃和筷子了。

「你放着罷，祥林嫂！」女主人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回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不再去取燭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主人教她走開，她才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

的小鼠；否則跌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記了去淘米。後來，她便從主人的家中被趕出來，變成個乞丐，不久就死掉了。這便是中國封建社會裏的一個被蹂躪的女人的一生，同時，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的破落的農村裏婦女們共同的悲慘的命運。

「在酒樓上」是寫一個『當年敏捷精悍』而現在『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的呂緯甫，他也曾是當時的言行激烈的知識份子，但經過了生活的折磨之後，他卻比那信奉着『差不多說』的方玄綽還要更加頹廢，遇事敷衍敷衍，以不了了之，打算在糊裏糊塗當中，混過了這有限的生命，充分地表現着『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知識份子消極的頹廢這一面。這，訴說出那時的一般的知識份子的苦惱和悲哀。

這年三月，魯迅又作短篇小說「幸福的家庭」和「肥皂」。(詳二)「幸福的家庭」是描寫一個知識份子的幻想中的『幸福的家庭』和現實環境之間的衝突，「肥皂」是描寫一班道貌岸然的自以為衛道者們的偽善者之無恥。

一位投機的文學家，他早已想過，須得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了。當他躺在床上幻想了一通之後，忽然從床上跳下來，四五步就走到書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張綠格紙，毫不遲疑，但又自暴自棄似的寫下一行題目道：「幸福的家庭」，投向幸福月刊社，因為那裏潤筆似乎比較豐富些。他剛寫好題目，筆立刻就停滯下來了，仰起頭，兩眼瞪着房頂，想着那安置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

「北京？不行，死氣沈沈，連空氣也是死的。」他想，『假如在這家庭的周圍築一道高牆，難道

空氣也就隔斷了麼？簡直不行！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福建更無須說。四川、廣東？都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倘使綁去一個，那就成爲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假如在外國，笑話。雲南、貴州不知道怎樣，但交通也太不便。……那麼，那裏好呢？

——湖南也打仗；大連仍然房租貴；察哈爾、吉林、黑龍江罷，——聽說有馬賊，也不行！……「他

想來想去，想不出好地方，最後，他用了一個洋文字母，決定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做A。
「……家庭中自然是兩夫婦，就是主人和主婦，自由結婚的。」他又繼續想下去，「他們訂有四十多條條約，非常詳細，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優美高尚……。東洋留學生已經不通行，——那麼，假定爲西洋留學生罷，主人始終穿洋服，硬領始終雪白；主婦是前頭的頭髮始終淺得蓬蓬鬆鬆的像一個麻雀窩，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卻是中國裝，……」

「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斤！」窗外一個男人的聲音，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聲響。他不由的迴頭看去，但他卻立刻回過頭來想道：

「不相干，什麼「二十五斤？」——他們是優美高尚，很愛文藝的。但因爲從小生長在幸福裏，所以不愛俄國的小說……。俄國小說多描寫下等人，實在和這樣的家庭也不合。「二十五斤？」不管他。那麼，他們看看什麼書呢？——裴倫的詩？吉支的？不行，都不穩當。——哦，有了，他們都愛看「理想之良人」。——他們一人一本，這家庭裏一共有兩本，……」

「……他們兩人正在用午餐。」他覺得自己的胃有點空虛了，但還是想下去。「桌上鋪了雪白的布；廚子送上菜來，——中國菜最進步，最好喫，最合於衛生；所以他們採用中國菜。送來的是第一碗，但這第一碗是什麼呢？……」

「劈柴，……」

他喫驚的迴頭去看，靠左肩，站着自己家裏的主婦，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

「什麼？」他以爲她來擾亂了他的創作，頗有些憤怒。

「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些。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兩吊五。」

「稱得太喫虧了。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好不好？」

「好好，就算他二十三斤。」

「那麼，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

「唔唔，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他抓起筆，就在寫着一行「幸福的家庭」的綠格紙上起草，算了好久，這才仰起頭來說道：

「五吊八！」

「那是，我這裏不夠了，還差八九個……」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才又回過頭向書桌。他覺得頭裏很脹滿，似乎極極又叉的全被木柴填滿了，五五二十五，腦皮質上還印着許多散亂的亞刺伯數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氣，又用力的呼出，彷彿要藉此趕出腦裏的勞柴，五五二十五和亞刺伯數字來。果然，吁氣之後，心地也就輕鬆不少了，於是仍復恍恍惚忽的想下去：——

「什麼菜？茶倒不妨奇特點。滑溜裏脊。蝦子海參，實在太凡庸。我偏要說他們喫的是「龍虎鬪」。……於是一碗「龍虎鬪」擺在桌子中央了，兩人同時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於是他們同時伸筷子去，同時夾出一塊蛇肉來，——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怪，不如說是鱔魚罷。……一樣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時放進嘴裏去，……」他不能自制的只是想，但覺得背後很熱鬧，有人來來往往的走了兩三回。他還是熬着，竭力想下去，「這似乎有點肉麻，那有這樣的家庭？……」他終於忍耐不住了，回過頭去。就在他背後的書架旁邊，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下層三株，中層兩株，頂層一株，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唉唉……吁……，」他的思路有些亂了，但還是想下去。

他腰骨筆直了，因為他根據經驗，知道這一聲「拍」一定是他的主婦的手掌打在他們的三歲的女兒的頭上的聲音。

「幸福的家庭，……」他聽到孩子的嗚咽了，但還是腰骨筆直的思想，「孩子要生得遲，……或者是沒有，……」孩子哭聲高起來了，他不得不走出去，開了風門，聞得一陣煤油氣。孩子就躺在門的右邊，臉向着地，一見他，便「哇」的哭出來了。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他彎下腰去抱她。」

「連你也來欺侮我！不會幫忙，只會搗亂，——連油燈也要鬧翻了牠。晚上點什麼？……」主婦怒氣沖沖的曬着。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抱她進房，摩着她的頭，說，「我的好孩子。」於是放下她，拖開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兩膝中間，擎起手來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着手掌舐了兩舐，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才歇了手，只見她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運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着一行題目的稿紙，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裏。

這是對於生活在現實的世界上，偏要超越現實；活在現在，偏要幻想着未來，和實際生活隔離了的。不敢正視現實而又逃不出現實的空頭文學家極好的絕大的諷刺。

「肥皂」裏描寫的，又是另一種人物的類型。偽善者四銘從街上買了一塊肥皂，回家遞給四銘太太。「唉，這實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將肥皂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說。

「唔唔，你以後就用這個……。」

她看見他嘴裏這麼說，眼光射在她的額子上，便覺得額骨以下的臉上似乎有些熱。她有時自己偶然摸到額子上，尤其是耳朵後，指面上總感覺着些粗糙，本來早就知道是積年的老泥，但向來倒也並不很介意。現在在他的注視之下，對着這葵綠異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臉上有些發熱了，而且這熱又不斷的蔓延開去，即刻一逕到耳根。她於是就決定晚飯後要用這肥皂來拚命的洗一洗。

「有些地方，本來單用皂莢子是洗不乾淨的。」她自己對自己說。

「學程！」四銘像記起了一件事，忽而拖長了聲音叫。

「學程！」四太太也幫着叫。她停下糊紙鏡，側耳一聽，什麼應聲也沒有，於是她又儘力提高了喉嚨，尖利的叫道：

「給兒呀！」

這一叫確乎有效，不一會，那穿着短衣，肥胖的圓臉上流着亮晶晶的油汗的學程果然站在她面前了。

「你在做什麼？怎麼爹叫也不聽見？」她譴責的說。

「我剛在練八掛拳……。」他立即轉身向了四銘，筆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問他什麼事。

「學程，我就要問你：「惡毒婦」是什麼？」

「「惡毒婦」？……那是，「很凶的女人」罷？……」

「胡說！胡鬧！」四銘忽而怒得可觀了，「我是「女人」麼？」

學程嚇得倒退了兩步，站得更挺了。

「「惡毒婦」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來請教你？這不是中國話，是鬼子話，我對你

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懂麼？」

「我，……我不懂。」學程更加局促起來。

「嚇，我白化錢送你進學堂，連這一點也不懂。虧煞你的學堂還誇什麼「口耳並重」，倒教得什麼也沒有。這說鬼話的人至多不過十四五歲，比你還小些呢，已經嚶嚶咕咕的能說了，你却連意思也

說不出，還有臉說「我不懂！」——現在就給我查出來！」

「這真叫作不成樣子，」過了一會，四銘又慷慨的說，「現在的學生是。其實，在光緒年間，我就是最提倡開學堂的，可萬料不到學堂的流弊竟至於如此之大：什麼解放咧，自由咧，沒有實學，只會胡鬧。學程呢，爲他化了的錢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給他進了中西折中的學堂，英文又專是「口耳並重」的，你以爲這該好了罷，哼，可是讀了一年，連「惡毒婦」也不懂，大約仍然是唸死書。嚇，什麼學堂，造就了些什麼？我簡直說：應該統統翹掉！」

「對咧，真不如統統翹掉的好。」四太太糊着紙錠，同情的說。

「香兒她們也不必進什麼學堂了。」女孩子，唸什麼書？」九公公先前這樣說，反對女學的時候，我還攻擊他呢；可是現在看起來，究竟是老年人的話對。你想，女人一陣一陣的在街上走，已經很不雅觀的了，她們卻，還要剪頭髮。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頭髮的女學生，我簡直說，軍人土匪倒還情有可原，攪亂天下的就是她們，應該很嚴的辦一辦……」

「對咧，男人都像了和尚還不够，女人又來學尼姑了。」四太太附和着說。

「他們還嚮着什麼「新文化新文化」，「化」到了這樣了，還不够？」四銘非常憤慨地獨自說下去，「學生也沒有道德，社會上也沒有道德，再不想點法子來挽救，中國這才真個要亡了。——你想，那多麼可歎？……」

「什麼？」四太太隨口的問，並不驚奇。

「孝女。」他轉眼對着她，鄭重的說，「就在大街上，有兩個討飯的。一個是姑娘，看去該有十八九歲了。——其實這樣的年紀，討飯是很不相宜的，可是她還討飯。——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的，白頭髮，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簷下求乞。大家多說他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討得一點什麼，便獻給祖母喫，自己情願餓肚皮。可是這樣的孝女，有人肯布施麼？」他射出眼光來釘住她，似乎要試驗她的識見。

她不答話，也只是將眼光釘住他，似乎倒是專等他來說明。

「哼，沒有。」他終於自己回答說，「我看了好半天，只見一個人給了一文小錢；其餘的圍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還有兩個光棍，竟肆無忌憚的說：「阿發，你不要看得這貨色甜。你只要去買兩塊肥皂回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哪，你想，這成什麼話？」

「噫。」她低下頭去了，久之，才又懶懶的問，「你給了錢麼？」

「我麼？——沒有。一兩個錢，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討飯，總得……。」

「噫。」她不等他說完話，便慢慢地站起來，走到厨下去。這時，黃昏更顯得濃密，已經是晚飯的時候了。

「學程，」在晚飯桌上四銘看着他的臉，又問道：「那一句查出了沒有？」

「那一句？——那還沒有。」

「哼，你看，也沒有學問，也不懂道理，單知道喫！學學那個孝女罷，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願餓肚子。但是你們這些學生那裏知道這些，肆無忌憚，將來只好像那光棍……」接着他便寫得更厲害。

「天不打喫飯人」，你今天怎麼儘鬧脾氣，連喫飯時也是打雞罵狗的。他們小孩子們知道什麼。四太太忽而說道。

「什麼？」四銘正想發話，但一回頭，看見她陷下的兩頰已經鼓起，而且很變了顏色，三角形的眼裏也發出可怕的光，便趕緊改口說，「我也沒有鬧什麼脾氣，我不過教學程應該懂些些。」

他那裏會懂得你心裏的事呢。她可更是氣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點了燈籠火把，尋了那孝女來了。好在你已經給她買好了一塊肥皂在這裏，只要再去買一塊……」

「胡說！那話是那光棍說的。」

「不見得。只要再去買一塊，給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麼話？那有什麼相干？我因為記起了你沒有肥皂……。」

「怎麼不相干？你是特誠買給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這真是什麼話？你們女人……」四銘支吾着，臉上流出油汗來。

「我們女人怎麼樣？我們女人，比你們男人好得多。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

賀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麼好心思。「咯支咯支」，簡直是不要臉！」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那是一個光棍……」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極響的叫喊。

「道翁麼？我就來！」四銘知道是何道統，便遇赦似的，也高興的大聲說，「學程，你快點燈照何老伯到書房去！」

學程點了燈，引着道統走進西邊的廂房裏，後面還跟着卜薇園。

「失迎失迎，對不起。」四銘還嚼着飯，出來拱一拱手，說，「就在舍間用便飯，何如？……」

「已經偏過了。」薇園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說，「我們連夜趕來，就爲了那移風文社的第十八屆徵文題目，明天不是「逢七」麼？」

「哦！今天十六？」四銘恍然的說。

「你看，多麼糊塗！」道統大嚷道。

「那麼，就得連夜送到報館去，要他明天一準登出來。」

「文題我已經擬下了。你看怎樣，用得用不得？」道統說着，就從手巾包裏挖出一張紙條交給
他。

四銘踱到燭台前，展開紙條，一字一字的讀下去。

「一恭擬全國人民合詞籲請貴大總統特頒明令專重聖經崇祀孟母以挽頹風而存國粹文。」——好

極好極。可是字數太多了罷？」

「不要緊的！」道統大聲說，「我算過了，還無須乎多加廣告費，但是詩題呢？」

「詩題麼？」四銘忽而恭敬之狀可掬了，「我倒有一個在這裏：『孝女行』。那是實事，應該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薇園連忙搖手，打斷他的話，「那是我也看見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話，她不懂我的話，不知道她究竟是那裏人。大家倒都說她是孝女，然而我問她可能做詩，她搖搖頭。要是能做詩，那就好了。」

「然而忠孝是大節，不會做詩也可以將就……」

「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薇園攤開手掌，向四銘奔過來，力爭說，「要會做詩，然後有趣。」

「我們，」四銘推開他，說，「就用這個題目，加上說明，登報去。一來可以表彰表彰她，二來可以借此針砭社會。現在的社會還成個什麼樣子，我從旁考察了半天，竟不見有什麼人給一個錢，這豈不是全無心肝……」

「阿呀，四翁！」薇園又奔過來，「你簡直是在『對着和尚罵賊禿』了。我就沒有給錢，我那時恰恰身邊沒有帶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銘又推開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別論。你聽我講下去：她們面前圍了

一大羣人，毫無敬意，只是打趣。還有兩個光棍，那是更其肆無忌憚了，有一個簡直說，「阿發，你去買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這……」

「哈哈！兩塊肥皂！」道統的響亮的笑聲突然發作了，震得人耳朵嗡嗡的叫，「你買，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這麼囂。」四銘喫了一驚，慌張的說。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四銘沈下臉來了，「我們講正經事，你怎麼只胡鬧，鬧得人頭昏。你聽，我們就用這兩個題目，即刻送到報館去，要明天一準登出來。這事只好偏勞你們兩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薇蘭極口應承說。

「呵呵，洗一洗，咯支……嗚嗚……」

「道翁！」四銘憤憤的叫。

他們胡鬧了一陣便走了，四銘把他們送出門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中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躊躇，終於跨進了門檻，他看到了，在桌子中央放着那塊長方形的肥皂，在那離燈很遠的陰影裏的高背椅子上坐着四太太，她的死板板的臉上並不顯出什麼喜怒，眼睛也並不看什麼東西。

「咯支咯支，不要臉不要臉……」

四銘彷彿聽得秀兒在背後說。

拚死拚命地攻擊新文化的衛道先生們的生活圖畫，原來是如此的！「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男盜女娼」的虛偽者的真面目上的似乎嚴正的薄紗，無可逃避的被魯迅扯下來了。由此，我們不難猜想到，這一班東西還能够在社會上活動的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和統治在這社會上的軍閥官僚的政治，又是一個怎樣的 politics 了。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後，封建勢力捲土重來的時候，尤其是當着新文化運動的陣營起了很大的分化，其中一部份以前曾經提倡過新文化，而現在卻反身投降到舊壁壘去的時候，繼續着反帝反封建這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優秀傳統，並爲着這一個偉大的任務而鬥爭，是有頭等的重要的意義的。這一點，在祝福和「肥皂」裏表現得很明顯。

魯迅從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開始，便對於幾千年相傳下來的中國封建社會下了一個宣戰書。在這篇小說裏，他第一個破天荒的指出了這一社會的「喫人」的本質，這之後，魯迅在「孔乙己」、「藥」、「明天」，……這幾篇小說裏，又畫出了這個「喫人」的封建社會的具體的面貌，並且加以本質上的說明，給予牠以中肯的致命的打擊，動搖了牠的似乎是牢不可動的根深蒂固的基礎。「祝福」和「肥皂」便是繼續着這一個戰鬥，而又加強了對於舊的封建勢力的攻擊的力作。在「孔乙己」、「藥」、「明天」這幾篇小說裏，魯迅所刻劃出來的人物底面貌，雖然是明確而又生動的，但却在某一些場面，似乎是稍嫌太簡略了，主觀的抒情成分太多，客觀的描寫場面太少，沒有什麼含蓄，把主題很明顯的揭露出來。這就是說感情太強烈了，等不及容納在具體的形象裏面，然後再把牠表現出

來，這情感像是一團熊熊的烈火，壓也壓不下去，要從內心裏燃燒出來，牠又像是奔騰澎湃的怒濤，在內心裏激蕩迴旋地打圈子，想找一個出口傾瀉出來，而魯迅卻在他的作品裏，極力地採取客觀的冷靜的態度，他想壓下去這一種強烈的情感，並且在大多數的場面裏是已經做到了，這便形成了他的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作風。但也有少數的場面，魯迅減少了或是疏忽了對於這一種力量的控制，有時，便不免影響到了這一作風的完整，這傾向在「吶喊」中的後幾篇小說裏慢慢地被克服下去了。現在，在這幾篇小說裏「刻劃也稍加深切」，「一面也減少了熱情」，這一個改變，在魯迅的現實主義的本身是一個頗大的進展。尤其是在「幸福的家庭」這篇裏，心理狀態的細緻描寫，比起「端午節」和「白光」來，顯然地存在着很大的差異，並且表示着驚人的進步。

四二

一九二四年的五月，魯迅從甌塔胡同六十一號遷居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新屋。在去年（一九二三年），他就由公用庫八道灣的房子裏搬到甌塔胡同六十一號了，原因是：魯迅和周作人沒有辦法可以相處下去。那時掌理家政的是周作人的妻子，一個喜歡浪費的日本女人，魯迅把他的全部收入提供家用，仍然不敷開支；而周作人夫婦反而倒過來說是魯迅自己蓄私，甚至於誣賴說魯迅對於弟媳有不敬之處。於是魯迅便決然和他們分手了。魯迅搬出之後，母親暫時仍和周作人住一起，周作人的家裏面，男男女女的僕人很多，但母親卻是自己做飯自己喫，老人家受不了這個氣，不久，也就搬出八道

魯迅和魯迅住在一起了。(註一)爲了安慰母親，魯迅便向許壽裳、齊宗頤兩位先生各借四百元，買下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新屋。(註二)

這時，周建人先生已經到上海去了，家裏只有老太太、朱氏夫人、魯迅，此外還有兩個女用人；玉媽和蘭媽。這情形是非常寂寞，冷清的。老太太每天只是瞧小說，朱氏夫人招呼用人，魯迅在家裏是不多講話的，常年四季，除例話外，是不和太太談天的，只有在太太向他家用錢的時候，魯迅才說出較多的話，如「要多少？」或者更順便問一句，「什麼東西添買不添買？」但這種較長的話，一月之中，至多不過一兩次。魯迅和母親的談話比較多些，但多半也只是關於老太太的看書問題，家庭的事情是很少談的。

「在改革家庭方面，我是失敗者。」他有時頗爲慨歎的說，「常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稍微改變一點，一遇有什麼意外或者不如意的事，她們便馬上抱怨了。抱怨之後，覺得還是她們老法子好。一下子又恢復原狀了。」

所以，在家裏，若是遇着不大緊要的事，魯迅往往不開口，他不願傷及年老的母親的心，不願引起那事飛來老太太的意旨的，一直守着老規矩的舊式太太的糾紛，對於家事，他就不去過問了。(註三)

(註一) 請參看歐陽凡海先生編「魯迅的書」第二四二頁。

(註二) 請參看景宋先生編「魯迅和青年們」。

(註三) 請參看蕭有麟編「魯迅回憶斷片」第六八——七〇頁。

生活在無怨也無愛的寂寞而又冷清的家庭裏面，魯迅感不到有絲毫的溫暖。這時，只有在他的學生或是其他的青年們來訪的時候，才顯得熱鬧起來。

因為新出版的「吶喊」到處風行，接着「吶喊」之後魯迅又在北京的進步的報紙和雜誌上繼續發表文章，給青年們以思想上的領導，以及他在北大、女師大還有其他的學校教書，直接地接觸到許多男男女女的青年們，魯迅這時幾乎變成了北京的青年們的中心了。在他的寓所裏，時常是去了一批又來了一批，那些認識的或不認識的熱切的登門求教的青年朋友。他甚至錯過了喫飯的時間來陪客，他絕不忍爲了寶貴自己的光陰而拒絕了任何人，有時談興正濃，他反而會留客人多坐一會兒。

那時他的學生之一尙絨先生，在回憶到他的那時候一段學習生活時，寫出一段愉快的記憶道：

「在先生決定辦「莽原週刊」的時候，一日夜，我便和長虹一塊到先生家中去了。在我的計劃中，見了先生似乎有很多的話要說。可是到了他家中。他在「秋夜」散文詩中所描寫的小書齋中坐下後，我卻一句話也想不到來了。這小書齋是客堂の後進，一間突出的小房間。右首靠壁是兩個長條桌接成的長書案，書案的兩頭都齊整地堆着雜誌和書籍。房間的後面和左面，上面整個都是玻璃窗。後面玻璃窗底下是一片床，床上放着一床藍色小白花被，右首窗下是兩個茶几，和兩把椅子間開放着。我們走進門時，先生正坐在書案前的藤椅上，轉身向外看。大概是聽着腳步聲，要看看是誰來打擾了。我們走進了小房間，他笑着站起來，讓我們坐。於是他便和長虹談起辦「莽原週刊」的問題來。我一面嚼着娘姨送進來的鹹花生仁，一面透過窗上的玻璃看看後園的夜風搖動的棗樹的依稀身影。

「整個的小房間很清潔，清潔得恰如先生的文章一樣，沒有堆積，沒有華彩，只使人恰好明白。我在沉默中，聽着他與長虹的談話，也如我讀着他的文章和看着他的小房間一樣，一切都是坦白的平凡的，絲毫不覺着夾雜。如果加一句形容詞的話，那就是簡單得恰好說明一個康健的人的健康的生活。這種樸素的簡單，的確，是我第一次看見的，絕沒有包含着一點紳士的誇大，老爺的複雜，學者的孳孳，教授的堆砌，名流的虛驕，他的談話也如他的房間一樣，沒有爲擺飾而設的東西，沒有爲裝璜而特置的書籍，沒有爲誇耀而陳列的名畫，沒有爲舒適而特置的器具，沒有爲炫赫而裝出的面孔，也沒有爲「深刻」而嚼出的語句。我走過許多紳士、老爺、教授、名流和學者的書齋，在此地我才看見知識和人凝結在一起的典型！」

「許久，先生大概怕我孤坐寂寞吧，從書案上抽出我前幾天請他看的兩篇稿子，拿出一篇轉向我說：「這裏邊還有幾點可商議的地方。」

「我走到桌前，在綠紗罩的燈光下，先生打開稿子一頁一頁仔細尋找着。每找到一個錯字，或別字，或是不通，或是不適當的句子時，他都指着錯處的額頭和我說：「這個地方，我以爲這樣改一下比較更好一點。」

「我仔細看，額頭上都精細地註着小字，或點着小點，這是等待徵求我的意見後，準備正式改正的。這稿子還未看完，又有幾位先生陸續走進小書齋來。這幾位先生中，有我認識的，也有我不認識的。但從樣子上看，與先生對照起來，似乎各人都賦有一種特權：不是「我應該看不見你，」就是

「我只會看見我自己的鼻子，」或者，眼角中故作驚訝的問「你是誰呀？」或者鼻窪中不客氣地流出「你跑到這裏來幹嗎呀？」總之「你是什麼人也來麻煩魯迅先生嗎？」這些先生們，長虹因為時常發表小說和文章，還能和他們扳談幾句，聽聽他們的「煙士披里純」，我則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感了。同時，小書齋這時也就顯得太小了，魯迅先生被擠得向後退了兩次，還有腳在地板上無所措置地散步。我真感到寂寞了，於是便約着長虹，從先生家中退了出來。

「這時候，夜空好像懷着無限光明希望似的，那樣高朗而穆靜，我剛才在先生家中所見所聞的一切都分明得如冷靜的銀星一般，在我前後左右的深濃的黑暗中纏繞着。我沉默地和長虹走着，我們雖然不知道這樣走過好多次，但這一夜卻似乎有一種異樣的啓示，使我感着一種異樣的安慰和莊嚴的勉勵！如果用言語把這啓示寫出來，我現在還記得是這樣幾個字：「先生的態度和生活已把我從小地主的狹籠中解放了出來，我嘗到自由的美味了。那美味雖然當時仍是苦的。」（註二）

他的另一位學生李靈野先生，也有同樣的動人的描寫，他記述初次訪問的情形道：

「一九二四年冬天的一個下午，被一位熟朋友領導着，我靜靜的走到北京西城偏僻的一角，到魯迅先生的住處。一扣門，便被讓進去。因為來訪是事先約定的。不大的四合院裏種着幾棵小小的樹，一點聲音也沒有，靜寂得有如古寺。上邊居中的一間房分成兩段，我們走進靠裏的一間小屋。一位留着短短的鬚鬚，上身穿着灰色毛線衣，褲腳紮着腿帶的人從書桌跟前站起來。不用介紹，從額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我便知道這就是我所景仰的魯迅先生了。」

「在鄉間的師範學校讀書時，每月有一件難以忘卻的事，這便是「新青年」的寄到。拆開來第一先看看看魯迅先生的文字，對於卷首的大議論倒並不熱切的想要拜讀。以後先生常有譯著的零篇發表，這些都深切的引起我對於文學的嗜好，同時對於作者的好奇心，也隨着增加起來了；我願望見這樣的人物。這是很自然的。但那時候覺得這希望很是渺遠，因為我實在說不清離北京有多少路，也沒有想出究竟怎樣可以走到的方法。」

「一九二三年到北京讀書時，魯迅先生的文學活動正蓬蓬勃勃，我的要瞻仰先生丰彩的心倒冷卻一些了。我是從鄉間初來的人，深怕一種叫作「架子」的怪物，聽說城裏人多半都有這樣一條守門狗；我想魯迅先生大概也是不能例外的了。但是以後從間接的聽聞得知魯迅先生並不是凜然可畏的人物，頗歡喜和青年人談天說笑；可是我不完全相信這樣的話。」

「一九二四年七月我譯了「往星中」，過些時，領我的那位熟朋友便拿給魯迅先生看去，因為先生常向他說太少見青年人的譯作。我想這譯稿不進紙箋，也得放在那裏吃一二年塵土罷；不料只過了十幾天，那位朋友便告訴我說，譯稿不僅看過，並且記出一點有待商酌的地方，留待有機會而談一下了。這是一種意外的喜悅，也就是約定去訪魯迅先生的緣由。」

「我們所進的那一間屋真可以說是「斗室」。後牆上部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幾棵稀疏的小樹；窗下是一張木板床，雖然不寬，卻幾乎佔去了屋裏四分之一的地方，我就被讓坐在

這張床上，右手是一張茶几，兩張木椅；左手便是先生著作的書桌，先生就轉過桌前的椅子，在書桌跟前坐下來。

這屋裏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被都有一種鄉裏的樸素味，談話又毫無虛套的立刻開始，我心裏很泰然，覺得和我對談的是一個誠誠懇懇的人，絕不是有一點架子的作家。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所經歷的人生經驗是何等深刻，他談話時的兩眼顯然表示着他的觀察是何等周密和銳敏。聽到不以爲然的事情時，他的眉頭一皺，從這你也不難看出他能感到怎樣的悲憤。笑話是常有的，但卻不是令人笑笑開心的笑話，那裏面總隱藏着嚴肅和諷刺。他的談鋒和筆鋒一樣，隨時有一針見血的地方，使聽者覺得這是痛快不過的談吐。這是魯迅先生所給我的最初的印象，在以後的接談中除了他有時偏於抑鬱，有時偏於愉快外，我覺得沒有什麼大改變。

魯迅先生是不斷吸煙的，所以這間小屋裏早就充滿了濃馥的煙了。看出我是怕煙的了，便笑着說，這不免太受委屈，隨即就要去開窗子。我說不怕的，也就趁談話有一段落，起來告辭，因爲怕久坐就攔他的工作。他說，既不怕，那就無妨再坐一時了。所以第一次的訪問的時間頗長久，送我們走時他還叮囑常去談天。

和他談天是一種愉快的經驗，我們看着他的心和機智自然的活動，比讀文章更多一種親切感；所以這以後，我們兩三個熟朋友總隔幾天去訪他一次。先生是健談的，往往一談幾點鐘毫無倦容，我們也不到夜深不願走，有時我們知道他的寫作都在夜晚，稍談些時便勉強要告辭，但他說他惟一的休

息和消遣便是談談天，我們若有閑暇，在他是並無妨礙的，我們自然樂於再坐下去，先生是愛吃甜食和小花生的，也常常用這些來款客；有一回隨吃隨添了多次，他的談興還正濃，我料想兩種所存的不多，便笑着說，吃完就走，他說，好的，便隨手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大糖盒。這以後，有一回打開盛花生的鐵盒時，裏面適逢空無所有，他笑着說，這次只好權演一回空城計了。

「所談的話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事。只記得有一次問起他怎樣寫作，他詳細的說了他作小說的經驗。他說偶然有一點想頭時，便先零碎的記下來，遇到或想到可寫的人物特性時，也是如此。這樣零碎的記錄在心裏慢慢融化，覺得人物有了生命，這才將段片的拼湊成整篇的東西。全篇寫就以後，才細看那些地方要增刪。最後還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韻調，有讀起來覺得不合適的字眼，再加以更換。他又說，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兩樣東西，一是戀愛，一是自然，要在用一點自然的時候，他不歡喜大段的描寫，總是拖出月亮來用一用罷了。」

「關於罵人，記得也常談到，他說一見到虛偽，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嘔的世態時，心裏的悲憤便覺得非吐不快。有些個人代表或一種世態，罵他並不出於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會的嘴巴罷了；社會是冥頑的，先生常嘆息着說。在這樣的談話中你親切的覺得有一顆赤熱的心在。」

「每次談話之後，我都覺得有一種爽快之感，彷彿給清晨的涼風吹拂了一樣。深夜走出先生的住處時，那偏僻的小巷裏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他總望我們走遠了才進去。北京的冬夜有時是極可愛的，在那靜寂的街道上步行着，先生的聲音和容貌還縈繞在腦際，這印象永遠不會磨滅！」（許一）

他的另一位學生孫伏園先生，也有同樣的記載，並說明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原因道：

「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雖然作官十幾年，教書十幾年，對於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如賭博，如舊戲，如妓院，他從未沾染絲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這所謂怪者也無非書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舊布衣，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西服的襪子總是單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魯迅先生也永遠穿着這樣的單褲。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襪子還是二十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一條棉襪，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的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爲我的話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卻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襪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看我的鋪板，我從不願意換籐綳或棕綳，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魯迅先生的房中總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甚麼時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鋪蓋一捲，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遠在奮鬥的途中，從來不夢想甚麼是較爲安適的生活。他雖然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註二）

在這些川流不息的登門訪問的青年們當中，也有一些無聊的人物，爲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故意來打擾魯迅，給魯迅許多麻煩的，但魯迅卻總是殷勤相待，不給他們以難看的。

「是北大旁聽生馮省三，有一天跑到魯迅先生家裏，向魯迅先生床鋪上一坐，將兩腳蹠起，說：——

「「喂，你門口有修鞋的，把我這雙破鞋，拿去修修。」

魯迅先生不遲疑的，將馮省三的破鞋，拿去修好後，他還爲他取回來，套到他的腳上。可是，馮省三連謝都沒有說一句，悻悻地走掉了。

「魯迅先生，在每提到這件事時，總是說：「山東人真是直爽哇！」

「其次，是一個中國大學旁聽生鍾青航。

「在一個夏天的夜晚十二時以後，魯迅剛剛開始寫東西，碰碰碰，有人打門了，魯迅放下筆，跑出去一看，來者是一個面善的青年，穿着拖到地的睡衣。對魯迅先生說：

「我睡不着，特地跑來同先生談談。」

「好，請進來。」魯迅開了門，將青年人讓到書房裏。

「青年人開始滔滔了，但出乎先生意料之外的，來者並不是失眠的痛苦，也沒有失戀的悲哀。青年人是高興了，叫一輛汽車，在北京城兜了一個圈，付不出十五元車錢，卻打了鬧車的個其光，於是被關進警察廳兩星期。吃着黑麵饅饅，受着蚊子臭蟲的圍攻，雖然只有兩星期，人卻是可怕地變瘦

（註一） 見「憶魯迅先生」。

（註二） 見「哭魯迅先生」。

了。同魯迅一直談到天亮，魯迅先生所要寫的文章，只能向後再說了。因為天亮了，他還須去再上課。但魯迅先生對此事，並不懊悔，他總好說：「四川青年真勇敢。」因為那位鍾青航正是四川人氏。』(註一)

對於敵與友，魯迅分得非常清楚，他時常注意到某人是 *foe*，某人是 *friend*，但他對於青年後輩卻往往總是不大提防的。有時，他也稍稍存著一點戒心，怕一些英雄豪傑們給他反戈一擊。

在北京，東城有一家法國點心舖，算是那時首屈一指的了，他在很難得的機會，才買一兩塊錢的蛋糕來請幾位親近的學生喫。有人便問他爲什麼不拿出來普遍地請客呢？他惋惜地說：

「你不曉得的，有些少爺真難弄，喫了有時反而會說我闊氣，經常喫這樣點心，不會相信我是偶然的。」(註二)

這是魯迅在社會上許多年來的多方的身受的經驗，這經驗教訓着他要在坦白的心胸上，留著一兩片必要的遮攔，這原是不不得已的事，但結果還是因為魯迅過分的忠厚，喫了類似這一些惡少的許多的苦頭。然而，他決不因此而灰心，有時，他似乎慨歎的說：

「中國多幾個像我一樣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個，中國不是這樣了。」

他更加緊自己的工作，不會有絲毫的懈怠。因爲工作的繁忙和來客的無限制，魯迅的起居是沒有定時的。大概平均每天到夜裏十一二時，客人才散去，客散後，如果沒有急待準備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書，二時左右就入睡了。他並不以睡眠而是以工作爲主體，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三兩小

時，衣裳不脫，甚至蓋被不用。就這樣，像兵士伏在戰壕休息下一樣，打一個盹，翻過身，醒了，抽一支煙，起來泡杯濃清茶，有糖菓點心呢，也許多少喫些，又寫作了。有時寫作興趣正濃，放下筆，直至東方發白，是常有的事。

誠懇、坦白、真實、率直、樸素，這一些人類中最高尚的品性，中國人傳統裏的最優秀的作風，自然而然的，毫不做作的在魯迅身上流露出來了；這，使得他成爲：在思想上是青年們的堅強的導師，在行動上是青年們的卓絕的領袖，在生活上青年們的親密的好朋友。

四三

六月中，「中國小說史略」^(註二)印行，這是他的近幾年來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現在把他印行出來，在這書的序裏，魯迅寫明這原因道：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於小說仍不詳。」

(註一) 見「魯迅回憶斷片」第一一七——一一八頁。

(註二) 請參看景宋先生：「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註三)

初印時分上下兩卷，上卷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印成，下卷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印成，後上下兩卷又交北新書局合印爲一冊，今通行之訂正初版，係一九三一年七月印行。「全集」第九卷第一四五—四五〇頁。收入者即以此爲根據。一九三五年有日譯本。

「此稿雖專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憶，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爲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終付排印者，寫印已屢，任其事者實早勞矣，惟排字反較省，因以印也。」

全書從小說之見於著錄起至清末止，分爲二十八篇，共考訂之詳，論斷之確，在中國小說史學這一方面可以說是開山之作，後來的人們雖然是因爲時代的關係，在材料上有許多陸續的新發現，但是大體上至今天卻沒有超越過魯迅的規範。書中的許多發前人所未發的真知灼見，在中國文化史上也可以說是創舉，魯迅從小說史這一個部門裏，他深深地發掘到了中國人的埋藏在封建社會的塵埃下面的靈魂。從這裏，對於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祕奧，可以得到許多新的正確的了解。

在這書印行之前，魯迅會做了許多準備工作，給這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古小說鈞沉」，「唐宋傳奇集」(註二)，「小說舊聞鈔」(註三)便是這書的附本或長編。「古小說鈞沉」裏所包括的是：自「青文子」到「旌異記」共三十六種唐以前的，古代小說的逸文；「中國小說史略」中的第三篇到第七篇的材料，大都是出自這裏。「唐宋傳奇集」是六朝以後的，唐、宋的單篇小說的總集，這本書所依據的是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珏排印本「琳琅祕室叢書」等本子，糾正了前人所校勘輯錄的「說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說」，「龍威祕書」，「唐人說薈」，「藝苑

摺華」等書的「妄製篇目，改題課人」的謬誤。這書的輯錄是非常的審慎的，在「序例」裏有這樣的規定道：「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煢燁，或本書已亡，亦不收采。」「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抉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僞欺。」「本集所取文章，有復見於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惟從其是，……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於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中國小說史略」中的第八篇至第十一篇的材料，大都是出自這裏。「小說舊聞鈔」是魯迅在講授中國小說史時所搜集的，關於宋、元以後的小說的史料的整理與清算，這一些史料都是他親手從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室等處，「廢寢懷食，銳意窮搜」時得來的。在這書之前出版的有蔣瑞藻氏的「小說考證」，是和牠的性質類似的；但在許多地方，二者卻是絕不相同的。在蔣氏的書中，體例是比較雜亂的，把有關於傳奇文的一部分也包括在「小說考證」裏，而這書卻把有關於傳奇文的這一部分撇開了。在蔣氏的書中所搜錄的史料，有很多是「未曾理析，核以原本」的，故書中字句與原本大有出入，而這書中所取的材料，除出於王圻的「續文獻通考」的，魯迅僅閱其「經籍考」者外，其餘的部份

(註一) 收入「全集」第十卷第一九五——五一六頁。這書的最後校訂是一九二七年，先生在廣州的時候；但先生開始編輯這本書的時間，恐係在「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以前。

(註二) 收入「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八六頁。這書的最後校訂是在一九二六年，但先生編錄是書，開始恐怕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在紹興會館的時候。

，魯迅皆曾「通觀全部」，「皆據自本書，未嘗轉販。」其他如「小浮梅閒話」、「小說叢攷」、「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辨」等書，通卷俱論小說者，自有牠們本身的價值在，「無煩披揀，冀省篇幅，亦不復采也。」「中國小說史略」中的第十二篇至第二十八篇的材料，大都是出自這裏。

全書的寫法，雖然沒有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但在這書中有許多地方所獲得的結論，卻達到了令人驚詫的幾乎接近真理的高度，魯迅的戰鬥的社會實踐加深了他的對於事物的觀察方法，從這書裏可以得到一個顯明的例證。除了魯迅的社會實踐的這一個因素，使得「中國小說史略」這書在寫法上得到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魯迅繼承了並且發揚了清代的學者們的治學的優秀傳統和科學方法。把「中國小說史略」估計作爲從顧亭林到章太炎的二三百年來的，樸學的治學方法的最高成果之一，這也不能說是過分。

由於「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向來的士大夫階級視小說爲閒書的觀念，被魯迅打破了；他確定小說在中國的文苑裏的以及在傳統的文學史上的價值，並且把他提高到應占有的地位。同時，由於這書的出版，後來的治小說史這門學問的人們，也得到了一個最好的榜樣。但不久，卻又得到了正人君子如陳源即西滄教授的筆伐了，他在「致志摩」的信裏面，寫道：

「他（指的是魯迅）——（善註）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鏗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

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此外，陳源即西澂教授在他的「閒話」裏，又提到了這事，並且還加重的說道：這是「整大本的剽竊」。

後來，在一九三五年，這書由日本作家增田涉先生譯成日文了，而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也早就被譯成中文了，這時，魯迅揭穿了這一個無恥的流言，他寫道：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裏，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澂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註一）

同月，又校「嵇康集」，並撰「校正嵇康集序。」（註二）對於嵇康和他的著作，魯迅感到極大的興

（註一）見「全集」第六卷第四四二——四四三頁。「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

（註二）收入「全集」第九卷第一五——一四三頁。這次的校正，在大體上算是成了定本；後來，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又曾以涵芬樓影印宋本，再校一過。

趣，在他初到北京，一九一三年住在紹興會館裏面的時候，就開始校勘「嵇康集」了，一九二一年再校「嵇康集」，一九二二年三校「嵇康集」，到這一年為止，是第四次了。這書是魯迅在京師圖書館中，從明「吳寬叢書堂」鈔本「亟寫得之」，取「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比勘」，復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注，「野客叢書」，胡克家翻宋元表本「文選」李善注，及所著攷異，宋本「文選」六臣注，相傳唐鈔「文選集注」殘本，「樂府詩集」，「古詩紀」，及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胡讚宗本「藝文類聚」，錫山安國刻本「初學記」，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等所引，著其同異。……而嚴可均全「三國文」，孫星衍「續古文苑」所收，則間有勘正之字，因並錄存，以備省覽。」經過了這樣的艱鉅的校勘工作，魯迅自己也認爲：「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善於此者矣。」

對於漢、魏、六朝的文化，魯迅是具有深刻的研究的，對於魏、晉的人物的風度，他也具有特別的愛尚，尤其是像嵇康這樣的剛毅不屈的有骨氣的，在陰險的統治者統治底下，到處都佈滿了爪牙的環境裏，而保持着自己的高風亮節不去隨聲附和的文學家，更從心底裏獻與以極大的尊敬。

七月七日（註二），應西北大學及陝西省教育廳之聘，並爲了要體味古長安的風光，以便着手寫作那計劃已久的歷史劇「楊貴妃」，往西安講學。同行者有王桐齡、胡小石、孫伏園、夏浮筠，……諸先生。他們之中，孫伏園先生對於這次經過，特別明瞭內中的情形，他寫道：

「魯迅先生對於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對於漢魏六朝的文化一樣，具有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

有許多望古遙集的學者或收藏家，不是說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觀，便是說「史漢」以下無好文章，他們甚至以爲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遺物不算古物；魯迅先生是受過近代科學訓練的人，對於某一時代的愛憎，絲毫沒有這種不合理的偏見。

「他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

「拿這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作背景，襯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戀愛心理學的研究結果作線索：這便是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年左右計劃着的劇本「楊貴妃」。

「魯迅先生的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爲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說，長生殿是爲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註二）

到了西安之後，便開始講演了。據那時正在陝西省署任職祕書的張辛南先生說，到處總是講着小說史：

「在西安講學的時候，魯迅先生所講的總是小說史。對於學生及教職員講小說史，對於督省兩署和各廳處的職員也講小說史，劉雪雅先生（陝督——辰）想請魯迅先生對西安的下級軍官士兵講演一

（註一）據林辰先生作「記魯迅赴陝始末」中引孫伏園先生的遊記「長安道上」所云。

（註二）見「楊貴妃」。

次，教我向魯迅先生商議一個士兵能了解並感覺興味的題目，魯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講說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因為我只會講小說史。」（註一）

「據我所想，小說史之講法，本來可淺可深，可嚴正，亦可通俗。」孫伏園先生對於這事作這樣的解釋，是最貼切不過的。

在講演的餘暇，魯迅便常和孫伏園先生等到各處遊動，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壩橋，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鋪，孫先生他們獲了很多的教益。

「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鋪，」孫伏園先生寫道：「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 \square 』者也許是『 \times 』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字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註二）

有一次，他們又上街了，張辛南先生追憶起一件瑣事來，他寫道：

「魯迅先生有工夫時，常到街上去遛躑。有一回他約了我們上街去買「魯吉」，我以爲他要買的是「滿雞」。……但到了南院門一家古董鋪，先生就問人家要「魯吉」，人家答應說「沒有」，又跑到北院門，看了幾家古董鋪，也沒找到。」（註三）

這所謂「魯吉」者，據後來孫伏園先生給張先生的信上說：「當年與魯迅先生到西安街上所買者

同「滿雞」之物，乃是「弩機」。此爲一種黃銅器，看去機械性十足，魯迅先生愛其有近代軍器之風，故頗收藏了好幾具（自北平古董鋪購得），形似今日之手槍，銅綠斑斑，極饒古味。惟用法則始終未明。據魯迅先生所云，當時必有若干皮帶與銅連繫，今已腐朽，無可辨認，即「弩機」之名，亦爲鑿賞家所定云。」

魯迅對於古代器物的知識之賅博，是十分令人驚佩的。

在西安，幾乎每家的園子裏都生長着一種白色的木槿花。這花原是極平常的植物，在別處只看見一株兩株，而且是紅色的居多，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樣白色一片是很少有的。孫伏園先生頗爲欣賞，他便對魯迅說了：

「將來，「楊貴妃」的背景中，應該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魯迅靜靜地向他望着，沒有什麼表示。按照着魯迅的脾氣，這沒有什麼表示是含有兩個意思：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無所感，而決不是有了一點平平常常的感想。但這一次卻是屬於否定方面的，他說：

「我不但甚麼印象也沒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點印象也打破了！」

（註一）轉引自林辰先生作「記魯迅赴陝始末」中之張辛南：「魯迅先生在西安」一文。

（註二）轉引自「記魯迅赴陝始末」中的引文「長安道上」。

（註三）轉引自「記魯迅赴陝始末」中的引文「魯迅先生在西安」一文。

「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美妙香扮賈寶玉。……」魯迅又這樣說道。所以他本來打算到馬嵬坡去的，但爲了避免看後的失望起見，於是他便不去了。

七月底，魯迅便提前轉回北京，在西安，他沒有逗留到滿了約定的日子，孫伏園先生也跟着回來。他和孫先生商量。只要够得旅費，他們就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這裏講學的酬金是一個月三百元），在陝西用掉。他們打聽到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於是就捐出一部分的錢給易俗社。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也主張多給錢。有一位先生卻反對說：

「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我以爲多給錢沒有意義。」

魯迅當時堵着嘴不說話，後來，他對孫先生說道：

「我決不贊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說，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

八月初，魯迅回到了北京。

四四

魯迅回到北京不久，九月裏，奉直兩系軍閥的第二次戰爭又爆發了。

自從一九二二年的奉直第一次戰爭以後，直系的軍閥和官僚在洋洋得意中統治了整個的北方天

下，奉系軍閥退出了山海關外，在表面上，戰爭算是停止了，可是，在實際上，他們之間的矛盾還是存在着，並且更加尖銳化了。由於直系軍閥們在武力上佔了上風，大英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在中國也就逐漸抬頭，這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不滿，於是他就遺餘力的扶助奉系軍閥，來和直系對抗。奉系軍閥的頭子張作霖覺得在這個時候，單是他們自己的力量，還不能够把直系軍閥打倒，於是他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策動之下，首先聯絡皖系的殘餘軍閥浙江盧永祥反對直系軍閥；同時南方的革命力量也願意加入他們的反直的戰線，這形成了奉、浙、粵三角同盟。不久，這一戰爭的前哨戰，在江浙爆發了。

江、浙之戰的導火線是上海區域的管轄權問題。上海是在江蘇省境內，而實際上卻由浙江督軍盧永祥管轄，這使江蘇督軍直系軍閥齊燮元不能容忍，於是就調動軍隊，準備奪取上海，同時又聯絡皖、閩、贛三省軍閥，採取包圍形勢，孫傳芳親自率軍由閩入浙，援應蘇軍，盧永祥在四面楚歌裏，宣佈下野，逃往日本去了。同時，正當江浙戰爭打得正熱鬧的時候，在北方，奉系軍閥以反對直系政客曹錕選爲藉口，對直系軍閥發動了戰爭。這次戰爭，雙方的準備都是非常充足的，在瀋陽和洛陽，漢陽兵工廠裏，都用重金禮聘外國技師，趕造殺人的武器，雙方動員的人數也各在十萬以上，規模之大向來所沒有的。

奉軍的大本營在錦州，分三路向關內進攻，直軍也分三路向關外迎戰，雙方在山海關附近大規模的接觸起來了。正在雙方相持之下，吳佩孚親赴前線督戰的時候，直軍第三軍軍長馮玉祥倒戈了，在

南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勢力影響之下，馮玉祥在十月二十三日忽然班師回京，發出和平通電，強迫曹錕下令停戰，孫吳佩孚總司令之職，自己組織國民軍三軍。南方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勢力開始伸入北方。新的和舊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正在垂死掙扎的和正在艱苦中誕生、成長的，也起了一個更劇烈的夾雜不清的糾纏。

魯迅在這個時候，開始寫作他的「野草式」的散文詩，「秋夜」——後來收集在「野草」(註二)中的第一篇，便在九月裏的一個夜間寫成了。接着「秋夜」之後，在同月內又寫成「影的告別」和「求乞者」。

十月三日，魯迅因為看到當時「阿呀阿育，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了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擬古的新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以「某生者」筆名投給「晨報副刊」，來和當時的所謂詩人們開玩笑。這時的「晨報副刊」編者是孫伏園先生，平時他經常來約魯迅向「副刊」投稿，對於魯迅的字體和筆跡，他是很熟悉的，所以魯迅雖然換了一個「某生者」的筆名，但他一看卻知道了這是魯迅投來的稿子，於是他便立刻拿去付排了。恰巧，也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留學生新從歐洲回來，他和晨報館的關係很深，對於「副刊」頗不滿意，在「正人君子」們的支持之下，決計要對於「副刊」加以改革，這天，孫伏園先生發過了稿子出去了，這位留學生便跑到排字房去檢查「副刊」的稿子，恰巧就看見了魯迅以「某生者」筆名寫的「我的失戀」這首打油詩，於是他就以不成東西為理由，不經孫伏園先生的同意，老實不客氣的把這篇稿子抽掉了。孫先生大為生氣，辭去了「晨報副刊」編輯者的職務。

「我辭職了。可惡！」他有一夜來到魯迅的家裏，見面第一句話便這樣說道。再過幾天，他提議要自辦刊物，魯迅當然是極端贊成的，這除去了別人因為他的稿子而辭職的，一塊壓在心上的沈重的石頭，他答應了願意竭力的吶喊。

十一月十七日，新的刊物誕生了，名字叫做「語絲」，每週出版一次。撰稿人十六位，都是孫伏園先生邀請來的。最初這刊物是沒有一定目標的，無所謂統一戰線；這十六位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如顧頡剛教授的便是考古的稿子，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代社會問題者卻是相反的。又有一些人，開始只是在敷衍孫伏園先生的和他們的交情，投了兩三回稿，便厭倦而遠之的態度離開了。後來，「語絲」的固定投稿者，至多只剩了五六個人，但同時也就在無意中形成了一個特色，那便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的；朦朧的然而卻又堅韌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在這五六個撰稿人中間，魯迅是最忠實最勤快的一個。從最初的發刊起，幾乎是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收集在「野草」內的全部的散文詩，差不多都在「語絲」上發表過，此外，還有一些論文、短評以及其他的創作和翻譯。

最初，「語絲」的影響是並不大的，而開辦者的努力，確是令人嘆為。除了孫伏園先生以外，李小岑、章川島諸位先生卻還是年青的孩子，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辦報紙，自己拿到大眾聚集處去

兜售，在幾個學校裏——尤其是北京大學的第一院，比較的還算風行。後來，銷路便一天比一天的好起來了，由一千五百份，而達到二千份，三千份，……五千份，再後來，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收支不但已足相抵，並且還有贏餘，在孫伏園先生另就了「京報副刊」編輯之職以後，李小峯便被尊爲「老板」了。撰稿者每月勸令他拿出贏餘中的一部份，請一同客。對於這種有宴會的場合，魯迅往往是避開的；因爲他對於這些場合不感到興趣，並且不願意和周作人在宴會上碰面。但他卻極力支持着這一件工作，以這刊物爲中心，魯迅組織了並訓練了一大批年青的文藝工作者和向舊社會挑戰的戰士們。同時，新文化和新文藝的思潮，藉此也推得更深遠了。

四五

接着「秋夜」這幾篇散文詩之後，在第二年（一九二五年）的一、二月間，魯迅又寫出了類似這種文體的作品：「希望」、「雪」、「風箏」、「好的故事」等四篇，都在「語絲」上發表。

此外，魯迅又在一九二四年的十月、十一月裏，寫出雜文「論雷峯塔的倒掉」，「說鬚鬚」，和「論照相之類」，（註一）在一九二五年的二月，作「再論雷峯塔的倒掉」和「看鏡有感」，（註二）以及應「京報副刊」的徵求，作「青年必讀書」（註三），對於國粹主義繼續加以猛烈的攻擊。

在歷史的進程中，和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作頑強而持久的戰鬥，是中國人民大眾爭取自身真正的

解放所必經的，不可避免和不可超越的，艱鉅的曲折複雜的過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迫切的任務，是每一個爲着民族解放、獨立、自由而奮鬥的戰士所應當追求與實踐的顯著的目的。因爲，假如不把這數千年來的根深柢固的壓在人民頭上，裝在人民腦子裏，混在人民血液中的封建制度和牠的在思想上的遺毒，予以根本的澈底的肅清，那末，另一種和這舊制度舊思想完全相反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在牠的發榮滋長的前進路上，必然地便要碰到那些層層相因糾纏不清的，龐雜凌亂而又腐朽的障礙物，阻止着新時代勇往直前的推進，有時，甚至於不但單是阻止而已哩，牠還想出了千方百計，做成了許許多多的圈套，企圖把歷史拉向後退的方向。國粹主義便是整個的封建社會中最迷人最動聽同時卻又最頑固的一個圈套。

遠在「五四」運動之前，在一九一八年，魯迅在他的發表於「新青年」雜誌上的「隨感錄」裏面，就已經開始攻擊國粹主義和國粹主義者們了。這之後，魯迅又在小說裏詳細地描繪出中國封建社會具體的面貌；繼續着這一系列的戰鬥，現在，他開始了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不單是赤裸裸的剝脫的工作，而是更深刻更澈底的發掘工作。他使用着這明顯鋒利而又有力的雜文，直接地來擊斷封建社會的根柢。這是魯迅的最優秀作戰方法之一。

(註一) 見「全集」第一卷第一五七——一七五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一七六——一八六頁。

(註三) 見「全集」第三卷第一八頁。

四月，又作雜文「秦末固談」和「燈下漫筆」。(註二)

在這一些雜文裏，魯迅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人性，和封建社會的歷史特質，作了一個精確的分析。

從杭州西湖上的雷峯塔被迷信的鄉下人天天挖去塔磚，以至於挖倒了這整個的古塔爲止的事實說起，魯迅指出了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由於長期的奴化的愚民政策的結果，一般人便養成了兩種極壞的性格：寇盜式的和奴才式的性格，真正的人性是罕見的。整個的封建社會長期地呈現着停滯狀態，而沒有絲毫新的建設；有之，那便是寇盜式的或奴才式的與新建設沒有關係的破壞。一般的愚昧的人民便生活在這混沌的沒有生氣的社會裏，過着被蹂躪被奴役的日子。在苟且偷生的生活方式之下，便學會了逆來順受的奴才性格；也有不安於做奴才的，但他們卻又一變而爲極端殘忍和兇暴的，蹂躪和虐殺奴才的寇盜了。這一種奴才式的性格表現的例子，就如雷峯塔的塔磚被人撿掉，龍門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的插圖，往往被人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這一種破壞的原因，卻並不在有志革新，而爲着目前極小的自利，不惜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以創傷。寇盜式的性格表現的例子，則像那些軍閥們，懷着極端的兇惡的殘酷心理和極端貪婪的佔有慾望，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佔爲己有，否則就完全毀掉牠。所以當他們洋洋得意的時候，便浩浩蕩蕩的到處攘奪，而在他們失意的時候，卻又到處焚燒，殺人如麻，似乎連雞犬也不留給在這世界上的他們的敵手了，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瓦礫。魯迅，當他分析了這兩種性格和心理之後，提

出了嚴重的警告道：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爲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接着，魯迅便去追尋造成這兩種人性的原因，他發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特別性質，那便是整個的社會和人民長期的停滯在愚昧和落後的封建主義的狀態裏。封建君主的殘酷的統治，是造成社會和人民落後的一個原因，在專制君主的暴政底下『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另一個原因便是受了作爲這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利益的辯護人的國粹主義者們的，整天所謳歌禮贊的『固有文明』的羈縻和束縛。優游於神祕的東方的所謂『固有文明』之中，人們暫時忍受或忘掉現實給予他們的創痛，或者是他們在現實社會遭受了劇烈的創痛，卻反而向虛無飄渺的『固有文化』中去求虛無飄渺的安慰，這樣，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便形成了這不進取的墮落的性格。由於一般人民養成了這樣的性格，和社會形成了這樣的風尚，如此，牠們便轉過來影響到或阻止了下層的經濟結構的變革了。如此，中國數千年來顛倒錯亂的，始終停止在封建社會這一階段的歷史，和這歷史所產生的災難，便繼續不斷地演

變下去，似乎演變到無窮無盡的樣子。魯迅揭穿了這歷史底祕奧，並且提出改造這歷史的呼聲道：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

「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真正的『人』的時代，是不曾有過的。

『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魯迅又繼續說道。

而國粹主義者們是見不到這一些的。他們閉起眼睛，信口昏說，異口同聲地來粉飾這社會現狀是怎樣的合理，所謂『固有文明』又是怎樣的美妙，鮮血淋漓的喫人的罪惡，卻被置之九霄雲外了。魯迅攻擊着這激頭激尾地保護着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國粹主義者們，捧爲法寶的『固有文明』，道：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是使中國一切人們（這當然是指被壓迫階級以外的人們——舊註）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

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現代青年們怎樣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怎樣去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時代呢，這當然要根本地改造中國的封建社會。要根本地改造這一個社會，首先必要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的個性的澈底的解放。

中國的現代青年們應該毅然決然地擺脫一切舊有的羈縻和束縛，義無反顧的走向一個新的方向去。在答覆『青年必讀書』這個問題裏，魯迅給予了這樣的一個指示，他說：

『我以爲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他又說：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註一)

他又說：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

都踏倒他。」（註一）

堅決地給予那含着許多毒素的舊有文明以澈底的否定，在思想上先解除敵人的武裝，這是必要的現實的工作。雖然，因此，在當時魯迅也會遭到多方的非議與責難，但是，從具體的歷史環境說來，魯迅所提出的主張，並沒有謬誤，而是非常正確的，具有時代意義的。

四六

與後兩篇雜文同時，魯迅又作類似散文詩情調的獨幕劇「過客」，和兩個短篇小說「長明燈」與「示衆」（註二），五月，又寫出另一短篇小說「高老夫子」。（註三）在這幾篇小說裏，魯迅所要暴露和攻擊的對象，也還是封建主義和由牠產生出來的愚昧和落後的現象，以及虛偽和假作正經的騙局。

「長明燈」中所描寫的是住在吉光屯這村裏的人們愚昧和無知的情形。在他們這村裏，據說有一盞從梁武帝時候起便一直傳下來的長明燈。他們把牠好好地供在廟裏，誰也不敢去動牠，就是在「長毛」造反的時候，也不會熄過；一熄，這裏就要變成海，人們就都要變泥鰍了。這村裏忽然出現了一個冒冒失失的小孩子，他卻要走到廟裏去把這燈吹熄，因此，便引起了全村裏的人們大大的不安。各人發出各人的議論；有的主張除掉這個孩子，有的主張把他送進縣衙門，說他忤逆罪，有的主張還不如用老法子騙他一騙，把這燈用厚棉被遮起來，對他說是這燈已經熄了。最後，他們商量定了一個妥當的辦法，誰也不會沾染半點禍祟，他們大家把這孩子關在廟裏的一個空房間裏，這房間只有一個

小房窗，粗木直柵，決計挖不開的。於是，天下便從此太平了，暮色中，綠瑩瑩的長明燈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龕，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柵裏的昏暗。而在這廟裏的西廂房外面，卻看見了一隻手扳着木柵，一隻手撕着木皮，柵欄裏兩隻眼睛閃閃地發亮。

封建勢力的糊塗、膽怯、軟弱無力，在這裏都被表現出來了，然而，同時，新興的反封建的革命幼苗卻也就被這腐敗的空氣窒息住了，枯死在這污穢和黑暗的泥沼裏。

在「示衆」裏，魯迅刻劃出來的具體形像，和「長明燈」裏所表現的，是非常相像的。犯了罪的人被牽着在街上示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閒得無聊的人，靈魂停滯得幾乎發臭的人，大家都圍得來看了，他們想從這一件新奇的事件當中找一點新奇的刺激。而結果是什麼呢，依然是無聊的來了，來了又無聊的散了，留下來的仍舊是寂寞和空虛。像夏天中午的太陽底下的植物一樣，整個的社會是懶洋洋的，生活在這社會裏面的人們是懶洋洋的，在這樣的懶洋洋的社會裏，在這樣的懶洋洋的人們生活當中，像類似示衆這一類的事，便成爲他們的消耗生命的，幾乎是天天發生的而又幾乎無事的悲劇了。這是非常可憫的事。

從另一個方面，描繪出封建主義的無力以及作爲這封建勢力的保護人國粹主義者的腐敗和墮落，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五一頁。

(註二) 見「全集」第二卷第二〇六——二二〇頁。

(註三) 見同上第二三一——二四四頁。

魯迅創造了一個高老夫子。

偽善者高老夫子是一個流氓社會裏的吃酒打牌的人物，但他卻愚不安愚，在一家報紙發表了他的論「中華民國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的膾炙人口的名文，並且又謀了一個在賢良女學校歷史教員的地位，要到這學校教書去。可是，在沒有上課之先，他就慌了。他翻開歷史教科書想來預備教材了，但他卻越預備越糊塗，最後，他在昏昏迷迷的狀態裏被引上了講堂。行了禮，定一定神，他慢慢地翻開書本，來開講『東晉之興亡』這節書。

『嘻嘻！』他聽到了似乎有誰在下面偷笑了。

高老夫子臉上登時一熱，忙看書本，和他的話並不錯，上面印着的的確是：『東晉之偏安』。在書腦的對面，他瞥見了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沒有什麼動靜。他猜想這是他自己的疑心，其實誰也沒有笑；於是又定一定神，看住書本，慢慢地講下去。當初，他自己的耳朵還聽到自己的嘴說些什麼，後來，便逐漸糊塗起來，不知說些什麼，等他發揮『石勒之雄圖』的時候，又聽到吃吃的笑聲了。他不禁向講台下一看，情形和以前不同了：半屋子都是眼睛，還有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兩個鼻孔，這些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而深邃的海，閃爍地汪洋地正衝着他的眼光。但當他瞥見時，卻又驟然一閃，變了半屋子蓬蓬鬆鬆的頭髮了。他連忙收回眼光，再不敢離開教科書。萬不得已，就抬起眼來看看屋頂，那屋頂中央的圓形的稜線又動起來了，忽然擴大，忽然收小，使他眼睛有些昏花。他不敢向下看去，怕遇到眼睛和鼻孔聯成的海，只好把目光回到書本上，這時已經是一

灑水之戰」，荷堅快要駭得「草木皆兵」了。他總疑心有許多人在暗暗發笑，但他熬着講下去，一會兒，又到「拓拔氏之勃興」了，接着是「六國興亡表」，他本以為今天未必講到，沒有預備的，於是，他只好中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這樣罷。……」他惶惑了一會之後，才斷續地說，一面點頭一面跨下講台，便出了教室的門。

「嘻嘻嘻嘻！」他似乎聽到背後有許多人在笑，又彷彿看見這笑聲就是從那深邃的鼻孔的海裏出來的。

高老夫子從學校回到家裏，許久之後，有時全身還驟然一熱；又無端的憤怒起來了：覺得學堂確乎要鬧壞風氣，不如停閉的好，尤其是女學堂，——有什麼意思呀，喜歡虛榮罷了！於是，他便似乎很有理由，並且非常清高地把賢良女學校的聘書退了。

各事安排妥當，他戴上紅結子的秋帽，便往他的賭友黃三家裏去了。在大罵女學校一通之後，便坐上了牌桌，待到他打完了第二圈馬將，快要湊成「清一色」的時候，這才心平氣和下來。

口口聲聲地主張中華民國皆有整理國史義務的角色，便是一幅這樣的真實的嘴臉；如此國粹，實在可憐煞人。

在這三篇小說裏，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又有一點稍稍的改變，在「幸福的家庭」和「肥皂」裏，他是偏重於個人心理的細緻的描寫的，而現在，在「長明燈」和「示衆」裏，他卻想描寫出這整個

的封建社會底落後和愚昧的面貌。所以，他在選擇主題的時候，他採取了的不是生活在封建社會裏的人物的身邊故事，藉此發展開去，如在「肥皂」這篇小說裏，從「肥皂」這個問題深掘出道貌岸然的四銘的卑怯來；他所採取的是發生在封建社會裏的一件事件的全體，以這事件作中心，他描繪出發生這樣事件的社會面貌，以及參與這事件的人們的愚昧、無知、與可憫。曲折、細緻、偏重於個人心理描寫的作風勢必要改變了，代替牠的是用明快、清晰而又簡練的比較粗一些的線條，勾出一個社會的輪廓。「高老夫子」的作風和「長明燈」、「采藥」又稍有不同，牠在某一些方面，倒是和「肥皂」的作風有點相似的。對於這封建社會的愚昧無知的悲憤和憐憫，魯迅發出了幾乎是絕望的，由熱情而變爲冷靜以至於死靜的，冷靜到殘酷程度的諷刺。這和舊俄時代的文學大師們所謂「含淚的微笑」是不同的，在這裏，魯迅不但把笑影收斂起來了，他把那因苦痛而流出的眼淚也都收斂起來了，而是含淚的微笑之後的低徊的歎息，或絕望的大叫。

四七

當魯迅發表這一些短篇小說的時候，也正是中國人民大眾正在度着極度不安的煎熬的日子，同時，他們也正在醞釀着偉大的變革的日子。在魯迅的「高老夫子」發表不久，在同月內，「五卅」事件發生了，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們顯出他們的獍狴的面目，開始屠殺中國的工人以及同情他們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這表示着國際帝國主義者們和中國人民大眾——尤其是勞動的人民大眾的衝突，更

加尖銳化了。遠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中國的工人階級就顯示出他們的存在了，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間便成立了他們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站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線，爲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的事業而努力。一九二三年的「二七」事件中，他們便領導起來大多數的人民，進行反對國內的軍閥和軍閥們的背後的主人國際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在他們的這一個革命的進步的勢力影響之下，在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年間，中國國民黨也重新改組，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這奠定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反帝反軍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而形成了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五卅」便是這一次大革命的先聲。以工人階級和他的政黨作爲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向全國各個階層發出熱烈的偉大的號召，在爲着整個的人民解放事業的旗幟之下統一起來，向國內的封建軍閥國際的帝國主義者進軍。

在新興舊的鬥爭當中，舊的是不會投降的。和這相反，倒是在他們的垂死的最後掙扎當中，他們是更加刻毒和陰險的，對於新生的力量的迫害，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這樣的一個錯綜複雜的鬥爭，在各方面都表現出來。這時，魯迅直接參加的，是鬧得北京學界瀟風雨的「女師大」的事件。在這事件裏，一面是代表着封建軍閥勢力的教育總長章士釗，以及他的幫忙的「正人君子」如陳源即西澂之流，一面是代表着新興的向上生長的勢力的魯迅和青年學生們，以及其他的民主戰士。壁壘便是這樣的對立起來了，鬥爭也就是這樣的震盪。

五月七日，由教育總長派來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女士到校了，她一到校，便和學生們直接衝突起

來。這之前，女師大的學生們早已表示過了她們自己的意見，她們不願意楊蔭榆來做校長；而當時的反動的教育官僚卻硬要支持着楊蔭榆，把學生們的意見壓制下去。這樣，雙方相持不下，校長沒有正式到校，校內的職務由致務長薛某代理，用延宕的拖的辦法，以不了了之的辦法來對付這件事。然而，這事終於得不到一個解決。現在，楊蔭榆親自到校，雙方於是便正式衝突起來了。同在五月七日這一天，教育總長章士釗的貴府上，也遭受了學生的襲擊。這樣，雙方的衝突便尖銳化起來，黑暗的反動勢力對於學生們的壓迫也就更加厲害起來。在這之後，學生們便有的被捕，有的失蹤了。這時，楊蔭榆也趕到外面開會，請客，五月九日以學校評議會的名義把學生自治會代表六人開除了。於是全校譁然，學生們更加堅決地拒絕楊蔭榆來做校長。於是，在軍閥和官僚豢養之下的「正人君子」們便走出來指手劃腳，說長道短的了。魯迅給他們以有力的打擊。他寫道：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並羊而不如。現在託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僱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麼？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羣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麼？而幾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生長的男人們，此時卻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面前搖尾，簡直並羊而不如。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於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註）

學校的事情便就是這樣停頓下來，學生們的求學機會被攔起了。學生自治會發出一個通告來，略

謂：

「句除以來，校務停頓，百廢（「全集」內引文作「費」字，恐誤。——菁註）待興，若長此遷延，不特虛擲數百青年光陰，校務前途，亦岌岌不可終日。……」

接下去，下面是說請教員們開一個會，出來維持這個學校的意思的話，訂的時間是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鐘。

魯迅接到了這封信之後，當天下午就去了。四點半他進了陰慘慘的校門，又走進教員休息室。出乎意料之外！除了一個打盹似的校役以外，已有兩位教員坐着了。一位是魯迅曾見過幾面的，一位是不認識的。魯迅和他們在一處坐下了。

「先生的意思以為這事情怎樣呢？」這不相識的教員在招呼之後，看住了魯迅的眼睛問。

「這可以由各方面說，……你問的是我個人的意見麼？我個人的意見，是反對楊先生的辦法的。」

……魯迅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位先生便將他那靈便小巧的頭向旁邊一搖，表示不屑聽完的態度。

「就是開除學生的處罰太嚴了。否則，就很容易解決。……」魯迅沒有管他的，還要繼續說下去。

「噫噫。」他不耐煩似的點着頭。

魯迅就默默地點起火來吸烟捲了。

「最好是給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這位先生又開始發表他的「冷一冷」的學說了。

（註一）見「全集」第三卷第六六頁。

「噫。瞧着看罷。」魯迅也不耐煩了，也點着頭，加上了這句話。

在他的坐前一張印刷品出現了，魯迅拿來一看，不覺地毛骨悚然起來了。那紙上面印着的是：

「……第用學生自治會名義，指揮講師職員，召集校務維持討論會，……本校素遵部章，無此學制，亦無此辦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鬧潮以來……不能不籌正當方法，又有其他校務進行，亦待大會議決，茲定於（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時，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務懇大駕蒞臨，無任盼禱！」

下面署名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這之下，還有一個「啓」字。魯迅憤然大怒，要尋求質問的對象了，舉目四顧，只見兩個教員，一個校役，四面磚牆帶着門和窗門，而並沒有半個負有答覆的責任的生物。這默默地陰森地四周的牆壁將人包圍，現出險惡的顏色。

一會兒，兩個學生來請開會了；校長婆婆終於沒有露面。魯迅走進會場去，這時連他已經有五個人，後來又到了七八個。於是乎開會。魯迅說明了他所以來校的理由，並要求學校當局對於今天縮頭縮腦辦法的解答。然而，舉目四顧，只有媳婦兒似的學生們和西賓，磚牆帶着門和窗門，而並沒有半個負有答覆的責任的生物！

魯迅知道這是碰了壁。

碰壁，碰壁！魯迅知道他碰了楊家的壁了！他看到這時的學生們，就像一羣童養媳。……

這種會議照例是沒有結果的，幾個自以為大膽的人物對於婆婆稍加微辭之後，大家便走散了。

待到魯迅回到家裏，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而陰慘慘的顏色卻漸漸地退去，回到下午碰壁的事，他微笑起來了。

他想到：此刻太平湖飯店之宴恐怕已近闌珊，大家都已經喫到冰其淋，在那裏「冷一冷」了罷。

……

他彷彿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着桌子都喫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似的學生們，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脚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命運。

他的眼前又似乎幻出飯店裏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殺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汗穢酒滿風籟琴，……。

魯迅吸了兩支烟，他抓起了筆，寫下了他的雜文。

這事的三四天之後，七個教員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發表了宣言，聲明對於這事的態度，魯迅便是其中的一個。這回的反響可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陳源即西滬教授就在他的「閒話」第一段中特地加以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只論學潮，和宣言無關。故意裝出公正的嘴臉，在這「閒話」裏，陳源即西滬教授寫道：

「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

但接着，在他的「閒話」裏，又從宣言中摘出他所認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他覺得「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遂以為「可惜」了。但他又說「還不信我們平常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這點子是原來就有的——普註）風潮」，這是非常別致的論調。魯迅給予他以適當的有力的還擊，他寫道：

「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域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牠。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啓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揮於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註）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只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澧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面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這是引用「閒話」裏的話——普註）可惜的是西澧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閒話」之後，才知道西澧先生們原來「常

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朶，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閒話」的前半，即西澧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爲「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的義務」了。爲什麼呢？一者報上兩個袒反的啓事已經發現（校長的「致全體學生公啓」和學生們反對她的啓事——附註）；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一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爲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澧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譁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閒話」裏的 and 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爲「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裏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摘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爲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

（註一）此係陳西澧和楊蔭榆而言，因爲他們同是蘇州人。

寡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局外人那裏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召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澧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爲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麼打掃得乾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麼？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蟲蛆成塊的，打掃夫又怎麼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在黑幕中，隔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竊了『臭毛廁』，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註一）

在雜文「我的『籍』和『系』」裏，魯迅更加明顯地揭穿了「正人君子」如陳源即西澧教授的陰謀和詭計，他寫道：

「我確有一個『籍』，也是各人各有一個的籍，不足爲奇。但我是什麼『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怎麼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細想；終於也明白了，現在寫牠出來，庶幾乎免得又有『流言』，以爲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爲應付某國某君的囑託（按即俄國王希禮君，他曾把「阿Q正傳」譯成俄文——菁註），我正寫了一點自己的履歷，第一句是「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一家姓周的家裏」，這裏就說明了我的「籍」。但自從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後，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幾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這樣的一個「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確的，至於「挑剔風潮」這一種連字而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沈默，否則立刻犯了嫌疑，至於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澤先生者也來代爲「可惜」呢？那麼，如果流言說我正是鑽營，我就得自己鎖在房裏了；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確是這樣做過了，還留下些什麼「空穴來風，桐乳來巢」的鬼格言。可惜我總不耐煩敬步後塵；不得已，我只好對於無論是誰，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尊敬」……

「人類是進化的，現在的人心，當然比古人的高潔；但是「尊敬」的流毒，卻還不下於流言，尤其是有人裝腔作勢，要來將這撤去時，更足使乏人和白癡惶恐。我本來也無可尊敬，也不願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時候，又被人捧下來。更明白地說罷：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纔還有點像活在人間；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於我倒是一個冷嘲，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

加侮辱，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麼，則使我感到將要嘔噦似的惡心。然而無論如何，「流言」總不能嚇啞我的嘴……」（註一）

這件事情還是拖下去，學校還是停頓着，一直拖到了放暑假，學生們紛紛回家，於是告一段落。在這一次戰鬥當中，魯迅認識了景宋女士，並且在情感漸漸接近起來。

四八

暑假期間，各學校雖說放假了，在北京，那蓬蓬勃勃的學生的愛國運動的浪潮，仍舊繼續不斷地向上高漲，這使得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走狗們大爲惶恐了。於是也就一個一個走出來爲他們的主子申辯。「詩哲」徐志摩先生站出來說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陳源即西滬教授站出來說了：『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那末，中國人就應該不去打倒帝國主義，就應該被打而不作聲了，就應該馴伏得像牛馬一樣了，誠如這一些先生所訓誡的。魯迅卻堅決地反對這個，扯下他們虛偽的面幕來，斥責他們的陰險刻毒的居心，並且隱隱約約地給中國人民指出了自己的道路，他寫道：

「無論是誰，只要站在『辯護』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護。」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

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到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爲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會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卻並不被稱爲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尋求公道。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爲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註二）

壓迫中國人民大眾的不僅是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國內的統治階級也是同樣地壓迫着勞苦羣衆，魯迅又更進一步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又寫道：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僞文明人的真面目顯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爲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銜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爲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是爲奇呢？」

「自家相殺和爲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爲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註三）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八七——八九頁。

（註二） 見同上第九二——九三頁。

（註三） 見同上第九六——九七頁。

魯迅對於中國人民大眾提出了這極尖銳的警惕。接着，他又寫道：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爲「排貨」復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註一）

什麼是「別樣的工作」呢？那便是魯迅已經做出了一個榜樣來的，堅決地澈底地持久地反對國際的帝國主義，國內的軍閥官僚，以及作爲他們的走狗的『正人君子』，歐化的紳士和大小官辦們。這工作，以往魯迅做過了，現在，魯迅正做着，將來，魯迅將比任何一個人做得更英勇、更勤快。

暑假過去了，新的學期開始，八月一日楊蔭榆率領武裝入校，把反對她的學生毒打了一頓，有的，並且被拖出校外，暫時沈靜下去的女師大事件又鬧起來了。他們在事前就尤有一個詳細的佈置的。這之前，在她沒有到校之先，楊蔭榆便得到教育總長的支持，在新平路十一號另租房子，積極準備招生，繼續把女師大事件擱起不問，學生方面也往各教帥處接洽，結果是由在北京的四位主任出面，親到教育部催促早日處理解決校事，但是，教育部還是故意拖延，暗中支持楊蔭榆，想把學生們壓下去。現在，他們便實行他們的預定計劃了。反對楊蔭榆的學生們被驅逐出校了，但她們卻並不屈伏，還是和校方繼續抵抗。她們便在宗帽胡同另租房子，請同情他們的教員來上課，魯迅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北京的一班反動勢力，對於魯迅是恨透了，教育總長章士釗借著這一個機會爲口實，八月十二日免掉了魯迅的在教育部僉事的職位，理由是：魯迅參加了女師大的校務維持會。在他的命令裏，說

道：

「……又該偽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爲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係有意抗拒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於八月十二日，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執政明令照准……」

魯迅於是乎也就「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爲委員，係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先預知將舉樹人爲委員而先爲免職之罪名耶？……」

魯迅於是乎向平政院對於章士釗提起訴訟，控告章士釗非法免職，因爲，就是按照官僚規矩，章士釗也沒有權力免去魯迅的職務的。這之後，魯迅更擴大了戰鬥場面，把筆鋒直接地轉向着章士釗，竭力攻擊他的反動的堅壁清野主義的整頓學風運動。同時，也沒有放棄揭露楊蔭榆的配合着整頓學風運動的，寡婦主義的教育的罪惡。

他寫道：

「新近，我在中國社會上發現了幾樣主義。其一，是堅壁清野主義。

「『堅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素業，所以這話不是從兵家得來，乃是從別的書上看來，或社會上聽來的。……」

「中國雖說是儒教國，年年祭孔；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丘未之學也。」但上上下下卻都使用着這兵法；引導我看出來的是本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詩註）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據說，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學生往游藝場和公園；並通知女生家屬，協同禁止。自然，我並不深知這事是否確實；更未見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當局之意，是因為娛樂場中的「有傷風化」情事，即從女生發生，所以不許其去，還是只要女生不去，別人也不發生，抑或即使發生，也就管他媽的了。

「或者後一種的推測庶幾近之。我們的古哲和今賢，雖然滿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口無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結果是：收起來。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專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二，是器宇只有這麼大，實在沒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經濟法，只有將錢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樣。古聖人所教的「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就是說子女玉帛的處理方法，是應該堅壁清野的。

「其實這種方法，中國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過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見男人和賣氣力的女人，很少見所謂上流婦女。……至於一到名儒，則家裏的男女也不給容易見面，霍渭涯的「家訓」裏，就有那非常麻煩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構造圖。似乎有志於聖賢者，便是自己的家裏也應該看作游藝場和公園；現在究竟是二十世紀，而且有「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的教育總長，實在寬大得遠了。」

……
「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爲之事，「收起來」卻是管牢監的禁卒哥哥的專門。況且社會上的事不比牢監那樣簡單，修了長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溝高壘，都沒有用處的。……

「總之，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以「收起來」爲改良社會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車往奉天。這道理很淺顯；壁雖堅固，也會衝倒的。……

「其實，「堅壁清野」雖然是兵家的一法，但這究竟是退守，不是進攻。或者就因爲了這一點，適與一般人的退嬰主義相稱，於是見得志同道合的罷。但在兵事上，是別有所待的，待援軍的到來，或敵軍的引退；倘單是困守孤城，那結果就只有滅亡，教育上的「堅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麼呢？照歷來的女教來推測，所得的只有一件事：死。」（註一）

什麼是寡婦主義呢？這「寡婦」二字，按魯迅的意思，應該用純粹的中國思想來解釋，不能比附歐、美、印度或亞刺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決不宜意譯或神譯，只能音譯：Widowism。這「寡婦」二字，應該包括和丈夫死別的「寡婦」，以及和丈夫生離的和不得已而抱獨身主義的「擬寡婦」。尤其是「擬寡婦」之類的人物一掌握到教育大權，而青年女子之遭災，就遠在於往日在道學先生治下之上了。

魯迅揭穿了他們的醜態，寫道：

「至於因爲不得已而過着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有着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歐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維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內侍），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別的獨身者也一樣，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等都可憎，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便生恨惡。尤其是因爲壓抑性慾之故，所以於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嫉妬。其實這也是勢所必至的事：爲社會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裝作純潔，但內心卻終於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牽掣，不自主地蠢動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學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養媳或繼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覺得萬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與此輩正相反。……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婦人，那裏能想到這些事；始終用了她多年鍊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爲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爲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被學生反對，專一運用這種策略的時候不待言，雖在平時，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國本是流言的出產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這些流言作談資，擴勢力，自造的流言尙且奉爲至寶，何況是真出於學校當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價值地傳布起來了。」

「……因爲人們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這樣的不同，所以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裏，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陰沈，她們卻以爲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爲，非如她們萎縮，她們卻以爲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

是極其「嫻順」的，以她們爲師法，使眼法呆滯，面肌固定，在學校所化成的陰森的家庭裏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拜領一張紙，以證明自己在這裏被多年陶冶之餘，已經失了青春的本來面目，成爲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會上做佈道去了。」（註二）

這是一種如何抹殺個性和戕賊人性的教育！在這樣的教育總長和這樣的「擬寡婦」校長治下會有多少青年遭受了無窮的毒害，現在，魯迅把他們刻毒和陰險的面目揭露出來了。其實，像這樣的辦着殘害青年的教育的，並不止章士釗和楊蔭榆，一直到現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章士釗和楊蔭榆是可以被看作普通的名詞的。

在這場險惡的鬭爭中，魯迅付出了極大的精神。工作緊張的時候，往往犧牲了自己的睡眠，整天整夜地在工作着。要是工作得實在太疲倦了，就隨便的倒在牀上合一合眼，翻一個身，起來，抽了一支煙，泡一杯濃茶，又開始工作了。「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顛動」，「立論」，「死後」，「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臘葉」，幾乎是散文詩「野草」裏的全部作品，都是在這種狀態之下寫成的。他吸煙吸得很多，每天總在五十支右，左工作越忙，越是煙不離手，這煙有時候是一半吸掉，一半是燒掉的。他飲茶也飲得很多，用一隻有蓋的舊式茶杯，每飲一次泡一次，很濃很苦的清茶，但遇到工作太忙了，沒有工夫飲茶，茶便冷了，他於是又泡一杯，除了煙茶之外，有時，他太氣悶了，他便拚命的喝酒。這大大的損害了他的健

康。許多愛護先生的青年們，時常到魯迅家裏來的學生們，就鬧着不許他喝酒，要求他戒煙，景宋女士是其中最關心的一個。她鼓勵着魯迅，希望他努力工作，不要鬆懈，不要怠忽；但又更愛護着魯迅，希望他多加保養，不要過勞，不要太發狠。這是不能兩全的，這是一個矛盾，然而，就在這矛盾裏卻正交織着廣大而深切的愛情。

四九

就在這場鬭爭最劇烈的時候，一九二五年十月，「莽原」週刊發刊了，這是「語絲」之外的另一個團結在魯迅周圍的青年文藝工作者的團體。這團體的主要人物是；長虹、尚鉞、向培良，……諸位先生。老早，魯迅就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現在編印「莽原」週刊作爲發表意見的地方。

對於每一個青年人，只要他有一點特長，魯迅總是念念不忘地注意他，想盡了方法幫助他。這之前，在「語絲」上就有好多新的作家出現了，現在，魯迅又竭力地推薦了另一些人物，對於他們，魯迅不懷絲毫的成見，就連那有人在孫伏園先生去職以後的「晨報副刊」上天天吹噓的沈從文，魯迅也還時時提到，唯恐編輯埋沒了他。可是，當他不向好的路上走，用休芸芸的筆名寫些無聊的小說，到處投稿的時候，魯迅便斥退了他。

有一次，魯迅的一個學生李霽野先生到先生家中來玩了，見他的神色很不好，於是便問起魯迅來

了；然而他卻並不介意的答道：

「昨日校長虹的稿子，吐了血。」

對於不相識的青年朋友，魯迅也是一樣的熱心；甚至於因為他過分的熱心，而遭了無端的譴責。他對鄭振鐸先生曾經說過：

「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我改了，我仔細地改得很多，不料那位青年卻寫信來罵我一頓，說是被塗改太多了。後來，他又寄一篇稿子來，我又替他改了寄回，這一次回信，卻又責備改得太少。」

雖然有許多惡少對於魯迅不了解，但他卻從不記仇的，往往是一笑置之。

和「莽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成立而又彼此互相呼應的是未名社。這一個文學團體，差不多也是魯迅一手扶植起來的。最初，社址設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對面的一個公寓裏，實際上就是在韋素園的一間小小的住屋裏，因為他的身體不大好，因此天然的便輪到他守寨。魯迅在北天下課後，常常到那裏去談天。假使在喫飯時候，偶爾也就在那裏喫飯了。在公寓裏，飯菜是非常壞的，而魯迅只願照樣喫，添點菜他便極爲不安。有時，在閒談裏，有人會向他說：

「先生上課覺得有興趣嗎？」

「那配教什麼哩，不過很歡喜年青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鐘也是還樂於去教的。」魯迅忘掉了他自己，對他們回答說。

寫着鼓勵青年朋友們努力寫作或翻譯，並且能够增加他們這種勤懇努力的興趣，和顯示他們辛辛苦苦的工作的實績，魯迅計劃着出版兩種叢書：一種是專收翻譯作品的「未名叢刊」，另一種是專收文學創作的「烏合叢書」。先後印行的，「未名叢刊」有：魯迅自己譯的「工人緩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桃色的雲」，……等書。爲別人校訂的有任國楨譯、蘇聯格沙克等論文「蘇俄之文藝論戰」（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胡敦譯、蘇聯A·勃洛克作長詩「十二個」，董秋芳譯俄國V·但策珂等作短篇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韋叢燕譯、俄國F·陀思妥夫斯其作小說「窮人」，李露野譯、俄國I·安特來夫作戲劇「黑假面人」，……等作品。「烏合叢書」有：魯迅自己的「吶喊」，爲別人校定的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故鄉」，長虹作雜文集「心的探險」，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飄渺的夢」，……等創作。

這一些書籍的印行，多半是經過魯迅校閱過的。他不但對於自己的翻譯和創作，親自來校閱訂正，對於別人的作品，是一樣的，他也往往親自動手校訂。有時，他還把這些工作經驗教給青年們，例如他舉出：在一行的頂上一格不要排着無所屬的標點符號，便是一個例子。他的工作是非常仔細的，在他校過的印稿裏，想找出一個疏忽的地方是不容易的。談起來，他會故意自傲的笑着說：

「你看，年紀和經驗倒是有用處的了！」

對於書籍的裝訂，魯迅也費了一番心血。他主張：第一，每本書都是毛邊子，書店不要先把邊子切掉，由讀者自己隨着隨裁，看完了一本書，假如書邊緣髒了，然後再把這邊緣切掉，這書還是和新

的一樣。其次，書的每頁的天地要留得寬些，使讀者看來心裏舒服些，而不要每頁都排得滿滿的，是字，令人有狹窄之感。此外，在書的前面或後面多留些白紙，給讀者讀完之後有抒寫自己意見的地方。

對於書籍的售價，魯迅也經常加以注意，主張標出實價，以免一般唯利是圖的書商蒙弄老實的讀者。甚至於廣告，也都是出自魯迅自己的手筆，寫得極端的樸素而又真實，不加半點吹噓，恐怕讀者因此而上當。「未名叢刊」的廣告便是這樣的：

「所謂『未名叢刊』者，並非無名叢書之意，乃是還未想定名目，然而這就作為名字，不再去苦想牠了。」

「這也並非學者們精選的寶書，凡國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費，便即付印，想使蕭索的讀者，作者，譯者，大家都稍微感到一點熱鬧。內容自然是很龐雜的，因為希圖在這龐雜中略見一致，所以又一括而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叢刊』。」

「大志向是絲毫也沒有。所願的：無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從速賣完，可以收回錢來再印第二種；（2）對於讀者，是希望看了之後，不至於以為大受欺騙了。」後來，在這計劃有了小小的變動的時候，魯迅又加上了這樣的幾句：「現在將這分為兩部分了。『未名叢刊』專收譯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種單印不鬪氣的作者的創作的，叫作『烏合叢書』。」（註一）

（註一）見「全集」第七卷第八七五——八七六頁。

這樣，中國的新書業——尤其是關於文藝的，在魯迅的扶持和培植之下，慢慢地抬起了頭來。這樣，北新書局也就成立起來，在北京翠花胡同開張門面，李小峯成爲正式的老闆了。這樣，魯迅二十年來所懷抱的理想逐漸實現了，從他的最初介紹「域外小說集」開始的，爲中國新文學安排良好的適當的肥沃的土壤的工作，逐漸地一天比一天擴大了；並且在這土壤上也最初地放出幾枝樸素的動人的花朵來。

五〇

和「莽原」週刊發刊同時，正在和「正人君子」們筆戰正酣的時候，魯迅繼續創作了兩個短篇小說：「孤獨者」和「傷逝」（註二），稍後，他又創作了兩個短篇小說：「弟兄」和「離婚」（註三）。

在「孤獨者」裏，魯迅所描寫的是和方玄綽、呂緯甫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知識份子的典型，性格非常倔強而又高傲的，沒有固定職業的單身漢子魏連受。他是S城大家都認爲非常古怪的人物，他所學的是動物學，卻到當地的中學堂做歷史教員；對人總是愛理不理的，卻常喜歡管理別人的閒事；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領薪水卻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一口也不拖延。他便是這樣的一個生活在理想和實際生活矛盾裏面的人物。他的家裏只有一個祖母，但不久，便染病死了，於是只剩下他一個人，在學校裏教書。但不久，他又被校長辭退了，他無以爲生，於是便靠賣書過活，這時，人們更不願來理他，他的生活是非常窮苦的，幾乎到求乞；實際上，也可以算是已經求乞了。然而他是「有所爲」

的，「願爲此求乞，爲此凍餓，爲此寂寞，爲此辛苦。」他爲的是什麼呢？後來，他自己也覺得茫然了，他覺得非常空洞，他覺得生活裏缺乏一種力量；他對於自己的生活發生了疑問。再後來，他便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否定了，他履行着他「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他排斥他「先前所崇拜，所主張的一切」的了。並不是由於他自己的心願，他竟做了杜師長的顧問，而生活在一個「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讚賞，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生活裏。最後，在這樣的生活裏，他終於不能活下去，當他消耗盡了僅有的精力，便死去了。從這裏，魯迅說明了一個淺顯的真理，從反面給正徘徊在黑暗中的知識份子指出了一條出路，——一個極端憎恨舊社會的知識份子，而又不能毅然決然地擺脫掉舊社會中的束縛，投身到改造這舊社會的新陣營，卻始終停留在「孤獨者」的地位上，滅亡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悲慘的結果。

「傷逝」是一篇獨一無二的魯迅的以戀愛作爲題材的創作，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爲着他們自己的愛情和理想，不顧封建社會裏的禮教的束縛，輿論的譴責，以及親屬的冷眼，他們按照自己的願望，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家庭。在他們沒有同居以前，子君是一個有點稚氣的，天真的，熱情的，勇敢堅決的女性，頭腦也很清醒，談家庭專制，談打倒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雖然有時候還不能完全脫盡舊思想的束縛，但她的勇敢和堅決確是令人敬佩的。甚至於在涓

（註一）見「全集」第二卷第二四五——三〇四頁。

（註二）見同上第三〇五——三三五頁。

生表示對於舊社會還有所顧忌的時候，她卻能夠以大無畏的，爲着愛而犧牲一切的精神，安慰鼓勵着涓生不要和舊社會妥協。可是，當他們同居之後，實際問題便來了，現實的破碎的家庭裏的雜務事，把子君的理想完全折磨掉了，平日的生活便只有爲喫飯而忙碌，喫了飯又要去籌錢，籌了錢來又喫飯。他們之間也漸漸起了隔閡，不能彼此互相了解，卻在表面上用虛僞來掩飾生活的空虛。這樣，到底不能常久支持和敷衍下去，最後，他們終於離散了。子君回到她自己的娘家，不久便死了。故事的梗概是非常簡單的，這篇小說便是從涓生對於子君和自己以前的生活回憶起始。在這篇小說裏，魯迅用了極大的溫情和熱愛，對於當時沈溺在盲目的愛裏的青年們，寄與深切的關懷和警惕，在這個短篇裏，他借了涓生的嘴，給予那盲目的空洞的，同時也正是那時青年們熱烈追求着的愛情，和爲了愛而忘卻了生活的青年們以批評道：

「……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爲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卻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了。……」

盲目的愛，爲了愛而犧牲一切的精神，這對於舊的封建社會說來，是有牠的革命的意義；但是，當牠碰到了現實的生活，牠便顯得無力了。失去了生活，愛便失去了依據；但若在生活裏忘卻戰鬥，那生活也還是空虛的。仍舊借着涓生的話，魯迅寫出了對於子君的批判：

「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

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撞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在這兩個短篇裏，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又稍有一點點的改變，由細微曲折的心理描寫，轉向着直抒胸臆的抒情成分的逐漸增加。這傾向在「祝福」，在「在酒樓上」——尤其是在「在酒樓上」這篇裏面，早就已經顯露出來了，但卻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接着魯迅寫出了「幸福的家庭」，「肥皂」這兩個短篇，他的現實主義的作風轉入另一個方向，形成了另一種和直抒胸臆的作風完全相反的心理描寫的作風。現在，在「孤獨者」和「傷逝」這兩個短篇裏，這種傾向又抬起頭來，並且發展到幾乎不可壓抑的程度，魯迅要把他的對於舊社會的罪惡的控訴，對於新人物的熱烈的愛護，對於舊和新、憎和愛、生和死的固執着糾纏，他要把他的壓抑在胸中的所有憤怒、憎恨、悲痛、和熱愛，一齊表現出來，所以，這就不是委婉曲折的細水長流，而不得不是波濤洶湧一瀉千里的順流而下了，這便形成了抒情主義佔着主導地位的，尖銳、鋒利、熱情洋溢的戰鬥性極強的作風了。這當然是頗受了雜文的影響的。在這戰鬥正酣的時候，魯迅是沒有辦法能夠壓下他的愛和恨的，他不能夠控制自己作冷靜的客觀的描寫，而採取着主觀情感極為強烈的抒情詩一般的寫法，這是作為戰鬥者魯迅的自身的一個特質。這主觀的抒情的作風，在魯迅的現實主義作風裏，是一個獨創的，屬於他自己特有的風格。像「傷逝」便是在他極端興奮的情形之下，用了一個整夜，一口氣寫成的。

和這兩個短篇大不相同，在小說裏排除了雜文的影響，仍回到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作風的小說，是出現在「孤獨者」和「傷逝」之後一些時候的「弟兄」和「離婚」。

「弟兄」裏所寫的是偽善者張浦君的虛偽和作假。有一天，他的弟弟靖甫病了，他便像是大難臨頭似的，說話也有些口吃了，聲音也發着抖，趕快從辦公室請假回家，十分焦急地打電話給醫生，請醫生到他們的住處去看病。真像煞有介事，他到處訪問醫生，並且裝出十分焦急的神情，結果，連他自己都被他欺騙了，對於他自己的虛偽的心情，他自己也似乎信以為真了。然而，他這種自欺欺人的騙局，卻在他的潛意識裏露出馬腳來，在他的凌亂的思緒裏，現出這樣的一幅圖畫：

「……他彷彿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紅熱，而且是不可救的。那麼，家計怎麼支持呢，靠自己一個？雖然住在小城裏，可是百物也昂貴起來了……。自己的三個孩子，他的兩個，養活尚且難，還能進學校去讀書麼？只給一兩個讀書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兒最聰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評，說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後事怎麼辦呢？連買棺木的款子也不夠，怎麼能夠運回家，只好暫時寄頓在義莊裏……。」

誰知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他的弟弟所患的不過是疹子，喫點藥便慢慢地好起來了。張浦君在過度的緊張之後，昏昏地睡了一夜，第二天起來很遲，走進了他的弟弟的屋子裏，但頭腦裏卻還是昏沉沉的，閃閃爍爍地浮出了許多夢的斷片：

「……靖甫這樣的躺着，但卻是一個死屍。他忙着收斂，獨自背了一口棺材，從大門外一徑背到堂屋裏去。地方彷彿在家裏，看見許多熟識的人們在旁邊交口讚頌……。」

「他命令康兒和兩個弟妹進學校去了；卻還有兩個孩子哭曬着要跟去。他已經被哭曬的聲音纏得

發煩，但同時也覺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權和極大的力。他看見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鐵鑄似的，向荷生（他弟弟的孩子）的臉上一掌批過去……。

「荷生滿臉是血，哭着進來了。他跳在神堂上，……那孩子後面還跟着一羣相識和不相識的人。他知道他們是都來攻擊他的……。」

「我決不至於昧了良心。你們不要受孩子的謊話的騙……。」他聽得自己這樣說。

「荷生就在他身邊，他又舉起了手掌。……」

他忽而清醒了，覺得很疲倦，背上似乎還有些冷。靖甫就靜靜地躺在對面，很調勻地呼吸着。

這是一個如何大的諷刺呵！雖然內心裏充滿着矛盾和衝突，但表面上卻硬是要維持着一團和氣，這是一個如何愚蠢而又徒勞的事呵！魯迅用冷冷的筆觸，畫出了他們的真實的面貌。

似乎是回到了「風波」和「故鄉」的那樣情調，魯迅寫出短篇小說「離婚」；但在實質上，牠卻比「風波」和「故鄉」深沉得多了。

鄉下人愛姑因為不堪她丈夫的虐待，她回到了自己的娘家，雙方已經差不多都同意離婚了，但她還不服氣，一定要到她婆家去，鬧得牠一個「家破人亡」。這一個意見，她是非要堅持不可的，任何人都勸不動她。這事一直鬧了有兩三年。最後，她和她的父親被領到當地的一個紳士慰老爺家裏，聽候判決了。慰老爺又邀了和知縣大老爺換過帖的七大人來，一同處理這件事。

「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麼？」她想。「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

對七大人說一說，從十五歲嫁過去做媳婦的時候起……。」

果然，不一會兒，她和她的父親被領進一個客廳了，被引到七大人的面前。

「本來新年正月又何必來勞動你們。但是，還是只爲那件事，……。」慰老爺開腔了。「我想，你們也鬧得够了。不是已經有兩年多了麼？我想，冤讎是宜解不宜結的。愛姑既然丈夫不對，公婆不喜歡……也還是照先前說過那樣：走散的好。我沒有這麼大面子，說不通。七大人是最愛講公道話的，你們也知道。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面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這麼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肯說。」別人又從旁插嘴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着愛姑的父親莊木三，點點頭。

「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愛姑覺得事情危急了，她怪她的父親爲什麼不開口，她只有鼓起勇氣來說了，「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鍾馗」。那年的黃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雞，那裏是我沒有關好嗎？那是那隻殺頭獐皮狗偷吃糠拌飯，拱開了雞柵門。那「小畜生」不分清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七大人對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緣故的。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鑿；知書識理的人什麼都知道。他就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那麼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裏不行，還有府裏呢……。」

「那些事是七大人知道的。」慰老爺仰起臉來說。「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樣。你看你的爹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打官司打到府裏，難道官府就會問問七大人麼？那時候是，「公事公辦」，那是，……你簡直……。」

「那我就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那個並不是拚命的事，」七大人這才慢慢地說了。「年紀青青。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添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北京洋學堂裏回來的，自己問他去。」於是轉臉向着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

「的確的確。」尖下巴少爺趕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愛姑覺得自己完全孤立了。她要作最後一回的奮鬥，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她說：

「怎麼連七大人……是的……我知道，我們粗人，什麼也不知道，就怕我爹連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發昏了。就專憑他們「老畜生」「小畜生」擺佈；他們會報喪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巴結人……。」

說着她便和那『小畜生』吵起來了。她又向七大人一看，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她忙住口，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回臉一仰，細長鬍子圍着的嘴裏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彷彿失足掉在水裏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了。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卻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彷彿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才翻身走出去。

愛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的，也防不了的，她這時才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得很，先前都是自己的估計錯誤，所以太放肆，太粗獷了。她非常後悔，不由的自己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她的話細微得幾乎聽不到。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農民的典型，好久沒有在魯迅的小說裏出現了，從「在酒樓上」起（更早些的還有「孔乙己」、

「端午節」、「白光」)到「弟兄」止，他所描寫的大部分是新的或舊的知識份子這一個階層。現在，在魯迅的作品裏，農民階級的典型，又重新出現了，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從「在酒樓上」開始，魯迅想盡量地向深處去發掘新的和舊的知識份子的靈魂，他想從這裏尋找出他們的肯定的對於生活固執着的力量，可是，在事實上，魯迅的這個企圖失敗了。他只能夠從呂緯甫身上找出顏唐，從空頭文學家（「幸福的家庭」中的人物）找出麻木，從四銘身上找出愚昧和頑固，從高老夫子身上找出無知和無賴，從張沛君身上找出虛偽；他只好用死結束了魏連受，也結束了子君，涓生似乎有了所謂新的生路了，但實在也還渺茫得很。從這裏，魯迅所得到的只是對於他們（也就是對於魯迅的階級的）無可奈何的悲哀，和從這悲哀的深處所出來不可壓抑的憤怒。所以，最後，尤其是在「孤獨者」和「傷逝」裏，魯迅實在壓抑不住這股怒火了，他的情感就像熔岩一樣，什麼東西也阻止不了牠，一下子傾瀉出來。這形成了和他先前的作風稍有不同的新作風，感傷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似乎漸漸地濃厚起來，這是在魯迅的以前的作品中所沒有的。現在，在「離婚」中，這傾向被克服了。魯迅從知識份子這一個階層以外，去尋找他的作品中的典型，他又回到了從「風波」和「故鄉」以後他便沒有接觸過的農民的典型上來。雖然，在「離婚」裏，魯迅所描寫的人物也還是不定的，但卻比知識份子們的典型堅實，倔強而又有刀得多了。感傷的浪漫主義的成分是沒有的，反抗的戰鬥的情緒逐漸高揚起來，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在這裏得了一個很大的勝利，這作風在魯迅的作品裏，這時走向了牠的最高峯。

十一月，魯迅雜文第一集「熱風」(註一)印行了，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本雜文集。這裏面包括了：一九一八年的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雜文的最初形式——「隨感錄」，和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的一些短評和論文。這書裏所評論的，多是些「小問題」；「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對於這一些雜文，魯迅並沒有特別的注意到牠們的，所謂永久的藝術的價值的，他只希望：

「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癩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註二)

然而，可悲的是魯迅所攻擊的時弊，並沒有和他的文字同時滅亡，和這希望相反，這一些「時弊」在那個時候卻是非常猖獗的。這有着白血輪功用的雜文便在病態的社會裏存留着了。在對於舊的社會作決死的不妥協的鬭爭中，魯迅所創立的這種新的戰鬥性極強的，匕首式或投槍式的文體，牠不僅僅是已經存在着了，牠在戰鬥中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廣闊地傳播開去，牠成爲在今天千萬個爲人民解

放事業而鬪爭的戰士們經常地運用着的武器了。

因爲這一種文體是新創的，在中國的舊的文學傳統裏是沒有的，於是就有人們把牠拿來亂加比擬；很多的人們說道（同意這種說法的人那就更多了）：魯迅的「熱風」和尼采的「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是很相似的，或者說，在「熱風」裏魯迅的作風簡直就是受了尼采的影響。甚至於還有人說：整個的魯迅的早期思想也是和尼采非常接近的。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和過失。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魯迅和尼采是沒有一絲一毫的共同之點的。首先，他們是出生在各不相同的時代和國度，代表着各不相同的階級利益的；作爲尼采的哲學思想的根據的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阻礙着德國的新興資產階級興起的，貴族的特權階級在德國的龐大的存在；尼采出生在這一時候，他百分之百地盡着這反動的貴族階級代言人的任務。在一八四八年後的德國，勞動的無產階級逐漸抬頭來了，並且很快地便形成了龐大的陣容，來和資產階級對抗；這資產階級是軟弱無能而且又非常膽怯的，所以牠便轉過頭來乞靈於阻礙着和壓迫着牠的貴族階級，和封建地主們結成反動的統一戰線，來壓伏那逐漸強人的無產階級了。尼采的哲學思想便正是代表着那最反動的德國貴族地主階級，和投降了貴族地主階級之後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替貴族們說話，他說只有「優秀的」日耳曼的貴族才是高貴的民族，得天獨厚的上帝的選民，是主子；而其他的人們則是劣等民族，是天生的笨種，只配做奴隸。這規則永遠

（註一）見「全集」第二卷第九——一三一頁。

（註二）見該書「題記」，以上引文亦見「題記」。

不變的，主子永遠是主子，奴隸永遠是奴隸。和尼采恰恰相反，魯迅出生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這時，是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正淪沒向半殖民地的奴役生活裏的時代，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時，勞動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偉大的政治力量）所要努力奮鬥掙扎擺脫的，便是這被奴役的命運，魯迅正是這廣大的人民隊伍中的一個，他所代表的是半殖民地上的成千成萬的被壓迫被蹂躪的人們的堅強不屈的求生的意志。這是他們之間截然不同的顯著的區別。其次，因為，尼采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意識形態是反動的，他違反了人類的向前進步的方向而向後開倒車，所以，他和他的哲學思想便被進步的愛好自由的人士所唾棄，反過來，卻被他的孝子賢孫法西斯匪徒奉爲偶像和寶典，認真地實行起來，使全世界的人們都遭受了無邊的禍害。和尼采恰恰相反，魯迅所代表的是中國的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他和中國的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多數的人民一齊走向着進步的方向，而不是宣揚着殺人放火的回到野蠻時代去的強盜主義，所以，在今天，在希特勒和其他的匪幫在全世界到處被肅清着的今天，在中國人民大眾正走向着解放之路的今天，魯迅和他所指出的道路便更顯得光輝而且正確了。撇開了這一個事實，而單從文字的形式上去東拉西扯，去亂找根據，這是愚蠢而又無聊的癡想和妄學。最後，就是在文字形式上，魯迅和尼采也是不能相混的。從表面上看來，不錯，魯迅是曾經引用過尼采的許多話，——尤其是在這本雜文集「熱風」裏；此外，他又曾譯過「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註二），這似乎是很受尼采的影響了。然而，其實是不然的。就在「熱風」裏，魯迅便給尼采以正確的批判說：他的「超人」實在「太渺茫」了。

比「熱風」出版稍後一些時間，十二月，魯迅譯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論文及隨筆「出了象牙之塔」；（註三）這之前，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魯迅曾譯出同一作者的論文集「苦悶的象徵」。（註三）

「苦悶的象徵」是厨川博士的遺稿，是在他死後由他的門人整理出來的著作。「作者據伯格森一流的哲學，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爲人類生活的根本，又從弗羅特一流的科學，尋出生命生的根柢來，即用以解釋文藝，——尤其是文學。然與舊說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來爲不可測，作者則以詩人爲先知，弗羅特歸生命力的根柢於性慾，作者則云即其力的突進和跳躍。這在日下同類的羣書中，殆可以說，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似的玄虛，而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的，……而對於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的著作。作者主要的意思是，他以爲「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徵主義。」但是這「所謂象徵主義者，決非是前世紀末法蘭西詩境的一派所曾標榜的主義，凡有一切文藝，古往今來，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用着象徵主義的表現法的。」這是一種不失爲一種具有自己獨到的意見的文學論，雖然牠並不是科學的文學論，牠的觀點和辯證的唯物論還差一大段很遠的距離。

（註一）收入「全集」第七卷第五七八——六〇五頁。先生所譯的僅是「序言」，載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新潮」二卷五期。

（註二）收入「全集」第三卷第一三三章、五九——三八頁。

（註三）同上第一七——二三三頁。

「出了象牙之塔」是作者把這一個文學論的觀點，引用到對於他「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偽、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一加以辛辣的攻擊和無所假借的批評」的論文和隨筆的結集。用牠來作爲「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的武器，在那個時候，對於中國的社會說來，仍是不失爲一種鋒利的武器的。在這書的「後記」裏，魯迅寫道：

「我譯這書，也並非想揭鄰人的缺欠，來聊博國人的快意。中國現在並無「取亂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覺得負有刺探別國弱點的使命，所以正無須致力於此。但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彷彿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後來卻又覆然，宛如服了一帖涼藥。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將來要得內務部的褒揚的，大抵總覺到一種腫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的，大概都不會知道；否則，就叫白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藉此先將那腫痛提醒，而後將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

魯迅譯書的目的便在這裏。

譯文爲着要保存原文的口吻，文句便採取了「直譯」的方式，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的。這道路，在翻譯界，是魯迅獨創的。

五二

在「五卅」運動之後，羣衆的革命力量一天天地逐漸強大起來了；在北京也一樣，由於受了南方

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影響，學生們的反對軍閥官僚的浪潮，聲勢也就更加浩大了。在輿論壓迫之下，衆怒不可犯的情形之下，教育總長章士釗被迫辭了職，在他庇蔭下的「正人君子」們便也賣身投靠到另一個主子的門下；「女師大」的事件是學生們勝利了，他們的另外一個改頭換面的女子大學同時也就正式成立起來。他們又擁上了另一個好看的幌子，掛出了另一個好看的招牌，這便是「公理」或「道義」的欺騙的大帽子。所謂「公理」或「道義」的這一類東西，自從章士釗逃走，女師大復校之後，久矣夫已經失蹤了的，現在卻在女子大學的敦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學生家長的酒席上忽然出現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的記載，所謂北京教育界的「名流」，在十四日晚六時，在攝英番菜館開會了，從這飯局裏便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裏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據說還要把「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爲伍」云。這一羣浩浩蕩蕩的「名流」，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報上和函上有個這樣的名單：

除了萬里鳴是太平湖飯店的掌櫃，以及董子鶴這個莫名其妙的人物而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他是章士釗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閒話」的西滄，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會有一篇楊蔭榆要用迎他「觀劇」（這是他們把女師大的事件當作看戲的妙

喻——曹註）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會稱他們爲「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們那時並沒有開什麼「公理」會。

在這一天的酒席之間，——或者說是「公理」會上罷，他們都似乎是義憤填膺，摩拳擦掌，真的要維持「公理」了。北大教授王世杰說：「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又說：「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又北大教授燕樹棠說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云云。可是，到了十八日，在「晨報」上刊載着女子大學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真是醜態百出。這要的是什麼「公理」的把戲呢？在背後援的又是什麼呢？魯迅寫道：

「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復呢？雖然報復的事，並爲「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爲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爲着「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爲他們所不取罷。因爲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攝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這算得什麼

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嘗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爲異類，又何至於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麼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城狐社鼠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烏「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註一）

過了幾天，「現代評論」五五期出版了，在「閒話」裏的末一段，根據女子大學學生的宣言，說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個，別的「都」已進了女大，於是陳源即西澧教授便發問道：

「要是二百人（按據云這是未解散前的數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復麼？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魯迅有很好的回答：

「然而「要是」女師大的學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樣呢？其實，「要是」章士釗再做半年總長，或者他的走狗們作起累來，宗帽胡同的學生縱不至於「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剝到只剩一個或不剩一個，也正是意中事。陳源教授畢竟是「通品」，雖是理想也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麼，怎麼辦呢？我想，維持。那麼，「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想，就用一句「閒話」來答覆：「代被羣衆專制所壓迫者說幾句公平話」。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隱忽現一樣，「少數」的時價也四季不同的。楊蔭榆的時候多數不該「壓迫」少數，現在是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你說多數不錯的麼，可是俄國的多數主義現在也還叫作過激黨，爲大英、大日本和咱們中華民國的紳士們所「深惡而痛絕之」。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雖然多數，也得算作例外的罷。

「要是」帝國主義者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別的都歸了強國了，少數的土地，還要維持麼？……

「要是」真如陳源教授所言，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還有二十人。這足使在章士釗門下暗作走狗而臉皮還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學者們愧死！」（註二）

爲着要堅持這一個鬭爭，並且把這鬭爭進行到底，在這個時，魯迅不給這一些「正人君子」們有喘息的機會，他堅決地反對紳士們的偽善的『費厄澆賴』（Fair Play），而提出了『打落水狗』的主張。歐化的紳士林語堂先生在這個時候，他覺得這鬭爭似乎尖銳了，他便在「語絲」五七期上大講其『費厄澆賴』的精神，他以爲這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而現在應該努力鼓勵；他又說，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澆賴』的意義的。魯迅卻予以有力的駁斥。他把落水的狗分爲三類，而這三類大都是在可打之列的。一、狗自己失足落水者，二、別人打落者，三、親自打落者。他以爲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於無聊，或者近於卑怯；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對於狗，人們是不應該加以憐憫的，尤其是那

些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的，中外的娘兒們上街時候，在牠們頸子上拴了細鍊子跟在人們腳後跟跑的叭兒狗，牠們雖然是狗，卻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爲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的哈吧狗，應該先行打牠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牠自墜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有人過於要好，自然不打也可，然而也不必爲之歎息，因爲，假如對於叭兒狗如可寬容，則別的狗也就大可不必打了。

這一些寶貴的經驗和堅決的主張，都是魯迅從痛苦中得來的，這是雖然不是用了他自己的血，而卻是用了他親眼見到他的同輩和他年幼的青年們的血寫下了下面的，鐵一般的事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爲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放过牠的。」

「現在的官僚和士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後來說革命黨，甚至於到官裏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可是革命終於起來了，一羣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的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

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牠們爬上來罷。於是牠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然出來幫着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黨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麼多。這就因爲先烈的好心，對於鬼蜮的慈悲，使牠們繁殖起來，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爲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爲「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爲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爲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鎗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裏繼續跋扈出沒着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爲中國模範的名城裏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澂先生，真是洪福齊天。」（註一）

所以，在現在，這「費厄潑賴」就應該緩行了。以目前的事情來說罷，魯迅隨手便舉了一個例子，他接寫道：

「例如劉百昭毆曳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澂鼓勵女大學生佔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

吧？」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卻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鏢。」（註二）

所以，在現在，就非打『落水狗』不可了。

五三

一九二六年一月，女師大事件完全結束，新校長易培基先生就職，魯迅才卸却了職責；同時他對於章士釗的訴訟也勝利了，他的在教育部的僉事職位也恢復了。然而，魯迅卻決不放鬆對於他們的攻擊。

從這年的一開頭，『正人君子』便有的偽裝，有的放出烟幕彈，有的又散佈流言了。陳源即西潯教授在『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閒話』裏，宣佈他從今年起，想要不管閒事了，而高談其做學問的工具問題，規勸有志於作學問的人，不可不博覽羣書了。『就以『四書』來說罷，『據陳源即西潯教授說，『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這真使人啼笑皆非了，漢朝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實在是罕見的，稍稍對於『國學』有點常識的人，只

（註一）見『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二——二五三頁。

（註二）見同上第二五八頁。

要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類，這上面只有「五經」，「六經」，「七經」，……這些名目，卻偏偏沒有「四書」這個名目，更何況漢人所做的註疏和理論呢。嗚呼！堂堂一個大學教授，高談做學問的工具，連「四書」，南宋以後之名」的常識都沒有，那末，他的高談做學問的工具問題是什麼意思呢？是真是假，還是別有用心呢？此外，再看別的罷，只要「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下，便可以窺知這其中的消息了，什麼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〇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現在活着的人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在現在，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着如火如荼的鬪爭的現在，他們所要說明的是什麼呢，魯迅毫不客氣地揭穿了這個秘密，他說：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是牠的特色。」（註一）

他們所盡的怎樣的任務呢？魯迅把他們比作爲牧人領着胡羊的山羊，那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他說：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鐺，作爲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牠忽忽地競奔牠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想開口向牠們發一句愚

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爲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就難於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轎子上掛着小鈴鐺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註二）

這樣，魯迅揭穿了他們的祕密，暴露了他們的任務，把他們的卑污的醜行，險惡的詭計都指出來了，叫他們無可逃避，沒有容身之地，於是他們就彎彎曲曲鬼鬼祟祟地給魯迅加上了「土匪」、「學匪」、「學棍」、「紹興師爺」、「刀筆吏」，……這一些稱號了，在「晨報副刊」登出了陳源「致志摩」的一封信來，在這信裏，陳源寫道：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一八九頁。

（註二） 見同上第二〇四——二〇五頁。

「志摩」：

前面幾封信裏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這裏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曲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好像會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說了這兩句話，能不拿些證據來。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一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卻沒有。只好隨便舉一兩個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證據，要是你要看的話。

「遠一些的一個例，他說我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實在呢，我同楊女士非但不是親戚，簡直就完全不認識。直到前年在女師大代課的時候，才在開會的時候見過她五六面。從去年二月起我就沒有去代課，我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也就沒有在任何地方碰到過楊女士。

「近一些的一個例。我在「現代評論增刊」裏汎論圖書的重要。我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增刊六三頁）魯迅先生在前一兩星期的「語絲」裏就

輕輕的代我改爲「聽說孤桐先生到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

「再舉一個與我無關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們相識人中一個最純粹的學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國立京師圖書館聘他爲副館長。他因爲也許可以在北京弄出一個比較完美的科學圖書館來，也就答應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雖然許多教授兼二三個以至五六個重要差使，李先生卻向校長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內不支薪。他現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課。他的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你想想，有幾個肯這樣幹。然而魯迅先生卻一次再次的說他是「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舉例了。不過你要知道，就是這位魯迅先生，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領」。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的所以這樣，正因爲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爲「文士」嗎？魯迅先生爲了那名字幾乎笑掉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了鈔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裏，說起不願譯「文學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說「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卻是對牛彈琴；至於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卻時常有，幾多醜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你看這才不愧爲「青年叛徒的領袖」！他那種一見官僚便回頭欲嘔的神情，活現在紙上。可是呵，可是他現任教育部的僉事。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

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永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麼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爲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領袖」嗎？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志摩，你看，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這才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中國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才是中國的「土匪」……我不得不也來慶祝中國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爲我又生氣了。我不過覺得魯迅先生是我們中間很可研究的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吧了。可惜我只見過他一次，不能代他畫一幅文字的像——這也是一種無聊的妄想吧了，不要以爲我自信能畫得出這樣心理繁複的人物來。」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一九二六年一月——舊註）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鬚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着嘴立在泥潭中，後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語麼？可是千萬不可忘了那叭兒狗，因爲叭兒狗能今天跟了黑狗這樣叫，明

天黑了白狗那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不寫了，不寫了。無聊的話也說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經够支持人家半年的攻擊了。我現在也要說幾句正經話了。」

「常常有人來問我，人家天天攻擊我，他們不懂爲什麼。人家爲什麼攻擊，我也不十分明瞭爲什麼，可是我爲什麼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國人私人相罵，誰的聲音高就是誰的理由是。所以我甯可受此委曲，不願意也不能與人相罵。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誰的理由大。所以我也甯可吃些虧，不願意也不能與人家打官司。第一，我們不會捏造無中生有的事。第二，我們想不起那樣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閒功夫，好在衙門裏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們不做事便沒有飯吃。第四，人家能造種種的假名，看來好像人多勢衆，就是你所謂朋友也可用了假名來放兩枝冷箭，我們卻做不出這樣的勾當。第五，他們的嘍囉也實在多，我們雖然不是不認識人，可是他們既然對我們有幾分信任，我們總不肯亦不忍鼓勵他們去做這種無聊的事情。第六，他們有的是歡迎謾罵的報紙，我們覺得自己辦的一個報紙如只能謾罵，還不如沒有。」

「可是，志摩，還有一個頂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說的「漆黑一團」很容易把你圍進去。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泥潭裏有的是已經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淺處，有的已

經沒到了口鼻。他們在號着，叫着，笑着，罵着。你要是忍不住他們的譁聲，一停足，一同頭，也許就會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們一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時你再不設法拔你的腳出來，你也許會陷，陷，陷，直到沒頭沒頂才完畢。這就是我一向不愛與人較量的理由。我覺得我們的才具雖小，我們的學問雖淺薄，究竟也有它們的適當的用處。燭火雖然沒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為有了太陽便妄自菲薄，何況還沒有太陽。所以我一向總想兢兢業業的向前走，總不讓暴戾之氣佔據我的心。可是，志摩，這次也危險得很了！這一次我想，我已經踏了兩脚泥！我覺悟了。我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

「昨晚因為寫另一篇文章，睡遲了，今天似乎有些發熱。今天寫了這封信，已經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懇切的指導我。」

源 十五，一，二八。（註二）

過了不到幾天，就有人把這份「晨報副刊」寄給魯迅。魯迅覺得有些特別，既然寄來了，姑且看看題目罷，他看到了：「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這樣的標題，署名是志摩，魯迅知道這是和他開玩笑的了，果然，在這「一束通信」的屁股後面出現了「西滬致志摩」，就是對他的專論。魯迅於是也就立刻長篇大論詳詳細細的駁掉牠，他寫道：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

魯迅致「口」，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嘗願意發表；無論怎麼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不是他？」——畫馬爲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總得替「口」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灣致志摩」麼？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對「悻悻的狗」，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爲「某籍」，「某系」，「某黨」，「嘍囉」，「重女輕男」……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口」」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裏，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麼？那封信裏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爲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爲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喫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喫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喫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

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只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麼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只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着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歸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爲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只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說的「叭兒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裏「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牠的主人：閹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爲這是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裏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只有專講上帝，纔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氣，還是讓牠儘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面也好，在對面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麼之氣都放在心裏，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麼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面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有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爲「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

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網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爲「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爲「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發表的文章裏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裏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報」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祇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爲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祇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麼時候才有。但欠賬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此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爲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

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爲什麼呢？大約是因爲「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用三個例來概其全數，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徵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只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爲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面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爲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我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點已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倖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只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爲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

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吳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裏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爲「文士」嗎？魯迅先生爲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別個稱爲「文士」我也笑，稱我爲「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註）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牠實利上是並無什麼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採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

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嘗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並非閒話」也分明對西滬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只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益田，文章又不值錢，只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爲「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抓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裏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賸下的只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着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面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

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常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閒話」，說是「整大本的標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爲「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彷彿比自謙爲「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牠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牠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爲真，我以爲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會費去了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裏；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蒐起來。……其餘分量，取捨、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爲都以中國史實爲「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註）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爲似乎不可，因爲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

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爲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歷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標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只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標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之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爲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一九二六）——善註）夏天看見了，將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分，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鏗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爲我於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着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爲自己爬着。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着，卻以爲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

（註一）即通常譯爲西萬提斯（Cervantes）的，曾作不朽的名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據陳

源教授說：他傷得散馬叫化子。

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碰，也並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歷來隱藏蘊蓄着，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洩，我纔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爲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琶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纔刺激我去買『本 Art of A. 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嚥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有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曬「斂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

「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爲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

樣，……這樣「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嚥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貶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裏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彷彿「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復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面孔」，不但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於「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面孔上尋出些有趣味，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看別的面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爲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着。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裏面，到外國去炸火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派，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爲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源教授「刻骨鏗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爲自己是官僚，定要比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而且罪孽深重。延隔「面孔」了

麼？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面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嘆，這就是說金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麼？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裏，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纔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了，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爲有適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鬚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面孔，卻連我也並沒有什麼大「惡心」，而且彷彿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爲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復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註一）

魯迅的這封信「不是信」的公開信發表了，又是把「正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原形畢現，這真是叫他們頭痛的事。兩天之後，「晨報」忽然刊登出文字來，主張把這事結束了。照例用通

信，李四光教授開場白，徐志摩『詩哲』接後段，一唱一和，說道：『帶住！讓我們對着混鬧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了。此外還聲明一句說：『本刊此後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云。然而，魯迅卻還不罷『帶住』，他又寫道：

「他們的什麼『閒話……閒話』問題，本與我沒有什麼鳥相干，『帶住』也好，放開也好，拉攏也好，自然人可以隨便玩把戲。但是，前幾天不是因爲『令兒』關係，連我的『面孔』都攻擊過了麼？我本沒有去『混鬧』，倒是株連了我。現在我還沒有怎樣開口呢，怎麼忽然又要『帶住』了？從紳士們看來，這自然不過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語』，正無須『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實也並沒有『跳到半天空』，只是還不能這樣地謹聽指揮，你要『帶住』了，我也就『帶住』。」

『對不起，那些文字我無心細看，『詩哲』所說的要點，似乎是這樣鬧下去，要失了大學教授的體統，丟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的醜，使學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煩了。可憐可憐，有臭趕緊遷起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有這麼多的醜可丟，有那麼多的醜怕丟麼？用紳士服將『醜』層層包裹，裝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麼？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偽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着假面，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牠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醜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面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

裝進緞子盒裏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面貼滿着好招牌，法蘭斯呀，蕭伯訥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勸我「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認為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麼「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真以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這樣巨罰之後，還要我叩謝天恩麼？還有，李教授以為我「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纔盡他的興會。」我自己的意見卻絕不同。我正因為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為「蛆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使我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為例罷：一、因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爲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纔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於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五)上答覆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爲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僞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

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可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爲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只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就容易辦了。只要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裏去，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够了。」（註一）

可是，這些高貴的紳士們，卻偏不願把他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裏去，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那麼，魯迅也就沒有放下他的「較爲尖刻」的筆。

五四

二月，「華蓋集」（註二）印行。這是魯迅的第二本雜文集子，接着「熱風」之後而風格稍有不同的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二二六——二二九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三卷第二二——二七六頁。

雜文，差不多都收集在這本書裏面，牠的內容主要的便是和「正人君子」如陳源即西滬教授以及與女師大事件有關的論戰。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編定這書，在「題記」裏，他寫道：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滞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遙遠，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爲天人師。我幼時雖會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尙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够交着「葦蓋蓮」。」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魯迅接着又寫道，「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爲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可跟着

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魯迅所要堅持着的是持久的戰，『執滯在幾件小事情』是戰法，是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作戰方式的最大特色之一。在論及魯迅的這種戰的方式和作爲表現這戰的武器——雜文的社會意義時，何凝先生有最恰當而正確的評價，他說得好：

「一九二四——五年，他的『春末閒談』，『燈下漫筆』，『雜憶』（註二）『墳』以及整部的『華蓋集』，尤其是一九二六年的『華蓋集續編』（上節引文『不是信』，『我還不能『帶住』』等篇，均係自『華蓋集續編』中引出——著註），都包含着猛烈的攻擊階級統治的焰火。自然，這不是社會科學的論文，這只是直感的生活經驗。但是他的神聖的憎惡和諷刺的鋒芒都集中在軍閥官僚和他們的叭兒狗。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被披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個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六的時候，卻已經準備着，只要看當時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是怎樣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而魯迅當時的『語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這些未來的『官場學者』的。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爲『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滢』等類人

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澧」，就是「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他們個人的履歷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們這種「媚態的貓」，「比牠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嘍嘍地發一通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舐一點油汗，還要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到現在還活着，活着！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偽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綫。

「的確，舊的衛道先生們漸漸的沒落了，於是需要在他們這些僵尸的血管裏，注射一些「歐化」的西洋國故和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的學究主義，再加上一些洋場流氓的把戲，然後僵尸可以暫時「復活」，或者多留戀幾年「死尸的生命」。這些歐化紳士和洋場市儈後來就和「革命軍人」結合了新的幫口，於是僵尸統治變成了戲子統治。僵尸還要做戲，自然是再可怕也沒有了。

「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鬥，雖然隱微在個別的甚至於私人的問題之下，然而這種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後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完全只靠大炮機關鎗。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偽和戲法是無窮的。暴露這些「做戲的虛無主義者」（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也就必須有持久的韌性的鬭爭。」（註一）

「正因為這個緣故，魯迅絕不放鬆每一個問題的發生，「柳湜先生的話，可以算作何凝先生的發

揮和補充，「並將鬭爭擴大和深入，對於他的論敵，具體走出場的代表人物，也就僅情的打擊。不明白魯迅的人，以爲魯迅做得有些過火，似乎太過於「對人」，其實，完全相反，魯迅注意的並不是張三和李四，更非對某些個人有什麼仇怨，而是他們所代表的思想和傾向，爲使鬭爭更具體，更能影響人，故不能不對於它的代表人物的假面具在民衆之撕毀。這是他的鬭爭藝術。

「從這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現實是如何的結合，如何不畏強暴，如何選擇鬭爭的對象，如何發揚了他的鬭爭藝術。另一方面，在他的疾惡如仇的另一面，是對青年的愛護，對正義、自由的愛護，對中國革命的新生，中國新的文化的熱情與愛護。」（註二）

五五

正當「正人君子」們被魯迅打落了水，魯迅並沒有放鬆他們，還要從而打之的時候，他們齊說「帶住」，而魯迅卻還不能「帶住」的時候，在北京，另一件事情發生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卵翼之下的段祺瑞，在他的國務院門前命令軍警開鎗殺死了手無寸鐵的市民及學生好幾十人，受傷的有二百多。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自從一九二四年的第二次奉直戰爭之後，奉系軍閥佔了上風，張作霖的勢

（註一）見「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註二）見「學習魯迅的戰鬥」。

力便伸展到關內，日本帝國主義者老牌代理人段祺瑞，於是便更有保障。這時，又由於南方的革命勢力的高漲，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影響之下，馮玉祥也傾向了革命，在這次奉直戰爭中，他的勢力也達到了北京的附近。在這樣的新舊兩種勢力錯綜複雜的局面裏，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於是也就成立了。爲着要粉飾他的反動，在臨時執政府成立不久，段祺瑞便邀請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而孫中山先生也抱着「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遠絕跡於國內」……使武力與國力和結合，使武力成爲「國民武力」的理想，也就來到了北京，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的國民黨是進步的，孫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偉大的，「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是全中國人民大眾所擁護的，但是，這卻爲帝國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走狗軍閥和官僚所不容，孫中山先生北上和段祺瑞商討國是，沒有結果，他便在北京死了；但他的偉大的政治的理想和遠見，卻分明地留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變成了忠實於他的主張的中國人民所努力達到的方向。在他的臨終時候「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信」中，他留下了這樣的最寶貴的最動人的遺言，他說：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甯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上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成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狀況之羈絆，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這很使帝國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走狗軍閥和官僚們頭痛了，他們便千方百計地設法來阻止這一個偉大的正確的政策之實現，他們對於新興的革命力量的壓迫也就不遺餘力，而到了必要關頭，他們的猙獰的面目也就在人民大眾的面前，暴露出來了。『三一八』事件便是接着『五卅』之後的又一次，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爪牙們對於中國人民的屠殺。

在『三一八』之前不久，作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的奉系軍閥和作爲大英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的直系軍閥，他們就已經聯合起來對於馮玉祥的國民軍加以無理的壓迫了，這時國民軍因爲力量薄弱也就逐步退讓，沒有和他們發生大的衝突。雖然是這樣，可是他們還不能滿足，他們必定要把國民軍的

勢力完全趕走然後快意，於是就由奉系軍閥駐在山東的張宗昌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指揮之下，向國民軍大舉進攻了，誰知張宗昌的軍隊不行了，在天津以南卻被國民軍打敗了。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便親自出面來對付國民軍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兩艘開進大沽口，砲轟國民軍，而國民軍也就毫不客氣地予以還擊。帝國主義者是軍閥和官僚們的爸爸，是動不得的東西，這樣，怎麼可以呢？於是，在十三日日本政府便向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提出抗議了。十六日，英、美、德、意、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和日本一共八個國家，對段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十八日正午以前答覆，向各國政府道歉，賠償日本損失，並且以後要遵守「辛丑和約」的規定。段政府居然準備答應了，而北京的民衆卻不答應，就在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北京各界數千人在天安門集合，舉行國民大會，對於帝國主義者壓迫和屠殺中國人民的事件，提出抗議。會畢便開始游行示威，高叫『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驅逐八國公使』！……等口號。青年學生們和各界的代表還到執政府的門前去請願，段祺瑞便命令衛隊開鎗了。第二天，段執政又下令通緝這一些請願的『暴徒』的領袖：中俄大學校長徐謙，北大教授李大釗，顧兆熊，中法大學代理校長李煜瀛，女師大校長易培基諸位先生，罪名是提倡『共產學說』，『嘯聚學校』！此外，事後不久又發表第二批通緝名單，人數是五十個（看到名字的只有四十八人）把這四十八人分類統計一下，其中，見於陳源『流言』中所謂『某籍』的，有十二人，佔全數四分之一；陳源『流言』中所謂『某系』的，有五人；曾經發表反對章士釗宣言的北大評議員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內；曾經發表反對楊蔭榆宣言的女師大教員七人，有三人在內，皆『某

籍」；甚至於連爲女師大控告章士釗的律師也在內。顯然地，這個名單是什麼人所造的了。這便是他們對付他們的敵人的手段，由於他們的這許多敵人被通緝了，許多反對他們的學校便可以關門了，許多攻擊他們的報紙便可以停刊了。此外，自然還有許多肥美的遺缺空下來，可以安插他們的私人，這便是他們的卑鄙陰險而又狡猾的，真正的政治目的！可是，他們在表面上，卻還要裝出公正的嘴臉。陳源又站出來說「閒話」了。他說：學生們在執政府門前被鎗殺，是他們「自蹈死地」，是「受人利用」，「暴徒首領」應負「道義上之責任」，並且他還要「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羣衆運動」，以免「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而他們的主子段執政卻是好人，完全沒有罪過的。這使魯迅氣憤極了，魯迅指出他們的無恥，他寫道：

「中華民國十六年（此係「五」字之誤——善註）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會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語，決掩不住血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註一）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魯迅又寫道，他指出陳源的陰險的評論道，「本已言語道斷，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註二）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接着魯迅又加上了一句。

偽着更明顯地揭穿「正人君子」們的陰謀，魯迅更詳細地又說道：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佈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佈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着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面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爲「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爲這類譯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裏，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是也許是「刀筆吏」式深文周納。

「去年，爲「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爲「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裏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鎗，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羣衆所攜去的東西；即

（註一）見「全集」第三卷第二四七——二四九頁。

（註二）見同上第二五〇——二五一頁。

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爲他們「嘯聚羣衆」，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着一根不棍，兩支手鎗，三瓶煤油的羣衆。以這樣的羣衆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爲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三月二十六日——菁註）才見於「京報」。這種計劃，在目前的段祺瑞政府的祕書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裏，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註一）

這是魯迅的鬪爭藝術——韌性戰運用成功的又一個例證。魯迅知道得很清楚，通過當前的現實問題，抓住某種惡劣傾向的典型，予以澈底的打擊或揭露；直接地打擊到代表這傾向的私人，而間接地也就打擊到了這一代表的階級全體了。打了狗便打到了主子，要打倒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統治，首先，就必須先去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的叭兒狗先打落水，在水裏又從而打之。這是魯迅教給青年戰士的最特殊最優秀的，最「適合國情」的現實主義的戰法。

從這裏，魯迅指示出來了怎樣通過現實問題，通過現實中的「人」，去解剖，去分析，去了解中

國的社會和中國的歷史。這是魯迅的光輝的鬪爭藝術的又一面。

五六

三月二十五日，女子師範大學爲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羣兩位女士開追悼會，魯迅也到場參加。當他一個人在禮堂外面徘徊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走來問他道：

「先生可會爲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

「沒有。」魯迅說。

「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這位學生有點催促的意思。

追悼會開完，魯迅回來了；過了幾天，在四月初，在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傾注出他對於後輩青年們的深切的愛，和對於壓迫者的強烈的恨，帶着那似乎有點感傷的情調，他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

「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他這樣寫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歌，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牠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爲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

者的靈前。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羣衆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爲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着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羣君的。而且又證明着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爲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鎗，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沈勇而友愛的楊德羣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只有一樣沈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鎗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汗。……」（註一）

再後幾天，魯迅爲着避免他切骨的軍閥官僚們對於他的辣手，在四月十日（註二）左右，從他的家裏便走出避難了。最初，魯迅躲到北京西城什錦坊街九十六號莽原社，白天，他在這裏看書，寫文章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二五七——二六一頁。

（註二） 這是根據林辰先生作「魯迅北京避難考」的說法。此外，尚有荆有麟（即林辰先生這篇文章裏所說的艾雲？）作「魯迅先生避難在北平」（見「魯迅回憶斷片」第二五——二九頁），可以參看。

晚上，他總要出去到東城轉一趟，打聽打聽當天的特殊消息。第三天，突然有三四個青年，來到了萃原社，據說：他們對於「萃原」非常景仰，特地前來訪問，看收不收外稿。這幾個人似乎不認識魯迅，而魯迅也就裝着什麼都不知道，沒有答覆他們的疑問，他們便悻悻的走了。去後，魯迅疑心他們是化裝的暗探，第四天一清早他就裝成病人，移住到石駱馬大街的山本醫院裏去。在這裏住了四五天，又搬到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裏，這次，可真的生起腸胃病來了。他獨自住在一個很小的病房裏，床前茶几上擺着藥瓶，每天只能够吃醫院規定的無鹽無油的淡飯，麥粥，牛奶，蛋糕。過幾天，病好了，移住一間大房子裏，和其他避難的教授們同在一起。這時，忽然從外面傳來可怕的消息，說軍閥官僚們正預備搜查被通緝者的家庭，魯迅很着急，他怕驚擾了年高的母親，便託人將老太太和太太接出寓所，到一家旅館裏去躲避；幸而搜查的事沒有實行，幾天之後，便搬回來。德國醫院不願無病的人在院內多住，魯迅和別的幾個教授便又搬到法國醫院去。過了一些時候緝捕搜查的風聲慢慢沉寂下去了，魯迅在避難期中已借債數百元，經濟無法支持，在五月底便回到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本寓，避難生活告一結束。

在避難中，他寫出回憶兒時生活的散文，「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在避難後，他又繼續寫出了「無常」。這之前，在「三一八」之前，魯迅曾寫好「狗、貓、兔」和「阿長與山海經」等篇，這一些總名之曰「舊事重提」，刊載在「萃原」上面。

此外，又作散文詩「淡淡的血痕中」，「一覺」，以及雜文「大衍發微」，「無花的薔薇之三」，

「新的薔薇」，……等篇，仍舊沒有放鬆對於軍閥官僚和他們的走狗的攻擊。

回到自己的寓所之後，因為在逃難中辛苦了一些，以及在這一個期間工作太繁忙了一些，魯迅的胃病又發作了，休息了相當時間之後，從七月六日起，每天到中央公園去和齊宗頤先生同譯荷爾卜·望·萬覃作童話「小約翰」。(註一)魯迅所根據的是德文本子，是他在二十年前(一九〇六年)在日本求學時候，託東京丸善書店向德國定購的。這書出自弗魯斯女士 (Anna Flus) 的德譯，卷首有齊博士 (Dr. Paul Rucke) 的序文，爲「內外國文學叢書」之一。齊宗頤先生所根據的是英譯本，作爲魯迅譯這書的參照。

約有一個月的光景，在午後的強烈的日光底下，在中央公園的綠樹蔭裏，那穿着淺藍色的竹布長衫的，「正人君子」們視爲眼中釘的魯迅的瘦削的身影，每天都在這裏來往的搖蕩着。

但是，不久，北京的情形又變了。吳玉帥、張大帥都相繼來到了北京，同時，也帶來了肅殺的空氣。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魯迅不得不離開北京了，由津浦路乘車南下，經南京，三十日抵上海。景宋女士同行。

第八章 廈門——廣州——上海：四十六歲至四十七歲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五七

到了上海之後，魯迅便和許廣平女士分手了。她留在上海看看親戚，賣點東西，由海路回到廣州的
女子師範學校去任訓育主任。而魯迅在她之先，在九月二日早晨七點鐘，便離開上海，應林玉堂先生（即林語堂）的邀請，往廈門任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兼國學院研究教授。

九月四日午後一時，魯迅船抵廈門，當天就搬進學校。

因為學校裏教員宿舍尚未造好，魯迅暫住在一間很大的三層樓上，背山面海，風景絕佳，四面幾無人家，離市面約十里，靜養到是好的。氣候也很相宜，白天暖些（約八十七八度）夜裏卻很涼爽。學校要在二十日才開課，剛到這裏，魯迅的生活是比較清閒的。

沒有事的時候，魯迅便到海邊去散步，聽着呼呼的海風，檢了幾回貝殼，一個同事還告訴他說：這山光海氣，春秋早暮各不相同，他又指着海邊的石頭對魯迅說，這塊像老虎，那塊像蝦蟆，那一塊又像什麼什麼……。然而，魯迅對於這一些自然景物，卻早已不感興趣了。只有那隔着他的住所不遠

的一道城牆，據說是鄭成功的抵抗滿清的遺跡，魯迅看到了，有好幾天不能忘掉這一段悲壯的史實。

初到這裏，魯迅覺得還不壞，他打算在這裏住兩年，把先前已經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鈎沉」印出來。可是，不久，他便覺得不對了，和他常在一處的人們，都是「面笑心不笑」，無話可談，真是無聊之至。開學之後，情形並不能好轉，全校學生有三百多人，預科及本科共分七系，每系三級，每級寥寥數人。魯迅所開的課程，原定每週六小時：小說史兩小時，專書研究兩小時，中國文學史兩小時，因為專書研究沒有人選，所以每週的課程只有四小時。但課外的工作卻是非常之忙。他要為學校季刊作文，國學院季刊也要他作文，此外，他還要指導研究員，並且又要編中國文學史的講義。此外還有一種指導編輯書目的工作，這件事範圍很廣大，假如做起來，兩三年也未必能完工。

這個學校的校長——英國籍的中國人林文慶博士，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物，開口閉口，不離孔子，據說他曾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以及一本英文的自傳。他又是吝嗇的人，許多慳吝的舉動，實在令人難受。他又急於事功，魯迅剛到校，他便問履歷，問著作，問計劃，問年底可有什麼成績發表，他把教授當作牛馬看待，以好草喂牛，每天要多擠一點牛奶；對魯迅也催得很厲害。在開學後不久，魯迅便把「古小說鈎沉」拿出來，對他說道：

「我原已輯好了古小說十本，只須略加整理，學校既如此著急，月內便去付印就是了。」

於是，此後沒有下文。沒有稿子他催得兇，真有了稿子他又不準備真心印。這簡直是開玩笑了。再到後來，這位林文慶校長對於國學院的經費預算，也要大大的裁減了，林玉堂出來力爭，他又大吹

起來，說！

「只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付印。」

林玉堂就又勸魯迅把稿子再拿出來，魯迅於是就又把稿子拿出來，放了至多十分鐘罷，便又拿回去了，於是，從此又沒有下文。

此後魯迅就把印「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鈎沉」的希望，自動取消了，把在這裏兩年的計劃，縮短為一年，由一年又改成半年。

這裏的同事們，也多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物。如顧頡剛教授，那時他便「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而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他們這班人，是油滑淺薄的。上講堂裝口吃，會場上唱崑腔，在宿舍裏開留聲機，唱段梅蘭芳，這便是他們的全部學問。除去他們之外，另有一批人物，也是非常有趣的。有希望討喜歡，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員的老外國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結婚，三月復離的青年教授；有以異性為玩藝兒，每年一定和一個人往來，先引之而終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聽糖果所在，羣往吃之的無恥之徒。

魯迅便生活在這樣的一羣人們中間。

他離開了像在北京時候的火熱的鬭爭，他離開廣大的誠摯的青年朋友們，當他一個人從靠近海邊的宿舍移居到圖書館樓上的時候，這無聊、寂寞和煩悶更是不可壓抑的增加起來了。在後來，魯迅回憶到這時的生活，會十分動人的描寫出當時的心境，他寫道：

「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撒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以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他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會經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牠，但我愈想，牠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着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註一）

就在這「淡淡的哀愁」中，魯迅深深地體味到這社會現實的又一面；同時，他就在這「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的沈默裏，他的思維也逐漸地發展向更高的階段。

五八

目前的蕪籍的狀態魯迅看到了很難過，整天是面對大海，翻着古書，四近毫無生人氣息，沒有可

以作爲戰鬥的目標，於是，這時，回憶在他的心裏便出土了。北京的未名社這時不斷地來信，催促他在雜誌上寫文章，魯迅便寫出「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瑣記」等三篇回憶兒時生動的散文，稍後，又寫成「藤野先生」和「范愛農」，連以前在北京避難時前後所寫的一共十篇，後來都收入「朝華夕拾」裏面。此外，他又拾取古代的傳說，預備繼續「補天」之後，再寫七篇，足成八則「故事新編」。此外，還有編中國文學史的繁重工作。

同時，就在這一個時候，在九月裏，魯迅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彷徨」（註二）印行了。十月，編好了雜文集「華蓋集續編」（註二）和「墳」（註三）。

「彷徨」裏面所包括的是從「祝福」到「離婚」一共十一個短篇小說，是魯迅的繼續着「吶喊」之後的，一九二四、二五兩年以內的小說結集。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壓迫之下的舊中國的兒女們愁苦的面貌都在這裏顯示出來了。科學時代的犧牲者，「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後，彷徨無路而終於滅亡的知識份子，封建農村裏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農民，在魯迅的筆底留下了他們的無可奈何的苦痛和悲哀。

在這集子裏的每個短篇，比起收在「吶喊」裏面的，熱情雖然減退了一些，而技巧卻更加圓熟，作風更近於中國化了；逐漸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而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在「吶喊」裏，我們顯然地可以看出來，魯迅所受外國作家的影響是很深的，雖然在他的作品的基本情調上是中國的作風和中國的氣派。「狂人日記」受了果戈理的影響是不用說了，這個題目的名稱就是用得和果戈理的

相同。「藥」的收尾的地方，分明留有安特萊夫的陰冷，這是魯迅自己說過的；同樣，「明天」也是很顯明的沾染着安特萊夫的氣息。「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端午節」、「白光」的作風分明和契訶夫相似，「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在情調非常接近愛羅先珂，這也是清清楚楚的事實。然而，這之間卻有一個顯著的明朗的界限，魯迅的作品是和着那一些殖民地上的買辦文學家們的模仿的歐化文學不同的，在魯迅的作品裏深藏着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外表上也塗上了很濃厚的民族色彩，這在「風波」、「故鄉」，尤其是「阿Q正傳」裏，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傾向在「彷徨」裏發展到了居於主導的地位。

故事的發展有頭有腦，記述之中夾敘夾議，全篇的結構似乎是有條不紊，論斷事實常用第一人稱直抒胸臆，這一些魯迅的表現方法，恐怕是從「唐宋傳奇集」中的那一些短篇學習得來的。敘事的精密、簡明、詳盡，和沈既濟是不相上下的。「肥皂」裏的四銘的虛偽和「儒林外史」裏的范進非常相似，而善於替小說裏的人物起諱名，由這個諱名便可以想見其人的特色這本領，如「藥」裏的紅眼阿義，「明天」裏的藍皮阿五，紅鼻子老拱，「故鄉」裏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阿Q正傳」裏的王鬍子，……這恐怕是從「水滸傳」上學習得來的。在「高老夫子」裏而的好幾段對話，畫出了一個

(註一) 見「全集」第二卷第一三七——三三五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三卷第一七九——三八四頁。

(註三) 見「全集」第一卷第九——二六六頁。

無知者醜態，這和「金瓶梅」上的蔡御史和西門慶的對話（見該書第四十九面），是完全相似的。然而，這之間也存在着重大的顯著的區別，魯迅對於中國文學遺產的授受是和那一些食古不化的新的和舊的國粹主義者不同，他並沒有把「水滸傳」和「紅樓夢」，「金瓶梅」或「儒林外史」，看成「白話文學的正宗」，作為文學作品的範本；他只是有條件地帶着批判的精神去接受這一些文學遺產裏最優秀的傳統的。

在魯迅的作品裏，不但人物是現代的中國人，地方是現代中國的地方，在他作品裏所反映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物和地域的結合，他們的苦惱，的災難，的掙扎，的滅亡，……他都恰恰畫出最真實最準確的中國近代史的一面。孔乙己，陳士成彷彿是我們小時候的私塾裏的老師；方玄綽、呂緯甫、魏蓮受、涓生和子君便是我們知識份子的逼真的典型；阿Q的成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沾上一點，夏四奶奶，單四嫂子，華大媽，祥林嫂，……以及愛姑的悲慘的命運，則是中國社會裏婦女們所共同的，未莊、魯鎮以及存在在這裏的咸亨酒店之類的場面，在落後的封建農村中是到處可以發現的。正在崩潰下去的中國的封建社會裏的形形色色，在魯迅的作品裏被保存下來了。

從這裏，在另一個新的方面，魯迅爲着年青的後一代，他指出了一條鮮明而正確的路綫，向那個方向是應該走的，向那個方向又是此路不通的。

揚棄了外來的、古代的影響，建立了民族形式的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是魯迅的清醒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藝術的偉大成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從中國社會裏，從中國大多數人民身上，發掘創作的

泉源，把筆尖對準人民的生活鬪爭裏面的衝突和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寫出時代最迫切的要求，完成最迫切的戰鬥任務，是魯迅的現實主義的藝術的豐富的內容。

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魯迅所指出的道路是怎樣的道路了。

從這裏，我們也就不難了解，怎樣去學習魯迅的戰鬥的藝術了。

「華蓋集續編」是魯迅在這一年中，——那時他還在北京，和「正人君子」們論戰的文字。現在，他「住在海邊，目前只見雲水，聽到的多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了，「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的集子。

「這裏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他爲着要介紹這書的內容，給專門愛看他的雜感的主顧們，說，「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任牠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以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註一）

此外，在這書的後面，還附上幾封在廈門的通信，和「阿Q正傳的成因」等幾篇文字，作爲「續編的續編」。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一七九——一八〇頁，「題記」，上述括號中的引文，也出自這裏。

在「墳」裏面，除去一九〇七年所寫的幾篇作品之外，其餘的也都是和軍閥官僚以及他們的幫閒幫忙或幫兇的人們的論戰，尤其是最後的幾篇，更明明白白地寫着章士釗、陳西滢、楊蔭榆等輩的名字，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裏，魯迅天才地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辦法，和編印「華蓋集續編」的用意相彷彿，在這本書的「題記」裏，魯迅對讀者們說：

「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着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着，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世界。這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喫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到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爲他就尊你爲烈士了麼？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詳二）

不赤膊上陣，用血肉衝向敵人的刀鋒，這是魯迅的基本戰法——持久的韌性戰法的又一應用。

「華蓋集續編」和「墳」以及前此不久出版的「華蓋集」便是在中國的社會裏，教育青年戰士們對於中國社會的特殊作戰方法最好的教科書。

對於目前環境，這時，魯迅還是堅忍下去。他對付同事們惟一的方法是少說話，採取閉門主義，不和他們來往。但是，這是沒有用的，他們卻偏常常的尋上門來。顧頡剛就說魯迅是『名士派』。

此外，還有許多無聊的應酬糾纏着魯迅，真叫他哭笑不得。有一次，馬寅初博士到廈門來講演了，所謂北大同人，便排班歡迎，魯迅知道銀行是可以發財的，但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他自然不去參加了。然而浙江的學生卻硬要拖他去和馬寅初博士照相，校長要他去作陪客，和銀行家談話，魯迅都一概拒絕了他們。又有一次，太虛和尚到廈門來講經了，於是佛化青年們就提議，叫童子軍捧鮮花，隨太虛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蓮花』之意。可惜，這事並未實行。像這樣的事，的教職員還要硬拉魯迅去作陪客，請他和太虛並排上坐，當場就有羅庸教授稱讚太虛『如初日芙蓉』的昏話；結果，與太虛並坐的事推辭了，飯不能不喫，席間又看了許多醜態才得回來。另外，還有叫人忍無可忍的事，是有時不免要聽校長教授輩的胡說。有一天下午，學校開了一個懇親會，魯迅又被一個同事硬拉去，當場他又看到了一件醜事。他看見了，聽到了，在會場裏竟有這樣無恥的教員，站起來演說：先感謝校長給教員們點心喫，說教員們喫得多麼好，住得多麼舒服，薪水又這麼多，人家應該大發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長對教員如此體貼，真是恩同父母。魯迅真是氣極了，立刻就要跳起來，教

調這個傢伙一頓；但這時已有別一個教員去駁斥他了，鬧得不歡而散。最奇怪的，在教員裏面，竟有一個西洋留學生，對於駁斥那個人的教員，表示了大不以為然。他說，在西洋，父子和朋友不大兩樣，所以倘說誰和誰如父子，也就是誰和誰如朋友的意思。從西洋，他學得了這樣的大識見。這樣，還有什麼話可說哩。於是，他就豪飲起來，帶着醉意回到寢室，靠在躺椅上，抽着烟睡熟了，醒轉來覺得熱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團火，身上肚腹部的棉袍被香烟頭引着了，救熄之後，燒了七八寸直徑的一大塊。從此，魯迅打定了主意，至遲到學期末非走不可了。這時，魯迅從事實裏提取了這樣的經驗，他想到了：

「以北京爲汙濁，乃至廈門，現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乾淨，小溝就乾淨麼？」

當然，這問題不是局部的，而是整個的問題，——整個的澈底改造這一個汙濁的社會的大問題。這時，在魯迅所生活着的區域以外，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就正在進行着解決這一個大問題。這給予了生活在悲憤中的魯迅以莫大的新希望。

還在魯迅還沒有離開北京的時候，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統一戰綫——北伐便開始了。在「北伐宣言」裏表示着全中國人民的這樣的願望：要得到國家的獨立和自由，要人民大眾的利益有保障，首先，必定要打倒禍國殃民的軍閥和軍閥們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在這樣的號召之下，全國各個階層都參加到這如火如荼的鬪爭裏來。七月十三日，國民革命軍便攻克了長沙；九月七日又打下了漢口，圍攻武昌。對於這一些勝利，魯迅感到極大的快慰，予以極

大的關懷。當他剛到廈門不久，在九月十四日寫給景宋女士的信裏說：

「……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甚多，極快人意。報上又常有閩、粵風雲緊張之說，在這裏卻看不出，不過聽說鼓浪嶼上已有很多寓客，極少空屋了，……」（註一）

同月三十日的信裏，他又寫道：

「……看今天的報章，登有上海電（但這些電報是什麼來路，卻不明），總結起來：武昌還未降，大約要攻擊；南昌猛撲數次，未取得；孫傳芳已出兵；吳佩孚似乎在鄭州，現在與奉天方面暗爭保定、大名。」（註二）

雙十節這天，魯迅雖然還在這惡劣的環境裏，但他卻感覺到十分高興，還是在給景宋女士的信裏，他寫道：

「今天是雙十節，卻使我歡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禮，三呼萬歲，於是有演說，運動，放鞭爆。北京的人，彷彿厭惡雙十節似的，沈沈如死，此地這才像雙十節。我因為聽北京過年的鞭爆聽厭了，對鞭爆有了惡感，這回才覺得卻也好聽。」（註三）

這天，他還和學生們一同上飯廳，喫了一碗不大可口的，有大半碗是豆芽菜的麵。過幾天，十月

（註一） 見「全集」第七卷第一三九——一四〇頁。

（註二） 見同上第一五八頁。

（註三） 見同上第一七五頁。

十五日，在信裏他又寫道：

「今天本地報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確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陳儀（孫之師長）等通電主張和平；四、樊鍾秀已入開封，吳佩孚逃保定（一云鄭州）。總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總是真的。」（註一）

十一月五日，國民革命軍果然克復九江，孫傳芳逃往南京。八日，又克南昌；不久，全閩底定。九日燈下，魯迅高興極了，又寫信給景宋女士說：

「……聽說漳州是盟軍就要入城了。克復九江，則其事不甚確。昨天聽到一消息，說陳儀入浙後，也獨立了，這使我很高興。」（註二）

這一連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掃蕩着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們的殘餘勢力，似乎是真像那偉大的狂風暴雨就要來臨了，來洗滌乾淨這土地上的汙穢和腥腥，跟着便送來一個風和日暖的日子，在中國人民大眾的面前，展開一個遼闊的遠景。自然，魯迅也從這一些勝利裏感到無限的歡欣，雖然，在他個人的面前，這時還佈滿着無數的陰雲。

當魯迅生活在這陰暗的影子裏面的時候，景宋女士便給他許多鼓勵和安慰，尤其是在他被幾個惡劣少年如長虹之流攻擊，極端氣憤的時候，在這裏，她寫道：

「……你的弊病，是對有些人過於深惡的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湯蹈火，一旦覺得不副所望，你便悲哀起來了。……」

『……你敢說天下就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麼？有一個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無窮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現在是還有一個人勸你，希望你容納這意思的。』（註三）

此外，這時她又害怕天氣冷了，織成一件羊毛背心，從廣州寄到廈門來；在毛背心裏面還夾上一塊金星石的刻着『魯迅』兩個字的圖章。如此的體貼是無微不至的。

爲了這兩個原因，所以，在這一學期的末尾，魯迅便離開廈門，走向『革命的策源地』廣州，和景宋女士在一塊兒，『時常談談』，『做些有益於人的工作』了。

六〇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魯迅到了廣州。同來的還有許多學生。這之前，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裏，他便接到了中山大學的來電，請他去『指示一切』。那時，因爲他剛到廈門大學，上課不久，不便請假，所以就沒有去。後來，魯迅又聽到中山大學聘請教員之中，也有『現代派』的『正人君子』們，對於往廣州的事，他就很有些躊躇了；雖然在十一月中旬，中山大學的聘書已經寄到，但他卻沒有立

（註一） 見「全集」第七卷第一七九頁。

（註二） 見同上第二二六頁。

（註三） 見同上第二四三—二四四頁。

到動身到廣州去。經過了相當長的考慮之後，他終於毅然決然來到廣州了。對於這次來到廣州，魯迅抱着許多的新希望，他想：『到中大後，也許不難擇一並不空耗精力而較有益於學校或社會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了』。此外，他還抱着一點『野心』，他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綫，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註一）

『雖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着一點沈重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才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註二）魯迅在一月十六日的夜裏，在船上寫給李小峯的信上又會這樣的說道。

這時魯迅將以一個新的戰鬥姿態出現了。面對着碧玉一般的海水，海面上映着皎潔的月色，一大片一大片的銀鱗在閃爍，在搖動，魯迅帶着這樣廣闊的戰鬥的心情，他來到了廣州。

可是，事實和理想相反，魯迅到了廣州之後，他便看出了這不過是『奉旨革命』。他覺得這『革命的策源地』的廣州，並沒有什麼澈底的改革，舊勢力仍然是潛在着。他大失所望了，他知道『不妙』了，同時，他也就冷靜了下來。他要看清楚這事實的真相。

在中山大學裏，魯迅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學系主任，擔任的課程是文學論和中國文學史。他住在校內的最中央最高的鐘樓上，景宋女士是他的助教，（註三）初到時，道路不熟，語言不通，出入也多

由她做嚮導。她又怕學倭裏的飯菜，不合浙江人的口味，每天都由她家裏送些菜香來。

廣州的青年們對於魯迅是已經景仰好久了，當魯迅一到廣州之後，在他們當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動，有在報紙上做文章歡迎的，有親身前來探訪的，有研究他的風貌，甚至於鬚鬚的，他們的一致的要求，是希望魯迅來領導他們從事文藝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然而，他們卻都不知道，這是不十分容易做到的事。

在中山大學學生會的歡迎會上，魯迅隱隱約約地說明這個道理，同時，在這篇演辭裏，他又曲曲折折地帶着十分含蓄的口吻聲明了自己到達此地之後的觀感，他說：

「我是於十八號到廣東來的，前天學生會代表來說明要開一個歡迎會，我想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為我還沒有到享受開會歡迎的程度。這事真有點困難了，若是不說幾句話，那對於諸同學的好意未免辜負了，要來說話，可是又無什麼話可說。

「對於我的本身，社會上有許多批評和誤解，而對於這些誤解和批評，我又沒有工夫做文章來辯護辯護。譬如有人說，我是對社會的鬪爭者，或者因為這句話，引起了諸位對於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並非一個鬪爭者，如果我真是一個鬪爭者，我便不應該來廣東了，應該在北京廈門，與

(註一) 見「全集」第七卷第二二二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三卷第三八八頁。

(註三) 傅林辰先生作「魯迅在中山大學註三」。

憑勢力來鬪爭，然而我現在已到廣州來了。

「從前我很惹人討厭，這裏也討厭我，到了廈門，廈門也討厭我，我實在無地可跑了，這時恰好中山大學委員會打電要我來這裏。」

「我爲什麼要來呢？我聽人家說，廣東是很可怕的地方，並且赤化了！既然這樣奇，這樣可怕，我就要來看，看看究竟怎樣——這樣我便到此地來了。」

「我到這裏不過一禮拜，並沒看見什麼——沒有看見什麼奇怪的，可怕的。就是紅顏色的東西，也不大看見。」

「據我兩隻眼睛所看見的，廣東比起舊的社會，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形，並不見得有兩樣。我只感覺着廣東是舊的，雖則，有許多情形，我還沒有看見到的。」

……

「文藝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見『廣州文學』一樣。因此，我要問廣州許多青年那裏去了！這或者可以解說，他們忙得很！誠然他們是忙一點，有種種運動，種種工作。但那有這麼多人全是忙着？廣州青年在精神上的現在實在太少了，這是什麼緣故？既然不是忙一個字，那就是第二個字懶了。若不是懶，我實在找不出第二句話來說。」

「這樣一個沉靜的社會，於我是很好的。因爲許多朋友，從前相好的來會會我，而許多新的朋友對我又表示好感，所以鬪爭的事還沒有。至於舊的和我們鬪爭的，也沒有在後面跟着來，這樣，使我

懶下去，倒也覺得很是舒服。

「在這樣沉靜的環境下面，要想生出什麼文藝的新運動是不容易的。大家這樣子懶下去是不行的，我們得要緊張一點，革新一點。」

「文藝這個東西大不可少，究竟我們還有意思，有聲音，有了這些，我們便要叫出來，我們有靈魂，也得讓牠叫出來使大家知道。雖然有的是舊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論新舊，也當一齊叫出來。」

「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了，有聲的發聲，有力的出力，現在是可以動了，是活動的時候了。」

「然而有許多青年都有一個怕字在心裏，他們怕幼稚，怕人家罵。幼稚是不不要緊的，最初雖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長起來，發展出去，如一個幼孩，他雖然是個幼孩，但並不覺得幼孩是可羞恥的，所以作品雖然是幼稚，但沒有什麼可羞恥的地方，這是不不要緊的，我們不要怕。有的以為怕人家罵，這也不要緊，若是沒有人罵，反而覺得無聊得很。好比唱戲，台下的拍掌喝彩，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彩，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樣，我們只要，只儘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就是思想舊也不要緊，也可以發表，因為現在是過渡時期。現在縱有舊的思想，也可以叫出來，給大家看看。」

「可是，舊的對於新的是不是全無意義呢？不是的，是很有意義的，有了舊的，才可以表示出新的來。有了舊的滅亡，才有新的發生，舊的思想滅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進步了。故

不論新的舊的，都可以叫出來，舊的所以要滅亡，就是因為有新的，但若無新的，則舊的是不亡了，譬如人穿上新的衣服，但身子仍然是舊的，這是不算亡的好例。

「我以為文藝這個東西，只要說真話，暫時總可以存在的，至於將來，可也不必管牠，這時候是過渡的時代，不過新的運動應該要開始了。我將來能不能有什麼貢獻，是不敢說的，但我希望以中山大學為運動的中心，同學們應該開頭着手努力了。我覺得我是無力來幫忙的——我既無學問，又沒有創作力，況且學問與創作力是不可以並存於同時間的。」

……

「將來，廣州文藝界有許多創作，這是我希望看見的，我自己也不一定站在旁觀地位來說話，其實在社會上是沒有旁觀地位可說的，除了你不說話。我的年紀比較老一點，我站在後面叫幾聲，我是很願意的，要我來開路，那實在無這種能力，至於要我幫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現在我只能幫忙，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我身上。……」

「我這次到廣東，要說帶了什麼好消息來，事實上並不見得是如此，因此我很抱歉，無什麼話可說，我只希望大家努力，至於努力的結果如何，是很難說的。可是大家做總不會錯，做起來總比睡着的好，比像死般沉寂下去的好得多。永久的做，你做了更有人接下去，有什麼思想，有什麼意思，便發表出來，要這樣不斷地努力的幹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這樣不間斷地做下去，將來必然有一定的收穫了。有的人我很不贊成，他們做文藝的東西，做了二三年便不做了，畫也畫了幾年便停

筆了，這都是不好的。……」（註一）

魯迅雖然這樣的說了，不料做主席的某先生——這位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着演說，說魯迅是太謙虛了，就魯迅的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於是魯迅的「戰士」做定了。這叫魯迅真爲難，啞巴喫黃連有苦說不出，後來，在寫給李小峯的信裏，提起這事，他寫道：

「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着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做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註二）

沒有法子，姑且由牠去罷，然而苦矣！於是，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都來了，鬧得個不亦樂乎。魯迅尤其怕演說，因爲牠有指定的時間，不得拖延，說話的範圍，大概也有一定的題目；不問魯迅願意不願意，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把他綁了出去；魯迅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話，但至多以十分鐘爲限。可是，他心裏是十分不舒服的，他常常對熟朋友表示着十分惋惜的說，不料到了這「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這是非常有趣而苦惱的事。

（註一） 見鍾敬文先生編「魯迅在廣東」第八三——九三頁，先生在中山大學學生會上講，當時由林維先

生筆記。

（註二） 見「全集」第三卷第四三四頁。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魯迅便戴上了『教務主任』的『紙冠』，忙碌的時期就來到了。於是點鐘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祕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他就招呼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魯迅說已經優待，別人說沒有優待的辯論；補救考試落第，魯迅說儘不在他，學生說在他，魯迅說無法，學生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魯迅說不難，學生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來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支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晚上，在這鐘樓上，每夜都要有十多匹或二十四匹老鼠縱橫馳驅，這樓上有什麼可喫的，牠們便喫什麼，並且還會把盒子蓋打開。一到清晨，就有三位工友吼出響亮的歌聲，——魯迅所不懂的歌聲。

魯迅真是不勝其煩了，他說：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

其實，這一類事情，麻煩倒是麻煩的；然而最使魯迅感覺爲難的還是在小心翼翼地『謹防扒手』，環境逼着他必須要吞吞吐吐地去做洋八股；做洋八股並不難，難的是在這吞吞吐吐隱約其辭的中間，對於青年們（自然是指純潔的青年們）委宛曲折地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當魯迅到了廣州之後不久，青年們便分成了兩個陣營，在他們之間，已經有點『磨擦』了。有人在當時的官辦的報紙上，登着這樣的一個宣傳廣告；這廣告上說：——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麼』，『這樣做』兩刊物。聞『這樣做』爲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這使魯迅頗爲驚異，他全不知道的事情，怎能够說都是他『先後創辦』的哩。後來，魯迅才知道，真相是這樣的：『做什麼』是共產青年的團體主持的刊物，而『這樣做』卻是和他完全相反的；在『這樣做』的通訊欄內就有這樣的大文，說：『在一般C P氣燄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 P，不祇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 P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這樣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刊物，而官辦的報紙卻偏說，都因他『南來』而『先後創辦』，其用意是不難想見的。所以，這把他弄得莫名其妙了，而說話也就不得不含含糊糊了。當着他被別人連請帶逼，綁票似的拖去講演的時候，他只好去做起承轉合的洋八股了。但是，魯迅卻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意見，雖然外面的壓力是非常之大的。

二月十六日，魯迅曾往香港青年會講演去，題目是『無聲的中國』。他指出作爲統治階級愚民政策的工具的封建文化的毒害，表達這一種文化的工具——反動而艱澀的古文，束縛了大多數的中國人的思想和行動，使得他們變成活『死人』或是『啞巴』，結果是中國就成了無聲的中國。同時，他又指出，在現在，是青年們應該把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的時候了，他說：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主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

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忘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註二）

十九日，又在青年會講演，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更明顯地斥責唱着「老調子」的，贊美封建文化的人們是在替本國的封建的統治階級和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們服務，他從封建文化的本質上把他們利用這「老調子」的陰險的詭計揭穿了。他說：

「……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爲中國人沒有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

敢再唱，將牠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論，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麼，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着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的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

「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他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和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爲什麼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爲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眞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羣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是唱着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力會多起來。因爲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的時候，我們可以靠着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爲，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游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

喫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什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裏。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衆有什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中國人也附和着。但這些事和民衆有甚麼關係？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賣的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痛苦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然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子孫也不能逃……他們還是唱着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裏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
「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裏，就一定長壽，

白影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裏，便不至於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安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賊，到牢獄裏，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監獄是實在最安穩的。』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註一）

這之後，『摩擦』越來越厲害了，巨動的勢力的氣燄一天比一天更加囂張起來，『現代派』的『正人君子』們也一個一個的到廣州來了，這時，魯迅深深感到：雖然，『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鐵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於是在黃花節這一天，『因為謹避「學者」，搬出中山大學』，自己賃房子居住，這房子就在廣州的東堤，叫做白雲樓。

六一

魯迅雖然搬出了中山大學，可是特別『關心』他的人們卻並沒有因此而放鬆了他。他們對於魯迅依舊是探聽，訪問，研究，連請帶逼地拖去講演。沒有法子，魯迅只好依舊上台去做起承轉合的革命八股；但在言語當中，卻不能壓抑下他的憤怒，帶着尖銳的鋒芒，向着洋洋自得的權貴們諷刺幾句，

揭露出他們的不可掩飾的醜惡來。

四月八日，黃埔軍官學校要他去講演，他便去了，他於是就講：「革命時代的文學」。他開始便這樣說道：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着沒有來。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邀我來，大約是因為我會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鎗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啾啾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啾啾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會開口的喫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

不提了，大家倒傳誦着看誰的輓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的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爲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爲不算什麼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牠，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爲沒有一刻不在革命。……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都還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爲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喚起牠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爲止於叫苦和鳴

不平。……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喫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潰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弔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着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輓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

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是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王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斬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些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弔亡輓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麼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麼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家地裏的生活，入學教養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吳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齣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

民——工人農民——爲材料，做小說做詩，他們也稱之爲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爲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託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學，一看好像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爲是平民之音了，因爲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得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爲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砲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造的詩句，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砲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砲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註一）

講演完畢，當場有一位委員，表示非常佩服，並且約魯迅到他的官邸去吃飯，魯迅再三推辭不掉，只好前往應酬。酒席是很豐富的。但是，在吃飯時候，魯迅發覺了這位委員對他再三的恭維，都是假意的；實際上，這位先生是什麼也不懂的俗物，更不必談文學了。他所說的對於魯迅的講演，怎樣佩服，怎樣贊同，都是騙人的，於是魯迅就很討厭他了。這時，剛巧上來一道菜，這委員對於此菜，稱讚不置，並且說：這菜是某先覺喜歡吃的，而現在做出這菜的人，就是先前替某先覺做菜的廚子。這真是恭維到了極點了，而魯迅的筷子卻一動也不動，冷冷地說道：

「我就是不喜歡吃這一樣菜。」（詳見）

結果，是不歡而散。

這之後的局面愈演變愈惡劣了，四月十二日，在上海便演出了「四一二」的『苦迭撻』的慘劇，反革命的陰謀家和劊子手公開地屠殺工人羣衆工人領袖以及共產黨員，在廣州也一樣，四月十五日，同時大學逮捕和屠殺革命份子與共產黨員，中山大學的學生也有許多被捕，魯迅當天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設法營救被捕學生，無效，他便把中山大學的所有的職務辭掉了。

這時，他仍舊住在東堤的白雲樓。

六二

以「四一二」的『苦迭撻』爲轉捩點，中國的革命又進入了另一個新階段，反動的資產階級退出

了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而拼命地向後轉，轉到國際帝國主義者們的懷裏去，自甘墮落，爲虎作倀，充當屠殺自己昨日的忠實的好朋友——忠於革命事業的工農階級——的劊子手。國共合作的基礎，從此便破壞了。這實在是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的進步的人士，所應當認爲莫大的可惜的事。

有了國共的密切的合作，孫中山先生的偉大的理想才能够逐步的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能够完成，全中國的人民才能够從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封建軍閥的底下，爭得自由和解放，中國的民主革命才能够得到成功。在合作時，國共兩黨的互相幫助，互相發展，這不僅是對於中國共產黨是有利的，對於中國人民大眾是有利的，就是對於常常以領導者自居的國民黨也是有利的，這或者使得牠所得的利益，也許更多些。在合作時候，國民黨的力量才大大的發展起來，國民黨的名譽才大大的提高起來，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可以說是國民黨的空前盛舉。但是，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反動勢力卻是反對這個的，他們是堅決地反對國共合作的。這一個陰謀，不僅加害於中國共產黨，而受害最大的是國民黨，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國民黨只要是背叛牠的盟友了，牠的名譽和威望便立刻一落千丈，爲中國的和世界的進步的人民所唾棄，不得不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低頭，回到反動的開倒車的路上去。這道理和事實都是很明顯的，嗚呼！有許多人就不明白這個。

（註一）見「全集」第三卷第四〇二——四一〇頁。

（註二）請參「別有講作「孫迅的個性」。

托派也是不明瞭這個道理的。他們也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不但反對而且從中破壞，對於這一次「四一二」的「苦迭撻」，他們也就乘機攻擊國共的合作的「罪過」了。這未免「左」得「可愛」了，這說明了什麼呢？除了在客觀上效忠於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勢力而外。

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中國的革命卻進入了更高的階段。雖然反動的資產階級離開了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跑到反革命的陣營，但在這隊伍裏，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同時也就加強了。這時，在武漢的國共合作的領導之下的工農羣衆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就向着這一傾向。發展向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更澈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鬭爭。但是，這時，在廣州反革命的勢力卻到處伸出罪惡的腥膻的血手，空氣裏也充滿着殘殺的景象。

魯迅在這時也變成了一隻招人疑忌的「烏鴉」了。原來要他作序的書，往往借故取回，期刊上有他的題簽，也都趁機換掉；有一種報紙，則竭力不使有「魯迅」二字出現；又有一種報紙，則奚落他爲「雜感家」；最險惡的報紙，則又說他已經逃走，並且說是逃到漢口去了。在這時，漢口是去不得的，這時的漢口還沒有「清黨」，不是共產黨員怎麼會向漢口逃走哩。和他同來的學生，也因爲認識了他而沒有學校可進。此外，便是英雄豪傑之士們動動懇懇地來探訪，調查，研究，請他講演，藉此以觀察他的態度。圍繞在他的周遭的環境是惡劣極了，危險極了，甚至於當心着莫吸從哈爾濱或海參崴輸進來的捲烟。但魯迅卻忍耐着巧妙地應付過去。他不但不逃走，如別人在這時所捏造的；有人來探訪他了，他就大談其安特萊夫、妥斯托也夫斯基，有人來請他講演了，他就大講其讀書問題，魏

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聽的人覺得奇怪、有趣，而結果是摸不着頭腦，奈何他不得。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魯迅也不會放下他的工作來，他寫下了許多鋒利的雜文，他沒有停止對於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治下的鷹犬的攻擊。

趁着這一個機會，『現代派』的『正人君子』們，或是離開了廈門大學的『山河永固』的飯碗，或是捨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胡同』，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來到這青天白日的旗下『服務』了。首先，對着魯迅開炮的是顧頡剛教授，在七月二十四日從杭州寄給魯迅一封信，命令魯迅『暫勿離粵，以候開審』，他將在九月中回粵，提出魯迅不知在什麼地方損害他的名譽的訴訟，魯迅直接了當地回掉了他，在覆信裏，魯迅寫道：

『頡剛先生：

來函謹悉，甚至於嚇得絕倒矣。先生在杭蓋已聞僕於八月中須離廣州之訊，於是頓生妙計，命以難題。如命，則僕尚須提空囊賃屋買米，作窮打算，恭候偏何來遲，提起訴訟。不如命則先生可指我爲畏罪而逃也，而況加以照例之二傳十，十傳百乎哉？但我意早決，八月中仍當行，九月已在滬。江、浙俱屬黨國所治，法律當與粵不異，且先生尚未啓行，無須特別函挽聽審，良不如請即就近在浙起訴，爾時僕必判杭，以負應負之責。倘其典書賣褲，居此生活費昂之廣州，以俟月餘後或將提起之訴訟，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註一）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五一——五二頁。

跟着顧頡剛教授而來的，但面目卻稍有不同的是陳源即西澹教授的「閒話」廣告，不知怎的，把魯迅在「文藝界」裏陞高到「首領」的地位，那廣告是這樣的：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裏說：「北京究竟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宅主將——西澹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瞭。現在我們特地和西澹先生商量，把「閒話」還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爲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澹先生的文筆的，

研究西澹先生的思想的，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然而，魯迅卻把這「首領」頭銜，自動地「革」掉。他針對着這廣告，寫道：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也幾乎要去買一本。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被「正人君子」指爲「學匪」，還要「投昇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澹先生，我也記得

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灣先生是即刻叫他「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着「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裏從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竊取「琵琶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陞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會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本來在房裏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鬪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嘩嘩嘩」。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

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着「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爲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陞爲「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叭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沫去。不一定要存梁上，插着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章，便以爲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牠的氣味還未明瞭，再要去嗅一嗅，那是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爲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註二）

這之後，不久，在九月底魯迅和景宋女士離開了廣州。

（註一） 見「全集」第三卷第四五八——四六〇頁。

第九章 被圍攻：四十七歲至五十歲

——一九二七——一九三〇——

六三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魯迅由廣州回到上海，八日，卜居景雲里二十三號，與許廣平女士同居。關於這件事，老早就有人傳說了，當魯迅一個人住在廈門的時候，北京和上海兩地都傳說得很厲害，說他帶着景宋女士已經在廈門同住了，這「流言」似乎很有效力，就是魯迅的學生章川島先生也信以為真，他從北京來到廈門。看見魯迅一個人住在高樓上，覺得頗為詫異；後來，他便把這事告訴了魯迅。魯迅在那時很為生氣，但不久也就算了，隨他們罷。現在，他和景宋女士在上海同居了，以前曾經囑囑的人們又怎樣呢？他們倒反啞口無言了。後來，魯迅在給韋素園先生的信裏，曾提及這事：

「至於「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用島到廈門以後，才聽見的。他見我一個人住在高樓上，很駭異，聽他的口氣，似乎是京滬都在傳說，說我搗了密斯許同住於廈門了。那時我很憤怒。但也隨他們去罷。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麼都不管的。後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

裏——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在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真是沒有骨力。」

(註一)

這時，茅盾先生也剛由武漢回到上海，魯迅的寓所和他的同在一個弄堂裏。這時，因為茅盾先生的行動不能自由，魯迅便和三弟周建人先生到他的寓所來看他。這是他們最初的相識。(註二)

當魯迅初到上海的時候，郁達夫先生也會到旅館來看過他，他們談話談得很久，直到中午，他於是就約魯迅和景宋女士以及在座的許欽文先生去吃飯，吃完了飯，茶房端上咖啡來，魯迅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的口氣，對她說：

「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罷！」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裏，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郁達夫先生在他的回憶裏，這樣寫道。(註三)

自此以後，魯迅便和許廣平女士在上海住下來了。

在同月內，「野草」印成。在「野草」印出之前不久，在七月裏，「朝華夕拾」便印出來了。

(註一) 見「魯迅書簡」第一〇——一一頁。

(註二) 請參看茅盾先生作「紀念魯迅先生」。

(註三) 請參看郁達夫先生作「回憶魯迅」。

「朝華夕拾」和「野草」都是魯迅的詩一般的散文的結集，是魯迅的雜文以外的散文又一天才的發展。收集在這兩本書裏的魯迅散文的風格，若從魯迅的作品的內在發展來說，這風格是非常奇特的。從某些方面說，「朝華夕拾」裏面的回憶文，和「吶喊」裏面的「社戲」是非常相似的；而「野草」則和「熱風」在許多地方非常接近。但是，我們若是仔細分析起來，「朝華夕拾」和「野草」裏面所收集的文章，和「社戲」和「熱風」裏的文章，卻又大不相同了。

由於目前情況的蕪雜，回憶在心裏便出了土，在轉徙流離的生活中，魯迅寫出了「朝華夕拾」裏面的十篇回憶文。兒時生活的歡欣，故鄉景色的秀麗，記憶中的人物淳樸和敦厚，這給予魯迅以生活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上也增加了一些明媚動人的，帶着很濃的抒情氣味的描寫。但是，透過了這一薄膜，那不可言喻的悵鬱和淡淡的哀愁，便流露出來了。在「野草」裏也一樣，但這種悵鬱和哀愁卻化爲強烈的憤怒和憎恨，這種不可壓抑的憤怒和憎恨，像是在爐子裏鍊了許久的純鋼的匕首，脫手向龐大的岩石上一擲，在黑暗中迸射出無數的火花。

要尋究出這一種風格的現實的背景和牠的歷史根源，這確乎是一件困難而又複雜的事。像「朝華夕拾」中的以及「野草」中的如「好的故事」那些優美的散文，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裏，實在找不到適當的比擬，用句抽象的老話來，真是如「流水行雲」，作者心裏有什麼感觸，就寫出什麼感觸，並且寫得淋漓盡致，文字和內容融合到恰到好處，這恐怕是吸收了從魏晉以來的所有的中國散文裏的優秀傳統，而又在現在的中國社會的現實裏創立了自己的風格。收集在「野草」裏面的短文的風格，那是

更加複雜的，除了中國的文學傳統的影響，此外也許受了一些佛經文學的影響，以及以進化論的進步觀點（這是對於封建社會來說的）作爲內容用凝鍊的文字表現出來。這便形成了一種如此奇特的風格。

不論這種風格是怎樣的奇特，但是，這卻不是不可了解的。在這些作品裏面，不論牠們含有佛經的影響，或是進化論的影響，或是中國的文學遺產裏的優秀傳統也好，然而，最重要的是在現在的中國社會的，戰鬪的現實裏，魯迅卻把牠們在戰鬪的意義上統一起來了。這帶着戰鬪性極強的內容便形成了魯迅的自己的風格；雖然這風格是受了不少的其他的影響，在表面上存在着奇特的，似乎不可解的謎一般的外貌。

悵鬱、哀愁、與憤怒、憎恨雖然是在外表上截然不同，但是，若從另一個意義上說來，卻又只不過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底兩面，牠們同是對於舊社會表示不滿或抗爭的。在現實的社會的基礎上，在對於舊的行將崩潰的社會戰鬪的意義上說來，牠們在本質上直接地否定了舊的存在，也就等於在間接上幫助了新的成長。這之間的差異是不太大的，或者說幾乎沒有什麼差異。

可是，有許多論客，他們就不懂這點粗淺的道理。在後來，當着太陽社圍攻魯迅的時候，牠的主帥錢杏邨先生就帶着意氣，作這樣的謬誤的批評，他說：

「在這時（指魯迅作「野草」和「朝華夕拾」的時候——善註），魯迅是停滯在他原來的地方。他沒有牢牢的抓住時代的輪軸，隨着它的進展而進一步去把握這個已經展開了的新地，重行開始他的新的反封建的創作。這樣，顯然在魯迅作品中的世界被破壞了以後，他又進一步的失卻了強有力的創

作的依據，他祇有「吾將上下而求索」了。在什麼都「求索」不到的時候，他祇有切斷了他的創作的生命，寫他的開始生長的悲觀哲學（這是指「野草」說的——善註），和他的兒時的回憶（這是指「朝華夕拾」說的——善註）了。魯迅在這時是又感到了失卻了他自己的地球的悲哀。」（非二）

這樣的批評，是大錯而特錯了。錢香邨先生不能夠了解：作爲一個戰士的魯迅，他的生活並不會和現實的社會脫了節，他的悵鬱和哀愁正是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悵鬱和哀愁，他的憤怒和憎恨正是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憤怒和憎恨，假如他曾經有過「悲觀」——他是從沒有悲觀的——的話，這「悲觀」也正是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悲觀」。

這已經是非常普通的真理了，真正的創造歷史的人民大眾是決不會悲觀的。『開始生長悲觀哲學』的，只是那一些『失卻了他自己的地球』的，遨遊在幻想的天空裏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們。但是，事實告訴過我們，魯迅不屬於這樣的一羣，他生活在現實的中國土地上。

六四

在上海的許多學校，聽說魯迅到了，便紛紛地來邀約魯迅去講演。有些學校還想請他去教書，但魯迅謝絕了他們，從此專心致力在著述和翻譯的工作上。這時，大學院院長是蔡元培先生，特聘他爲特約著作員。

這之後，魯迅便定居在上海，展開了他的輝煌的戰鬥工作又一面。

真是天不巧得很，剛上陣便碰到了上海灘上的『革命文學家』們，並且被他們『圍剿』了。

自從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的『苦迭撻』之後，中國的革命便變了質，在東南一帶的革命陣營起了很大的分化作用，革命與反革命的面目顯露得都非常清楚。但是，在這時，在武漢的革命陣營之內的反革命的勢力，還沒有露出狐狸尾巴來，可是上層分子卻就開始動搖和慢慢走向變節的路上去了。內部的『磨擦』到處發生，及至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便明目張膽地舉行清黨運動，把共產黨份子從國民黨內清出來，國共於是正式分裂了。以汪精衛爲首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背叛了自己的盟友，也開始屠殺工農羣衆和革命的知識青年。從此，中國的革命走向更艱苦的階段，中國人民墮入水深火熱的生活，歷史循着一個曲折和複雜的道路前進着。這是全中國人民最重大的，最痛心的無法賠償的損失！同時，也是最慘痛的最不幸的千萬不能夠再犯的錯誤的教訓！

由於革命受了阻礙，不能順利地進展；直接參加革命工作的文學青年們，又遭遇到殘殺和迫害，『革命文學』當然也就不能順利地推行了。於是從大革命的低潮裏退出來的人們，輾轉漂流到了上海灘上，提出了沒有內容的空洞的『革命文學』的口號；而他們又認不清在革命進程中的敵和友，『革命文學』的統帥們第一個便拿魯迅來『祭旗』了，這是大錯而特錯的。

在當時，『圍攻』魯迅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提倡『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和太陽社諸位先生們不用說了，就是那一些其他的並不標榜什麼文派的人們，或是作家或是教授，也要在文字裏暗暗地奚

落魯迅幾句，這樣，才足以表示他們的高明。這更是無聊的浮妄輕薄的舉動。這並不能損害到魯迅的毫末。

『革命文學家』們對於魯迅的攻擊，往往是『解剖刀不中膝理』的，連魯迅屬於那一個階級，他們都不能夠確定。於是『第一個有聞，第二個有聞，第三個還是有聞』啦，『有聞即有錢』，魯迅便成爲『中毒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了。但他似乎又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似乎是『小資產階級』的『沒落者』；這似乎又大不像，於是便確定他是『封建餘孽』了。可是，不久又改變了，他原來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於是他又『被判爲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魯迅的作品則被認爲是『阻礙』了，或者是『嘲笑』着革命；而最『革命』的『革命文學家』如葉蠶鳳之流，上毛廁都要拿一本『吶喊』揩屁股，非如此，是不足以表示他『革命』革得『澈底』，非如此，是不足以表示他的『革命文學家』的風度於萬一的。此外，甚至於連魯迅的態度、年紀、酒量以及牙齒的顏色，也都成爲他的攻擊的目標了。這真是天知道，不知從何說起了。

魯迅並沒有沉默，對他們也都一一回敬了；並且爲革命文學指出了明確的道路。

一九二八年二月，魯迅在雜文『『醉眼』』中的『朦朧』裏面，指斥着在『革命文學家』們當中，某些投機份子的機會主義的傾向，他寫道：

『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

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鏈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於是在這裏留着一點朦朧。於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裏，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着人稱託爾斯泰爲「卑汗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佈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澈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註一）

這樣，還高談什麼「革命文學」哩！

「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鬭爭和所謂超時代。」談到那時文藝與革命的問題，魯迅在答覆冬芳先生的信中，又寫道：「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人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着，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爲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鬪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爲什麼不鬪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着，於是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爲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尙且不愛俄人，這實在無須鬪爭文學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牠，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曾經當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是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爲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稻香村」，「陸稿廬」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是因爲牠是文藝。

「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註一）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註二）魯迅又寫

道。這實在比眼睛近視的人們，互相爭值着一塊懸在廟裏的匾上的字的真假，其實這匾還沒有掛出來；比這樣的事情還要好笑得多。所以，魯迅便主張有人出來，能切切實實地做出一些介紹理論的工作。他說：

「有馬克思學識的人來爲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註三）

當然，魯迅這話是正確的；可惜的是：「革命文學家」們在當時卻沒有能夠了解到這一層。

六五

正當魯迅被創造社與太陽社『圍攻』的時候，一九二八年二月，「唐宋傳奇集」全部印成。這書，在魯迅還沒有離開廣州，當他住在白雲樓上正被人們探訪、調查、研究的時候，就已經整理好了。一九二七年底印出上卷，現在又印出下卷；全書一共八卷，計四十八個短篇，爲六朝以下唐宋單篇小說的總集，考訂至爲精審，匡正前人謬誤的地方頗多，比較起鄭振鐸先生所編選的「中國短篇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九四——九五頁。

（註二） 見同上第九七頁。

（註三） 見同上第一三六頁。

小說集」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⑨ 六月，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思想・山水・人物」(註)譯文印行。以前譯成的有十二篇，現在又譯成八篇，合成一書，在上海的『革命文學』的潮聲中，把這書中的『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的部分，移譯出來給讀者們看看，這不是沒有益處的。

十一月，第五本雜文集「而已集」(註)印行。這集子裏所收集的都是自一九二七年間的雜文。在題辭裏他寫下了這樣的話：——

「這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

在這樣情況之下寫出來的文字，風格和以前的雜文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像「熱風」裏面的文字

的潑辣的單刀直入的作風是沒有的，也沒有像「墳」裏面的某一些洋洋洒洒的大文，或是痛快淋漓的直抒胸臆；而是委宛曲折，「吞吞吐吐」的從側面把意思表現出來，在許多篇裏倒是和「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的帶刺的含蓄的作風相近似，但是，在另外的許多篇裏，卻又是非常尖銳而且特別露骨的；而另外的又有一些卻又比「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裏的晦澀得多了。總起來說：像這一個時期的中國的社會的變革，和這一些變革反映到魯迅的腦子裏所引起的思維相似，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在「而已集」所表現的正是這樣的非常錯綜複雜的，沒有確定的，正在形成中的作風。雖然這一些雜文是在一年之內寫出的，可是，我們要勉強地指出這其中的某一種作風是佔着主導地位，這是十分困難的事情。無已，這種沒有什麼作風的「作風」，也許就是這「轉變」期中的特色罷。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在這裏留下了被壓抑的沉痛，慙鬱，苦悶和憤懣的，然而卻是正在跳蕩着的心底影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魯迅暫時地離開上海，到北平去省親。在北平逗留了約有二十多天，看看舊日的老朋友們，整理整理存在家裏的書籍和日記，此外，便是應各學校的邀請，去作公開的講演。

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上講「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對於「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家」們，魯迅提出了很懇切的指責。

(註一) 收入「全集」第十三卷第三八五——六四二頁。

(註二) 收入「全集」第三卷第三九一——五六六頁。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魯迅特別加重文學與現實的政治變革的關係，他這樣說：「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爲什麼呢，因爲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激，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喫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數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着「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爲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之後，「重見漢宮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爲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鍊。但後來，詩人葉遂甯，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爲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不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

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澈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爲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有人推爲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又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上一個鐵鏈，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直說，使大家看去，爲仇爲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却故意購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強紅

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论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註二)

二十九日，又往北京大學講演，題目是「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魯迅看到了現在的「正人君子」們，正在打算搖身一變，由軍閥官僚的走狗混進黨國新貴的羣中，所以，藉此給他們一刺。他

說：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爲兩大類：(一)廟堂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閒；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下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閒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閒，那麼，心裏就甚是悲哀了。」

魯迅爲着講起來方便，他把中國文學分成這兩大類，揭穿了這一些人們的祕密，接着他又說道：「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徵君；開當舖，賣糖葫蘆是不會被徵的。我曾經聽說有人做世界文學史，稱中國文學爲官僚文學，看起來實在也不錯。一方面固然由於文字難，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來，中國文學和官僚也實在接近。」

「現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於看不出來。今日文學最巧妙的有所謂爲藝術而藝術派。這一派在五卅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爲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

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爲藝術而藝術派對俗事是不問的，但對於俗事如主張爲人生而藝術的人是反對的，則如「現代評論」派，他們反對罵人，但有人罵他們，他們也是要罵的。他們罵罵人的人，正如殺殺人的人一樣——他們是劊子手。

「這種幫忙和幫閒的情形是長久的。我並不勸人立刻把中國的文物都拋棄了，因爲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不幫忙也不幫閒的文學真也太不多。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閒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喫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爲文學與喫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閒就好。」（註二）

這話使得某些人聽來是很不舒服的。有一天，在某一個場合，魯迅和胡適之博士碰見了，胡博士便向他帶着一點開玩笑的口吻，說：

「你又捲土重來了。」

「我馬上就捲土重去，決不搶你的飯碗。」魯迅冷冷地回答說。

「還是老脾氣呵！」胡博士蒼極了。

「這叫做至死不變。」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一四六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七卷第七八三——七八四頁。

這時胡適之博士正是忽而反對國民黨，忽而又想做國民黨的官，所以魯迅便這樣的當面諷刺了他幾句。(註一)

對於魯迅的話，青年們是最熱烈歡迎的。許多青年學生們以及魯迅的舊日的老朋友們都紛紛地邀請魯迅到他們的學校裏去教書，魯迅又都一一謝絕了他們。在講演的第二天，他到西山的醫院去看看韋素園先生的病；不久，再後幾天，便回上海了。

這時，韋素園先生的病是已經很重了，據醫生說恐怕是不會好的。三十日一清早，魯迅就和李聲野先生等四個人，踏進了醫院的病房；這病房的壁上掛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畫像，魯迅看到了這位用筆來使讀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作家的苦臉，他便立刻想起了有人似乎說過韋素園先生原有一個愛人，因為他沒有全愈的希望，已與別人結婚；魯迅便聯想到韋素園先生不久就要死去的，這是中國的一個損失的事情來，於是他覺得心臟一縮，暫時說不出話來。但立刻他卻又裝出笑容來，很愉快的談話便開始了。韋素園先生的精神倒是很好，只是瘦些，因為日光浴，曬得很黑，醫生不准他坐起，只好躺着談天了。談了許久，韋素園先生才想讓魯迅吸烟的事來，讓了好幾次，魯迅只是搖頭說：

「不吸了。」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戒絕了烟，而是爲着避免病房裏有烟味，這對於病人是不相宜的。韋素園先生再三說是對他自己無礙，魯迅這才走出病房，站得遠遠的吸完了一枝紙烟。

「這是小事，是的；然而小事正可以見體貼。先生對素園說，對於北京的朋友是常常懷念的，在接素園逝世的消息時，他深以不能再圖歡晤爲哀。素園逝世後，有些令我們悲憤的事件，我和先生幾次

暗談時，他都絕口不提，因我提起而偶一談到，他也只有傷感，絕無諷刺，這種動人的體貼，不是高貴的性格是不會具有的。『後來，在韋素園先生逝世後，李霽野先生追憶到這件事，曾這樣寫過。』(註二)

六月五日，魯迅回到上海。

九月二十七日早晨，景宋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十月一日爲這孩子命名曰：海嬰。

六六

正當魯迅被創造社與太陽社『圍攻』的時候，『革命文學家』們所沒有做的，或是不願意做的，然而卻是極重要的工作，魯迅卻一點也不聲張地做了出來。一九二九年二月譯成日本片上仲作「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註三)，六月，據日本昇曙夢日譯本，重譯成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註四)十月，又據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輯的日譯本，重譯成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註五)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這書的內容，是把從蘇聯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以來，在文學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的論爭，作一個簡單而明瞭的介紹。這是講到新興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最初的入門書籍。魯

(註一) 請參看荊石麟作「魯迅的對事與對人」。

(註二) 請參看「憶魯迅先生」。

(註三) 收入「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八五——二三八頁。

(註四) 收入「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七三——三二七頁。

(註五) 收入「全集」第十七卷第二四一——四四七頁。

迅翻譯這書的意思，是要使得整天亂嚷亂叫的『革命文學家』們知道，革命的新興的文學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書的「小引」裏，他寫得很明白：

「至於翻譯這篇的意思，是極簡單的。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敵對者也以為將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載，終於火滅烟消。如什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彷彿都已過去了。其實又何嘗出現。現在藉這一篇，看看理論和事實，知道勢所必至，平平常常，空曠力禁，兩皆無用，必先使外國的新興文學在中國脫離「符咒」氣味，而跟着的中國文學才有新興的希望——如此而已。」

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所包括的範圍是非常廣闊的，是一本以實證美學為基礎的科學的藝術論。這書的依據是生物學底社會學，書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物理，化學，哲學的問題很多；但主要的觀點，仍是在用科學的社會主義來解釋藝術與產業，藝術與階級，藝術與生活，以及其他的美學上的問題。

「文藝與批評」是幾篇重要論文的結集，是作者以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批評文藝的本質和作家的書。魯迅把牠譯出來，作為那些『高唱自由主義的「正人君子」』們，和『大叫「打發他們去」的「革命文學家」』們的『一帖喝得會出汗的苦口的良藥。』

譯文仍然都是直譯的，就是如梁實秋教授所說的『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綫索位置』的『硬譯』的方法。

然而，「革命文學家」們是看不起這工作的，「正人君子」們卻更要來咒咀牠。於是，就有人說他翻譯這些書是「不甘沒落」，有的小報上，則說他譯「藝術論」是「投降」，而在太陽社的雜誌「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他是「方向轉換」了。有的人則說這些譯文是「死譯」，譯出來看不懂，其實等於自譯。魯迅對於他們，都有確當的答覆。

他說道：

「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爲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那些連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爲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着我所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够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註一）

可是，有許多太「革命」了的「革命文學家」，還是不能够了解這工作的意義的。瞿秋白先生在他分析這一段有歷史意義的論爭時，會有極精確的見解。首先指出這些「革命文學家」們的階級根性，他寫道：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二三二——二三三頁。

「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裏迅速的積聚着各種「蕩海民」(Pa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識青年。這種智識階層和早期的士大夫階級的「逆子貳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結果，同樣是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官僚的犧牲品，同樣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但是，他們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們和農村的聯繫更稀薄了，他們沒有前一代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傳染了歐洲的世紀末的氣質。這種新起的智識份子，因為他們的「熱度」關係，往往首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是，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如果不堅決克服自己的浪漫諦克主義。「這種典型最會輕蔑地點着鼻子說：『我不是那種唱些有機的工作，實際主義和漸進主義的讚美歌的人』。這種典型的社會根源是小資產者，他受着戰爭的恐怖，突然的破產，空前的飢荒和破壞的打擊而發瘋了，他歇斯替利地亂撞，尋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無產階級而贊助牠，別方面又絕望地狂跳，在這兩方面之間動搖着。」(烏梁諾夫)這種人在文藝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養天才的泥土」，而「很早就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墳」，「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們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暫時失敗了，他們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極，有些叛變，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藝一瞥」)於是要「包辦」工人階級文藝代表的「事務」。

接着他指出了這些「革命文學家」們的錯誤，瞿秋白先生又寫道：

「創造社等類的文學家，單說真有革命志願的（像葉燻鳳之流的投機分子，我們不屑去說到了），也大半扭纏着私人的態度，年紀，氣量以至酒量的問題。至少這裏都表現着文人的小說集團主義。」

「這時期的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而還有人說：那是魯迅「投降」了。現在看來，這種小市民的虛榮心，這種「剝削別人的自尊心」的態度，實在天真得可笑。」（註一）

對於這次論爭，馮雪峯先生的批評是恰當而且公允的。論及革命與知識階級的關係，他說：

「創造社改變了方向，傾向到革命來，這是非常好的事；但他們沒有改變向來的狹小的團體主義的精神，這卻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雜誌有半本是攻擊魯迅的文章，在別的許多地方是大書着「創造社」的字樣，而這只是爲要抬出創造社來。對於魯迅的攻擊，在革命的現階段的態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創造社諸人及其他等的攻擊方法，還含有別的危險性。革命現在對於知識階級的要求，是至少使知識階級承認革命。但我們在魯迅的言行裏完全找不出詆毀整個的革命的痕迹來，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學的運動（他也並沒有嘲笑革命文學的本身），嘲笑了追隨者中的個人的言動；而一定要說他這就是詆毀革命，「中傷」革命，這對於革命是有利的嗎？而且不是可笑的嗎？對於一切的惡意的詆毀

（註一）見「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者，爲防禦自己起見，革命要毫無猶豫地擊死他們；革命也正不必遮隔一切，但將不是詆毀革命者強要當作詆毀者，是只有害處沒有益處的。』(註十)

六七

正當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諸位『革命文學家』們拚命地『圍攻』魯迅，好像不把魯迅打倒，革命文學便不能夠順利地發展的時候，真正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的新月派的文人乘機露出頭角來了。這個文學團體是由徐志摩、梁實秋、沈從文……諸位先生組成的，在一九二八年開始出版『新月月刊』，在這刊物的創刊號，他們抬出了一塊『健康與尊嚴』的大招牌來。在這煌煌的大文裏，他們官腔官調地表示他們的『態度』了，把別人罵得一文不值。在這妙文裏，這樣寫道：

『不幸我們正逢着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這又是一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

『先說我們這態度所不容的，我們不妨把思想(廣義的，現代刊物的內容的一個簡稱)，比做一個市場，我們來看看現代我們這市場上看得見的是些什麼？如同在別的市場上，這思想的市場也是擺滿了攤子，開滿了店舖，掛滿了招牌，扯滿了旗號，貼滿了廣告，這一眼看去辨認得清的至少有十來種行業，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誘，我們把牠們列舉起來看看：

- 一、感傷派
- 二、頹廢派
- 三、唯美派
- 四、功利派
- 五、訓世派
- 六、攻擊派

- 七、偏激派 八、織巧派 九、淫穢派 十、熱狂派 十一、稗販派 十二、標語派
十三、主義派

商業上有自由，不錯。思想上言論上更應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錯。但得在相當的條件下，最主要的兩個條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折辱尊嚴的原則。……

「同時在思想的市場上我們也看到種種非常的行業，例如上面列舉的許多門類。我們不說這些全是些「不正當」的行業，但我們不能不說這裏面有很多是與我們所標準的兩大原則——健康與尊嚴——不相容的。我們敢說這現象是新來的，因為連着別的東西思想自由這觀念本身就是新的。這也是個反動的現象，因此，我們敢說，或許是暫時的。先前我們在思想上絕對沒有自由，結果是奴性的沉默；現在我們在思想上是有了絕對的自由，結果是無政府的凌亂。思想的花式加多本來不是件壞事，在一個活力磅礴的文化社會裏往往看得到，像傍着剛直的本幹，普蓋的青蔭，不少盤錯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蘿。那本不關事，但現代的可愛正是爲着一種顛倒的情形。盤錯的恣蔓的儘有，這裏那裏都是的，卻不見了那剛直的與普蓋的。這就比如一個商業社會上不見了正宗的企業，卻只有種種不正當的營業盤據着整個的市場，那不成了笑話？

「即如我們上面隨筆寫下的所謂現代思想或言論市場的十多種行業，除了「攻擊」，「織巧」，「淫穢」諸宗是人類不怎樣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縱）當然的發洩，此外多少是由外國轉運來的

投機事業。我們不說這時代就沒有認真做買賣的人，我們指摘的是這些買賣本身的可疑。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觀念，顧着一個容忍的美名，我們往往忘卻思想是一個園地，牠的美觀是靠著我們隨時的種植與剷除；又是一股水流，牠的無限效用有時可以轉變或不可收拾的奇災。……

「但記憶與想像，這就是一個燦爛的將來的根芽！悲慘是那個民族，它回頭望不見一個莊嚴以往；那個民族不是我們。該得滅亡是那個民族，它的眼前沒有一個異象的展開；那民族也不應該得是我們。……」

「我們相信一部純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個需要。純正的思想是活潑的新鮮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勝，可以消滅一切致病的微菌。純正的思想，是我們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後自然的產物，不是租借來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販來的瑣碎的技术，我們先求解放我們的活力。……」

「我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爭，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橫受凌辱與侵襲的時日！來吧，那天邊白隱隱的一綫，還不是這時代的「創造的理想主義」的高潮的前驅？來吧，我們想像中曙光似的閃動，還不是生命的又一個陽光充滿的清朝的預告？」（註一）

這是一個什麼「態度」呢？在這「態度」裏所表明的是些什麼呢？所謂「尊嚴與健康」又是誰的「尊嚴」和誰的「健康」呢——除了表明他們在爲着某一個集團或某幾個主子盡着「山羊」的義務之外，在這篇裝腔作勢的費話連天的大文裏，實在沒有說明了什麼。而另一篇文章裏，在梁實秋教授的「文學與革命」裏，他們的「態度」卻完全表明出來了。帶着輕薄的侮蔑的口吻，否認了文學的階

級性的存在，梁實秋教授提出了他的天才的『人性』的文學論，這是頗為有趣的事情，在這妙文裏，他寫道：

『我先問：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革命運動的真諦，是在用破壞的手段打倒假的領袖，用積極的精神擁戴真的領袖。……』

『革命的意義既如上述，請進而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在革命的時期當中，文學是很容易沾染一種特別的色彩。然而我們並不能說，在革命的時期當中，一切的作家必須創作『革命的文學』。……我們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學，往往發現在實際的革命運動之前。……文學家並不表現什麼時代精神，而時代確是反映着文學家的精神。……』

『所以我又說：革命期中，文學家不必就要創造『革命的文學』；在文學上講，『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根本的就不能成立。在文學上，只有『革命時期中的文學』，並無所謂『革命的文學』。……並且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忠實——忠於人性。至於與當代的時代潮流發生怎樣的關係：是受時代影響，還是影響到時代；是

（註）見『新月』的態度。轉引自李何林先生編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二三三——二三二五頁。

與革命理論相合，還是爲傳統思想所拘束，滿不相干，對於文學的價值不發生關係。因爲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所以「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縱然不必說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學的了解上是徒滋紛擾。……

「文學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一切人類的情思；對於民衆並不負着什麼責任與義務，更不會負着什麼改良生活的擔子。所以文學家的創造並不受着什麼外在的拘束，文學家的心口中並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含有爲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文學家永遠不丟掉他的獨立。在革命期中的文學作品，往往隱示着民間的苦痛，諷刺着時代的虛偽，這並不是文學家衝着民衆的諭旨，也不是文學家自動的要完成他對於民衆的使命。文學家不接受任誰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內心的命令，文學家沒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內心對於真美善的要求的使命。故此在革命期中，如在常態期中一樣。文學家不僅僅是羣衆的一員，他還是天才，他還是領袖者，他還是不丟掉他的個性。

「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創作的材料是個人特殊的經驗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沒有關係；只要你寫得深刻，寫得是人性，便是文學。「大多數的文學」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名詞。……無論是文學，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的「大多數」，不發生若何關係。……「無產階級的文學」或「大多數的文學」都是不能成立的名詞，因爲文學一概都是以人性爲本，絕無階級的分別。……

「一件文學作品，如其不能得到無產階級的了解與欣賞，這不必就是因爲作品是屬於另一階級或

帶有貴族性，這也許就是因為無產階級本身缺乏鑑賞的能力，鑑賞文學，不是像飲食男女等等根本的本能那樣，不是人人都有的的一種能力。真真能鑑賞文學，也是一種很稀有的幸福，這幸福不是某一階級所得壟斷。貧賤階級與富貴階級裏都有少數的有文學品位的人，也都有一大半不能鑑賞文學的人。所以就文學作品與讀者的關係上言。我們看不見階級的界限。

二、至於文學作品之產生，更與階級觀念無關。……文學愈來愈成爲天才的產物。天才的降生，不是經濟勢力或社會地位所能左右的，無產者的階級與有產者的階級一樣的會生出天才，也一樣的會不常生出天才！所以從文學作品之產生言，我們也看不見階級的界綫。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

一偉大的文學家，足以啓發革命運動；革命運動僅能影響到較小的作家。……很多的大文學家，……對於革命運動起初很表同情，但是到了革命進展之後，看着羣衆的暴行，對於一切標準的毀滅，紀律的破壞，天才的摧殘，他們便要認爲這是過度，收回他們的同情。沒有一個第一流的文學家，一生的同情於革命。革命運動對於文學的影響，是誘發人們的熱情，激起人們對於虛偽的嫉惡，惹動人們對於束縛的仇恨，這種影響的本身不是壞的，縱然不能提高文學的價值，至少亦不致於文學的價值有損；但是這種影響容易發生不良的結果，且不可避免的流於感情主義，以及過度的浪漫。

三、近來有人提倡「革命的文學」，但是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由文學方面來觀察；反對「革命的文學」者似乎又是只知譏諷嘲弄。吾人平世靜氣的研究，以爲「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實在是沒有意義的一句空話，并且文學與革命的關係也不是一個值得用全副精神發揚鼓吹的題目。

「文學也罷，革命也罷，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冷靜的頭腦。」（註一）

另外，梁實秋教授還有一篇佳作，也是登載在「新月月刊」上，標題是：「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據他的說法，文學是沒有階級性，有的還是「人性」。這階級性是由幾個不安分的文學家挑撥出來的。

魯迅給予他以有力的反駁：

「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乾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麼馬克思牛克思」以及什麼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麼，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麼馬克思」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褊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鬪的慾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正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鬪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

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常的生活鬭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五十年，但當不至於以爲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爲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爲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於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爲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尙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爲無產者所嘔吐了，將只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

……

「梁先生首先以爲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爲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爲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

爲「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够了，又何必如此「過於雷同同情心」。一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的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種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太婆子身受的酸辛，飢饉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甯呀！」固然並不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學爲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爲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爲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爲是無產階級，所以要作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鑑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干，因爲「鑑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裏，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

能受教育，至於一字不識，也可以鑑賞「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通俗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為鑑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成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本家的鬭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裏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

……

「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鬭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

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會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爲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雖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並非無產文學。……」（註一）

梁實秋教授的奇妙而有趣的偉論，到底是在盡什麼任務呢？魯迅在另一篇文章，「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裏，老早就指出了他們是在思想上盡着「維持治安」的任務。他們「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註二）這實在是紳士們的最安全最妥當的蒙「上」欺「下」的遮眼法。

六八

由於新月派紳士們的擺出了「尊嚴和健康」的架子，對於新興的文學加以無端的曲解和侮蔑，這促使着進步的文學團體們內部的團結，牠們放棄了各自的狹小的集團主義的歪風，大家趨向於一致的方向，來共同地對付當前的敵人了。創造社和太陽社以及其他的革命文學的團體，便停止了對於魯迅的進攻。同時，又由於魯迅的努力的介紹了進步的科學的文藝理論，在理論上給革命文學建立了一個堅固的基礎，這使得帶着浪漫諦克的色彩很濃厚的文學家們清醒了許多，並且彼此之間藉此可以互相切磋，互相批評，互相改正錯誤；這使得大家都堅實起來了。同時，更由於當時的現實環境的需要，所有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們，就不得不在一個走向着進步的方向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了。這便是在一

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由創造社、太陽社的各作家及魯迅、茅盾、丁玲等五十多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牠的理論綱領是這樣的：——

「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

「我們的理論要指出運動之正確的方向，並使之發展，常常提出新的問題而加以解決，加緊具體的作品批評，同時不要忘記學術的研究，加強對過去藝術的批判工作，介紹國外無產階級藝術的成果，而建設藝術的理論。」（註三）

屬於「左聯」的刊物，先後有「萌芽」、「北斗」、「文學月報」，……等。

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上，魯迅發表了他的光輝的演說，這對於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是一個極寶貴的指示：

首先，魯迅指出文藝工作者們容易觸犯的錯誤和本身的不正確的觀念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毛病，他說：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二一一——二一七頁。這引文中有括號的字句，均係出自梁實秋教授的「文

學與革命」和「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二篇大文。

（註二） 見同上第一六六頁。

（註三） 轉引自李何林先生編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二五三——二五四頁。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的。爲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鬭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裏，最容易高談澈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ocialism」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裏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愉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甯，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甯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在我們辛亥革命時

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爲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爲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爲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裏去，圍着上帝坐着，上帝請他喫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喫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爲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爲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喫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爲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毀滅」中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接着，他又指出今後應注意的幾點說：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是非

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已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牠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爲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牠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爲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爲無產文學並不利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彿在客廳裏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緻；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鬪爭，批評家也唱着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鬪爭底一翼，牠跟着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爲戰綫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爲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鬪爭，舊派的人倒能够開舒地在旁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爲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

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豈非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能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麼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卻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眾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韜」。所謂韜，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牠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牠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裏去了呢？是因爲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名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我們是要有

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艱辛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爲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爲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爲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爲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註一）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二三八——二四二頁。

第十章 真理 · 光明 · 力量：五十歲至五十六歲

——一九三〇——一九三六——

六九

因爲魯迅參加了『左聯』和這之前不久他又參加了『自由大同盟』，於是，這時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他暫時離開寓所，到別處去避難；在避難期間，他的牙齒腫痛得非常厲害，於是就全部拔去，換上假牙。到四月間，環境稍微好轉了一些，他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寓所。雖然抱着病抱着危險，他卻沒有停止了工作。有一天，他便和鄭伯奇先生去到上海市內的某一個大學演講。

在他們未到之先，這個大學的禮堂裏就擠滿了學生。一開頭是鄭伯奇先生講，講的是當時最爲大家注意的文藝與社會關係的這一類問題。他講了不到一刻鐘，聽衆是一個去了又去一個，偌大的講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個人。他心裏有點發慌：頭一炮就打不響，魯迅又有病，這事怎麼辦呢？心裏越急，口上越亂，什麼『意德沃羅輯』呀，什麼『印貼利更地亞』呀，什麼『狄亞列克特』呀，這一類

生硬的術語，只是在嘴邊亂撞。那百十個聽衆又漸漸散開，變成散兵線就要走了。鄭伯奇先生看到這様情形，於是就更慌了，只好趁早收場，趕緊作了一個結束了事。

在他剛剛結束的當兒，他的耳邊哄的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魯迅登壇講演了。

由於病體還沒有復原，魯迅的聲音並不高，卻帶着一點沈重的低音；聲調是徐徐的，像是跟自己的家裏人們談家常一樣的親切。

他先從他的家鄉說起，他說：他是浙江省的一個產酒名區的人，但他並不愛喝酒。這是他故意針對着曾經說他『醉眼朦朧』的某一個革命文學家說的，順便提一提這事，開他一個玩笑。

接着，他便談起他家鄉的風俗。大意是說：在他的家鄉那裏，討媳婦的時候，並不要什麼杏臉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壯的少女。由這類的例子，他歸結到農民和紳士對於美觀的不同。然後，他又用實證，揭破了『美是絕對的』這種觀念論的錯誤，而給『美的階級性』這個觀點，找出鐵一般的根據。

在這樸實的語句中，時時露出諷刺的光芒；而每一個諷刺的利箭投射到羣衆中間，便引起熱烈的掌聲和快意的大笑和歡呼。

不知在什麼時候，這房子裏又添進了那麼多的人，偌大的講堂又擠得水洩不通了，連窗子上面都站着挾書本的學生。

講演就在這熱烈的空氣裏宣告完結。在散會後，在這學校裏馬上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學組織。

的演講能够打動聽衆的心坎，正和他的文字一樣，因爲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細現象中找出高深理論的具體根據，又能用素樸而深刻的日常言語將這理論表現出來。」

『左聯』內部的重要會議，魯迅往往總是出席的而且決不遲到。

每次『左聯』將要開會的時候，總有人說：我們我不找老頭子來呢？大家總要考慮一下，結果是常常沒有去找他。但是，不是在開會前，也必然在會議後去告訴他一下。魯迅也在這個時候，把他的意見告訴參加開會的人；他們若是有什麼事必須要找魯迅辦的，魯迅也決不推辭，就照辦了。這時之所以不常去找魯迅開會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在這會議場中，事情實在太瑣碎了，什麼工作計劃囉，工作檢討囉，……他們參加會議的人不願意拿這些瑣事麻煩魯迅；另一方面那時在上海要開一個人數較多的會，實在也不容易佈置。但是，有些必要的，需要魯迅參加的會議，他總是親自到場。有些人常常擔心，怕他不能按時到會，因爲大家都知道他工作太忙，睡得很遲，然而魯迅卻從未遲到過。在開會的時候，魯迅總是很平和的，精神集中地注意聽着；有時，有些青年作家們常常愛發一些大套的理論，每個人都彷彿覺得自己的意見是最重要的，最新的意見，有時還含着教訓別人的意味，有的甚至於還說你們這些老作家們算什麼，……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魯迅在任何一个表情上也沒有一個不耐煩或不快。他總是注意地聽着，不多說話，他從沒有去反駁過誰，說誰是錯了；也沒有隨意去批評過誰，說誰是左傾或右傾。儘管有些人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但是，假如稍有可取之處，魯迅總是說：

「我們要做起來，我們要一點一點做起來，我們就照着這些意見切實的做吧。」

開過了會議，人們常常覺得對於魯迅似乎有點抱歉似的，有的人向他說到開會的難處，有的人說準備得不充分，也有人解釋着某某實在幼稚，但卻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這一些話；但是，魯迅也總是毫不介意的笑了一笑，接着便和他們談起那些應該如何具體着手的話了。（許二）

回寓之後不久，魯迅便和上海神州國光社商洽，準備出版「現代文藝叢書」。

這時，左翼文學剛剛抬頭，還沒有遭受打擊和壓迫，在上海的許多書店爲了在表面上顯示自己的前進起見，大約每家都願意印幾本關於新興文學這一類的書的；即使未必收稿罷，但也極力要發一個將要出版的書名的廣告。這一種風氣，竟也打動了一向專出碑版書畫的神州國光社，肯出一種收羅新俄文藝作品的叢書了，這時魯迅就和別的朋友們商量，選出了十種世界上早有定評的劇本和小說，約好譯者，名之爲「現代文藝叢書」。

那十種書，是——

一 「浮士德與城」，A·盧那卡爾斯基作，柔石譯。

二 「被解放的堂·吉訶德」，同人作，魯迅譯。

三 「十月」，A·雅各武萊夫作，魯迅譯。

四 「精光的年頭」，B·畢力涅克作，蓬子譯。

五 「鐵甲列車」，V·伊凡諾夫作，侍桁譯。

六 「叛亂」，P·孚爾瑪諾夫作，成文英譯。

七 「火馬」，F·革拉特珂夫作，侍桁譯。

八 「鐵流」，A·綏拉非摩維支作，曹靖華譯。

九 「毀滅」，A·法捷耶夫作，魯迅譯。

十 「靜靜的頓河」，M·峻羅訶夫作，侯樸譯。

後來，對於左翼作家的壓迫，是一天一天的喫緊起來，終於緊到使書店都駭怕了。神州國光社趕快來聲明，願意將舊約作廢，於是就廢了約。

七〇

自從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之後，中國的革命便進入更複雜和艱苦階段。爲着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向資產階級投降，放棄革命的取消主義，從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止，中國革命走向更高級的，土地革命的工農兵聯合戰線蘇維埃運動的階段。進步的人民的軍隊在湖南、湖北、江西、廣東、福建各地，到處活動着，而反動的勢力卻企圖用武力把他們壓制下去。這形成了劇烈的無法停止的鬭爭。同時，又由於國民黨軍隊內部的意見分歧，北伐雖然是一告一結束，可是他們之間的矛盾卻又尖銳起來，這便是在一九三〇年的二月間北方的馮（玉祥）閻

(錫山)聯合，並勾結廣西李宗仁起來反對南京政府，戰爭狀態仍然繼續存在着。全中國的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

爲着掩飾這一個政治上的過失，不惜歪曲了現實而爲自己的主人辯護，這時，紳士們走出來發表他們的主張了。和梁實秋教授的文學上的「人性論」相呼應，胡適博士很巧妙地把中國人民大眾的眼光，轉移到無關緊要的方向；並且接着又開了一張永遠不能兌現的支票，——這是廉價的包着糖衣的麻醉劑。

在他的大作「我們走那條路」裏，胡適博士寫道：

「我們的任務只在於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剷除的是什麼？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剷除打倒的是什麼？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爲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爲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爲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

「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限度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安定的生活，發達的工商業，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濟制度，公共的救濟事業。「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與普及。「現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現代環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衛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卻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甯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

能主張這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甯，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燄更兇，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

「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最要緊的一點是我們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最後，胡適博士在這篇文章裏，特別着重地叮囑囑道，並且舉出例子來，他說：「如組織工人，不爲他們謀利益，卻用他們作擾亂的工具，便是盲動。又如人力車車夫的生計改善，似乎應該從管理車廠車行，減低每日的車租入手，車租減兩角三角，車夫便每日實收兩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辦工運的人卻去組織人力車夫工會，煽動他們去打毀汽車電車，……這便是盲動。」

怎樣才是盲動呢？那末最妥當的辦法，還要算是梁實秋教授想出來「好政府主義」了。和胡適博士一樣，梁實秋教授也是「不滿於現狀」的。他也以爲「現在有知識的人（尤其是夙來

有「前驅者」、「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懇懇懇地追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甚麼是醫治這爲紳士們所「不滿」的「現狀」的藥方呢？梁實秋教授曾提出了「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說：「三民主義是一副藥，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

但魯迅卻以爲不然，在雜文「好政府主義」裏，他寫道：

「不過我以爲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爲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他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品，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務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嚶嚶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插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裏，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爲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附二）

揭破了偽自由主義的面目，其實，好政府主義者和一點一滴的改良論者實在是在盡着山羊或走狗的任务；不管他們是有意或無意的。在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裏，魯迅又寫道：

「凡走狗，雖或爲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牠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牠的主子（在梁實秋的「我不生氣」的大文裏，他說，「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人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着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鏰或盧布賞資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鏰，如何可以到

××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善註），正是牠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牠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然而，這一些走狗們雖然在表面上是溫和恭順的，而居心卻是陰險，手段卻是毒辣的，魯迅又揭露了他們的這一點，他繼續寫道：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即前面括號中所引的文章裏梁實秋自己說的話。——善註），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爲確實計，還得添個字，稱爲「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知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裏。很巧妙地插進電桿上寫「武裝保衛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字句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即「我不生氣」中所說的——善註）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着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爲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爲「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爲給主子喚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的電桿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麼，爲將自己的論敵指爲「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覺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註二）

想用這樣的卑鄙彎曲的手段來壓倒自己的論敵，嗚呼！資產階級的文藝批評家，竟可憐到如此地步。

五月，根據日本外村史郎的日譯本，魯迅譯成俄國蒲力汗諾夫作「藝術論」。（註三）這是一本把馬

克思主義的觀點應用到藝術領域的名著，雖然其中有一些地方是並不十分正確的。在譯這書的過程中，魯迅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後來，他在「三聞集」的「序言」裏會寫道：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註三）

便是指的這回事。譯文『還是「硬譯」，……仍須讀者伸指來尋線索，如讀地圖；這實在是非常抱歉的。』——在這譯本的「序言」的結尾，魯迅又這樣帶上一筆，來和梁實秋開個玩笑；因為梁實秋曾說過：『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樣的話的。

同月內，由景雲里寓所移居到北四川路的寓所。

八月，根據日本井田孝平的日譯本，譯成蘇聯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十月」。（註四）

七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二五〇——二五一頁。

（註二） 收入「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一八一頁。

（註三） 見「全集」第四卷第一九頁。

（註四） 收入「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二五一頁。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魯迅的五十壽辰，在上海的他的朋友們就在十七日這天，在法租界荷蘭西菜室租了一個會場來爲魯迅祝壽，魯迅便很高興地去參加了。會場情形是很熱烈的，他的朋友之一美國的名記者史沫特黎女士在「紀念魯迅」一文裏，追憶當時的盛況，她寫道：

「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個外國小飯店，可以讓我們在那裏開一個下午的茶會，並且吃一頓晚餐。中國人要有這樣一個集會是危險的。我是外國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來請我的客。不過等到客人都來齊了，那外國飯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國人，又大多是貧窮的，並且中國的侍者們也要聽到我們的談話和演說，於是就要發生危險了。」

「在魯迅生日（這是紀念魯迅五十壽辰的日子，和魯迅的生日略有出入——著註）的那天下午，客人陸續來到那小飯店的花園中。他們有單獨的，有成羣來的。有許多沒有錢，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飯的。魯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個孩子），在園裏一張桌子旁邊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走進園來向他們致敬的客人。那天魯迅真是美麗，——因爲當他快樂的時候，或是對於什麼東西發生興味的時候，他總是美麗的。他的臉老是那麼動人，他的眼睛老是帶着智慧和興味而閃耀着，但是在今天，他真正是美麗了。他那件長的綢袍增加了他的美，增加了成爲他的一部分的那種莊嚴。」

「我在中國的時間不久，這種景象使我驚異了。在那個時代，就是少數人集合在一處地方，也是危險的。我們的周圍一徑都有偵探，有許多集會他們似乎都知道。可是那一天，來給魯迅致敬的不下二百人，而且其中有許多，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他們的腦袋都要難保。可是二百個人來了，並沒

有一個偵探知道。我還記得有一羣從一個近代舞台來的貧苦演劇家，站在那裏和魯迅談話。不知爲什麼，他們似乎比其餘的客人都要窮些。在當時，有許多革命的團體正在組織之中，因而有許多小劇團也正在組織成一種全中國的組織。此外客人之中，有許多左翼的或革命的作家，許多藝術家，少數新聞記者，許多教員，一些學生，一些從各大學來的教授。還有一個是紅軍協助會的代表，一個剛剛出獄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個當時上海共產黨黨報的編輯。我又記得一個守舊的哲學教授也來參加魯迅生辰的慶祝。

「整個下午，客人不斷的來來去去，到晚上只有五十個人留着舉行一個小小的宴會。我看着那外國店主在房間裏不住走動着，親身照料着一切，每一回那個侍者走出房去的時候，我都注視着，傾聽着，留心着他是否去打電話給警察，因爲當時在場諸人的演說，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是大可以引得他們帶着機關鎗和捕人車而來的。並非那些演說是「狂妄的」或是「凶險的」。不，他們不過是談着近代的思想，談着中國的解放，談着教育文化團體的組織，談着魯迅的領導的必要。他們談到了魯迅的可寶貴的五十年生活，而仍舊還是年青而健旺，成爲一個青年和革命思想的領導人。他們請求他出來切切實實的做個領導。」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聽見魯迅演說。我的耳朵一面側向外面的街道，期待着警察的捕人車可能的隆隆聲的到來，一面卻仍傾聽着一個譯人替他譯出來的話。不久之後，我就忘記了捕人車快要到來的一件事了。因爲魯迅正在那裏講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個平靜而威嚴的形象，從容而平靜地說

着話，說得所有的侍者都靜聽着他的每一個字，有時竟至客人也忘記伺候了。

「魯迅講到他在前清時的青年生活，他在一個半封建的小鄉村裏的青年生活。他講到他起先怎樣在日本學醫，後來怎樣認明了今日的醫學只是替富人服務。只有富人能够給得起醫生的診費，而中國的問題，他以爲，並不是由替富人醫肚痛可以解決的。因此，魯迅移轉到了爲社會的文學，用牠來作喚醒青年的工具。他傾向於俄國的革命作家，並且從他們學習。」

「最後，魯迅講到了世界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他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而且我以爲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教養最深的一個。這一天晚上，他把他對於世界文學的知識在他的朋友們面前展示出來了。但是，魯迅說，他自己並不是一個普羅列塔利亞的作家。他的根柢，他的創作生活，開始在一個半封建的鄉村裏，他除了那個鄉村和知識階級之外，對於其他任何集團知識知道得很少。可是，他一徑是和學生及其他知識者思想中的封建主義奮鬥的，而這件事，他仍舊還在做，而且能够繼續做下去。關於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他正在把許多蘇聯作家的重要作品譯爲中文，還有許多許多他也預備要譯。這些作品，他說，應該用作中國青年作家的指導。同樣，在藝術上，他要把西方近代繪畫藝術家的第一流作品搜集起來，在中國刊布，使得中國青年的藝術家可以從他們去學習。用着這樣的方法，他就可以教導中國的青年了。」（註一）

十月四五兩日，魯迅與內山完造借用北四川路購置組合第一店樓上開版畫展覽會。魯迅把他自己收藏的版畫拿出來，藉此以引起當時的青年藝術家們的興趣，和介紹世界的戰鬪的藝術作品，作爲他

們的學習上的參考。

因爲那時的神經衰弱的人們對於版畫不能諒解，他們把版畫認爲坦克車，他們以爲弄版畫的人就是屬於「××黨」，平常借地方開展覽會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得不借日本的店樓，又不得不顧到版畫的範圍了；在這次展覽會裏，除去特意安排了不多的日本版畫之外，對於凱綏，珂勒惠支的連續版畫，富於反抗性與刺激性的，爲了減輕空氣的重壓，也特意把牠們分散在幾個房間之內，分別展覽。

在這次展覽會之前，魯迅就已經做過了許多對於新興藝術的介紹工作。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月，魯迅曾和柔石以及其他幾位青年朋友們，在上海成立了朝花社。朝花社的目的是在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來扶植一些剛健質樸的文藝。由朝花社出版的有「朝花旬刊」，和「藝苑朝華」五輯，介紹歐美蘇聯以及日本的版畫，都是循着這條路線在向前推進。其中有一本「落谷虹兒畫選」則是爲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風這紙老虎而印的。此外又會影印德國革命藝術家梅斐爾德的「士敏土之圖」。

這樣的藝術，在當時頗爲尊嚴的鼓噪的大師們，高傲的嬌貴的藝術家們所不滿。他們的趣味還完全逗留在「羅馬夕照」或「西湖晚涼」裏面，他們或是拾掇了「學院派」的餘唾當作金液，或是鑽向印象主義的牛角尖，或是在溫暖的「紗籠」裏期待「神來」的時候，他們是不屑來理會這「彫蟲小技」的。他們雖然不理會，但這是不緊要的，然而這樣的藝術卻爲進步的青年藝術工作者所歡迎，在

(註一) 引用的是根據傅東華先生的譯文。

魯迅的影響之下，中國第一個新興木刻團體——一八藝社就在這時誕生了。

這一個團體誕生在杭州西湖藝術學院之內，牠是「首先主張藝術從沙龍走向街頭，從侍奉高官貴人的幫閒藝術家的手裏奪下這武器來替大眾服務的」，「向勞苦階層吸取題材，請洋車夫或賣燒餅老頭子來做模特兒」的第一個新興藝術團體。這團體「理論上的依據是魯迅先生翻譯的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與「文藝與批評」等書，技巧上的借鏡是魯迅先生編印的「藝苑朝華叢刊」及「士敏土之圖」等等」。(註一)

因為魯迅的竭力倡導和青年藝術工作者們的努力，木刻這新興藝術很快地便發展起來了。在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一八藝社的一羣青年們就把他們自己的習作，在上海舉行展覽，並且在上海成立分社。魯迅高興得不得了，他看見了自己一手所培植的花木開花了，他帶着洋溢的熱情和希望，爲他們的習作展覽會寫了一篇小引，熱烈地鼓勵他們道：

「現在有自以爲大有見識的人，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然而這樣的藝術，在現在的社會裏，是斷斷沒有的。看罷，這便是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的人，也已將人類分爲對的和錯的，或好的和壞的，而將所謂錯的或壞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現在的藝術，總要一面得到蔑視、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擁護、支持。

「一八藝社也將逃不出這例子。因爲它在這舊社會裏，是新的、年青的、前進的。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

們的履歷和作品的題目——故意顯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騙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裏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樑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自然，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面。」（註二）

這特刊印出來了，卻又引起小小的風波。當時的一八藝社負責人之一力揚先生記述道

「特刊印出，被院方看到後，院長林風眠先生召集我們幾個負責人——有胡一川、夏朋、劉夢瑩在內——去談話。他要我們把魯迅先生的小引撕去後再發散，並且說：

「我和魯迅先生是好朋友，對他也佩服的，但是……」他底聲音有些顫抖了。

我們以刊物已經發出，無法撕去爲辭，他就只好作罷了。但院方對我們的仇視，卻從此加深。」（註三）

不管別人怎樣的仇視，魯迅對於新興木刻的培植，總是盡着他的最大的努力。中國的第一次木刻講習會在他主持之下，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開始了。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內山完造先生的弟弟內山嘉吉先生，到上海來玩了。」那時的木刻講習會

（註一） 以上引文均見力揚先生作「魯迅先生與一八藝社」。

（註二） 見「全集」第四卷第二九三——二九四頁。

（註三） 亦見「魯迅先生與一八藝社」。

參加者之一曹白先生在日後追憶當時的學習情況，他寫道：「嘉吉先生是日本的彫刻家。但他沒有進過美術學校，以自修而成名的。他也會木刻。到得上海，魯迅覺得有了機會，可以趁此把木刻上的必需的知識，請嘉吉先生授給我們一向「無師」的野生的藝術學徒們。嘉吉先生也高興的答應了。」

「於是，中國第一次的木刻講習會，在魯迅先生的主持下，開講了。然而人很少，爲了當局歷來把新興的木刻看做坦克車緣故，一切都在默默中進行着。但是大家都很興奮。」

「嘉吉先生不會中國語，魯迅先生就當翻譯。起先講了許多木刻理論上的知識，學生們是沒有問題的。待得按着實習了，大家動手刻了，於是疑問百出，要問先生，這時候，魯迅先生又當了學生們的翻譯。所以在那悶熱的夏天中，往往弄得魯迅先生渾身是汗；然而他不煩厭，不疲乏；他露着非常的愉快的神情。」

「這講習會在極短促的一星期內，就結束了的。在最後的一天，把十三個學生的習作，開了一個小小的展覽會，算是大家在這一週中的努力的果實。」

「從此，木刻界才得到了製作上的具體的一些寶貴的經驗，是那木刻講習會所賜予的。」

「那自然是魯迅先生的賜予！其中也有內山嘉吉先生的。」（註）

八月二十二日，木刻講習會告一結束。這之後，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正在蓬勃地向上生長の木刻運動也暫時受到了阻礙。

自「左聯」成立以後，中國的革命的普羅文學才算是有了一個真正的開始，但不久牠卻又遭受到重重的壓迫。在「左聯」成立後三個月，黃震遐、王平陵、傅彥長、朱應鵬、邵洵美……等等人物，在一九三〇年六月發表了「中國民族文藝運動宣言」，提倡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企圖和「左聯」所提出的普羅文學相對抗。他們的刊物有「前鋒月刊」和「文藝月刊」等。在這宣言裏，他們表示着他們的對於文藝的態度：

「我們很明瞭藝術作品在原始狀態裏不是從個人的意識裏產生，而是從民族的立場所形成的生活意識產生的。在藝術作品所顯示的不僅是那藝術家的才能、技術、風格和形式，同時在藝術作品內顯示的也正是那藝術家所屬的民族的產物。……」

「文藝的最高的使命，是發揮他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換句話說，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註二）

「文藝的最高的使命」，果真是「發揮他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麼，或者換句話說，「文藝的最高的意義」果真「就是民族主義」麼？這所謂「民族」又是怎樣的「民族」呢？他們這些先生們所

（註一） 見「魯迅先生和中國新體的木刻」。

（註二） 轉引自李何林先生編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二五四——二五五頁。

盡的又是怎樣的任務，他們所發揮的又是怎樣的一精神和意識，在後來不久，事實都給他們以確切的實證。

可是，反動的統治階級單有這些文藝上的應大是不夠的，他們這些荒謬的統治者，是要實現好政府主義者如梁實秋教授們的偉大的願望的，那便是把警察和憲兵調來，用鎗桿和牢獄以濟文藝之窮，那便是對於左翼作家加以逮捕或屠殺，那便是以特務機關來對付「左聯」。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月二十日前後，在上海有好幾十個左翼作家被逮捕了。二月七日的夜裏，柔石、胡也頻、李偉森、白莽……等二十三個政治犯在龍華司令部被鎗斃了。這時，魯迅也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寓所，到另一個地方去避難；而外間傳說紛紛，有的說他也被逮捕了。用信用電報來探問他的消息的也很多，連他的年高的住在北平的母親也急得生病了。在一個深夜裏，魯迅站在客棧後院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景宋女士和孩子。魯迅沈重的感到他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在悲憤的沈靜中，他寫下了這樣的沈痛的詩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羣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在那時的中國，對於左翼文學的壓迫和禁錮，真比罐頭還要嚴密，確是無處可寫的。魯迅在二月二十八日回到寓所之後，就寫了一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對於屠伯們提出激烈的抗爭，託史沫特黎女士譯成英文，寄到美國的「新群眾」上去發表。他寫道：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爲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介紹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和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的文藝理論進到中國的時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 Prof. Irving Babbitt）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即是指梁實秋而言——著註）以爲文藝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褸，到這花園中來吵嚷。並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並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當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發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並不相信它，因爲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卻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階級的鎗彈。」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壓了。禁期間，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綏拉非摩維支（A. Serefimovich），伊凡諾夫（V. Ivanov）和奧格涅夫（L. Ognov）不必說了，連契訶夫（A. Chekhov）和安特來夫（L. 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只好出算術教科書和童話，如 Mr. Cat 和 Miss Rose 談

天，稱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爲至爾妙倫（H. Zurmühlen）所譯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稱讚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爲「人」，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踪，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後，再去問時，知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記載。接着是封閉會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魏爾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治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有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喉使的自己的一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爲裏面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爲止，已將十種。然而這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善於「解放」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

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並不分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只有一兩個胡塗的中計，多數卻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裏面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為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倒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家的幾個人，為什麼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為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面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 (Aubrey Beardsley) 的一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慾小說的，倒並不覺得不便。然而較為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才不至於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饑渴，因為他們知道，與其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於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卻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的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知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支持，「將來」正屬於這一面。」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者應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卻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於「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於左翼作家的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卻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着同一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 (Persecut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註一)

當魯迅把這篇文章交給史沫特黎，她看到的時候，她想這一篇文章也許要引起他的被逮捕，監禁或處死的，於是就問魯迅，把他的名字簽在上面是否妥當。魯迅略略地點着頭，用平穩的聲音說道：

「這幾句話是必須要說的。拿去發表就是。」

史沫特黎似乎還有疑惑，還有什麼事要詢問。

「不要緊的。發表去吧！」魯迅帶着堅強的信心回答道。

以上這一些對於左翼文藝的卑鄙和殘忍的手段，是配合着極端反動的鄉兵贖武主義者們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目的。當着中國人民的革命的隊伍在一九三〇年的上半年，肅清了他們自己隊伍裏的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後，又和左傾的機會主義「立三路線」作堅決地不調和的鬭爭的時候，當着他們逐漸地克服了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把革命深入到中國的農村，發展和鞏固蘇維埃運動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在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在十二月的末尾，反動的資產階級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反人民的內戰。雖然這次戰爭在一九三一年的一月宣告失敗了，然而，不久，在五月，第二次戰爭便又開始了；雖然這次戰爭不久又宣告失敗，然而，反動派還是不死心，在七月再發動第三次比以往規模更大的內戰。可是，不久，「九一八」事變便發生了，內戰受到這一個影響，也暫時停頓一下。

爲着要配合着這一連串的反人民的大規模的內戰，在文藝戰線上當然也就必須要對於左翼的無產文學的壓迫和禁錮，而對於左翼作家們自然是要採取逮捕或殺戮的辦法了。因爲這新興的無產文學，它不但是和這一新興階級同生同長，並且它還是這一階級的鬭爭的一翼；那末，獻身給無產文學的作家們要和無產階級在同一個時代裏鬭鬥、受難、勝利或死亡，用他們的鮮血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頁，這又是必不可少的事了。因爲，我們生在這一個鬭鬥的時代裏！

「九一八」事件並不是突如其來的，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多年來處心積慮的周密的計劃。牠早就夢想用武力征服所有的中國人民，使中國完全變成牠的殖民地；同時，這又是響應着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反蘇的陰謀的，佔領東北是進攻蘇聯的第一步。

在這事變之後的第三天，九月二十日「答文藝新聞社」問中，魯迅便清清楚楚地指出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道：

「在這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階級』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階級』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註一）

中國的共產黨在這個時候，爲着要挽救全民族的當前的危機，便起來號召全國人士與全國軍隊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聯合全國各階層來進行這民族革命的戰爭。可惜的是這一個寶貴的至公無私的意見竟爲反動派棄置不理，他們一意孤行地堅持着他們的神聖的「安內」的工作。

掩飾着不抵抗主義者們的懦弱無恥和國際帝國主義者們的猙獰面目，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文学家們，在這時，便又都大露頭角，大顯身手了，或則激昂慷慨，或則發揚踴躍，然而，同時也顯出了他們的原形。在「前鋒月刊」第七號上「民族主義文學家」黃震遐先生發表了他的劇詩「黃人之血」了。這劇詩的事蹟，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人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韓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軍隊的構成是漢、韃靼、女真、契丹

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爲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請看，這是作者的妙文：——

『……………』

恐怖呀，煎着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醜；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堆摟；

美人螭首變成瘁猛的鬍髯；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裏鬩爭惡鬪；

千年的棺材洩出牠凶穢的惡臭；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鐵蹄踐着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一九五頁。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註一）

魯迅立刻地指出了這位『民族主義文學』的文學家的陰險的用心和他在國際上所盡的政治任務來，當魯迅引用了這段詩之後，接着他便予以嚴厲的批評道：

『道德皇威康因爲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着「幹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爲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爲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悲哀。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爲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現在已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壞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幹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註二）

這事變對於『民族主義文學者們，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於是，在『民族主義文學』這面大旗之下的，莫名其妙的小勇士們便憤激地絕叫起來了，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異的。

請聽，這是小勇士們絕叫出來的聲音：

「戰呵，下個最後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鎗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築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脚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註一）轉引自「全集」第四卷第三〇一——三〇二頁。

（註二）見「全集」第四卷第三〇二——三〇三頁。

我們的肉人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鏽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礮口。

去，戰場上去，

憑着我們一股勇氣，

憑着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

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敵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志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一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衝，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

朋友們，

準備着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給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他們所說的是些什麼昏話呢？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

「一羣是發揚踴躍，一羣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魯迅又這樣寫道。接着他更詳細地分析着這班「民族主義文學者」們所盡的政治任務，卻是號喪和送葬的任務，他又寫道：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薰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衝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於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撲：……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成吉思皇帝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瀋陽事件，但是「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

「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是很可惜的。

「那麼，「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的勾當，在沈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擾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洩，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踴躍，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着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背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註一）

在這段期間，和着新月派的紳士們以及「民族主義文學」的文學家們對抗，魯迅曾與他的戰友們合編「萌芽」月刊和「十字街頭」旬刊，又曾主持「左聯」的機關雜誌「前哨」。

此外，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根據日本藏原惟人的日譯本，參照 R. D. Charques 的英譯本，和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出版的德譯本，譯成蘇聯法捷耶夫長篇小說「毀滅」。(註)這書的內容是描寫在蘇聯內戰時期，在西伯利亞的森林裏，在日本人的包圍中的一支游擊隊的生長，發展與「毀滅」，新的一代人在革命中誕生的情形。這書，在這年十一月印成。

七四

「九一八」事變之後不久，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很快地佔領了幾乎是全部的東三省，這使得親日派的不抵抗主義者也慌張起來了。怎麼辦呢？於是向當時的「國聯」——在英、法帝國主義者控制之下的國際聯盟的機構——去喊冤。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十四日，果然「國聯」成立了調查東北事件的，由英國李頓爵士爲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準備到中國來調查東北事件的「真相」。可是，在這調查團剛剛成立不久，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炮聲在上海又響起來了，牠不原諒親日派份子們的苦衷，不珍惜不抵抗主義者們的「友誼」，竟打上了南京政府的大門，這便是「二二八」的上海戰爭。

這時，二月三十日，在北四川路一帶已入於交戰狀態了，魯迅由他的寓所臨時搬到內山書店。二月六日，再從內山書店由店員鎌田誠一先生護送到英租界內山書店的支店暫避，戰爭稍平息，才又回原來的寓所。

配合着在南方的軍事行動，三月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北一手製造出來了一個『滿洲國』，並且擁出滿清政府的已經退位的皇帝溥儀算做執政。就在這之後不久，三月十四日，『國聯』調查團也慢騰騰地到達上海。這顯然是英、法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大英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偏袒，故意要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進攻，所以得到這樣的順利，是完全由於利用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們的和蘇聯之間的矛盾，以及國際帝國主義者們和中國的反動派對於中國的革命的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大英帝國的一貫的綏靖政策，從一九二一年以來，就是縱容法西斯的匪徒墨索里尼，稍後，更有大頭子希特拉的，他們有意地想在歐洲豢養兩條爲着他們的利益的，防止——到必要時是進攻布爾什維克的惡犬，他們聯合着全世界的反動勢力，隨時隨地作撲滅蘇聯的舉動。在東方，所以他們就特別地看得起日本了。所以他們就竭力地在暗地裏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者用武力在國際陣容上反蘇，而在中國內部反共了。

對於這罪惡的舉動和企圖，魯迅代表着我們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曾提出過嚴厲的抗議和答辯。

當着『日本佔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伙』，置之不理的時候，一班純潔的學生們便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抗日，而『友邦』卻表示『驚訝』了。在

雜文「友邦驚詫」論」裏，魯迅寫道：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兵隊強佔了遼吉，碾碎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年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衆，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註）

對於帝國主義者以及牠們的走狗們亂造關於蘇聯的無恥的謠言和有意的污蔑，魯迅也加以有力的反駁和斥責。在「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裏，他寫道：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爲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裏放着的一本德國「星期報」(Die Woche)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着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着手鎗。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是這麼凶暴麼，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末對於闊人就一定壞的，有些旅行者爲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但後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着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的兩邊，使觀者坐着摩托車，從中間駛過。這是針對着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指一九三一年）——書註』

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聽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黨之後，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虛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後，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於是漸以爲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優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爲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爲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後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後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確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種壞結果，是令人對於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登的什麼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氣，固然只要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游記，也竟至於不大想去翻動牠。」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

記」，一就是這「蘇聯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爲了想看看這自說「爲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並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彷彿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鋪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於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並沒有什麼稀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豔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體遊行，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據這書裏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爲什麼呢？因爲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後十年，所以只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告訴

我們，而怎樣苦鬥，才能够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種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部負擔起來，但讀者是萬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據說是因爲他要造的是離地的高樓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爲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註一）

在雜文「我們不再受騙了」裏面，魯迅又寫道：

「帝國主義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牠們愈急於要進攻，因爲牠們愈要趨於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牠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麼？正而之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麼？列甯格勒、莫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麼？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峻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麼？關於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據烏曼斯基 (K. Umanaky) 說，一九一九年

中，在莫斯科的展覽會就有二十次，列寧格勒兩次（“Nine Kunst in Russland”）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於從前，彷彿他很爲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

「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爲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聽到別國的失業者，排着長串向飢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擄取的大羅網之下，排着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好像牠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牠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牠要去懲辦了。」

「牠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牠們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裏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但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裏？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癩疽，是牠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譁詠、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効，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牠才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爲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去謀害牠，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註二）

在中國人民大眾面前揭露出帝國主義者們的陰謀，反對牠們對於蘇聯的進攻，這是爲着求得我們自由和解放的，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事情。同樣，這對於其他的被壓迫與被奴役的民族，也是迫切的而且必須堅決地去完成的任務。

爲着要完成這首要的迫切的任務，魯迅就更加立得定，看得準，把得穩，做得勤了。假如說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的反封建反帝的鬪爭中，以前魯迅在反對封建勢力的鬪爭，做工做得最好，現在他在反對帝國主義者以及牠們的走狗的鬪爭，就做工做得更加光輝而且偉大了；雖然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反封建和反帝這兩大任務是不能截然分開，而必須同時進行的；但在現實的鬪爭的實踐裏，因爲具體的歷史和社會環境的需要，作戰的方法和作戰的目標，是必須靈活運用的。

爲着要維護中國人民大眾的利益，爭取我們的自由和解放，首先就不得不反對違害着我們的生存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們——其中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及牠們的走狗們——其中尤其是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中的親日派份子們。魯迅堅決地反對他們把殺戮和宰割加在人民頭上的，對內的反人民的大規模屠殺的戰爭，以及對於中國的進步的民主的人士的迫害。同時，他又堅決地反對他們無恥地加諸蘇聯的污蔑，反對他們的進攻蘇聯的陰謀；因爲在我們爭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的鬪爭中，蘇聯是我們最忠實最可靠的朋友。

爲着要維護新興的屬於人民的文化，並且要發展牠，使牠成爲人民的解放鬪爭中的一翼，首先就不得不和那一些各式各樣的要謀害這一個新文化的妖魔鬼怪作戰。所以魯迅就嚴厲地毫不留情地打擊那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文學家們，「第三種人」，革命戰線上的逃兵、叛徒，革命市場中的小販，洋場惡少，以及看着天時氣候變來變去的還不免露出尾巴的「變形蟲」們，……這一些東西們，在魯迅的筆底，各各地留下了他們的「尊容」。同時，在作戰的意義上，直接地打擊着走狗們，也可

以說間接地打擊到了他們的主人。

完成這一些光輝的任務的，是魯迅的匕首式的用以和敵人短兵相接的雜文。

一九三二年四月，魯迅編定一九二七、二八及二九年來的雜文，題名曰「三閒集」(註一)，「尙以射仿吾也」。是爲魯迅的第六本雜文集。其中收集的文章，主要的是在揭露帝國主義者們的對於中國人民的陰謀，中國的統治階級的凶暴，指責革命文學家們的淺薄和空虛，以及抨擊新月派的紳士們幫閒或幫兇的技倆。

在這一本雜文集裏，魯迅的雜文的風格也有了和以前不同進展。在「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裏，進化論的觀點在雜文裏被應用達到了成熟的最高峯，這之後，便是魯迅的雜文的風格在尋求着新的路子。由於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在廣州和香港親眼看到帝國主義者的對於中國在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侵略，和帝國主義者們如何利用中國的封建和官辦的勢力，來阻止革命力量的成長；以及他親眼看到血的屠殺的事實，和自身所受的威脅，這一些是形成魯迅的思想「轉變」的主要的契機。歷史在他的面前展開了新的冊頁，在戰鬥的社會實踐當中，魯迅感覺到了他所使用的攻擊和解剖舊社會的武器，是不够應用了，他必須要尋求到一個新的方向，把握住一個新的武器，站在一個新的觀點，參加一個新的陣營，否則，他是沒有辦法再能够戰鬥下去的。這一個追尋的過程，便反映在他的第五本雜文集「而已集」裏面。在「而已集」裏面所表現的作風，是從「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一五——一九一頁。

編」這一些雜文集裏的作風的結束，就是說：猛烈的鋒利的明快的筆鋒似乎是停頓下來了，而在醞釀着一個新的轉變。

在「三閒集」所表現的作風，也還是正在醞釀之中而沒有十分具體地形成的作風，但是比起「而已集」來，卻是明朗得多了。

和「三閒集」同時，魯迅又編定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雜文，題名曰「二心集」，是爲魯迅的第七本雜文集。爲什麼叫做「二心集」呢？在這書的「序言」裏，魯迅寫道：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 (Hrann Meinring) 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撻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謀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爲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並且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這書裏所收集的雜文，便是魯迅的雜文風格有了新的轉變，和新的觀點新的手法的最初的具體表現。這所謂新的觀點和手法，卻又和這之前的所謂「革命文學」家們的公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不同的；在現實的中國社會裏，在魯迅的光輝的社會實踐裏所形成的，對於錯綜複雜的並且是隊伍龐大的敵人

作姿宛曲折的鬭爭的，戰鬭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對敵人予以無情的暴露和打擊，對朋友予以親切的撫慰和愛護，不空喊口號而實事求是的作風，是這以後的魯迅作品的一個重要的特徵。

七五

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的炮聲在東北響起來了，從東北又響到了上海，同時，又成立了一個『滿洲國』，可是這卻沒有驚醒中國的資產階級中的反動派，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對內的反人民的戰爭；相反地，這鬭爭卻更趨向尖銳化了。正在這一個鬭爭趨向尖銳的時候，在上海，在文藝的戰線上出現了所謂超然於這鬭爭之外的『自由人』和所謂『第三種人』這一些稀奇古怪的聰明伶俐的人物。

這問題是因一九三二年以文藝創作的自由問題而引起的論爭。自稱爲『自由人』的胡秋原在那時剛剛出版的『文化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他的『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什麼『民主』呢？——普註）是永久絕對的自由與民主（嗚呼！——普註），而不是階級性的，受社會一切限制的』偉論，他以爲『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據他說；文學家是應該超於政治鬭爭之外，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的『自由人』。

和胡秋原的論調相彷彿相呼應是唱着『爲文藝而文藝』的老調子，自稱爲『死抱住文學不放手』的『第三種人』蘇汶（即杜衡），在他們的刊物『現代』上，發表了他的『關於『文新』與胡秋原

的文藝論辯」，他有意地對於「左聯」的理論和行動，加以歪曲和侮蔑，在他的下文裏，蘇汶寫道：「其實，我們單說左翼文壇是馬克思主義者似乎還不適當；我們應當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其間的分別是在他們現在沒有工夫來討論什麼真理不真理，他們祇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種目前主義。我們與其把他們的主張當作學者式的理論，卻還不如把他當作政治家式的策略，當作行動；而且這策略，這行動，實際上也就是理論。目前的需要改變了，他們的主張也就隨之而變；這才是「辯證」。

「你會不會稱輕重？什麼真理，什麼文藝，假使比起整個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來，還稱得出幾斤幾兩？亭子間裏的真理吧！小資產階級狗男女的文藝吧！你假使真是一個前進的戰士，你便不會再要真理，再要文藝了。」

「譬如拿他們所提倡的文藝大衆化這問題來說吧。他們鑒於現在勞動者沒有東西看，在那裏看陳舊的充滿了封建氣味（這就是說，有害的）連環圖畫和唱本。於是他們便要作家去寫一些有利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來給勞動者們看。這個，像胡先生之類的批評家當然是反對了；不但胡先生，恐怕每一個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人都要反對。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確實，連環圖畫裏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的。這一點難道左翼理論家們會不知道？他們斷然不會那麼蠢。但是，他們要弗羅培爾什麼用呢？要託爾斯泰什麼用呢？他們不但根本不會叫作家們去做成弗羅培爾或託爾斯泰，就使用了，他們也是不要，至少他們「目前」是不要。而且這不要是對的，辯證

的。也許將來，也許將來他們會原諒，不過此是後話。

「胡秋原先生把盧那却爾斯基稱爲「官僚、執棒子，莫明其妙」，何其毒視之深！其實，從這裏我們正可以看出胡先生是永遠不會瞭解盧那却爾斯基的。盧氏有一次曾經把託爾斯泰非議得很利害，但是在託氏百年祭時又把他恭維得很利害。他的話簡直有點如出二口。何其前後矛盾一至於此，何其不顧所謂「真理」一至於此！其實，託氏被「不要」於萬方多難之秋，而旋又被「原諒」於國泰民安之日，是很有道理的。你假使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便不該非難盧那却爾斯基「莫明其妙」，說他太會變卦，變卦就是辯證法。

「我之所以如此說，無非是想說明左翼文壇的一切主張都無非是行動，並且一切行動都是活的。而胡秋原先生不明白。左翼文壇已經屢次向胡先生暗示了，甚至說明了，叫他不要空談真理，離開行動是沒有什麼真理的。而胡先生還是不明白。胡先生固然會說，行動沒有真理是不正確的行動；但左翼文壇也會說，真理沒有行動便是不正確的真理。那麼，這場論戰會有什麼結果呢？

「在「知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着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羣。

「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氣味的；……但是在現今這局面下，作者是處了怎樣個地位呢？最初，在根本還沒有什麼階級的文學觀念打到作者腦筋裏去的時候，作者還在夢想文學是個純潔的處女。但不久，有人告訴他說，他不但不是一个處女，甚至是一個

人盡可夫的賣淫婦；她可以今天賣給資產階級，明天又賣給無產階級。這個，作者在剛聽到的時候，似乎就有點意外了；不過據說是事實，於是也就沒有方法否認。既而，因為文學這賣淫婦似乎還長得不錯，於是資產階級想佔有她，無產階級也想佔有她。於是文學便祇能打算從良。從良以後呢？作者便「從此蕭郎是路人」。

「你瞧，不是有好多大大小小的作者攔起了筆嗎？」

「固然，有一部分作者還想把她從一入深如海的侯門中拉回來，而另一部分就索性爽快快陪嫁了過去。前面那種作者是在那兒被「不要」，可以不必說。對於後面那種作者呢，要是要的，可是規矩很嚴，要你作另外一種人。終於，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是終於只能放手了，然而你說他們捨得放手嗎？他們還在戀戀不捨地要藝術的價值。」

「我這樣說，並不是怪左翼文壇不該這樣霸佔文學。他們這樣辦是對的，為革命，為階級。不過他們有一點不爽快，不肯乾脆說一聲文學是現在不需要，至少暫時不需要。他們有時候也會掏出藝術的價值來給所謂作者們嘗一點甜頭，可以讓他安心地來陪嫁。其實，這樣一來，卻反把作者弄得手足無措了。為文學呢，為革命？還是兩者都為？還是有時候為文學，有時候為革命？」

「正因為有這一班無所適從的作者的存在，胡秋原先生便又以藝術保護者的資格而出現了。他叫人不要碰藝術。這種自由主義的創作理論是應該受作者的歡迎的。」

「在人人都不肯讓步的今日，誠哉，難乎其爲作家！」（註一）

在雜文「論第三種人」裏，魯迅立刻予以嚴厲的批判，他說：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鬪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鬪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爲有人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鬪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爲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爲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爲幻影不能成爲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他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託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託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爲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託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爲「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爲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託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爲了那時的「現在」的。」（註二）

在他的「『連環圖畫』辯護」裏，又給這意見以詳細的補充的說明，魯迅又寫道：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爲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是進意大利的教皇宮——我沒有游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

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是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蹟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圖，原意是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 (Gusta ve Dore)，他是插畫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註二)

然而，「第三種人」為什麼偏偏厚於彼而薄於此呢？偏偏對於現在的「連環圖畫」特別地似乎頗為關心地來吹毛求疵呢？這原因，也許就因為他們是「第三種人」吧。稍後，在雜文「又論『第三種人』」裏面，魯迅指明出他們的面目的真相。他寫道：

(註一) 見「全集」第五卷第三六——三八頁。

(註二) 見同上卷四〇——四一頁。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闕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牠便會分明的顯現。……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羣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註一）

在這年的十一月裏，因為母親生病，九日，魯迅到北平去省親。北平他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來了，這次，受到了青年們的熱烈的歡迎，從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這一些學校講演，十二月才回上海。回到上海之後，編定自一九二五年三月起至一九二九年六月止的，與景宋女士的書信集，定名曰「兩地書」。（註二）在這書的序言裏，魯迅寫道：

「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思的，但對於別人，卻並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來，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有的，即有也未必存留的，

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會幾何時，社會發生了這許多的巨大的迅速的變革，回憶往事，魯迅也不免要發一點喟然的慨嘆了，他又寫道：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諷刺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激園和柔石。我們以這一本爲自己記念，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七六

由於和「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和這一論爭同時，瞿秋白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文學月報」創刊號上，提出了文藝大衆化的問題。在他的「大衆文藝的問題」這篇的第一節裏，在他說明「革命的大衆文藝問題」是在於發動新興階級領導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的意義之後，在第二節裏就提出了「用什麼話寫」的問題，他說：

「五四之後，從「文學革命」發展到「革命文學」，這是前進的鬭爭。但是，幾幾乎正是革命文

(註一) 見「全集」第五卷第一二九頁。

(註二) 見「全集」第七卷第一七——三六六頁。

學的營壘裏面，特別的忽視文學革命的繼續和完成。於是乎造成一種風氣，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的習慣，而採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的文法，日本的文法，常常亂七八糟的夾雜著許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懂的所謂白話。固然，有些著名的文學家，他們自己寫的作品，寬泛些講起來，是能夠寫出真正的白話的。但是，自從一九二四年之後，誰也沒有再特別注意的提出文學革命的問題。一切「新文藝」方面的作品和論文，尤其是翻譯，都在隨便的寫著那種新式的文言（所謂白話），一點兒也沒有受着什麼懲罰。革命文學方面是這樣，地主資產階級方面當然更不必說了。反動派只會利用這種革命隊伍之中的弱點，來打擊革命文學的發展。「幸災樂禍的」表示他們的文章寫得童話一樣的「順」，而革命文學寫得「天書一樣的難懂」。其實，這些「通順的」文學家正是現在的第一號的「林琴南」。

「因此，大眾文藝的問題，首先要從繼續完成文學革命這一方面去開始。大眾文藝應當用什麼話來寫，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卻是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

「現在中國文字的情形是：同時存在着許多種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電報等等）；（二）是梁啟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三）是五四式是所謂白話；（四）是舊小說式的白話。中國的漢字已經是十惡不赦的混蛋而野蠻的文字了，再加上這樣複雜的，互相之間顯然有分別的許多種文法，這叫三萬萬幾千萬的漢族民衆怎麼能夠真正識字讀書？這差不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新的文學革命，不但要繼續肅清文言的餘孽，推翻所謂白話的新文言，而且要嚴重的反對舊小說式的白話，「反對現在的一切種種林琴南」！是我們的新的口號。這就要一切都用現代中國活人的白話來寫，尤其是新興階級的話來寫。新興階級不比一般「鄉下人」的農民，「鄉下人」的言語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新興階級，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面，在現代化的工廠裏面，他們的言語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僚的所謂國語），牠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的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等的新的術語。這種大都市裏，各用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真正的現代中國語，這和知識份子的新文言不同。新文言的杜撰新的字眼，抄襲歐洲日本的文法，僅僅只根據於書本上的文言的文法習慣，甚至於違反中國文法的一切習慣。而新興階級普通話的發展，生長，接受外國字眼，以至於外國句法……卻是根據於中國人口頭上說話的文法習慣的。總之，一切寫的東西都應當拿「讀出來可以聽得懂」做標準，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話。

「至於革命的大眾文藝，尤其應當從運用最淺近的新興階級的普通話開始。這裏，應當預防可能的錯誤——就是盲目的模仿舊小說式的白話——我們決不當容許這種投降政策，所謂「最淺近的普通話」是最大的民衆有聽得懂的可能白話，而並不是舊小說式的白話。這是要新興階級的先進份子，領導着一般勞動民衆去創造新的豐富的現代中國話。有必要的時候，還應當用某些地方的土話來寫，將來也許需要建立特殊的廣東話，福建話等等。」（註一）

但是，在「文學月報」的第二期上，止敬先生卻提出不同的意見，在他的「問題中的大眾文藝」，對於「用什麼話」寫這問題，他以爲：瞿秋白先生所描寫的活龍活現的「真正現代中國話」何嘗真正存在？新興階級中並無此全國範圍的「中國話」。他以爲：土話的大眾文藝比之「真正現代中國話」的大眾文藝，可能性更大。他又以爲：在目前，到底還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話」——即所謂新文言——；只要從創作的人多下工夫修煉，肅清歐化的句法，日本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見於口頭的名詞，還有文言裏的形容詞和動詞等等。而作家要辦到這層，就一定不能躲在書房裏用工夫，而必須和各種南腔北調的人多多接觸，先使自己的嘴巴練好。

在「文學月報」第三期上，瞿秋白先生又發表了「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他把他的意見說得更具體些，同時也就更深入些，他說：

「中國的文學革命沒有完成，而需要第二次的文學革命。——這是我的見解。而止敬先生認爲「不能不仍舊用新文言」，不必管舊小說的白話還佔着統治地位，——這是根本認爲沒有新的文學革命的必要。」

「關於這部分的說明，尤其重要。而且不僅僅是大眾文藝的問題，而是一般的文化革命的問題。我在第一篇文章裏就屢次說明：「一切東西都應當用現代中國活人的白話來寫」，而大眾文藝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在這一篇文章裏，再來特別着重的說明「一切寫的東西」的文字上的革命的必要。」

怎樣才是「一切寫的東西的文字上的革命」呢，在這篇文章裏，他說：

「我所謂的新文言，就是隨便亂用不必要的文言的虛字眼——口頭上說不出來的許多字眼，有時候還有稀奇古怪的漢字的拼湊。這樣，這種文字的本身就剝奪了羣衆了解的可能。羣衆要去學會運用這種文字，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口頭言語的文法之外，（或者學習普通話的文法之外），再去費了五六年工夫學習漢文文言的文法。所以我說新文言在這一點上是和舊文言相同的，牠是一種「階級的文字」。這種文字根本沒有改用羅馬字母的可能。而中國普通話，上海話，廣東話，福建話，……（方言區域和普通話的口音標準等等，還要詳細的調查研究下去），將來一定要採用羅馬字母而廢除漢字，變成新的中國文，上海文，廣東文……。」

又說：

「『新的文學革命』的綱領，是要繼續五四的文學革命，而澈底的完成牠的任務。這是要真正造成現代的中國文，——可以做幾萬萬人的工具，被幾萬萬人使用，使幾萬萬人都能够有學習藝術的可能，簡單而明瞭的：先要根據現在這種不完備的沒有完全形成的中國的普通話（可是真正是活人能够說得出來的話），造成一種比文言更優美的文字。雖然這種普通話，用漢文寫着仍舊是一種「糊弄局兒」，然而這種真正白話，——活人說得出來的話，很容易用羅馬字母拼音而廢除漢字。」（註三）

（註一）轉引自李何林先生編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三五九——三六一頁。

（註二）以上引文，均轉引自上書第三六六及第三六八——三六九頁。

這樣，由對於「文藝大衆化」的問題，便引向了「大衆語」和「新文字」的問題了。

「大衆語」和「新文字」這一些問題正式地被提出是在這之後不久，一九三三年的時候。這是一個新的「文化革命」的陣營對於頑固的守舊的反動派澈底的，也是最後的鬭爭。

最初，引起這個論爭的是汪懋祖先生在一九三三年所提倡的「文言復興」的主張，在他的大作「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和「中小學文言運動」裏，一方面，他列舉出文言文的優點說：

「文言便於敘事，說理，議論，應用，而壯烈之節，激昂之氣，尤有資於文言，若以白話表之，則易失之狂暴，無所裁節。……」

「文言爲口語之符號，所謂一字傳神，最能描寫文言之便利。……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需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曉曉；乃必含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

又說：

學習文言固較尋常語言稍難，而應用上之省力，則閱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較經濟，若用耳不用目，固無須文言，若須用目則文言尚矣。因文言爲語體之縮寫，語言注重音義，而文言於音義以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此僅就工具言之，已無待辯論。」

在另一方面，就硬把罪狀加在白話文的頭上，他說：

「青年因長久講習語體，潛移默化，而就好所謂時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當之思想，每棄不觀，獨於現代文藝之詭譎，刻畫，與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釋手，……其結果則習爲浪漫，爲纖巧刻薄，馴至甘墮於流浪的生活。……」

『現代語體文，乃新文化運動之產品，而其運動之意義，在於發揮個人主義，毀滅禮教，打倒權威，暗示鬪爭，今則變本加厲，徒求感情之奔放，無復理智之制馭，青年浸淫日永，則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讀之而快意。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彼等且視若土苴，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孟子洪水猛獸之說，觀於今而益信。』(註二)

顯然地，這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幼稚得可笑的夢囈似的胡說八道，在這年六月裏，陳子展先生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他的「文言——白話——大眾語」，給予了這一種荒謬的論調以嚴厲的批評，並且正式地提出了『大眾語』這個字樣來，他寫道：

『其實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分過勝負了，並不是林琴南章行嚴諸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好，他們趕不上古人；只因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某種程度變革的路上，基礎一動，舊文化全般動搖，文學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種。這種大勢所趨，自然還有許多回環曲折，可是站在沒落下去的某方面，無論個人或他所屬的某一階層，雖然還能夠來幾次掙扎，最後的勝利卻不會歸到他們的，儘管也得佩服他們的勇敢。』

『……現在我們以爲要提出的是比白話更進一步，提倡大眾語文學。這理由並不怎樣高深繁重，

(註一) 以上引文，均轉引自「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三七二——三七三頁，第三七四——三七五頁。

就極淺薄極簡單的說，十多年來的白話文，雖然比較文言的東西是要和大衆接近些兒，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這個顯然還不够。目前的白話文學只是知識份子一個階層的東西，還不是普遍的大衆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簡單的話說，只因這種白話還不是大衆的語言，從前爲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在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衆語。」（註一）

接着陳子展先生提出「大衆語」問題之後，陳望道胡愈之等先生們也都發表了他們的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由於「大衆語」這一問題而連帶惹起的，便是牠的寫法拉丁化；八月二十三日魯迅發表了「漢字和拉丁化」，他堅決地主張必定要把漢字廢除掉，他說：

「爲了這方塊的連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弄到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卻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馬上回答的。」（註二）

再後，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的「答曹聚仁先生信」裏，魯迅提出了更具體的意見。他這樣寫道：

「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卻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眾文，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爲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分爲多少區，每區又分爲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爲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複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牠已經採用了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眾語」的雛形，牠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

（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着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顯，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爲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够的，而中國大眾的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

（註一） 見李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三七〇——三七二頁。

（註二） 見「全集」第五卷第六一五頁。

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啓蒙的大衆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爲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着「這媽的天氣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麼都要媽的了。」那麼於大衆有什麼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衆話雛形的地方，我以爲大可以依此爲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爲「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卻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爲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够懂。有些人以爲「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那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爲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够實行的，我以爲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

衆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註一）

十六日，魯迅又寫出了洋洋萬餘言的「門外文談」（註二）詳細地說出漢字是怎樣來的，後來牠又怎樣演變，以及將來怎樣去改造牠。從根本上把謎一般的，『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像符咒似的方塊漢字的神祕性，完全揭露出來了，他以為：

一、方塊漢字是中國的古代社會的，逐漸進化的途中的產物，而不是統治階級裏某一個聖賢造出來的；

二、最初的方塊漢字和圖畫是分不開的，『寫字就是畫畫』；

三、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向來就是不一致的，最大的原因是方塊漢字太難寫了，在作文時只好節省些。所以，以前的文章，至多只是當時的白話，而非大衆語；

四、文字在人民間萌芽之後，不久就被特權者所收攬，而變成特權者的東西，並且加上了尊嚴性和神祕性；

五、最初的文學作品，是不識字的作家——勞動者們創作出來的，後來才有文人的記錄，潤飾和模擬；

（註一） 見「全集」第六卷第七八——八一頁。

（註二） 見同上第八六——一一一頁。

六、方塊漢字必定要經過拉丁化之後，用文字表現出來的智識，然後才能普及到大衆；

七、先用固有的，使一個地方的語文大衆化，然後再加入新的成分，各地互相交換，這便是全國語文逐漸的大衆化；

八、大衆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他們的表現方法的剛健、清新，是所謂上流社會文學裏沒有的。

最後，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和「關於新文字」裏，再三著重地指出，方塊漢字是中國勞苦大衆身上的一個結核，這病菌潛伏在體內，若不除去牠，結果是自己必定趨於滅亡。只有採用簡單明瞭的，根據於實生活產生出來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的新文字，這才是中國語文的新生，同時也是勞苦大衆的活路。

勞苦大衆獲得這樣的武器，在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中是有利的。

七七

和普洛文學、新興藝術平行，在中國，作爲新興階級解放運動的另一翼的是國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新興的作品與理論——的翻譯與介紹。對於這工作魯迅是非常關切的，而且他自己一直地就在不斷的做着。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除了新興文學理論的介紹之外，他又曾譯出日本板垣鷹穗作的以民族色彩爲主的「近代美術史潮論」，（註）和各家意見都有的「關於文藝論說」的雜集「壁下譯

「讀」，(註二)印出來給「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裏去」的「革命文學家」們看看，作爲一種借鏡。一九三〇年會譯出「十月」。一九三一年會譯出「毀滅」。一九三二年又編譯蘇聯作家二十人集，這書分爲兩冊出版，上冊題名曰「豎琴」(註三)，其中收入柔石先生譯的兩篇，靖華先生一篇；下冊題名曰「一天的工作」(註四)，其中收入文井先生譯的兩篇；其餘都是魯迅譯的。此外，又爲曹靖華先生譯的「鐵流」做編校的工作，出版時又作「編校後記」，又爲靖華先生譯的蘇聯聶維洛夫作「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作「『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註五)；爲瞿秋白先生譯的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解放了的董·吉訶德」，作「『解放了的董·吉訶德』後記」。(註六)

因爲新興文學的作品與理論的翻譯和介紹工作，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使得神經衰弱或過敏的人們頭痛了。首先給予這工作以打擊的是政治上的壓迫，其次，便是對於牠的曲解和破壞。當着魯迅最初翻譯新興文學理論的時候，梁實秋教授就第一個站出來說這是「硬譯」，「硬譯」即「死譯」，

(註一) 收入「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七——一七〇頁。

(註二) 收入「全集」第十六卷第九——二七一頁。

(註三) 收入「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二五四頁。

(註四) 同上第二五七——五四一頁。

(註五) 見「全集」第七卷第八二〇——八二三頁。

(註六) 同上第八二六——八三五頁。

他以為「此風不可長」；和梁實秋教授的論調可以互相比美的，是趙景深老爺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主張。他們兩位都是「拼死攻擊「硬譯」的名人」。對於他們魯迅會有極嚴厲的駁斥。

「這樣的書，」梁實秋教授以前曾經指着魯迅譯的「文藝與批評」，大聲地呵責道：「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句法的線索位置。」

其實，梁教授是不懂得這本書的內容，卻故意來和魯迅爲難，帶有開玩笑性質，硬是要把「硬譯」挖苦一下，來無理取鬧的。

魯迅卻毫不客氣的，輕輕揭破了他的祕密，回答說：

「這些話，在我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看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着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着手指（其實這恐怕是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 B C D者自以爲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爲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爲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實際上，梁實秋教授對於「這樣的書」裏的內容，實在是非常隔膜的，但他卻不肯承認自己的無知，怕損害到他的「尊嚴」，他擔心着自己的教授位置和飯碗，會被這些邪說異端弄掉了；所以他就

對於這新興的進步的加以曲解和嘲弄了。

「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魯迅又繼續追問下去道：「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記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註一）

這種想抹殺新興階級的文藝的卑鄙的手段，在這裏被魯迅揭露無遺了。魯迅仍然堅持着自己的主張說：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註二）

而梁實秋教授的不是「硬譯」的巧妙的翻譯，是怎麼一回事呢？請看梁教授對於Proletary 這個字的高明的翻譯吧，在他的大作「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面，他這樣寫道：

「其實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
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letar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

（註一） 以上引文見「全集」第四卷第二〇六頁，第二二二頁。

（註二） 見「全集」第五卷第一四八頁。

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註一）

這樣的妙文，這樣的翻譯，除梁教授之外，誰還能敢發表出來哩！把普羅列塔利亞譯成「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於是天下也就太平了。這是我們的梁教授在翻譯界爲主人立下了蓋世的功勳。

趙景深老爺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主張，這真叫人不可思議了。但魯迅卻道破了其中的底細，他說：

「這一條格言雖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對於讀者是有效的。因爲「信而不順」的譯文，一看便覺得費力，要借書來休養精神的讀者，就自然會佩服趙景深教授的格言。至於「順而不信」的譯文，卻是倘不對照原文，就連那「不信」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來對照的讀者，中國有幾個呢。這時候，必須讀者比譯者知道得更多一點，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錯誤，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則，就只好胡裏胡塗的裝進腦子裏去了。」（註二）

這算是什麼呢？這叫做翻譯上的愚民政策。好在中國的小百姓們是不識字的，學者教授高興怎樣翻譯就怎樣翻譯了。

因爲一些不負責的「順」譯家們的胡譯、亂譯、昏譯，這樣亂搞一通，讀者上了幾回大當以後，於是就有人講冷話，翻譯的工作便遭到人們的輕視和排斥；同時又由於政治上的對於新興文學的禁錮太厲害，於是書店老板就不接受翻譯的稿子了。不論翻譯的好壞，他們遇到了就搖頭嘆氣，說「翻譯

的書賣不了，不要了」每個雜誌也都掛起「不收譯稿」的牌子，把譯稿拒絕了。

爲着要糾正這個不良的傾向，魯迅提出嚴正的答辯，他說：

「今年（一九三三年——著註）是「國貨」，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了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都是一個也沒有。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註二）

作爲這一個理論的證明的，是魯迅的對於翻譯的工作的社會實踐。當着書店老板們因爲害怕而不敢印行新興的進步的文學作品，甚至於把已經訂好的印書合同廢棄了的時候，魯迅自己就拿出錢來，用「三閒書屋」的名義，印出「鈔滅」，「鐵流」和「士敏土之圖」來，這書屋所出各書的廣告，也

（註一） 轉引自「全集」第四卷第二〇四頁。

（註二） 見「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二——三三三頁。

（註三） 見「全集」第五卷第一四七——一四八頁。

是魯迅親自擬定的。他這樣寫道：

「現在只有三種（靖華按：即「毀滅」、「鐵流」和「士敏土之圖」），因本書屋以一千現洋，三個有閒（靖華按：「毀滅」譯者魯迅，「鐵流」譯者曹靖華及「鐵流序言」譯者史鐵兒，即秋白），虛心紹介，誠實譯作，重金禮聘校對老手，甯可折本關門，決不偷工減料，所以對於讀者，雖無獎金，但也決不欺騙。」（註一）

當着書店老板們都對着翻譯的作品搖頭嘆氣的時候，在一九三四年夏天，魯迅就約好了茅盾先生等幾位朋友，由他們自己來辦專門登載翻譯文章的雜誌——「譯文」。先是由魯迅請黃源先生向生活書店接洽，先試辦三期，稿費編輯費一文不要，若銷路不壞，以後再訂合同補算。

「與書店接洽定當後，決定了九月十六日出版，魯迅先生便開始編輯起來了。」黃源先生，記載這事的經過道：「他親自翻譯了幾篇，配製了許多插圖，以及名貴的本刻，又約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各人譯了兩篇。他把第一期的稿件插圖等等一切準備好了，便告茅盾先生約我在茅盾先生家裏會面，有許多事可當面接洽一下。」

「大概是——一九三四年八月十號左右罷，我如約在下午一二時到了茅盾先生家裏。」黃源先生詳細地描寫着這次會面的情形，他繼續寫道，「魯迅先生還沒有來，我和茅盾先生坐着閒談，不多久，魯迅先生從前門進來了，穿着一件白夏布長衫，短短的；掖下挾着一個用日本包袱包的書包，戴着怎樣的草帽，和是否穿着後來見他常穿的膠底帆布鞋，卻記不清了。我們站了起來，他朝我們點點頭，茅

盾先生給介紹道：

「這是黃源先生，見過的吧？」

「見過的，見過的，」先生接連着說。

「是魯迅先生。認識的吧。……」

「認識的，……」我應聲着。

「那時天氣很熱，外面太陽猛烈的曬着。魯迅先生脫去了長衫，掛在客堂門口的角落裏衣架上，便坐下來談話。一張方桌靠牆放着，我和先生對面坐，茅盾先生在中間，朝着牆壁，我們談些什麼話，已一點也記不起了。總之大家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很隨便，一點也不覺得「不容易對付」。

「談了一些時候，先生把帶來的包袱解開，裏面是創刊號的稿子，以及製插圖用的各種畫冊木刻。先生把稿子和畫冊等交給了我，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題名用幾號字體，插圖縮成多少大小，都已一一註明。總之差不多自前記以至後記，一切都編製定當。於是我們談開本的大小，先生說：

「現在的雜誌，是十六開本，我們來個二十三開本吧。」

「茅盾先生和我都贊成。」

「不過怎樣排法，格式怎樣？」我接着問。

（註一）引自曹靖華先生作「魯迅先生與翻譯」。

「只要大方一點，你去計劃罷。」先生隨口應道，口氣好像對極熟的朋友，不像對一個僅泛泛的見過幾次面的青年。

「好，排了樣子出來，我再送給你們看罷。」我說。

「好的，你有信寄到內山書店，有事情請茅盾先生找我。」先生說。

「將來校樣出來後，也送到內山書店罷。」我說。

「不，路很遠，送來送去不方便，你校一校罷。」先生仍用着像對極熟的朋友似的口氣，親切的說。〔註一〕

到了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譯文」雜誌如期出版了。在創刊號裏他用了許遐的化名譯出果戈理的「鼻子」，用鄧當世譯立野信之的「果戈理私觀」，用茹純譯格羅斯的「藝術都會的巴黎」，因為在當時，不用這些化名，魯迅的譯作是不能夠通過的。

「他看着「譯文」出版了，樣式，印刷，紙張都還滿意。銷行不能說壞，接着一版二版三版四版五版，輿論也還好。他工作疲乏時，躺在書桌邊的藤椅上，一邊吸着廉價的紙煙，一邊想像着這雜誌的讀者總能細心地從頭至尾地看一遍的罷，他會心的笑一笑，他滿足了。」

「於是他又埋頭工作。第二期用樂變的筆名譯了紀德的「描寫自己」，石川湧的「說述自己的紀德」的是先生，用張祿如的筆名譯了巴羅哈「山民牧唱序」的是先生，用許遐的筆名第一次介紹了俄國薩爾蒂珂夫的「饑饉」的是先生，用鄧當世的筆名開始譯了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第一二節的

也是先生。他一共譯了五篇。

「爲了環境的壓迫，他只能這樣埋了頭，暗暗地偷偷地化了筆名，擠着自己的血和乳，餵給千萬的青年。

「第三期他又譯了巴羅哈的「會友」，並續譯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

「最初這三期完全是先生親自一手編定的。

「他除了自己譯稿外，又找插畫，集稿，他把寶貴的精神，寶貴的時間化在許多雜務上。只有和先生合作過的人，才能想像到先生做事如何負責，如何認真，如何尊重別人的意見，又如何體貼別人的難處。我先前只讀先生的文章，覺得先生文章針針見血，淋漓盡致，使人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但我想像不出握着這鋒利的筆的先生是如何樣的人。我愛讀先生的文章，但對先生卻只存敬畏之心，這當然是最浮淺的理解。從我接近了先生，自然更熱烈地愛讀先生的文章，也更得多理解一點了。但同時我愛先生的人卻更勝於愛先生的文章千百萬倍。我看到一個巨人，他的良心好像一般烈火，五十餘年來始終猛烈的燃燒着——他以自己的血肉做成火把，在這暗無天日的世界中燃燒着；和世界一角的紅光輝映着。他成了光明，真理，正義的化身。被壓迫的民族與帝國主義戰鬪，他站在被壓迫民族方面；被壓迫階級與統治階級戰鬪，他站在被壓迫階級方面，小而至於學生與學校鬪爭，他也站在學生方面；編輯和書店鬪爭，他也站在編輯方面；他是一切「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的護士，不，他不

（註一） 以上引文均見「魯迅先生與譯文」。

僅是護士，他自己還要投在一切戰鬥中，如鋼鐵鍛鍊成的最勇猛的戰士，始終站在最前線投着標槍。但這樣如鋼鐵鍛鍊成的戰士，卻又是個待人至誠懇切之至的樸實的老人。他便是先生，魯迅先生！」黃源先生又寫道。

「譯文」雜誌從第四期起就由黃源先生接手編輯。魯迅仍然不斷地譯稿子，我插圖，他更希望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從第四期起特別多多地選登優秀的新進的翻譯家的稿件。這樣，他支持着「譯文」雜誌有兩年多，到第三卷爲止，方才因故停刊。但不久，魯迅又使得牠復活了。可是他這時自己身體已經病了太久，不能夠勉強了，但是魯迅在病中還十分關切着這一個新興事業。

「但「譯文」終於又復刊了，先生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黃源先生寫道，「他比以前更關切牠，我們也用了全力辦。但不久先生病倒了，在起病以前他還譯好了「死魂靈」的第三章。他病了，我把這第三章又擱下來，預備在他痊愈之後再發表，免得他在病中老掛念着。到了上一期他覺得好一點，自己堅持要發表，……」

「十月十七日下午他受了風寒，夜裏三點鐘病勢突變，到十八日早晨他已無力說話，但是他因爲想到「譯文」的廣告十六號十七號都沒有登出，雜誌也沒有送去，他焦急地要看看這期有些什麼文章，於是他問廣平女士：「報上有沒有廣告？」廣平女士告訴他「譯文」的廣告已刊出了，他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此外還有些什麼文章，他聽了還不滿足，說：「你把報紙同眼鏡拿來——」

「於是他把報紙上的「譯文」廣告的目錄仔細看了一會。這也就是先生一生對於「譯文」的最後

的關心了。」（註一）

魯迅開始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註二）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裏。這書是當時「世界文庫」的編者請他翻譯的，那時他沒有細想，便一口答應了。這書魯迅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還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稀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爲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於是他便着手翻譯了，這工作卻是相當艱苦的，魯迅寫出他的經驗道：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以爲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爲至少是無須構想的。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到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面摸出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爲預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爲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

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牠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

（註一） 以上引文均見「魯迅先生與譯文」。

（註二） 收入「全集」第二十卷第五——三〇六頁。

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不够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乾的：硬着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註一）

在這樣的沉重而又緊張的工作之中，魯迅的多病的身體是無法再支持下去了。許景宋女士在後來，追憶到他這一段的翻譯工作的極度緊張的和不安的，趕快做完的情形，她寫道：

「我從「死魂靈」想起他艱苦的工作：全桌面鋪滿了書本，專誠而又認真地，沈湛於中的，一心想志的在翻譯。有時因了原本字彙的豐美，在中國的方塊字裏面，找不出適當的句子來，其窘迫於產生的情況，真不下於科學者的發明。」

「當「死魂靈」第二部第三章翻譯完了時，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體的虛弱，一直支撐着做工。等到翻譯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後似的，輕鬆地歎一口氣說：休息一下罷！不過覺得人不大好。我就勸告他早些醫治，後來竟病倒了。那譯稿一直壓置着。到了病有些轉機之後，他仍不忘記那一份未完的工作，總想動筆。我是曉得這翻譯的艱苦，是不宜於病體的，再三的勸告。到十月間，先生自以爲他的身體可以擔當得起了，毅然把壓置着的稿子清理出來，這就是發表於十月十六日的「譯文」新二卷二期上的。而書的出來，先生已不及親自披覽了。」（註二）

在翻譯的過程中，魯迅的嚴肅的工作作風是令人驚佩的。他不但一字一句，絕不苟且，就是每

一個出典，也必定要詳細查考出來，註釋清楚。黃源先生曾舉出這樣一個微細的例子來：——，『死魂靈』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剛剛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先生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 (Venus De medici) 爲克萊阿美納斯 (Clomencs) 所彫刻，但他沒有見過這彫刻的圖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勢，於是東翻西查，卻遍查不得，又買了日本新出的「美術百科全書」來查，依然沒有，之後，化了更多力氣，終於查出註明。」(註三)

魯迅的翻譯的一貫主張是「直譯」，「這種主張直譯而保存原文神味的態度，貫徹了先生一生介紹工作。」(曹靖華先生語) 藉着翻譯「死魂靈」這本書，魯迅把「直譯」的意義解釋得清楚，他說：

「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他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爲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化一句爲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化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時何地，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他必須有異國情調，就

(註一) 見「全集」第六卷第三四五——三四七頁。

(註二) 見「全集」第二十卷第六〇五——六〇六頁。「死魂靈附記」。

(註三) 見「魯迅先生與譯文」。

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牠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本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懂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甯可譯得不順口。」（註一）

「自然，這所謂「不順口」，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下」，「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在另一篇文章裏，魯迅曾經這樣解釋過，「乃是說，不妨不像喫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嚥完了，卻必須費牙齒來嚼一嚼。這裏就來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氣力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爲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語，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祕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着糊塗的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爲只好陸續喫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爲己有。」

……

「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牠剝落在過去裏。所以

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爲「順」，有一部份，則因爲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註二）

七八

和魯迅的方向相反的是出沒在上海灘上的各種妖魔鬼怪：革命小販、洋場惡少、以及各式各樣的並不標明立場的，縮頭縮腦的變形蟲們。他們的出現，他們的得意忘形，卻正是中國人民大眾遭受着災難，陷沒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戰爭，以及接着這之後的偽「滿洲國」的成立，這一些觸目驚心的，直接威脅着中國人民生存的嚴重的危機，卻沒有驚醒了中國的反動份子的先安內而後攘外，或只安內而不攘外的迷夢。接着一九三二年的偽「滿洲國」的成立，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加緊了牠的對於熱河以及長城各口的進攻，日本的特務機關在華北到處設立着，企圖所謂華北特殊化。這時，中國的革命政黨和人民軍隊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這意見並沒有被採納。於是他們自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對日宣戰，發出宣言，號召中國所有的軍隊，聯合對日作戰。一九三三年初，他們又宣佈了：一、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的攻擊，二、

（註一） 見「全集」第六卷第三四八——三四九頁。

（註二） 見「全集」第四卷第三七六——三七八頁。

保障民衆的自由和民主權利，三、武裝民衆對日作戰；在這三個條件之下，他們願意和國內任何軍隊合作。可是，反動派卻仍是不理，在一九三三年的四月，又發動了第四次反人民的戰爭，雖然他們不久便失敗了，在這年的十月間，又發動了空前的大規模的，持久的殘酷的第五次的反人民的內戰。掩飾着和點綴着反動派的醜惡的豺獐的面目的，也正是這一批一批的，今天這樣變而明天又那樣變的，聰明伶俐的先生們。

魯迅卻使用着他的最鋒利的解剖刀——雜文，給予他們（主子和幫閒或幫兇者）以毫不容情的剝脫。

當着一九三三年一月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裏中起來，向着山海關攻擊，不久，山海關失守了，而不抵抗主義者還是只當沒有看見，專心致志於安內的偉大事業。魯迅曾有嚴厲的指斥，他說：「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鬭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鬭爭，也愛看自己的鬭爭。」

「但我們的鬭士，只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

「還是留着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暫時總有一些才還在看着的。但自然，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註二）

在榆關失守之後，北平的一般手無寸鐵的學生們，因為政府不能給他們保障，只好大家走散了，所謂社會上的人士，對於他們便加以無端的責難了。在雜文「逃的辯護」裏，魯迅爲他們辯護道：

「古時候，做女人太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去年冬季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爲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鎗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爲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裏還坐得住麼？」

「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並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鎗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教育顯了成效。』（註一）

這一班不抵抗主義者們，他們在表面上不說是『不抵抗』的，據他們說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或者是『長期抵抗』的。可是，既然說是『抵抗』了，爲什麼在事實上卻並沒有抵抗呢？或是裝出要『抵抗』的樣子，看敵人來卻反而先逃跑了呢？這不是很滑稽可笑的事情嗎？這將作何解釋呢？請看那時的首都的『救國日報』上的名言：

『浸使爲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見『上海日報』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轉載）

呵！原來是爲了『戰略關係』。

在雜文『戰略關係』裏，魯迅道出這『戰略關係』的祕密，他說：

『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血的確流過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將要流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都是反對運動者的血。爲着什麼？爲着戰略關係。』

『戰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時候，曾經說：『爲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這樣就退兵；過了兩天又說，爲戰略關係，『如日軍不向我軍射擊，則我軍不得開鎗，若士兵一體遵照』，這樣就停戰。此後，『第二道防線』消失，上海和議開始，談判，簽字，完結。那時候，大概爲着戰略關係也會經見過血；這是軍機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於親自流過血的雖然知道，他們又已經沒有了舌

頭。究竟那時候的敵人爲什麼沒有「被誘深入」？

「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次敵人所以沒有「被誘深入」者，決不是當時戰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於反對運動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還有個原因：原來英國從中調停——暗地裏和日本有了諒解，說是日本呀，你們的軍隊暫時退出上海，我們英國更進一步來幫你的忙，使滿洲國不至於被國聯否認，——這就是現在國聯的什麼什麼草案，什麼什麼委員的態度。這其實是說，你不要在這裏深入，——這裏是有贖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說。深入還是要深入，不過地點暫時不同。

「因此，「誘敵深入北平」的戰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幾次。

「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無論是黃面孔、白面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無論這些敵人要深入到什麼地方，都請深入罷。至於怕有什麼反對運動，那我們的戰略家：「雖流血亦所不辭」！放心，放心。」（註二）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一些稀奇古怪的不通的文章，便常常在刊物或報紙上出現了。其實也並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此先就「不敢通」了。魯迅說：「頭等聰明人不談這些，就成了「爲藝術的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方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四二七——四二八頁。

（註二） 見同上第四四四——四四五頁。

者，但兩者都是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裏的」。因此，惹起了當時的『民族主義文學』家王平陵先生的『通論』，他帶着輕薄的口吻而又官腔腔調的說道：

『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見他老先生的文章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裏去了。那麼，像他這種有間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儘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麼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爲着解放勞苦大眾而吶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爲着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麼，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產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裏，可以遇見他們伴着嬌美的愛侶，一面喝香檳，一面吃朱古力，與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懶，乘着雪亮的汽

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呵！鬪爭呵！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着，歡唱着，熱愛着。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麼苦，喊什麼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塗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麼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穫到什麼。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到什麼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拆通這「通論」，只是官話而已。魯迅反駁道：

「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論的腔調，就明白是屬於「官方」的。一提起筆，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

「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什麼「聽說」，什麼「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着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經有人當開學之際，命大學生全體起立，向着鮑羅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會經有人做過「孫中山與列寧」，說得他們倆真好像沒有什麼兩樣；至於聚斂享樂的人們之多，更是社會上大家周知的事實，但可惜那都並不是我們。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

「於是還要說到「文化的本身」上。試想就是幾個弄弄筆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監禁，鎗斃，失蹤的災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評，便立刻招來了「聽說」和「如果」的官話，叫作「先生們」，大有一網打盡之概。則做「基本的工夫」者，現在捨官許的「第三種人」和「民族主義文藝者」之外還能靠誰呢？「唉！」

「然而他們是做不出來的。現在只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

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爲「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註二）

「諷刺家，是危險的。」在雜文「從諷刺到幽默」裏，魯迅又寫道：

「假使他所諷刺的是不識字者，被殺戮者，被囚禁者，被壓迫者罷，那很好，正可給讀他文章的所謂有教育者嘻嘻一笑，更覺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現今的諷刺家之所以爲諷刺家，卻不在諷刺這一流所謂有教育的知識者社會。」

「因爲所諷刺的是這一流社會，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覺得好像刺着自己，就一個個的暗暗的迎出來，又用了他們的諷刺，想來刺死這諷刺者。」

「最先是說他冷嘲，漸漸的又七嘴八舌的說他謾罵，俏皮話，刻毒，可惡，學匪，紹興師爺，等等，等等。然而諷刺社會的諷刺，卻往往仍然會「悠久得驚人」的，……」

「樞紐是在這裏：他所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個人，他的諷刺倘存在，你的諷刺便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只好來改變社會。」

（註一） 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武漢日報」的「文藝週刊」，此係轉引自「全集」第四卷第四三八

——四四一頁。

（註二） 見「全集」第四卷第四四一——四四三頁。

「然而社會諷刺家究竟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人們雖高興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裏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笑笑既不至於得罪別人，現在的法律上也尚無國民必須哭喪着臉的規定，並非「非法」，蓋可斷言的。

「我想：這便是去年以來，文學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單是「爲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這情形恐怕是過不長久的，「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於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於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註二）

因爲那時的中國實在是難於「幽默」的地方，又沒有什麼「笑話」可說，更沒有什麼「便宜」能討，於是「幽默」只好歸天，「正經」統了一了全國。在雜文「從幽默到正經」裏面，魯迅寫道：

「又不幸而榆關失守，熱河吃緊了，有名的文人學士，也就更加吃緊起來，做輓歌的也有，做戰歌的也有，講文德的也有，罵人固然可惡，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經文章，裝正經臉孔，以補「不抵抗主義」之不足。」（註三）

一九三三年前後的中國的反動派所統治和指揮之下的所謂「文藝界」，大致就是如此的。和這些文士們的流言和呼應相配合的，是鏢客打手們的全武行的表演，以及對於圖書雜誌的殘酷

的檢査制度的建立。這就是說中國的反動勢力逐漸地走向法西斯主義化的道路，有許多人在盛讚着並且模仿着納粹匪幫的頭子希特勒的偉業。

在一九三三年的六月十八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先生遭了暗殺，這時，傳說紛紛，說魯迅也將不免。而魯迅真是憤怒已極，不顧生死，親自去到萬國礦儀館送殮。出門時候，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接着暗殺事件之後，便是對於影片公司和書店的搗亂。在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到十二月間，曾接連發生過這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劑同志會」搗毀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之攝影場，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在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聲一呼，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衝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檯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白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攝影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衆起來一致勦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衆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爲「中國電影界劑同志會」。約逾七分鐘

(註一) 見「全集」第四卷第四五八——四五九頁。

(註二) 見同上第四六一頁。

時，由一人狂吹警笛一聲，衆暴徒即集合列隊而去，迨該管六區開警派警士偵緝員等趕至，均已遠颺無蹤。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云云。

「據各報所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係共產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爲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爲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爲描寫階級鬭爭者，但以向南京檢委會行賄，故得通過發行。又稱該會現向教育部、內政部、中央黨部及本市政府發出呈文，要求當局命令該公司，立即銷毀業已攝成各片，自行改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對受賄之電影檢委會之責任人員，予以懲處等語。

「事後，公司堅稱，實係被劫，並稱已向曹家渡六區公安局報告。記者得訊，前往調查時，亦僅見該公司内部佈置被毀無餘，桌椅東倒西歪，零亂不堪，內幕究竟如何，想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所載）

「影界劇共會

警戒電影院

拒演田漢等之影片

「自從藝華公司被擊之後，上海電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動，從製片商已經牽涉到電影院，昨日本埠大小電影院同時接到署名上海影界劇共同志會之警告函件，請各院拒映田漢等編製

導演主演之劇本，其原文云：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電影界爲共產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影片公司之行動，查貴院平日對於電影業，素所熱心，爲特嚴重警告，祈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傑等所導演，所編製，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上海影界劇共同志會。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報」所載）

「今晨良友圖書公司

突來一怪客

手持鐵錘擊碎玻璃窗

揚長而去捕房偵查中

△……光華書局請求保護

「滬西康腦脫路藝華影片公司，昨晨九時許，忽被狀似工人等數十名，闖入攝影場中。並大發各種傳單，署名「中國電影界劇共同志會」等字樣，事後揚長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鐵錘，至該公司門口，將鐵錘擊入該店門市大玻璃窗內，擊成一洞。該男子見目的已達，立即逃避。該管虹口捕房據報後，立即派員前往調查一過，查得良友公司經售各種思想左傾之書籍，與搗毀藝華公

司一案，不無關聯。今日上午四馬路光華書局據報後，驚駭異常，即自投該管中央捕房，請求設法保護，而免意外，惟至記者截稿時尚未聞發生意外之事云。」（十一月十三日，「大晚報」所載）

「襲擊神州國光社

昨日七時四人衝入總發行所

鐵錘揮擊打碎櫥窗損失不大

「河南路五馬路口神州國光社總發行所，於昨晚七時，正欲打烊時，突有一身衣長袍之顧客入內，狀欲購買書籍。不料在該客甫入門後，背後即有三人尾隨而進。該長袍客回頭見三人進來，遂即上前將該書局之左面走廊壁上所掛之電話機摘斷。而同時三短衣者即實行搗毀，用鐵錘亂揮，而長衣者亦加入動手，致將該店之左櫥窗打碎，四人即揚長而逸。而該店時有三四夥友及學徒，亦驚不能作聲。然長衣者方出門至相距不數十步之泗涇路口，爲站崗巡捕所拘，蓋此長衣客因打櫥窗時玻璃倒下，傷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該長衣者當即被拘入四馬路中央巡捕房後，竭力否認參加搗毀，故巡捕已將此人釋放矣。」（十二月一日，「大美晚報」所載）（註一）

比這一些流氓手段稍微文雅一點的，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公佈了查禁社會科學和文學書籍的辦法。在二月裏，就由部裏派員到上海各個書店，開始嚴查了，總計查禁書籍至一百四十九

種之多，牽涉書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經市黨部審查准予發行，或內政部登記取得著作權，或者是各作者之前期作品。這樣，以致引起上海出版業之恐慌，於是新書業組織之中國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集議，於二月二十五推舉代表向市黨部請願，結果蒙市黨部允許轉呈中央，將各書重行審查，從輕發落，同日接中央覆電，允予照准，惟各書店於復審期內，須將被禁各書，一律自動封存，不再發賣。在這些被禁書籍裏面，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新興的社會科學和進步的文藝理論與創作。

這樣，大批禁燬書籍的盛舉，總算告一段落，書店也不再開口了。

然而，還有困難的問題存在着。那就是書店是不能不繼續印行新書和雜誌，所以還是有陸續被扣留，查禁，甚而至於封門的危險。這危險，首先使店主吃虧，不得不想個補救辦法。不多久，黨官店主和他的編輯，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善後的如何使新書和雜誌出版，不致遭受查禁的辦法。於是，當場就有一位雜誌編輯先生某甲，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於是，不多久，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號』字樣，說明了該抽的已經抽去，該刪改的已經刪改，並且保證着發買的安全——不過也並不完全有效，例如魯迅的『二心集』被刪剩的文章，書店改名爲『拾零集』，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卻還是沒收。

什爲是人身自由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呢？那只是狗屁罷了！

在這暗無天日的暴君和他的奴才們統治之下，中國人民的災難，一天天在加深着！

這時，「山東三省而熱河，山熱河而長城，由長城而「綏東非戰區」，由非戰區而實際佔領河北，察，綏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河山，已經被日寇佔領和侵襲了。田中奏摺所預定的完全滅亡我國的毒計，正着着實行，長此下去，眼看長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將逐漸被日寇所吞蝕。我五千年古國將完全變成被征服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了。」（「八一宣言」）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的革命政府和人民的軍隊開始了長征，實踐自己的諾言，北上抗日。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他們又向全國人士，發出了抗日救國的宣言，「再一次向全國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他們並且擬定了「國防政府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的形式和內容。把「中國人民鬩爭的鋒芒，只是對準現在階段上的死敵——日寇。」

「八一宣言」發表之後，引起了全國各界人士的響應。最顯著的是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北平學生反對華北傀儡政權的鬩爭，由這個鬩爭的擴大和深入，便掀起了普及全國的反對內戰救亡鬩存運動的巨浪。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文化界人士也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也發出了全國人民一

政聯合起來，抗日救國的呼聲。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總組織之內，文藝界也形成了最初的小規模的團結。爲着適應這全民族救國聯合戰線運動，爲着響應中國的革命政黨所提出的「國防政府」這政治上聯合戰線的號召，不久，在文藝界也提出了「國防文學」運動這一個口號。「在文學領域內進行救亡的工作」。

「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起見，魯迅和茅盾先生幾個人，經過一番商量之後，由胡風先生執筆，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間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個作爲創作的口號來，這立刻引起了國防文學論者周揚和徐懋庸先生等的反對和論辯。雙方爭執了好一些時候。

在實際上，這兩個口號所爭的只是彼此間的長短優劣而已，在原則上是沒有什麼差異的。這兩個口號都是在抗日民族統一的現實條件之下被提出來的，牠們都是服務於一個總的目標，「在文學領域內進行救亡的工作」，實在誰也沒有「標新立異」。

周揚先生在他的「現階段的文學裏」，說明當前文學的任務，他寫道：

「華北事變以後，中國的形勢起了一個新的基本的變化。遠東帝國主義併吞了整個華北，又在準備吞全中國，亡國的危懼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和賣國賊的中國人逼上了一條唯一的道路，就是一致向侵略者展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全民族救亡的統一戰綫正以巨大的規模伸展到一切的領域內去，文學藝術的領域自然也不能例外。國防文學就是配合目前這個形勢而提出的一個文學上的口號。它要號

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註一）

胡風先生在他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裏，指出了文學創作的方向，他寫道：

「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更加迫急了。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整個中華民族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因爲這，人民大眾的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和新的焦燥，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的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而能够描寫這個文學本身的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所以，爲了說明這個口號，首先要指出的是產生它的現實的生活基礎：

第一，在失去了的土地上面，民族革命戰爭廣泛的存在，繼續的奮起；

第二，在一切救亡運動解放運動裏面，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的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的要

求；

第三，人民大眾的熱情，的希望，的努力，在醞釀着一個神聖的全民族革命戰爭的現實，那戰爭能够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不願作漢奸的人民大眾；

第四，從太平天國運動到一二八戰爭的一切偉大的反帝運動，只有從民族革命戰爭的觀點才能够取得真實的評價。……

「那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底主題的。不過在這裏應該指明：是統一了那些主題，並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題。……」

「這一切，是帝國主義的助手，是產生漢奸的社會地盤，是養成漢奸意識的實質條件，由這些所引起的一切社會糾紛應該包含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主題裏面。所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

「從現實生活要求產生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方面也是繼承了五四的革命文學傳統，尤其是綜合了九一八以後的創作成果的。」

「九一八以後，反帝運動底最高形態發展到了民族革命戰爭。在文學上那也得到了反映，到最近且已爭得了一些成功的紀錄，在這些作品裏面我們看到了民族英雄底比較真實的面貌，人民大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尤其是民族革命戰爭和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這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先驅，是提出口號的作品的基礎。」（註二）

在這兩篇文章的立場和觀點上，是完全找不出矛盾和衝突的地方來的。在魯迅的文章裏，那就解釋得更清楚了。正當胡風先生和周揚徐懋庸先生等論爭得很激烈的時候，這時，魯迅生着病，並且病

（註一）轉引自李何林先生編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四一五頁。

（註二）轉引同上第四七六——四七八頁。

得很厲害，由他口授，馮雪峯先生筆錄的病中答訪者問：「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裏面，他說：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戰爭底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熳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戰爭，而是將這戰爭更深，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戰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戰爭，將一切戰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戰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胡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胡塗的昏蟲。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爲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

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鬭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卻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路，是全民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無需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鬭爭，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註一）

再後，他又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一篇長文，說得更明白澈底，淋漓盡致。他說：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爲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爲非常正確的，」

「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蝴蝶鴛鴦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詳一）

這樣的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這樣的對於戰友們的誠懇坦白的胸懷，魯迅使這一論爭得了解決的途徑，他把這一個文學運動引向着正確的方向。這是「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所不能了解的。他們卻猶猶地大發其議論了。就在這個時候，在魯迅發表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之前不久，魯迅會收到過這樣的一封信件：——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衆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爲，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衆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衆

的認識，使民衆認爲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衆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爲，使中國的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 Reds 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爲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鬭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鬭爭』的道路。我們認爲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爲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爲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爲

現光榮，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覆，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願頌健康！

陳××六月三日

魯迅收到了這封信，立刻予以嚴厲的駁斥，這時他病得很重，由他口授，仍由馮雪峯先生筆錄；他說：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鬪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爲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爲史太林先生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餐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爲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爲你們高超的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衆面前，倘若有人做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

報，你們能够洗刷得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爲從前你們中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爲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辦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爲我的某幾個「戰友」會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一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爲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大安。

魯迅六月九日（註一）

「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是不懂得這些的，他們必恭必敬地死守着他們的祖師的「不斷革命的」的誠條，他們只顧「研究革命理論」——那「高超的」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的「理論」，他們沒有看清楚中國革命的現實。他們似乎糊塗到連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都不知道，中國革命性質是一種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都不知道，而卻要拚命地堅持着他們的「正確的」「革命的民主鬭爭」的道路，——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道路。

在中國，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性子急是不行的！中國革命的現實是澈底的剷除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要澈底地完成這兩大革命任務，這需要廣大的中國人民大眾持久而堅決地作各種迂迴曲折的鬭爭的。也只有澈底的完成了兩大革命任務，中國人民大眾才能開闢出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然後，再由這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

這是一條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由中國的最革命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中國最大多數人民所贊同的新民主主義論的革命的道路；而不是托洛斯基以及他的『中國的徒孫們』所高唱的『不斷革命論』的道路。這界限是很明顯的。

所以，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威脅到我們整個民族生存的時候，聯合全國的各個階級各個黨派，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這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的『中國革命者』爲什麼『都感到羞恥』呢？難道我們都不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去從事『不斷革命』嗎？

這樣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只好拿去騙騙小孩子們罷。

七九

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魯迅的身體便逐漸衰弱下去了，但他卻仍然支持着繁重的工作。其實，當魯迅住在景雲里的時候，曾咳嗽，發熱，醫生說有肺病的嫌疑，叫他吃含幾怪的百拉托，經過一個

時期，好起來了。」（註二）這之後，身體便不行了。但仍支持着工作。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那一次版畫展覽會，便是魯迅一手經營的。因為當時的環境特殊，他把會場分做兩個：第一會場在北四川路千愛里四十五號，作品是德、法、蘇聯等國的版畫；第二會場在老靶子路海甯路日本青年會，作品是蘇聯、法、比、西、葡、美等國的版畫。這一些版畫的收集是很不容易的，蘇聯的那一些名貴的版畫，是由魯迅託曹靖華先生在蘇聯費了許多心血收集得來的；歐美的名家作品則是拜託那時留學法國的陳學昭女士和季志仁先生以及留學德國的徐詩荃先生收集得來的。現在，魯迅把這些作品拿出來展覽，使得青年的藝術學徒們有所觀摩，藉此引起他們的興趣，把藝術水準提高一些；並且促他們努力，把這片荒蕪著的藝術園地充實起來。

接着這次展覽會之後，魯迅仍是不斷地從多方面着手，來為中國的新與木刻開闢道路，從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尋求友軍，以及從中國的古代藝術裏尋找對於現代木刻有益的滋養料。這之後，魯迅又印行了麥綏萊勒 (Trans Mierod) 的「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畫；蘇聯各名家的創作共六十幅的「引玉集」；俄國阿根 (A. Agin) 繪，培爾那爾特斯基 (Berkhark) 刻的「死魂靈首圖」，以及德國凱綏·珂勒惠支夫人 (Käthe Kollwitz) 作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書。他又和鄭振鐸先生合作選印了「北平箋譜」共六卷，「十竹齋箋譜」共四卷（因工程太浩大，在先生逝世前僅印出一卷，其餘的在刻製中）——等註。此外，把中國的新興木刻的成果集中起來，在魯迅的指導和協助之下印成

（註一）見周建人先生作「關於魯迅的斷片回憶」。

的，有「創作木刻法」和「木刻紀程」兩本書。

爲着這一些初創的開闢草萊的工作，魯迅曾犧牲了他的寶貴的健康，作爲代價。在他逝世之前不久，爲着良友圖書公司選印的「蘇聯版畫集」，便是魯迅在病中親手一幅一幅選出來的。

雖然魯迅的健康是不行了，但是他對於工作卻並不放鬆，不僅不放鬆，而且他要「趕快做」，——「趕快做」——這個念頭是他覺得自己身體不行了之後才有的。越到他的晚年，他寫出的雜文分量便越是加多了。當他在一九三五年的年底編定了「且介亭雜文二集」的時候，在「後記」裏，魯迅寫道：

「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筆子裏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註一）

在魯迅晚年所寫的，接着「三聞集」、「二心集」之後的是他的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的第八個雜文集「偽自由書」（註二），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的第九個雜文集「南腔北調集」（註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十個雜文集「准風月談」（註四），和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第十一個雜文集「花邊文學」（註五）；以及他生前編好但沒有付印的「且介亭雜文」（註六）、「且介亭雜文二集」（註七）。和他死後由許廣平女士編定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和「附集」（註八）。這一些都是用來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最鋒利的武器。在這一段時期，鬭爭是非常曲折複雜的，黑暗的反動勢力非常之大，佔有絕大的優勢，壓

迫着新興的力量，使他們不能抬起頭來。爲着統治階級幫閒幫忙或是幫兇的鑠客暗探以及專用嗅覺的文人們充斥了整個的文藝界，發表他們的各式各樣的謬論。對於這一些黑暗中的鬼魅，魯迅便展開了他的銳利的筆鋒，一一加以掃蕩。他用各種不同的筆名，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使用着各種不同的手法，針對着各種不同的對象，在各種不同的報紙和刊物上，進行着各種不同的迂迴曲折的，然而卻是異常激烈的鬭爭。在「僞自由書」的「前記」裏，魯迅寫道：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卻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的壞處，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硬鋼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

(註一) 見「全集」第六卷第四四頁。

(註二) 見「全集」第四卷第四二一——六一五頁。

(註三) 見「全集」第五卷第一七——二二二頁。

(註四) 見同上第二三五——四七六頁。

(註五) 見同上第四七九——六四六頁。

(註六) 見「全集」第六卷第一三——二一七頁。

(註七) 見同上第二三一——四六四頁。

(註八) 見同上第四六八——六四二頁。

或和某乙的痘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爲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註一）

爲着回答這班英雄們——在某個主子保護之下的耀武揚威的「英雄」們，以及爲着後來的讀者明瞭當時的真相起見，差不多在每一本雜文集的後面，魯迅加上了一篇長長的後記，把當時的社會上的和文壇上的醜態，都清楚地畫了出來。這是頗爲使得某些人頭痛的辦法，因此也就引起了許多狃狃的狂吠之聲。

從「第三種人」——「民族主義文學家」一起，到幽默大師，富家贅婿，以及革命小販和托派匪徒止，他們都曾經因爲魯迅打着了他們的鼻子而表示不滿過，或則明譏，或則暗諷，或「好」意相勸，或則惡聲相加，或則亂造謠言，或則偷放冷箭；可是魯迅是不理會他們這些把戲的，不會有一個時刻，放鬆了對於他們的打擊。爲着這當前的迫切的戰鬥，魯迅也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在他的嚴肅的工作中，他損害了他的不能恢復的健康。

「二個作家對於他的工作生活是嚴肅的，如其這位作家是認真地對他的工作忠實的話。隨隨便便一揮而就的態度，不是一個好的作家所應有的。至少，他應該很謹慎地從事他的工作，我對於魯迅，所見到的就是這樣。」談到這一個時期的魯迅的寫作生活，景宋女士會這樣寫道：

「他是時常被許多識與不識的人們邀請寫稿的。在被限定的時間已經很急促，沒有工夫多加思索的餘裕，或者他自己正在沒有預算到的中間，一定要臨時趕交文稿，那麼，他甯可找些短篇來翻譯，卻不肯潦草從事，許多的短篇譯文，大約就是這樣來的。然而在未動筆之先選擇材料之際，是很經過一番苦心的，甚至爲了材料的沒有適當，連找幾天，看了幾許的原作，也是常有的事。到這時候，他會感慨地說：「唉，翻書也不容易。」爲了這方面的苦惱，所以他是時常留心買新書的，遇到有可以做翻譯的準備的材料，他就有時先買妥在那裏。

「至於創作，更是加倍的當心的，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評，也不是攤開紙就動手。那張躺椅，是他構造思維的好所在，那早晚飯前飯後的休息，就是他一語不發，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寫的大綱起腹稿的時候。每每文債愈多，腹稿愈忙，飯前飯後腦筋愈不得休息，更影響到他的胃納不佳，食慾不振，這都是互有關係的。就這樣磨掉了一生的生命。

「他有一本短評『花邊文學』，是因爲有些文豪譏諷他的短文而得優厚的稿費，特別借編者的用花邊圍繞而作雙關解釋的。但是魯迅自己知道他的短評產生也不容易，他說：「人家說這些短文就值得如許花邊，殊不知我這些文章雖然短，是絞了許多腦汁，把鍛鍊成極精銳的一擊，又看過了許多書，這些購置參考書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來，是並不隨便的。」這幾句話，就可以了解他一切

執筆行文的經過。

「在預備寫比較長一些的文章或者如「偽自由書」，「准風月談」的後記，幾乎是頭也不回，連夜編寫完成的萬言書。當他準備動筆寫比較長文的時候，他會很委婉地勸我先睡，等我睡了之後，可以靜心一意地寫作。……」

「到了早晨六時左右，經過了一夜寫作完成之後，有時他會把我叫醒，給我泡茶，在飲茶的時候，很高興地叫我先看他的文章。每次文章寫完儘給我先看的，偶然貢獻些修改的字句或意見，他也絕不孤行己見，很願意把他塗改的。或者預備些東西吃，有時午夜也會這樣要求，如果能够再有半杯酒，更覺滿意。但是有什麼好預備的呢！最方便的，就是雞蛋炒飯，放些葱，他是要炒得老的，照紹興農家的吃法，這種蛋炒飯他最喜歡。他歡喜吃硬的東西，蛋炒起來也是要焦硬些，軟綿綿的有些不大愛吃，好像絲綢的衣服不愛穿一樣，他是澈頭澈尾從內至外都是農民化的。譬如生黃瓜，脆花生，砂炒豆之類對於他，也還是愛好的食品。」

「他寫作的修養是很注意的。閒空的大部分都用在看書，更多的是外國書。除了社會科學的書是細細的閱讀之外，普通雜誌，他祇選幾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國內出版的雜誌，不過翻翻就算了，如果沒有什麼好作品，是不肯化費許多光陰的。有時寄來了，拆開之後，看看目錄就算了。我拿過來看，也會勸告似地說：「不如拿這些工夫做別的事。」對於報紙，也不過花費十來分鐘略略過目一下就完了，有時見到我總在看報，他偶然也會不耐煩地說：「這有什麼好看呢？」他雖然這樣像馬虎地

過口，卻是過了幾天忽然要找某一些材料，叫我向舊報翻時，我往往久翻不到，還是由他指示我約在某天，某一個角頭處找，這才找到。可見他處理學問的經濟，而我是自費了。等於沒有看過。他不承認有天才，然而這不是天才之異乎尋常嗎？他說：他也是用功得來的，這明明是告訴人以他的天才還是一樣的要用功，要善於用功。

「別人批評他的文章，他或看或不看，卻是不贊成依照批評而改變自己意志的。罵他的文章，就是寄到手頭，他卻未必就看，總把牠堆在一旁，等到用作材料的時候才去翻牠，這時是比較客觀的研究了，人家以爲他暴跳十丈高，其實更多的是爐火純青的時候。」（註一）

魯迅的雜文的發展到了現在的一個階段，貫穿着他的全部作品的現實主義的作風也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這一個作風在雜文裏的表現，是魯迅而對着當前現實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和虛偽的所謂客觀主義是相反的。所謂客觀主義者，在革命與反革命正進行着激烈的鬭爭的時候，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謂站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外的「第三種人」，或是爲着「整個」的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文學者」，其實，只是站在某一個隱蔽之下，披上了某一種偽裝，做出某一種姿態，而實際上卻是忠心耿耿爲着統治階級幫閒、幫忙或幫兇的。爲着要揭穿他們的虛偽的面目，就必須尋根究底地找出他們的階級的本質來；指明了：不管他們說的怎樣好聽，做的怎麼漂亮，或是動機如何「善良」，可是在實際的政治效果上卻是幫助了反動的統治階級，壓迫着進步的新生的革命力量。這便是違反着

最大多數的人民的利益。這樣的所謂客觀主義者，魯迅是必須加以揭穿的，在他們的各種不同的莊嚴的幌子上撥一撥，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種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的作風，是魯迅的以往的一貫作風，到了這一個階段，便發揮得更加充分了；並且還帶着洋溢的戰鬥的攻擊精神。

這一個作風在雜文裏的另一表現，是魯迅的表現方法的多樣性，這和公式主義或是教條主義是相反的。公式主義者或是教條主義者對於現實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是分不清楚的，越是分不清楚就越是死抱住教條不放手，他們有的認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或是把朋友當作敵人，拚命加以攻擊，而這攻擊方法又往往是由於公式教條作祟，各人把各人自己拘束在一個小圈子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和集團。這樣便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糾紛，互相消耗着實力，反縱容了真正的敵人。而魯迅恰和這相反，他是不固執自己的成見的，——尤其是對於自己的戰友，不固執自己的成見。但他卻把握着一個堅確不移的原則，爲着這個至高的原則，向各種化裝的敵人作多方面的，無情的堅決的鬭爭。這反映在他的雜文裏，便是表現方法的多樣性。

對於現實問題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表現方法的多樣性，在魯迅的現實主義的作風，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這是在他的雜文裏面一貫的優秀傳統；不過在這一階段的複雜環境表現得特別明顯，並且運用得十分靈活，真所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了。這也就是魯迅的後來的雜文的主要的特徵。

在這時候，除了這些雜文之外，魯迅又曾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寫出「非攻」(註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寫出「理水」(註三)，十二月寫出「采薇」(註四)和「出關」(註五)四個短篇歷史小說，一九三五年十

二月寫出的類似獨幕歷史劇的「起死」(註五)；和以前寫的三篇合在一起，共計八篇題名為「故事新編」，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了。

這書的寫作時間一共經過了十三年，最初一篇是在一九二二年寫出的，有兩篇是一九二六年的作品；最後這五篇的材料，在一九二六年、二七年便都收集好了。在這一個時候，魯迅才把牠們寫出來。在這書裏，所寫的雖然都是古時候的故事，可是，我們看到更多的卻是目前的現實社會的面目。在這書的「序言」，說及這書的內容魯迅會這樣的寫道：

「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爲「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

……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卻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罷。」(註六)

這裏所說的「舊書上的依據」，是魯迅要把這一些短篇歷史小說的歷史真實性，而所謂「信口

(註一) 見「全集」第二卷第五七六——五九二頁。

(註二) 見同上第四八四——五〇五頁。

(註三) 見同上第五〇六——五三二頁。

(註四) 見同上第五六一——五七五頁。

(註五) 見同上第五九三——六〇八頁。

(註六) 見同上第四五一頁。

「開河」則是魯迅想賦與這一些故事以現代性的現實主義的手法。這也就是使得某些人頭痛，使得他們有如芒刺在背的，他們所高聲大曬的「以古諷今」的手法。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魯迅的身體愈加不好了。十一月六日，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的前一天，上海蘇聯領事館招待他看影片「夏伯陽」，茅盾先生也在場。看完了電影，大家在下臨黃浦江的月台上休息；魯迅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很嚴肅地對魯迅說道：

「我覺得你身體很不好，你應該好好休養一下，到國外去休養。」

「我自己並不覺得什麼不對，」魯迅笑着說，「你從那裏看出來我非好好休養不行呢？」

「我直覺到。我說不上你有什麼病，可是我憑直覺，知道你的身體很不行。」

「你到了外國，一樣做文章，而且對於國際的影響更大。」這位朋友再三的勸他。

但是，在那天晚上，沒有得到結論。

過了一天，這位朋友又找茅盾先生專談這個問題，他以爲：魯迅在這時不及時出國休養，能活多少年是成問題的；但如果出國休養，一二十年的壽命是有把握的。地點最好是到高加索去。在休養期間，還可以完成「中國文學史」這部著作。到那年的年底，這位友人又來了，說是已經商洽妥當，具體地來談怎樣走，何時走的問題了。但是，魯迅卻以爲還是不出去的好。他說：

「我自己並不覺得這一定是致命的病。倘說是衰弱，則一二年休養也未必有效，因爲是年齡關係。再者，在國外即使是吃胖了，回來後一定立刻要瘦，而且也許比沒有出國時更瘦些。而且一出國便

做啞巴，人也很氣悶。」

於是，問題便這樣的攔起來了。（註一）

也有人勸魯迅到日本去養病的，也有人勸他到南歐去，但魯迅都沒有答應。

這時，又有人在傳播魯迅要出國的消息了，魯迅聽了很不高興，他頗爲幽默的說道：

「他們料我要走，我偏不走；使他們多些不舒服。」

最後，魯迅決定這事過了夏天再說，即使出國，也要把必須結束的事情結束一下。誰知道，不幸在一九三六年的三月就病倒了。

日本老醫師須藤先生在一「魯迅先生病狀經過」裏，這樣記載道：

「本年三月二日，魯迅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診，當時驗得病者體重中等，營養稍差，食慾不振，近一年半以來，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總須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喘息發作之日，症狀及醫治經過如下：

循左肩胛上部，右鎖骨上下窩及第三、四肋間部，胸骨緣深處，有似水泡之聲響。時作咳嗽，咯痰粘稠，質量或多或少，發熱最高在三十七度六分左右，毫無自覺，洩瀉無甚異常。右胸背面第七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細微。診察上肩胛骨下邊以下，詢問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稱並不知道。

胃擴張至胸部之上，不時充滿動搖之水聲，並無饑餓之感，時常失眠。

（註一）請參看茅盾先生作「紀念魯迅先生」。

「三月十九日。發熱較高，係「消耗性熱型」，病者聲稱右胸下部較痛，於是作突刺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喀痰有結核菌陰性，彈力纖維甚多。

「三月廿五日。咳嗽，喀痰甚多。

「三月廿八日。第一次行穿刺術採取胸液，約得三〇〇公分。

「三月廿九日。咳嗽頻發，而喀痰甚少，熱度仍爲「消耗性」，漸次升降，而於三十七度六分乃止三十六度四分左右爲多，一時進以滋養食物後，保守安靜，經過良好，遂停止用藥。」

病稍微見好一些，魯迅又開始工作了。

四月七日，他親自到良友圖書公司，選定蘇聯版畫。在這月內又着手編輯瞿秋白先生遺下來的譯著「海上述林」下卷；這書的上卷在他未病倒之前，在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便編定了。

五月十五日，魯迅的病，又復發了。這之後的溫度，總是在三十八度左右，沒有降低下來。二十日下午帶着病，魯迅親自把「海上述林」上卷拿到內山書店託內山先生寄到東京去付印。景宋女士請求代勞，他說：「還有許多細節，需要面談。」於是他便走出門去了。

從二十五日起，每天下午或晚間，須籐先生都來到魯迅的寓所，來注射荷爾蒙之類的針水。病勢漸漸嚴重起來了，魯迅整天靠在籐輪椅上，不言不語，隨便什麼東西，都不想吃了，連牛奶、橘子水都通通不吃。

二十九日，下午須籐先生又來注射，並且注射強心劑一針。

自從注射強心劑之後，第二天似乎稍有轉機，吃東西也稍有一點味道。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國D醫師來替魯迅診病，茅盾先生譯語。這位D醫師是上海的唯一的一的亞洲的醫肺病專家，經過他打針，聽診之後，他說魯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國人；然而情形卻十分危急了，倘若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就要死掉。於是史沫特黎女士就力勸魯迅趕緊入醫院，先醫三個星期，然後離開上海，什麼也不做，轉地養病一年。但是，魯迅卻說：「現在已經好些了。」

他不願意離開這鬪爭最劇烈的上海，更不願意離開這正在水深火熱中的祖國和人民。

六月，他又病倒了。自此以後，比以往更嚴重了，起坐都覺得有些吃力。五日，宋慶齡女士寄了一封信來，勸魯迅必須趕快就醫道：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厲害的消息，十分關心你的病狀！我恨不得立刻來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腸的傷口，至今尚未復原，仍不能夠起床行走，迫得寫這封信給你！

『我懇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延遲一天，便是說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爲着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爲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個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狀的，當我得盲腸炎的時候，因爲我厭惡入醫院，竟拖延了數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時，才迫着入院了，然而，這已是很危險的時期，而且因此，還多注了

六個星期的時間，假如我是早進去了，兩星期便可以全癒出院的。因此，我萬分盼望你接受爲你耽擱着，感覺着極度不安的朋友的懇求，馬上入醫院醫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內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斷的供給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

祝你

痊安！

宋慶齡六月五日

秋天來了，魯迅的病體又好些。八月初，他似乎有出國醫病的打算，但是，終沒有實現。他又開始工作了，然而他已經十分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不行。在他的九月五日作的雜文「死」裏面，魯迅寫道：

「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輪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

於是，他就在這篇雜文裏，立下了一個遺囑，都是留給親屬的，一共有七條：——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最後，這篇文章裏，魯迅又寫道：

『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十月初，魯迅的病似乎真的好起來了，體重也略略增加一點，他也偶爾出來看看電影或是訪朋友小坐一會兒。十月八日這一天，他還到青年會去參觀第二次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這天，白危先生也在場，他詳細地描寫道：

『十月八日是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最後一天。約莫下午一點鐘，在熱鬧的會場中擠來了一位身材短小，蓬頭亂鬚的不大惹人注目的老頭子——那便是魯迅先生。他穿了慣常穿着的藍長衫，

料子雖然是唾淺，但已經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許因為少洗的緣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蹟，一頂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過十年以上，卻還摺疊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的戴在頭上，而且戴得那麼低，彷彿怕遇見了貴人。

「但這不能回避熟人的視線，當他踏進會場時，就默默地給人包圍住了。」

「……」這是一片亂雜的笑聲和問話，大約是問他近來還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個月中，足足大病了六個月。」

「近來好了麼？」L問。

「稍爲好一點，不過也還時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

「現在也還繼續服藥嗎？」C問。

「服的。……害肺病真沒辦法，要是我年青倒還有法子想……」說到這裏，一陣乾咳把他的話尾捲了進去。

「先生可打過空氣針？」W問。

「那沒有，那沒有。打的都是藥針，一共打了六七針。現在可好一點。」

「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色顯得有點可怕。」

「先生應該休養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

「呵，我是不能休養的」他把帽子除下，繼續說着，堅決地否認這話對他有關係，「我怎麼能

够休養呢？像我這種人是無法休養的。」

「他伸手到衣袋裏抓，很久才抓出一個恰如盛瓜子的紙袋，這很引起人們好奇的視線，都集中在他那癢癢的兩手，彷彿要看從那裏變出什麼戲法來，我卻以為他帶來的是藥片，所以問他要不要開水。但終於也不過看他從那袋裏摸出一支香煙。到後來竟連香煙灰也彈在裏面，這才驚奇起來；那紅錫包的盒子那裏去了呢？」

「很久沒有在內山書店碰過先生了。」有人插進來問。

「是的，我也差不多四個月沒有到過內山書店了。」

「他又抽了兩口香煙，默默的注視著展覽的作品，這時不知怎麼一扯卻搭上他的孩子身上去。」

「已經進學校了。」他說，「聽說那個學校的先生要打掌心的。」

「停了不到三秒鐘，又彷彿發現了什麼似的，把肯定的眼光變爲疑難的神色了。」

「現在也還要打掌心的麼？」

「是的」。L答。

「爲什麼要打掌心呢？」他望了我們一眼，現出奇怪的狀態，「孩子是最怕這種刑罰的。」

「在這語氣中，他表示出對於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病非常痛惜，尤其關心兒童教育問題。」

「話匣子一經打開，就如播音機，非到適可而止的時候，便不能住口。你看他雖然大病了六個月，氣色變得蒼白，消瘦，但那有力的談話，那種鏗鏘的精神卻絲毫也沒有減少，而且說的那麼多，」

那麼快，令你連喘息的時間都不能輕意放過。只在他說了一大串之後，這才露出久病之後的殘痕；呼吸迫促，下顎和太陽穴的不自然的痙攣。

「談到翻印畫冊，他就現出稀有的快活，笑得兩眼變成一條縫。嘴巴卻露出一列雪白而整潔的牙齒，下巴也跳躍的更厲害。」

「我總是吃虧的。」他說時非常高興；笑得連筋肉都牽動起來，兩額凸出更高，「幾乎每印一次畫集，我都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士之圖」……這些，現在，現在通通都送光了。」

「一支香烟剛好抽完，第二支又接上去。」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現在住在那裏？」W問。

「她現在已返德國。希特拉自然要抓她的，不過，大約已經訂有條件；不准教書，不准出版畫集，只要她安分守己的做一個賢妻良母。」

「還有那位刻「士敏士」插圖的梅斐爾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拉的仁政之下了，」他有點惋惜，他說，「我所以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畫，就因為世界上的女作家只有她最前進最值得我們介紹；現在那畫集都送完了，可惜沒有閒錢來再版。」

「提起蘇聯的木刻。他說，家裏雖然還收藏了不少，但苦無時間和閒錢來翻印。問他能否拿來公

開展覽，他總是搖著頭，說道：

「這恐怕很困難。譬如在這裏，×××一定要和我搗蛋的。」說到這裏，嗓子提得特別高，神氣也更嚴肅起來，「借用日本人青年會麼？日本領事館要看，不成。那一次（係指一九三三年冬在靶子路日本人青年會舉行的法俄書籍插圖展覽會——著註）所以把蘇聯和法國的出品拉在一處，就是爲了使他們看了莫明其妙。」

「他大笑起來了，笑聲淹沒了一切。」

「因爲說話說得太真實，太懇切，或者太露骨吧，所以每每引起聽衆的各式各樣的哄笑，而他自己也一樣無邪氣的傻笑着。」

「談話稍一間斷，他總是出神地釘住壁上的圖畫，儼如天文學家觀察星球變動。」

「先生以爲這回的作品怎樣？」C問。

「自然比前進步了。但也還有許多缺點，這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力不夠的緣故。這毛病應該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則，就決不會有長進。譬如描繪一個人，雖至最小的部分，簡單的動作，也要仔細觀察，然後才能描得像，才能成爲一件藝術作品。」

「當抽完了第三支香煙，他站起來，扭了扭呢帽，隨手的敲在頭上。」

「看下去吧。」他跨開了穩健的步子，走近牆壁面前去了。「這是誰的呢？」他指著李樺的八

十八幅的連環畫「黎明」。

「真是李樺的。」S答。

「真是洋洋大觀！」他歎了口氣。

「先生覺得怎樣？」C問。

「我以為連環畫是無須乎這麼多的，」他袖着兩手環顧了四週，這時包圍着他的人更多，大家張着嘴巴往前慢慢擠，希望看見他一條鬚鬚或者聽聽他的聲音。……

「連環畫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者應該注意到讀者，並非多產就是傑作。多產的結果往往倒是濫產，徒然耗費精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刻人物要刻到像中國人。不必過於誇張。藝術是須要誇張的，但誇張透了，反變成空虛。……」

「刻木刻要緊的是素描的基礎，作者必須每天練習素描才有進步，而且觀察要準確，取材要調和。農民是純厚的，不必把他們塗得滿面血污，矯揉造作。」

「真是奇怪得很。怎麼他（指李樺）刻的人物通通都是額門那麼低的？難道廣東人的額門都是那麼低的麼？」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我們，又大笑起來。」（許一）

這之後的一兩天內，魯迅又會到上海大戲院去看過由普式庚的小說做成的影片「杜勃洛夫斯基」

（「復仇艷遇」）。看了之後，他覺得非常高興，幾天中間，逢人便要稱贊一番。

「後來聽見夫人景宋女士說，看了那以後的先生是高興得好像吃到了稱心的糖菓的小孩子一樣。」後來，胡風先生在追憶中，他這樣寫道：

「當聽着先生底高興的稱贊，我這樣說了：

「杜勃洛夫斯基」和「卻派也夫」（「夏伯陽」）所說的人生雖然不同，但在影片製作的手法上有一點卻很相像，在結尾處，「卻派也夫」用的是報仇的幾炮，「杜勃洛夫斯基」用的是復仇的一鎗……」

「先生馬上接下去——

「是呀，我當初爲什麼不曉得爲什麼那樣地覺得滿意，後來想了一想，發現了那最後的一鎗大有關係。如果沒有那一鎗，恐怕要不舒服的，可見惡有惡報的辦法有時候也非用不可……」

「於是先生笑了，笑得那麼天真，只有在他底笑顏上面才能够感覺到的。抖卻了所有的顧慮，昇華着全部的智慧，好像是在蒼勁的古松上綻開了明艷的花朵。（註二）

十六日，魯迅還爲着曹靖華先生譯的「蘇聯作家七人集」，作「蘇聯作家七人集」序，並且還能够寫信給曹靖華先生。

（註一）見「全集」第六卷第六一三——六一六頁。

（註二）見「悲痛的告別」。

十七日，魯迅精神很好，還出門去訪問鹿地亘，內山完造先生們，在北四川路走了一趟，覺得十分舒暢。但是，卻受了一點涼。晚間周建人先生來了，還談到搬家的事情；因為他住在大陸新村九號那個地方的附近，就是日本軍隊的司令部，在精神上他是感覺到十分不痛快的。這時，戰爭空氣已經很緊張了，魯迅感覺到住在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是不妥當的。他堅決地主張要搬到別處去。

「房子只要你替我看去定好了，不必再來問我。」當時他對建人先生這樣說，「一訂下來，我就立刻搬，電燈沒有也不要緊，我可以點洋燈。搬進去後再辦接線手續。」

說着他便拿起筆，寫了「周裕齋印」四個字，下面又畫了一個方形，一面又說道：

「你就替我去刻照樣大小一顆印子，如房東要訂立合同，你替我代訂，就用這個印子。裕齋這號我本來會用過的。」

一面套上筆套，又說：

「裕字好像應該有兩點；但刻字店裏橫豎要寫過的，隨它去了。」

於是，他也就沒有改。（註二）

十一時前後，周建人先生回去了。後半夜三點鐘，魯迅忽然又病倒了。沒有什麼特異的現象，祇是氣喘得厲害。

老醫師須藤先生在「魯迅先生病狀經過」裏，這樣的記載道：——

「十月十八日。午前三時喘息又突然發作，午前六時半來診，當時即以跪坐呼吸營救，病者顏色

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纖弱，尤以吸氣爲短微，體溫三十五·七度，脈細一百二十左右而軟弱，且時常停滯。腹部扁平，近兩肺處診聽有喘鳴，加以應急處置之後始稍轉輕，其不穩狀態亦似稍緩。午后二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間，脈軟弱，一一〇至一一四。體溫下降，爲三十五度左右。病者聲音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乳百公分。右肺喘鳴盡去，左肺亦然，診察左胸下半部感覺有高而緊張之鼓音，肋間亦覺陷落少許，心臟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爲心臟下方右傾，肺動與脈搏二音如稍充進，諒已引起所謂「氣胸」(Pneumothorax)，由此病狀，以致雖儘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前五時起，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臟麻痺而長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死了，年紀只有五十六歲。這天下午三時遺體被運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暫停在二樓上。

二十 到二十二，讓各方人士前往瞻仰遺容。二十二日下午兩時三十分啓靈，原來擬定的路線是：膠州路、赫德路、愛文義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虹橋路，然後到萬國公墓。結果是捕房深怕擾亂秩序，沒有答應，後來只得由膠州路、極思非爾路、地豐路、大西路、虹橋路到達萬國公墓。

(註一) 請參看周建人先生作「關於魯迅的斷片回憶」。

走在行列的先頭的，是由歐陽山、蔣牧良兩位先生以及別人交換地執掌着『魯迅先生喪儀』一幅特大的橫額。接着是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遺像，靈車，家屬車，執紼者，徒步送殯者，送殯汽車。爲了行進時的便利，序列有時也略有更換。

在租界區域內，巡邏在行列兩邊的是駕着卡車或是騎着大馬的外國巡捕，也有徒步的巡捕，他們耀武揚威地掛着鎗。走到了中國界的虹橋路，便由黑衣白纒腿的中國警察接替了。他們的長鎗也全都裝上了刺刀，短鎗也掛好了把子。然而，這送喪的行列卻是鎮靜的。在這行列裏，不僅是有經過戰鬥的男女工人、學生，以及文化工作者們，此外，還有鬚髮蒼白的老頭子們，也有天真純潔的小孩子們，他們心裏都明白，爲什麼要向這位民族的巨人，致他們的最後的敬意。他們連綿不絕地合唱着送葬歌，歌聲在沉痛的空氣裏低啞而又陰沉地流動着。在四點半鐘到達了墓地。

由蔡元培、沈鈞儒、宋慶齡、鄒韜奮、內山完造、……諸位先生們作了關於安葬的演說；由上海民衆代表獻『民族魂』白地黑字的旗子一面，覆在棺上；由胡風、巴金、黃源、歐陽山、曹白、鹿地耳、……諸位先生們抬棺入穴。在一片沉重哀痛的歌聲裏，魯迅的靈柩，輕輕地落進穴裏。

黃昏漸漸蒼茫，夜來了；西邊天畔的月亮還沒有滿弦，深秋的風吹動墓地裏白楊和梧桐的葉子，嘶啞而又低沉的歌聲輕輕地沉向了遠天！

魯迅雖然是死了，但是他的精神活着，他的事業活着，他的遺言活着。活在我們每一個不願意做奴隸的中國人民的心裏。

然而，魯迅死了，這卻是我們中國人民大眾嚴重的損失，無法補償的損失。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對於整個中國人民大眾來說，魯迅的重要和偉大是無可比擬的。要說明魯迅的重要和偉大，任何一個比喻都是不恰當的，因為是不論怎樣的一個比喻，牠只能說明了魯迅的部分的真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這原因是魯迅實在太偉大了，他所盡的社會作用和歷史任務實在太多了。

「魯迅先生的在中國的五四運動中的出現，就完全好像伏爾泰在法國啓蒙運動中的出現。」徐懋庸先生曾有過這樣的比喻，接着他解釋道：

「伏爾泰的生前，儘憑怎樣地遭放逐，下獄，幾乎每出一冊書都被政府和教會的詔媚之徒查禁，然而他畢竟替他的真理猛烈地打開一條道路。他終於使得君主們教皇們都去奉承他，巍巍的寶座在他的面前發抖，半個世界留神傾聽他的每一句話。他用了獅子的大笑，毀滅了一切舊物。他以「透闢的智力化憤怒爲嬉諷，化烈火爲光明」。魯迅先生的一生，雖然不會受到政府和禮教派的奉承，但是其他種種不是跟伏爾泰完全相同的麼？」（註一）

史諾 (John Snow) 也有過同樣的比喻，他說：

「他（魯迅）以一支深刻，殘酷的筆，冷嘲熱罵的撕破了「道學家」的假面具，針砭了一切阻滯

（註一） 見「魯迅先生又，比」。

中國民族前進、發展的封建餘毒。像託爾斯泰寫他的「慈善德」(Caritas)的動機，是爲了打破「定命論者」的謬說——永久的「寬容」；魯迅也藉着阿Q的人生觀來譴刺中國人的「定命論」，對於「寬容」，……一切環境的不良，伏爾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寬容」的，他燃起了法國革命。同樣的，魯迅是更努力的在激發中國大眾的情緒來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質上，不可忍受的痛苦，拿魯迅與伏爾泰相比擬，真是最恰當不過。」(註一)

這一個譬喻是含有部分的真理存在着。

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國新文學的創立上，尤其是在文學語言的創造這一方面，魯迅是又可以和俄國的普式庚相比的。蕭三先生曾說過：

「魯迅奠下了新文學的基礎，寫實主義的基礎，魯迅是中國新文藝的創立者和始祖。他的最高的藝術給予了中國新文化以極大的貢獻，——在這一點上，他作了普式庚對於俄國新文化所作的事業。」

「魯迅對於中國文壇之又一最大貢獻，是他所採用的形式和他用來寫作的文字。魯迅將戰鬥的短篇小說提高到了道地的「藝術高度。在這以前，短篇在中國似乎沒有人文學的資格。」

「魯迅的文字爲當時『文言白話』之最簡潔，最鮮明，最有力的文字。他的說話活潑，通俗，全出自中國人民大眾。『五四』時代之所謂「文學革命」在形式上是文言與白話的文字之爭，而魯迅卻是第一個用白話文創作的藝術家。『狂人日記』一出，壓倒了文言文的優點。因此，魯迅是中國白話文文學的創始者。」(註二)

歐陽凡海先生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

「如果普式庚是俄國語言底創始者，那麼魯迅先生應該是中國白話文底創始者。魯迅先生底「狂人日記」出現之後，白話文才在抒情上，描寫上，總之，對文言文的許多優點，取了壓倒的攻勢。白話文到這時候可以對文言文誇耀任何方面都不弱於文言文。因此，之乎者也之類的古董，才不能不在白話文底優秀的雄姿之下低頭。」（註三）

在另外的又一方面，魯迅對於整個中國文化的貢獻，他又相當於蘇聯的高爾基。在「紀念魯迅」裏，蕭三先生又寫道：

「中國的人民稱魯迅爲「中國的高爾基」。的確，在世界偉大的作家中間，我們只有將魯迅比之高爾基爲最適當。如同高爾基，魯迅善於恨，亦善於愛；如同高爾基，魯迅充滿着對於人民的撫愛，對於新羣，新社會的熱望；如同高爾基，魯迅奠下了中國新文學之新的基礎，領導着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生活；如同高爾基，魯迅教育了，培養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如同高爾基，魯迅是一向詞嚴義正，一絲不苟的；如同高爾基，魯迅的工作能力偉大，好學，博學，無時或懈；如同高爾基，魯迅指示了青年的道路，擎舉了中華民族解放鬪爭的旗幟，呼醒了中國民衆齊心合力爲抗日救國而前進。在高爾基

（註一） 見「中國的伏爾泰」。

（註二） 見「紀念魯迅」。

（註三） 見「關於研究魯迅先生的幾個基本認識的商榷」。

死去幾個月後，又死去魯迅，是這全人類莫大的損失！」

在另外的又一方面，魯迅在我們傳統的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光輝不朽的，還在魯迅的生前，武定河先生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他說：

『在文學者的人格與人事關係的一點上，魯迅是和中國文學史上的壯烈不朽的屈原，杜甫，陶潛等，連成一個精神上的系統。這些大詩人，都是有着偉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會熱情的人，魯迅在思想上當然是新的，不同的，但作爲一個中國文學者，在對於社會的熱情，及其不屈不撓的精神，顯示了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魯迅是相承了他們的一脈的……』(註一)

魯迅逝世後，郭沫若先生在他的紀念魯迅的文章裏，也曾說道：

『考慮到在歷史上的地位，和那簡鍊，有力，極盡了曲折變化之能事的文體，我感覺着魯迅有點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但魯迅的革命精神，他對於民族的榮譽貢獻和今後的影響，似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註二)

雖然這一些都是比擬，但這一些比擬卻都是事實。在中國近代啓蒙運動史上，魯迅確乎是某些地方和伏爾泰是相似的；尤其是在五四運動的時候，魯迅站在反封建反舊禮教的最前列，他是摧毀舊制度舊偶像的急先鋒，爲着新思想新文化打開一條出路這一點上，他們兩個人是非常相似的。在近代中國文學語言的建立上，魯迅確乎是有某些地方和普式庚是相似的；尤其是在新的中國文學語言剛剛萌芽的時候，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把固有的優秀的文學遺產裏面的，一直到現在還活着的語言巧妙地吸

收過來，運用出來，並且運用得特別合適，特別有力，特別生動，叫人不覺得牠們是古代的過去的東西，魯迅賦與牠們以新鮮的生命。魯迅又把現代的活生生的口語引用到他的作品裏面去，同樣的，他應用得特別恰當，特別靈活，特別精緻，就是自命高雅的不凡的人物也不覺得牠們是簡陋的粗俗的東西，魯迅把牠們提鍊成精粹的文學語言了。接受了舊的文學語言，採擷着新的文學語言，魯迅爲着中國的未來的文學語言，奠下了一個穩固的基石。在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史上和教育青年的工作上，魯迅也確乎有很多地方和高爾基是相似的；尤其是在這正在戰鬥的途程上，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魯迅不但是間接的或直接的，精神的或是物質的幫助了這一個偉大的鬥爭，而且是參加了這一個偉大的鬥爭。推動了這一階段的歷史向前邁進，他本人便是一個最勇敢最堅決的爲真理與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在這鬥爭中，他又教育了培養了成千成萬的青年戰士們。在中國的每一個青年人的心目中，魯迅變成了真理、光明、力量的化身，有了魯迅，才有了以他爲中心的青年的中國的新文藝的陣營，有了魯迅，在中國才現出了真正人類黎明期的新文化的曙光。在傳說的中國文學史的地位上，魯迅是有某些地方和屈原、陶潛、杜甫，……相似的；尤其是在他的生活、工作、作風上，魯迅接受了中國的前聖先賢的許多的美德，形成了他的完整的光輝的人格。作爲「人」的魯迅，他集所有中國人的優點的大成，他是一個標準的中國人。

(註一) 見「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

(註二) 見「寫在菜油燈下」。

和這一些意見相反，是在魯迅死後才站出來的『英雄』們的『批評』。在這些『英雄豪傑』之中，最勇敢最出色的有兩位：一個是魯迅的生前的（也是死後的）敵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梁實秋教授，一個是新起家的御用批評家鄭學稼先生。此外，許多縮頭縮腦，吞吞吐吐的小嘍囉不算在內。

『偶從書店走過，看見「魯迅全集」很整齊的放在架上。』梁實秋帶着蔑視的態度和輕薄的口吻指責道，『那編製的方法很是新穎，因為翻譯小說和文章也列入全集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雖然費茲哲拉德譯的「魯拜集」是一向被收在譯者的全集裏面，那是因為實際已近於創作的原故。魯迅的創作只有短篇小說和雜感文，似乎還不能和高爾基比。「人間世」上曾刊出蕭伯納與魯迅合影，魯迅先生矮一大樞子，在作品上亦然。但是以魯迅先生的才力，如果天假以年，而不再浪費精力於無謂的論爭，他的成就將不止於此。』（註）

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魯迅全集」編製的方法並不『新穎』，倒是梁教授的看法卻是非常『新穎』的，——好一個『新穎』的成見！對於費茲哲拉德譯的「魯拜集」收在譯者全集裏面，卻不敢稍有微辭，據說『那是因為實際已近於創作的原故』。其實，魯迅的翻譯，何嘗又不是『實際已近於創作』呢？

蔡子民先生曾有過極公正的論斷，就在他的「魯迅先生全集序」裏，他寫道：

『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

不快。但彼既博覽而又虛衷，對於世界文學家之作品，有所見略同者，盡量的逐譯，理論的有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之「藝術論」等；寫實的有阿爾志跋綏夫之「工人綏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靈」等，描寫理想的有愛羅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話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謙而勤了。」

這種「借他人之酒盃，澆自己的塊壘」的用心；在翻譯上，「有時因了原本字彙的豐美，在中國方塊字裏面，找不出適當的句子來，其窘迫於產生的情況，真不下於科學者的發明」的努力，梁教授的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就能抹殺了麼？

其次，我們再談梁教授所惋惜的「他的成就將不止於此」的問題。這也是非常可笑的事。爲什麼魯迅要「浪費精力於無謂之爭」呢？魯迅的精力果真「浪費」麼？這些論爭果真「無謂」麼？在現在，人們只要不是瞎子或聾子，或是白癡，那末，這些論爭的是非，論爭的有謂「無謂」，精力的「浪費」與否，這一些已經是清清楚楚的事實，擺在大家的眼前了。歷史不是證明了魯迅的「謾罵」幾乎都成了預言了麼，這是無法抵賴的。

再其次，魯迅的作品誠然是沒有高爾基或蕭伯納的多，可是事實上也沒有「矮一大撮子」，他們的價值卻也並不在高爾基或蕭伯納之下。魯迅的作品對於中華民族的貢獻相當於高爾基對於俄羅斯民族的貢獻，魯迅的作品對於中國人民的鞭策是要超過蕭伯納對於大英帝國的臣民的鞭策的。這大概是誰也不會否認的事實罷。

不管你愛他也好，你恨他也好，你讚揚他也好，你詛咒他也好，魯迅這位民族的巨人總是站在你的面前了。——他站在從今天到明天的路上。

魯迅的出生成長和發展，這幾乎成爲一部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縮影；他一生的轉彎抹角，紮紮實實地一步一步走向真理和光明，象徵着整個的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鬪爭底迂迴曲折的方向；他一生中的追求、沉默、吶喊，彷徨和戰鬪，又恰恰反映着中國人民大眾一致的和普遍的意志和信念。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要算是中國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新中國的聖人。」

這就是魯迅在歷史上最真實的評價。

踏着這一個偉大的聖蹟，循着這一個正確的方向，我們向前邁進罷！

